

目 录

- 1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
——从塘沽协定到芦沟桥事变 中村隆英著
王玉平 唐克俊译
- 68 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 易劳逸著
徐有威译 余子道校
- 102 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探讨 Γ·卡拉—穆尔扎著
吴永清译
- 157 陈公博——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民党理论家 索外超著
张士义 刘德喜译
- 173 斯内夫利特和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由来（1921——1923） 安东尼·塞奇著
刘廷国译 林海 李玉贞校
- 203 魏德迈在华回忆录（续） 林海译
- 237 新文化运动回顾
——新文化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社会革命观 阿里夫·德里克著
刘勇译 何祚康 韩红校
- 284 民国时期上海杰出人物生平学研究初探 白吉尔 康诺葛 安克强 何佩然著
黄庆华译
- 317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形成 薛衔天

- 330 共产国际的活动经验 Ф·菲尔索夫、K·希里尼亚著
丁如筠译
- 346 1986年日本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久保亨著
郭新嗣译 孙国群校
- 357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一） 黄光域辑录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①

——从塘沽协定到芦沟桥事变

中村隆英

一、前 言

1933年春，关东军越过长城，开始侵略华北，在弹指可取天津、北平之际，中日双方缔结了塘沽协定。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军事行动至此告一段落。协定主要内容有四：中国军队从连结北平、天津、塘沽的北宁线、长城与渤海而形成的三角地区（即所谓交战地区乃至冀东）撤出；日军飞机随时检查撤出的情况；在确认完全撤出之后，日军根据“自主的原则”把长城以南的地区归还中国；该地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双方还确认长城一线为满洲国的国境线，冀东地区为缓冲地带。进而亲日派黄郛主持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中日关系大体安定下来。

1934年至1935年初，满洲国与华北之间的通车问题，通过第三者东方旅行社的斡旋，得到解决。邮政、电报、电话等业务往来重新恢复，国境过关问题达成了协议。1935年春，中日双方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中国开始重新偿还旧债，中日之间的悬案向着解决的方向发展。^② 由于退出国联而使日本与欧美冷却的关系，也在逐步转暖。1934年7月，广田外相提议缔结日英互不侵犯协定。同年9月，英国派出了以巴柏爵士（Lord Baruby）为

① 原文标题为《日本的华北经济工作》。作者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译者

② 岛田俊彦：《华北工作与调整邦交》，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分会编：《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3卷《日中战争》（上），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46—66页。以下略为《日中战争》（上）。

团长的产业联盟代表团，到满洲国调查贸易与投资的可能性。这些都表明包括复活英日同盟在内的改善英日关系的活动正在试探地进行着。^①苏联与满洲国之间关于转让中东铁路的谈判，经过长期拉锯，最终在1935年1月缔结了协定。另外，英、比、法等国的企业与个人对满洲国的投资及参与建设开发事业的计划也屡屡见诸报端。以上这些规模虽小，但毕竟有付诸实施的。^②这样一来，满洲国逐渐在事实上得到承认，中日关系，日本与欧美的关系也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但是自1935年中期，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重新活跃起来。以何梅协定为开端，关东军、中国驻屯军、满铁，以及名义上是满铁子公司而事实上独立活动的兴中公司都再度开始了军事与经济侵略。东京的陆军省与政府也引为同道。1936年成了对华北进行全面经济侵略之年。在中国方面，因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抗日体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从而使中日关系发展到了注定破裂的地步。对此，东京于1937年春反省了两年来的蛮干活动，开始推行绥靖政策，可惜为时已晚，7月便爆发了芦沟桥事变。

二、侵略的孕育阶段

眼前的缓和，对关东军、中国驻屯军、满铁实施侵略华北的计划，都不具有约束力。倒不如说这种形势把东京蒙在了鼓里，闲置起来。前述三者间互相联络，推敲侵略计划，开始了进一步

① 细谷千博：《关于1934年的日英互不侵犯协定问题》，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英关系史的展开》，有斐阁版，第77—80页。

② 例如为开发满洲国，法国的摩班公司与日本的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合办的公司成立（见1934年11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比利时的那潘安男爵在对满洲国投资问题调查结束后，于9月17日抵达神户（见1934年9月18日《大阪每日新闻》）。关于英国的斯列克逊托拉斯与满洲产金的互助协作决定的理由（1934年11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等新闻报道散见于当时的报纸，但是此事的成果，至今尚未找到。

侵略的准备活动。

1. 满铁侵略华北的野心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满铁就配合关东军，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起草了满洲国的经济开发计划。因此，满铁地位进一步提高。根据“一行业一公司”的开发原则，满铁成了经营煤炭、机械、矿山、电信、电话等行业经营体的大股东。同时满铁还成了从日本国内转入资本的导管。尽管满铁打出“不向财阀发展”的旗号，^①但满铁的作法仍招来日本国内财界的反感，使其招徕资本的成绩既不称心，产业开发的成果也不如意。随着为关东军与满铁搭桥的板垣与石原相继调离满洲，关东军迎来了武藤信义任司令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的时代。加上星野直树等从中央机构派来的官僚集团到满洲国政府任职，使满铁的影响日见减少。1935年5月，陆军决定的《满洲产业开发方针纲要》，其中就包含改组、扩充满铁的方案。其要点是把满铁“作为一个大控股公司，将它与其资本控制下的各产业部门的子公司”分割开，控股公司对子公司是母公司，在金融方面加以控制，但在重要职务的人事安排、利润分红、事业规划等方面的决定，必须得到官方监督人——关东军司令官的认可。由于这一方案分割满铁，使其经营的各种事业相对独立，从而加强了关东军对满铁的监督。所以当7月13日这一方案作为最后通牒送交满铁总裁时，引起了满铁方面的强烈反对。这场争斗日趋白热化。10月23日，关东军特务部参谋沼田多稼藏甚至在汽车中公开谈论了这件事。由此可见这场争斗的严峻。在日本，政府机构和财界也强烈反对这一方案，满铁的债券只被认购了发行总额的1/4，股票价格暴跌。关东军见势不妙，以该方案“不成熟”为借口，暂时将其搁置起来。但是根

^① 原朗：《20世纪30年代的满洲经济统制政策》，载满洲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御茶之水书房1972年版第8—56页。据原朗说：“若对1936年前成立的所有专业公司或准专业公司的资本进行整理，……据说，满洲国政府、满铁各占1/3，其他资本仅占4/10。”（同前书第49页）由此可知满铁的地位。

据该方案围绕改组计划而达成的协议，在以后仍得到贯彻。同年2月14日，关东军和满铁以现场实际方案的名目，制订了与5月12日的控股公司化方案“差别不大”的《满洲产业开发纲要》，并提交陆军省。但是由于拓务省强烈反对，大藏省“犹疑观望”，使该纲要流产。以后该纲要的思想经过改头换目而实现时，是在1937年11月，鲇川义介的“日产”^①移到满洲，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之日。^②在此之前，1934年12月，通过驻满机构的改革，拓务省把对满铁的监督权移交给日本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而关东军司令官便兼任大使之职。固然满铁在满洲国依然保持强大的统治力量，但它也不时地受着“控股公司化”魔影的威胁。

纵观以上情况，满铁把华北视为其事业的新对象，那是极其自然的。1933年至1934年，满铁已显露出对华北的“关心”，试举两例。

例1：1933年11月，满铁开始起草了《华北经济调查》计划，同年12月制订完毕。据此立即在天津、青岛、上海设立了经济调查会分会，以后又在北京、山海关、滦州、张家口、太原、济南、芝罘、南京、汉口、香港、广东设立了调查组。调查内容包括开滦煤矿、井陘煤矿、山西矿产、山东煤矿、冀东工业、华北的经济资源（如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麻药等）的供求关系、满洲对华北的贸易（关税问题）、交通、各国的权益、渤海湾的走私贸易、以至华北政权与平津财阀的关系等等。^③翌年5月，满铁在天津配备5人（其中1人预定驻太原），

① 日产全称估计为日本产业株式会社。——译者

② 关于改组满铁的问题，请参阅原朗：《从满铁改组与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的建立看满洲经济统制政策的演变》，载安藤良雄编：《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211—213页和第269页。

③ 《对华经济调查机关设置计划》（昭和8年12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支那立案调查文件，第2编第1卷之2。支那经济开发政策及调查资料》，第339—350页，以下简称《支立案212》。关于此问题，可参阅小林英夫：《占领华北政策的展开过程——以特约乙组的组成及其活动为中心》，载驹泽大学经济学会：《经济学论集》，第9卷第3号，1977年12月。

在青岛配备5人，另外还配备数名外出调查人员作为辅助进行调查。最后他们完成了对渤海湾地区化学工业贷款的调查，以及有关各种矿业、交通、贸易等方面的调查，提出了37种立案调查报告书。^①在这些调查项目中，由于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提议，遂把满铁的要求收入了对华北经济资源调查的计划。其方针为：“主要着眼于推动我帝国在华经济的发展，同时为我帝国战时贫乏的国防资源易于得到补充，也为在华北扶植与增进我帝国的经济势力及促进日满华经济区的形成等项做好必要的准备。”调查对象虽是整个华北，但须先从“比较易于施行的非武装区”着手。主要项目大致如下：“一、为扶植我在华权益，对中国方面的排外风潮、收回与确保权益等运动，提出对策；二、研究开发华北煤矿问题，附加调查长城沿线地区的各种矿产资源；三、调查华北的铁路、港湾情况；四、研究平绥铁路问题；五、为日本、满洲国、华北结成经济区提出参考意见；六、研究龙烟铁矿问题；七、调查华北的棉花、羊毛、皮革、石油等资源情况；八、调查华北的盐资源；九、为在华北的日本企业提出指导性对策。”^②该计划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驻屯军为主导经济侵略华北的设想。军方与满铁合作，分六组，按此计划对察哈尔省、山东省、平汉沿线、津浦沿线各地进行调查。这一调查在1935年以后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具体情况容后述。

例2：满铁理事十河信二在1934年3月与6月曾两次到中国旅行，随后拟就一个草案，即侵略中国的提案。其要点如下：（一）在华北设立运输公司，将北宁线延伸至山西，以补偿放弃沧石铁路路权的损失。设立中日合办的运输公司，令其经营中国国有铁路；（二）在华北与青帮合作，设立银行，大力进口鞍山铁矿以

^① 经济调查会：《中国经济调查概要》，昭和9年10月，《支立案212》，第351—360页。

^② 《调查华北重要资源与经济的方针及要点》，见《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致满铁总务部部长石本宪治函》，昭和9年10月23日，《支立案212》第384—399页。

及利用运输公司控制海陆交通机构；（三）在西南设立贸易公司，促进日本商品的输入，并开设银行，开展金融业务；（四）设立“对华投资公司”，与中国方面交涉前述计划的实施；（五）在中国本土为满洲农产品寻求市场。①

十河信二的设想估计为满铁内部所接受，并且刺激满铁更积极地参加中国驻屯军组织的调查活动。首先，满铁在1935年2月26日改组了下属的经济调查会，增设了第六部、综合组、基础调查组，负责对中国的调查。②同时，满铁总务部也增设了东亚课，担负满铁在除日本、满洲、苏联以外所有东亚地区“进行经济活动时所必需的各种涉外事务”。③到1935年后半年，因为对华北工作的迅速开展，经济调查会的第六部于同年11月22日解散，经济调查会的干事亲自坐镇满铁天津事务所，主持“调查华北经济”的活动，满铁侵略中国的体制至此正式建立。

此后，设立对中国投资机构兴中公司的计划，也开始具体化了。本问题不仅出现在十河的提案，其中更有关东军的总意。④满铁董事会于1935年1月26日确定了根本方针，2月3日决定设立公司总部，3月14日提出了成立申请。⑤从关东军、满铁和驻华陆军武官三方首肯的方案，可知兴中公司是根据“为统制对华经济工作，必须寻找一条途径，即通过直接实施的机关用直接的办法进行，而该机关一般是由国策机关委托民间资本组成”的原则成立的。具体说，就是动员满铁资本，设立兴中公司，以其“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直接从事对华各项经济事业的斡旋及对该事业的投资”等活动。⑥不料，该公司在创建过程中曾

① 十河信二：《中华民国经济状况视察报告》，1934年，自费打印本。

②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昭和10年满铁调查机关要览》，第265—268页。
满铁产业部：《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文件目录第1卷》，昭和12年9月，第9—12页。】

③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昭和10年满铁调查机关要览》，第21—22页。

④ 内海治一的发言，载满铁经济调查会：《关东军参谋关于经济调查第一次座谈会的记录》，昭和10年6月。

⑤ 兴中公司：《有关公司设立的经过》，昭和10年12月。

⑥ 同上。

意外地遇到困难，主要因为高桥藏相反对，使成立申请一直拖到8月2日方被批准。^①据说同年8月担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也希望满铁直接侵入华北，尤其侵略交通的愿望更为急切。^②根据这种愿望，准备在设立兴中公司的报告书中，规定总公司设在上海，在大连、东京、大阪、广东等地设立分公司，并在“将来需要的地区”设立分公司，奇怪的是华北竟是空白。兴中公司计划的业务，除把满洲的生铁、煤炭等输入中国，进行“日满华”之间的一般贸易外，“主要从事斡旋、调停，介绍满洲对中国本土各种经济事业的投资情况”。关于对中国本土的各种经济事业，以后根据对满事务局的指示，改为“对日满华三国的各项经济事业”。就这样，这个以十河信二为总经理，计划资本1000万日元，而实际只有1/4的苦命公司，这个计划庞大而又资金匮乏的公司，在与满铁的矛盾中，在风云变幻的中日关系中，呱呱坠地了。

① 关于兴中公司创立问题，7月13日，冈田首相对本庄繁侍从武官说：“外省与大藏省的低级官员都同意，只是老大藏大臣出于纯理论的观点表示反对，而且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本庄繁：《本庄日记》，原书房1967年版，第219页。）估计高桥的反对是他对以前开办这种投资公司均以失败告终事记忆犹新，因而对军部不信任。7月23日，冈田首相偕林陆军大臣拜访高桥，就兴中公司问题恳切地说：“此时，若唯一的满铁不能出资，那怎么也不能设立公司。鉴于当今的气氛，大藏大臣拒绝这样做。但是在无论如何也要复活军方统制的今天，您的做法大有反作用之嫌，故请您务必同意设立兴中公司。”结果，高桥总算是同意了。（原田能雄口述：《西园寺公与政局》，第4卷，岩波书店1951年版，第297页。）所谓“军方统制”的实现是以7月15日罢免教育总监真崎为标志的。据十河信二回忆，这时（十河把昭和9年与昭和10年混同，所以不太准确）十河与胡汉民计划设立中日合办的西南中央银行，但高桥大藏大臣认为，设立这一银行将会与香港、上海的银行发生竞争，成为日英纷争的苗头，因而予以反对，这一来设想便流产了。但是这反倒说明高桥对兴中公司的设立表示赞成。（《十河信二与大陆》，北条秀一事务所1971年版，第32—47页。）另外，关于西南中央银行问题，冈田首次曾回忆：在陆军大臣官邸召开的会议上，在高桥表示反对设立发行钞票的银行，说投资只限于促进经济开发，附带条件是军方不能将其用于谋略等活动之后，双方才达成协议。（冈田：《日中战争内幕》，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2页。）

② 十河说：“在满铁内部，存在着松冈论。……至少把铁路，甚至把满铁组织照原样搬到华北的松冈这一夙愿，大有人赞同。”见北条秀一事务所：《十河信二与大陆》1971年版。

2. 冀东走私贸易的开端

由于塘沽协定，冀东成了非武装区，该地区的走私贸易也因之猖獗。纵观满洲国与中国本土的正当贸易：1932年，满洲国输出额为1.83亿元满币，输入额为6100万元满币；1933年，满洲国输出额为7200万元满币，输入额为8000万元满币；1934年，满洲国输出额为6600万元满币，输入为5800万元满币；1935年，满洲国输出额为6500万元满币，输入额为3200万元满币。总的趋势是沿着萎缩轨道走下坡路的。萎缩的原因，固然要考虑1932年开始的剧烈的中国经济危机和双方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政治原因，另外也不能忽视通过非武装区冀东进行的走私贸易日益兴旺这一事实。以前满洲国地区对华贸易的主要途径是由大连或营口的海路运输，在总贸易额中输出为90%强，输入为80%。^①

关于从海路进行走私贸易的规模，据“某比较可信机关的调查”，1933年度走私出口人造丝为900万日元，砂糖700万日元，其他400万日元，合计2000万日元；1934年度走私出口人造丝600万日元，砂糖720万日元，其他200万日元，合计1520万日元。根据日元与满币的元等值，即便粗略地说走私贸易为正当贸易的二至三成，那也会使人产生“过少”的疑问。^②在陆路贸易中，满洲国输出的走私品有鸦片（每年约400万两）、人造丝（每年约100—200万日元）、盐、卷烟纸、呢绒、人造丝制品、哗叽类制品、药品、化妆品等。输入的走私品中，最大宗的是白银（包括大洋），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8月即达3000万两。^③满洲国之所以输入白银，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使白银价格暴涨。以人造丝为首的砂糖、盐等商品都是高税率商品，而且较易于运输，所以成了走私的热门货。附带说一下，中国海关的平

①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冀东地区的贸易概况与关税情况》（高见信雄执笔），昭和11年2月，《华北经济资料》第5辑，第61页。以下略称高见《贸易概况》。

②③ 高见：《贸易概况》，第113—116页。

均税率1929年为8.5%，1931年为14.1%，1933年为19.7%，1934年为25.2%，逐年上升。^①

——海路走私贸易的增加，是因为1933年8月大连海关“废除了预交保证金制度”（预交保证金制度是大连海关规定的一种制度，货物从大连港出口，必须首先交纳相当于同种货物进口税50%的保证金，然后凭登陆地区的完税单，领取保证金。大连海关就是用这种制度来防止走私的。），这一来帆船贸易活跃起来。1936年大连有帆船1.2万只，大部分用于走私贸易，其中甚至有以发动机为动力的。走私的方法是把货物进行防水包装，装上帆船横渡渤海，驶入大沽或塘沽等港口，然后把货物转入预先联络好的帆船上，避开稽查网的视线，把货物卸到岸上。因为冀东是非武装区，稽查人员不得携带武器，这一来，胆大包天的走私贸易便公开化了。^②

陆路走私，从满洲国出口，一般是在山海关前一站的万家店车站^③卸货，然后由苦力将货物背过国境线。1935年10月的具体情况是：每50至100名苦力编为一队，由10至20名日本人或朝鲜人手持木棒监督偷越国境。若与中国稽查人员发生冲突，则靠武力强行越境。从华北进口则是在山海关卸货，在同样的暴力庇护下越境。^④

以前的情况大体如此。1935年11月冀东政权成立以后，虽然也重视走私贸易，但这种活动公开化是在塘沽协定签字之后。

3. 关东军、中国驻屯军分割华北的计划

中国驻屯军在1934年11月策划调查华北经济资源一事，已如前述。至于其制订出达到何种程度的具体计划尚不清楚。本文试

①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冀东走私贸易的实际情况》（高见信雄执笔），昭和11年6月，《华北经济资料》第18辑，第4—5页。以下略称《冀东走私贸易》。

② 高见：《贸易概况》，第97—98页。

③ 今万家车站。——译者

④ 同①，第113—116页。

将关东军、中国驻屯军1935年5月以前，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侵略华北活动汇总一下：（1）塘沽协定缔结后，在关东军的指挥下，李际春部与石友三部等杂牌军大肆活动。^①（2）李守信部队以关东军为靠山，从1933年开始，离开多伦，到长城线以南成立冀东特别自治区，关东军也在那里设置了特务机关和顾问部。1935年冀东、冀察两政权配合，发动了察东事变，占领沽源、宝昌的就是李守信的部队。^②（3）1935年1月，以内蒙古德王为首成立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关东军为其靠山，另外还进一步在内蒙古各地设立了特务机关。^③（4）在天津设立了以大迫通贞为长官的关东军系统的情报阴谋机构，对外代号为青木机关。^④（5）在热河省，允许垄断汽车交通运输行业的坂田组利用关东军的势力，打通承德——北平间的军用汽车线路，想用它来从事定期的卡车运输，同时也用它来走私鸦片。^⑤

以上活动，许多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具体的侵略计划，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前述的中国驻屯军策划调查华北经济资源一事，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促进日本经济势力发展、扶持日本经济势力、结成经济区而“进行的必要准备”。从调查经济资源转到制定具体的侵略计划的时间，至少要推迟到1935年1月4日关东军会同帝国中枢各代表在大连召开的大连会议以后。接着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于2月考察中国，3月4日返回满洲国，3月10日便决定了“关东军对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无视国民政府向日本频频送去的秋波，批判外务省试谋响应国民政府的政策。对华北，奉行两项政策：“（1）利用塘沽协定及附属议定事项，公正地申明我国既得权力，以促使华北政权绝对服从。（2）密

① 《日中战争》（上），第53—54页。

② 松井忠雄：《内蒙三国志》，原书房1966年版，第16—18页。

③ 松井忠雄：《内蒙三国志》，原书房1966年版，第46、53—59页。

④ 有关青木机关活动的情况，可参阅川合贞吉：《一个革命家的回忆》，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版，第196、203—221页。

⑤ 满铁经济调查会：《关东军幕僚与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一次座谈会会议记录》（1935年8月）。

切今后以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关系，促进棉花、铁矿等产业的迅速开发与交易。”此外，还提议也要给西南地区以“物质援助”，理由是“为了把‘华南的经济界’控制于股掌之中，必须给予必要的经济援助”。^①

这一政策显然符合东京的想法。1934年12月7日，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的有关课长一致决定了《有关对华政策条款》，大要如次：以迫令中国“追随我日本帝国的方针”及“扩张我日本帝国在华的商业权益”为“根本方向”。达到前一目的“至为困难”，所以要致力于商权的扩张。特别是“对中国政权的策略”，倘若希望南京政府的政令受阻于华北，如不动用“巨大的实力”是很难办到的。为此决定一方面对华北政权施加压力和表示诚意，另一方面要“安抚人心”，致力于悬案的解决和权益的扩张，促使政府人事变动——亲日派上台和创造不仅不排日，而且是日满华协作的气氛。此外要通过“扩张商权”和“利诱各地方政权”的途径，进一步把工作对象扩大到实业界，促进“国民经济互助”。^②大连会议接连召开，东京方面也制订了与这完全相同的方针。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如今驻外军方也开始自作主张地干了起来。

三、侵略的发动

1. 何梅协定的实际存在

所谓1935年6月出现的《何梅协定》^③与《秦土协定》意味着年初以来就准备的对华北工作进一步具体化了。促成《何梅协定》的导火线之一是天津日租界两个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传说

①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1961年版，第327页。

② 《有关对华政策条款》，昭和9年12月7日。《日中战争1》，《现代史资料8》，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22—24页。以下略称《现代史资料8》。

③ 并不存在协定书，只有何应钦署名的信。

这是日本的阴谋，而非国民党蓝衣社所为，真相至今不明。^①但无论如何，日方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向中方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求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嫡系部队撤出河北省。随后在察哈尔省日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软弱的宋哲元部移防这一地区，为日本侵略华北提供突破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华北的经济工作，是根据5月14日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协定进行的。协定的全部内容虽然尚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说促使“关东军在基地召集各种财团（满铁、东拓、东亚兴业、朝鲜银行等），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一个小规模的开发公司（即后来的兴发祥）”。^②当时演成何梅协定的事件虽已发生，但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提出强烈抗议，那还是在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缔结协定之后。何梅协定的存在，足以证明事态是按照当地驻军的计划发展的。

从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1935年6月9日在满铁经济调查会上的发言可以生动地了解到当时的气氛。田中说：“军方反国民党蒋介石与进行经济侵略的方针，和外务省的亲善论并不矛盾，作为军方，即便不使用武力也可以进行经济侵略。”^③大致的方针是成立开发公司，^④顺利地发展业务，切断天津财阀与长江沿岸华中财阀的联系。尤其要设立银行，以控制华北的金融，进而置江浙财阀于死地，最终推翻国民党政权。“……军方要牢牢地控制冀东，……培植关东军实质上的主权。”“不仅河北，就是绥远、山东、山西也要”与冀东一样。根据田中的发言，中国驻屯军华北工作方案的内容是“向华北走私石油、面粉、棉纱、砂糖、人造丝，逐渐繁荣天津的国际运输业，收购鸦片以供应平津

① 《日中战争》（上），第98—120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1961年版，第15—36页。

②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华北新政权产生时开发经济领导方案》，《支立案212》，第97页。

③ 满铁经济调查会：《关东军幕僚与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一次座谈会会议记录》（1935年6月）。

④ 开发公司即以后成立的兴发祥。

地区”。在金融方面，“统一残存的中国银行，建设一家包括日本银行与汇丰银行在内的大银行，”以切断华北与外界的金融联系，同时让满币在华北流通。其时，田中正为兴办兴中公司而苦恼，为建立开发公司而受责难，^①他准备用建立兴中公司和与开发公司合并为理由来为自己辩解。此外，田中还询问经济调查会委员长河本大作究竟打算“怎样处理华北”问题，这个炸死张作霖的凶手答道：“嘿，依次制造混乱。”他还指责“日本以前过于拘泥情面，付出的代价太大”。虽说田中有可能言过其实，但也许正是这些话，出人意外地引起了益满体之助的注意。冀东的走私贸易，向华北陆路输出人造丝、砂糖和从华北输入白银，自1934年5月进入了最兴旺时期，而这一切大体上是沿着田中发言的方向发展的。

何梅协定之后，有关华北经济建设的报道相继出现，可谓鼓噪一时。《中外》6月15日报道了日华合办龙烟铁矿，计划成立5000万日元资本的辛迪加的消息。《东京日日新闻》公布了日本帮助华北发展经济的目标：（1）通过开发煤矿、铁矿，促进华北重工业建设；（2）繁荣天津、青岛等工业区，尤其要加强和扩大纺织业；（3）以集团为主的方式经营华北五省棉花种植业；（4）改良交通事业，创办日满华合作的产业开发公司。7月7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中国驻屯军顾问吉田新七郎农学博士的谈话：“关于成立兴发祥一事，不能考虑规模过大。交通、贸易等方面按部就班地搞方是稳妥之策。”关于兴发祥的成立，除了中央下令解散与兴中公司合并的指示外，其他活动似乎没有。^②日本《大阪朝日新闻》7月14日转载了天津《大公报》的消息说：“关于开发计划，中国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应该欢迎日本提供资本与技术协助。”7月18日，《大阪朝日新闻》在报道

① 开发公司即以后成立的兴发祥。

② 见《中央对内蒙及华北的领导》，《现代史资料8》，第501页，军务局长曾向关东军发出解散乃至合并的指示。

满铁资金周转问题时，透露了华北方面的预算为1亿日元。以上这些零碎的消息报道，恐怕都带有很大的希望色彩。日本驻北平的海军武官助理桑原重远对当时华北经济合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如下评价：在华北，虽然口头上有人说与日本互助，但认真考虑可能实现方案的人却甚少。^①北平市长袁良想与大仓组合作，引进日本的机械与技术，在北平郊外建纺织厂。根据袁良的提案，华北的实业家一行视察了日本。^②以后殷同访日，又提出了中日经济合作需要“悄悄地进行”的原则，否则易于招致外国和中央政府的猜忌。他还提出了建设若干难于实现的，需要投资30至40万日元的大规模企业的设想。这些实例在以后也是少见的。同年8月19日，南京蒋介石电令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人，“在处理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上，要鼓励河北人士，组成河北经济协会”。23日，王克敏等招集实业界人士协商，组成了以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天津汇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为代表的河北经济协会。王克敏认为，在中日之间的政治问题、外交问题解决之后应考虑提出经济问题。周作民也持有经济合作是“当务之急”的看法，但他认为“若会员负担会费而又要接受官方领导，这并不理想，须立足于纯经济而且是自主的行动”。中国驻屯军认为此行动是中国方面先发制人的手段，建立协会旨在抑制日本侵入华北。^③日本方面于10月成立了以高凌霨为理事的东亚经济协会以示对抗。

中国驻屯军的骄横，从7月29日《华北新政权产生时的开发经济领导方案》可见一斑。该方案首先对“此次中日谈判”所带来的“异常硕果”表示“欢欣”，同时指出“要紧的是向各方继续投资以便将来保持固定不变的权益”。方案还扼要地叙述了“既得权益的扩大及充实”和“获得新权益”的情况。具体方针如

① 日驻华大使馆副武官助理桑原重远：《关于在华北的日华经济合作论》，燕秘情报第4号，昭和10年。现收入岛田俊彦文件第42卷：《中国的财政经济》，藏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② 用的是河北经济协会的名义。

③ 原注不详。——译者

下：以华北全境为对象，“先后顺序是交通、矿产资源（煤）、农村问题及其他”。关于交通，决定首先建设多伦——平地泉、承德——北平等6条铁路线，然后开辟汽车运输线和空中航线。矿产方面是恢复龙烟铁矿、斋堂煤矿、山头煤矿及石景山炼铁厂的生产，收买乃至委托经营当时存在的纺织厂等。该方案真可谓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百宝囊。^①在此过程中，华北经济调查也大规模地开始了。

2. 华北经济调查的实施

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通过关东军要求满铁派一名经济调查会干事常驻天津，另外派若干调查人员到天津，组成中国驻屯军领导下的华北经济调查组。以“获得开发华北各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经济及中日经济协作的基础资料”为目的，关东军、满洲国、满铁经济调查会及日本驻天津调查机关共同接受了这一要求。满铁决定派经济调查部第六部的野中时雄为常驻天津干事，并与中国驻屯军协商派遣人员赴天津事宜。^②当时，身为满洲国官吏的青木实、毛里英子菟、矢野征记等21人组成了特约甲组，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南乡龙音等6人组成了特约丙组，它们都被派到天津；8月以后开始了调查工作。特约甲组的调查题目是“关于华北经济产业的开发及统制的研究与调查”，共分5部分，包括通货与金融、财政与贸易、政治与外交、产业、交通等。其内容估计是研究分离华北迅速成功之后的经济政策。对于特约丙组，直截了当地提出预测“在华北独立于华中的情况下”，关于华北的经济、金融、税制、贸易等方面的对策。甲、丙两组8月抵天津，10月结束调查，11月便交出调查报

^①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华北新政权产生时开发经济领导方案》，《支立案112》，第97页。

^② 中国驻屯军特约乙组：《华北产业调查文书第1编第1卷》，《特约乙组调查概要》，第1—9页。以下简称：《特约乙组调查概要》。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小林英夫：《占领华北政策的展开过程——以特约乙组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中心》，载驹泽大学经济学会：《经济学论集》，第9卷，第3号。

告，完成了任务。①这两组研究的课题，反映了中国驻屯军对前景表示乐观。而课题研究本身，我认为纯属急就章。很遗憾，目前只见到特约丙组呈上报告的一部分，尚未得其全貌。

更正式的调查是同年10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派出115人组成特约乙组，根据10月2日军司令部制订的《特约乙组调查纲领》进行的调查。该组的调查方针是：“根据日本帝国国防急速扩张的需要，根据对不可缺少的经济资源与经济势力进行扩充、加强的需要，根据不可或缺的主要经济部门开发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需要，制订出先于列强获得利权的具体方案。”此外还“利用余力进行一般的基础调查”。这115人分为矿业、工业、铁道、港湾、经济五个小组。例如矿业小组，以调查铁矿、石油资源为主，并提出若干“具体的企业计划”。对煤、金、银、稀有金属等矿藏，命令只调查“有利开采”的矿。组内小组的任务主要以“研究日满财政经济的现状以及将来调整对华北投资为当务之急”。其课题是：“如何加强并扩大日满系统的金融势力”与“金融阴谋”等。②中国驻屯军当时期待着新政权的建立，并渴望对其操纵，同时也寄希望于为扩大利权而进行的速成调查。但是，特约乙组自己制订的《特约乙组调查细目要领》却分门别类地举出了自己的目标。例如矿山小组的目标是：计划“在华北寻找用龙烟铁矿石炼铁所需的矿产，如石灰石、无烟煤、莹石、耐火矿物等；为将来发展日本工业而寻找所需的煤炭资源提供对策依据；寻找铅、钨、石棉等军需矿藏，对已指示调查的煤矿，若因调查影响产权谈判，或影响将要进行的产权谈判，则暂缓调查，俟机进行；对于石油，不过是对边境地区的油田和其他矿产资源进行概查”。联系满铁侵略华北的意图，可以看出这一《要领》被涂上了什么样的浓厚色彩。铁道小组也不例外，除对预定铺设的9

① 《特约乙组调查概要》，第402—414页。

②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特约乙组调查纲领》，《特约乙组调查概要》，第13—15页。

条铁路进行调查外，还要对已铺设的北宁、正太、平绥、津浦、平汉、道济、胶济等线提出现状报告与改善报告。由此也可看出满铁强烈关心调查之所在。^①

参加这一调查的人员在1935年扩大到288人，总预算达25650万日元。1936年，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接手了工业小组和经济小组的工作，与矿产小组、港湾小组、铁道小组一起继续进行调查。人员为169人，预算为66481万日元，并且增加了铁路沿线的给水情况及河川水运情况的调查内容。^②

关于工业小组的调查，由于“现场调查遇到困难和搜集的资料不充分，而未能获得满意的结果”。^③至于经济小组，因为是按照建立“华北五省巩固的独立政权”的设想工作的，而“新政权的亲日色彩又十分淡薄，加之独立政权的根基不牢固”，所以“在调查中，中止预定方案或仅仅圈定了调查范围的项目不少”。^④与此相反，铁道小组、矿山小组、港湾小组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虽然中国方面从中干扰，调查存在“粗细不一”的情况，但由于调查人员努力把握技术的与经济的实际情况，因而取得了相当圆满的成果，矿山小组针对26种矿产，对159座矿山进行了调查，判断其中53座具有开采价值。这个调查报告最后被汇编成85册。^⑤

在特约乙组的调查中，关于矿山、铁道、港湾等项目的调查都比较具体而详细。但在工作与经济方面，因为华北的政情和实际调查的困难，尽管预算庞大，投入的人力也很多，仍然未能取得圆满的成果。即便如此，调查本身已强烈地反映了满铁与中国驻屯军从经济方面进一步侵入华北的企图。芦沟桥事变之后，这

① 《特约乙组调查细目要领》，载《特约乙组调查概要》，第15—28页，

② 《特约乙组调查概要》，第60—85页。

③ 同②，第144页。

④ 同②，第146—148页。

⑤ 小林英夫：《占领华北政策的展开过程——以特约乙组的组成及其活动为中心》，载驹泽大学经济学会：《经济学论集》，第9卷，第3号，第201—202页。

些调查结果便成了军事行动与经济活动的基础。①

3. 华北政情与币制改革

1935年6月至年末，华北政情变幻多端，各方面的活动都在进行之中。据说，6月，关东军的土肥原要拉出吴佩孚，日驻华大使馆副武官高桥坦主张拉出阎锡山，中国驻屯军要利用宋哲元，另外还有人要拥立孙传芳。6月27日，大迫机关利用日本浪人组织“日本青年同盟会”，指使白坚武等人袭击丰台火车站，但此举以失败告终。而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于6月20日任命商震为津沽保安司令，接着又于25日委任他为河北省主席，此外还任命程克为天津市市长。7月，宋哲元及其部下被授与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他们在抗日战斗中的功劳。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同时解散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9月21日，宋哲元走马上任。早在7月，蒋介石就说过：“中央已决定由宋明轩将军负北方全责。”对于以上情况，吴相湘认为“当时，宋哲元既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充分信任；又是日本军人企图利用的华北头号实力人物”。②9月，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设宴招待日本记者团。席间，他发表讲话，大意说：为了“所谓华北明朗化”，不得已时“也可使用威胁力量”。“我军对华北的态度是横扫反满抗日分子”，使华北经济圈独立，利用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来防止赤化，为此要领导组成联合华北五省的经济自治体。③10月21日，以大迫机关为靠山的武宜亭在河北香河县

① 满铁的所有调查并不仅仅局限于开发资源方面。为了弄清“在高利贷商业资本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封建掠夺和畸形货币经济发达情况下，农民丧失土地和进一步分化，被饥饿和小农耕作紧紧地捆在一起的”情况，1936年还进行了“冀东地区农家实际情况的调查”。伊藤武雄在其《生活在满铁之中》（劲草书房1964年版）中曾评价这一调查是满铁调查课的知识分子“良心未泯”。此外，有关当时华北知识分子生活的回忆录《在中国的日本人》（梨本祐平著，同志社1969年版）也有同样的记载。关于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已列入满铁产业部的《立案调查文书目录》（1937年），第573—574页。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12—214页。

③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1961年版，第58—60页。这一谈话曾刊登在当年10月25日的报纸上。

发动了“农民自治运动”。随后，以天津为中心，得到日本人支持的各团体相继开展了“自治活动”。①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于10月抵达华北，从事拥戴宋哲元、建立以宋哲元与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二人为中心的河北——察哈尔政权的活动。②

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其直接原因是美国政府大量进口白银，导致银价飞涨。至1932年，中国出现对外贸易商品入超而白银出超的情况，中国是银本位国家，外贸差额须用白银抵偿。所以不能说白银外流都归罪于银价上升。冀东走私贸易中，大量白银外流的事实，已在前述。在1933与1934年的两年中，上海与内地的白银与银元的流通数字分别为9560万两和505万元，没有走私贸易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1932年起，正常贸易中白银开始出超，1932年为1039万元，1933年为1442万元，1934年为2.5673亿元。1935年为5940万元。③白银外流使中国内部银根紧的情况加剧，物价下跌，生产减少，普遍的不景气使得空气更加灰暗。这时，英国政府决定派李斯·罗斯与日本共同解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并拟提供通货援助，进行币制改革。同时它还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让满洲国接手中国旧有外债的一部分。这一提案于1935年9—10月间提出，其目的是振兴中国经济，日本确保满洲国的存在，确保英国的债权，改善英日关系，军事力量集中欧洲。真可谓一箭三雕。④但日本方面对此提案态度冷淡，日本军部对华北工作进展期望甚殷。外务

①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1961年版，第58—60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15—216页。

②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1961年版第60—65页作了颇为详细的记载。

③ 高垣宣次郎、五十岚直三等：《白银问题》，财团法人金融研究会：《报告书》第12编《中华民国的币制与金融》第1集，第222—275页。

④ 关于李斯·罗斯、司蒂芬·安蒂长特的《中英政治——外交与企业（1933—1937）》，（曼彻斯特1975年版）及波多野隆雄的《李斯·罗斯访问远东与日本》，《国际政治58日英关系史的展开》（有斐阁1978年版），均写得较为详细。当时，尽管国民政府对满洲国声称“置之不理”，但估计事实上是承认的。关于大藏省的好意，可参阅津岛寿一的《高桥是清翁行状》，《芳塘随想》第9集，第252—257页。

省根据广田三原则进行外交谈判时，也不引李斯·罗斯的方案为同调，所以使抱乐观态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无代价地承认了满洲国。失望的李斯·罗斯赴南京会晤了国民政府首脑，研究了经济危机发展的趋势后，便帮助中国当局制订了正在着手准备的币制改革方案。该方案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其要点大致有六：

（1）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

（2）三银行以外银行发行的钞票可暂时流通，并逐渐兑换法币回收。

（3）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

（4）持有银元、白银者，须到指定机构兑换法币，违者予以处罚。

（5）用银本位货币单位订立契约，以法币结算。

（6）三银行买卖及汇兑外币业务不受任何限制。^①

以上六项是用财政部长布告的形式公布的。该改革另外还有4点：

（1）统一发行货币，意在产生强有力的金融调节机制。

（2）集中准备金（即白银），以巩固法币的基础。

（3）停止使用银元，以保存白银。

（4）平抑外币汇兑行情，争取产业复兴。

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向英镑与经济连锁的通货管理体制发展，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财政部关于币制改革的报告》、《财政部部长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在经济危机发展的过程中有关中国币制改革之研究》。高垣寅次郎、五十岚直三等：《白银问题》，财团法人金融研究会：《报告书》第12编《中华民国的币制与金融》第1集，第249—268页。

企图利用中央银行统一全国的通货，这也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强烈愿望。法币1元币值规定为1先令2.5便士，与1日元等值。对于币制改革，英国是完全支持的，而企图把华北分裂出来的中国驻屯军，不消说是强烈反对的了。

11月8日，日本驻南京武官矶谷廉次发表大要如下的声明：

“我驻国外军方坚决反对这次币制改革，币制改革实质上是在扼杀中国四亿民众……白银集中上海会使华北毁灭，所以华北的白银至少应当由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华北银行来保管，我帝国政府据此方针进行领导，坚信我方在没有华北地方实力派协助的情况下，有力量干好此事。此点公开布谕中外，毋庸避讳。”^①似乎与之相呼应，“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和驻各地武官合作”，强迫自宋哲元始，包括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市长程克、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在内的大小官员，阻止白银南运。^②

分离华北的工作，就这样开门大吉地开始了。土肥原把争取宋哲元作为分离工作的重点，但宋却毫无反应。11月12日，关东军集结于山海关附近，关东军司令官向参谋总长发出电报称：币制改革是把中国“置于英国的经济统治之下、蹂躏一般百姓的利益、威胁满洲国安全的举动”，所以必须强迫中国放弃这一政策。办法是“在经济上把华北政府从南京政府分离出来”。在百姓对立情绪日益强烈的今天，“南京政府这一粗暴之举”，是我们“坚决进行华北工作的唯一机会”。因此，要“把一部分兵力集结于满华边境，支援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使前述之政策易于实行”。这一方针得到了中枢的追认，土肥原就是以大兵压境为背景展开活动的。^③作为另一方的国民政府，也在作说服华北将领

①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1961年版，第338页。另外，在参谋本部的《币制改革（对英借款）问题与中国的形势》（1935年11月21日，《现代史资料8》，第116—119页）中也有同样的主张。

②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1961年版，第77页。《日中战争》（上），第148页。

③ 《日中战争》（上），第149—152页。

的工作，使预定于11月20日发出的自治宣言夭折。焦急的军方迫不急待地指使殷汝耕于11月23日在冀东地区发表自治宣言，25日便在通州^①设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辖35个县，人口500万，岁入占河北省的22%。

以后，日本方面进一步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动员一部分百姓向其请愿，开展自治活动。眼见宋哲元举棋不定，国民政府便对殷汝耕发出了通缉令，并派何应钦北上，委以收拾事态的重任。最后，何应钦终于下了决心，决定在中央的承认下，给河北、察哈尔两省以有限的自治。这种想法呈报南京，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许。12月11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人事任命发表，宋哲元为委员长，另有17名委员，18日举行了成立大会。该政权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机关，负责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政务。它一方面与中央保持着隶属关系，另一方面两省、两市在内政上又有着广泛的自治权。对该政权，日方的评价是：妥协的产物。此后，冀察政权便在南京与日本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便决定了它的这种命运。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已明确表示是从中央独立出来的“满洲国第二”，所以不能与冀察政权合流。12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行了改组。在华北，由于日方的压力，形成了性质各异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以后的华北政情，特别是关于冀察政权向背的赌博，便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形成了拔河赛。

4. 冀东走私贸易的兴衰

伴随华北政情的变化，冀东走私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冀东政府成立的11月中旬开始，日本官方加紧控制走私贸易，尤其是制止白银外流，在山海关（从海滨到山颠）完全切断走私通道，使陆路走私贸易彻底寿终正寝。但海路走私贸易不但有增无减，而且更加组织化，通常在大连将货物装到帆船和机动船上运往冀东地区沿海的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走私贩子当中不仅有专门的运输人员，而且也出现了专门从事收购

^① 今通县。——译者

货物、接洽运输、垫付运费、回收垫付运费和批发货物的人员。据1935年12月末的核算，135斤一袋的砂糖购入价、运费等各种费用合计为18.08元，天津的行情为23.5元，利润5.45元。每10磅人造丝的费用为83.84元，天津行情为98元，利润14.16元。厚利使得货流兴旺，终于导致走私贩子和官方在北戴河的哄斗事件。^①以后渤海湾结冰，1至2月无法进行走私贸易，但可以推测，解冻后走私贸易还会活跃起来。鉴于此种情况，冀东政府索性降低税率，公开课税，开辟财源。2月，非正式地确定了这种“特殊贸易”的课税手续，即自秦皇岛始，设五座相当于税关的“查验所”，根据货物的数量，征收轻微的“查验费”。相当于海关税的“查验费”，其税率大约是中国进口税率的1/4，白砂糖——约为1/5.5，人造丝——不过是1/6.9。但是这种低税率只适用于日本产品，其他国家产品的“查验费”税率大约是中国政府规定税率的80%。这真是一种差别极大的税率。对于这种走私贸易，连日本也不敢公开支持，而对国民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抗议，只能用“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来搪塞。

1936年冀东走私贸易的大体情况如次：冀东政府的查验处总处长查南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他那时的好友三宅富一经营的旭组在留守营和北戴河，正荣商行运输部和日本贸易运输公司在昌黎，南大寺运输公司在南大寺和秦皇岛分别成为查验处指定的运输公司，代替货主向查验所办理申报、纳税、起运、卸货等手续，从中收取手续费。因为使用帆船在海上运输，载货少而危险多，所以走私贸易中帆船逐渐被机帆船或汽船所取代，间或也有用千吨以上大轮船的。1936年4月，在大连从事冀东走私贸易的船舶中，有日本船145艘，总吨位9,348吨；有满洲国船39艘，总吨位6,825吨；有中国船24艘，总吨位7,168吨。总计208艘，23,341吨。真可谓极盛一时。由于卸货地点完全没有港

^① 高见：《贸易概况》，第123—128页。高见：《冀东走私贸易》，第7页。以下有关1936年走私贸易概况未注明者，均引自高见的《冀东走私贸易》。

湾设备，船只泊在海上，用吃水浅的舢板及小船把货运到岸边，再由苦力卸到岸上，用马车运到停车场或货场，所以海上保险公司和从事高利率货物保险的人员应运而生。在卸货地点之一的秦皇岛，中国方面虽设有海关，但对走私活动无能为力，只能坐视。从事这种贸易的人，以前只是那些“走私贩子”，1935年3月以后，驻天津的日本人便参与其中了。接着日本商号伊藤忠、增幸、三昌、泰信，以至三井、三菱也都先后组织假商号从事这种贸易。中国的批发商也有从事此类走私活动的。贸易品中大宗的是砂糖和人造丝。天津每年输入砂糖40—50万袋，仅1935年10至12月，走私输入即达10万袋，导致市场行情惟走私品行情是瞻。1936年3月，因为海水结冰而货源枯竭，一袋砂糖售价达27美元。以后由于走私品陆续到岸，估计4月底已运到砂糖30万袋，以致价格暴跌：4月20日一袋砂糖售价20美元，30日——售价17.2美元，6月5日——售价跌到15.8美元。关于人造丝，自1935年5月起，正常进口的途径完全被堵死，行情因货物充积而低落，至1935年9月，价格已低至无利可图。1936年4月走私贸易重新活跃起来，但到了1936年6月，价格继续下跌，以至再次亏本。砂糖也好，人造丝也好，都因为输入过多而引起价格暴跌。这可以说是使1936年上半年达到顶峰的冀东走私贸易走向衰退的原因。

冀东政府公开承认走私贸易是“特殊贸易”的直接目的，在于用查验费的形式确保其财政收入，而积极支持它的就是关东军。关东军征收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机密费，用于内蒙工作等。^①另外，从前述田中隆吉的发言也可看出日本企图使走私品在中国内

^① 在绥远事变时，田中隆吉曾说总经费为600万日元。（见松井忠雄：《内蒙古三国志》，原书房1966年版第182页）据当时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的今村均回忆，他当时听说，1936年5月田中从冀东政府走私贸易中得到了一笔查验费。他还听殷汝耕亲口说过此事。此外据说曾经给关东军百万日元的谢礼，但遭到对方拒绝。后来田中隆吉遂把这笔钱作为内蒙工作经费。仅仅数月走私贸易便告衰退，冀东政权苦于收入减少，不得不从满洲中央银行贷款应急。（今村均大将回忆录：《巨大而激烈的战斗》，自由亚洲社1960年版，第75—87页。）

地泛滥，以达到搅乱中国经济的目的。有关冀东走私贸易规模的精确数字虽不清楚，但高见信雄曾根据各种资料对3月中旬至5月末的走私贸易额进行过统计，其中人造丝650万磅，合585万元，砂糖55万袋，合1045万元，两项共计1630万元。假定其他货物与之等量，那么走私贸易总额为3260万元，这一数字与天津某机关对1—4月末走私贸易额统计的3500万元，满洲国大连港1—5月底起货4000万元数字基本吻合。^①但中国方面根据海关的估计，直至1936年5月止的一年零3个月中，华北走私贸易额约为3亿元，因而向日方提出了抗议。^②日本方面用走私货搅乱中国内地经济的做法，的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据估计，运到天津的商品约有80%被运往内地，其中40%是直接转运的，60%是入库寄存待机运出的。走私贸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满铁天津事务所驻汉口人员和驻郑州人员的报告可以看出，在汉口棉纺织市场上，因华北的走私货激增，使得上海商品对华北的销售额比以前减少了3—4成。棉织品的行情也受影响，价格下跌5—6分甚至1成。走私的砂糖在1月份是直接输入的，从2月份起成了违禁品，只好先运往信阳，再从信阳经汉口转运至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销售量因之减半，价格大大降低。人造丝及其制品大多通过邮件向中国大量倾销，致使中国半数以上的人造丝制品厂倒闭。上述情况虽有些夸张，但由此仍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鉴于以上情况，国民政府为杜绝走私，从3月21日起实行了许可证制度，要求所有在天津经铁路运往内地的日本货物，在进入铁路货场前必须经海关查验，只许运输完税的货物。最初，走私者采用收买铁路站员等手法继续运输，以后查验之风日趋严厉，在天津从事冀东贸易的人便组织了天津贸易协会来对抗。为使会员的货物南运，天津贸易协会竟然出动150名以上的朝鲜人，

① 高见：《冀东走私贸易》，第67—68页。

② 《满洲日日新闻》，1936年5月14日，

强行把600吨砂糖和人造丝送上了津浦线夜行列车。车到济南，再由组织好的货物接收协会强行卸车。^①当时在天津日租界约居住1万名日本人，但仅在6月便增加了1千人，不消说，其中不少是中国报纸所说的“日鲜浪人”。^②

“冀东贸易”最终逐渐衰落，与其说是由于实行了严厉的禁令，不如说是由于货物囤积过多而导致价格下跌。这种无视中国当局禁令的行为无疑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激情。冀东政府的罪名本来不仅限于侵犯主权，眼下这种行径又使其更加臭不可闻。然而，这一切恰恰是由驻中国日军，尤其是以关东军为主一手导演的。

四、经济侵略成为国策

1. 天津与东京

因为冀察、冀东两政权的建立，1935年下半年的分离华北计划暂告一段落。把华北五省变成第二满洲国一事，从当初的劲头来看，可说是失败了。但是在华北，特别是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却以此为门径，仍在断断续续强行分离华北的计划。在冀察政府成立后的1935年12月27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订了《华北产业开发领导纲要》，该纲要目前成了说明中国驻屯军当局思想的有力证据，其含义是很深的。纲要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除领导中方以自身力量逐渐开发产业之外，在国防资源及其他需要迅速开发的重要企业中，对中方自力开发有困难者，日方应积极投资以促进开发……

第二、要领。……（3）对于开发必要的国防资源及其他重要企业而需要大量资本的企业，日方应积极投资以促进

① 高见：《冀东走私贸易》，第67—68页。

② 《大阪每日新闻》，1936年7月22日，特派记者橘善报道。

开发。因此，我帝国政府必须敦促财阀、巨头奋起。日方的事业投资以日中合办企业为原则，在确保日方权益的同时，日本人还要掌握企业的经营权并占据技术要冲。要努力地、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效果。在创办日中合办的强有力的特殊投资企业时，也要讲求方法。在中方出资能力不足情况下，必要时可用该企业的利益及企业设施作担保。造成对日借款，事实上造成日方独家投资的局面。（4）阻止外国在华北增加利权，吸收已经存在的外国利权。（5）继续取得现在尚未开发，而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及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的利权。……（7）企业大致分为禁营企业、控制企业和自由企业，即对坏的产业采取禁止与抑制手段，对日满经济或对国防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加以必要的控制，其他企业则列入自由企业。警惕日资企业不正当、不道德的经营方法，扫除妨碍产业坚实发展的障碍，制止倚仗日本人的优越感欺压中国产业的行为。为此，日方要商议出适当的措施。控制企业包括采矿业中的铁矿、煤矿、石油等，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港湾、汽车、航空等，通讯包括邮政、电报、电话、广播等，工业包括发电、送电、电灯、炼铁及其他特定的冶金、制盐、制碱、硫酸、矿物、炼油、水泥、造纸等。棉纺织业因信赖日本纺织协会的能力而不划为控制企业。商业则只对特殊商品搞专卖制和包销制。关于新兴的控制企业，或者说是官营企业，是指由“日满及华北政府各出资半数的特殊资本”。这是“符合国策的”。从产业种类来看，铁，利用这种特殊资本使龙烟铁矿得到最大规模的开采。煤矿，“期待华北煤矿全面综合控制以后，由特殊资本统一开采”。所以，决定对英资开滦煤矿和德资井陉煤矿实行“压迫的同时，尽可能在有利情况下开展收买工作”。一切铁路都要官营，另外铺设了5条新线作为国防线路，新建、改建、及延长4条线路作为经济线路。作为官营港湾最佳选择，就是包

括塘沽在内的天津港。通讯事业须由官营企业或由认可的特殊资本企业经营。发电业须由官营企业或特殊资本企业建设大型电站。冶铁业也须由特殊资本企业经营。对苏打、硫酸、水泥、造纸等行业，为不与日本资本竞争，须予以“适度的抑制”。对鸦片、烟草实行专卖。为平抑盐、石油和化肥的价格，也要实行专卖。^①

纵观以上所述，可知这一纲要酷似在满洲施行的经济统制方针，即把企业划分为禁营企业等三类，采取一个行业由一家公司包办的开发国防资源的方针。可以说，这是满洲国正在实行的经济统制的翻版。对于需要巨额资本的重要企业，“特别要敦促财阀巨头奋起”，并且要贯彻“对特殊资本企业也要实行由日满及华北政府出资过半”的原则，这种情况与满铁垄断满洲国的情况不同。中国驻屯军未必由衷地欢迎关东军插手华北，对于关东军继续介入冀东，无疑是不愉快的。调查之时只不过是利用一下满铁而已。对于满铁加强侵略华北的势力，中国驻屯军是怀有戒心的，因此它希望输入日本国内的资本，寻求“财阀、巨头的奋起”。1936年2月，中国驻屯军关于特殊资本的设想进一步具体化，制订了《作为华北产业开发机关的华北兴业有限公司之设立计划纲领草案》。^②该草案规定这家公司是投资兴办日中合资企业的中枢机关”，是资金2亿日元（实有2—3千万日元）的国际法人，“主要寻求日方有力量的资本家投资”，中方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内外债。股份半数以上由日中政府持有，保证与民间资本的比例为6：4。该草案规定的业务对象涉及铁矿、炼铁、有色金属矿、煤矿、发电、广播、电车、电灯、制盐、石油、航空以及汽车运输等业。这一设想，作为两年后建立的“华北开发株

① 《特约乙组调查概要》，第28—38页。《支立案212开发中国经济对策及调查资料》，第103—116页。

② 《支立案212》，第116—120页。

式会社”的模型，颇值得注意。^①尤其是期待“日方有力量的资本家”一事，可以认为是意识到满铁威胁的表示，结果，中国驻屯军拒绝关东军与满铁过多干涉和介入华北。关东军和满铁虽说能处理满洲国的政务，但在华北是否也有同样的能力呢？且看关东军的反应。

华北两政权成立之后的1936年1月13日，东京决定了第一个《华北问题处理纲要》，^②目前尚不了解是由什么级别决定的（估计像1934年12月那样由主管课长联合决定）。无论如何，它是掺杂有海军省、外务省意见的陆军省军事课的方案，是反映当时官方综合意见的文件。该文件大要如下：以完成华北自治为目标，其地域为以前的华北五省。目下首先希望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自治，期待另外三省与之合流。当冀察政府的“自治机能尚未成熟时，应支持冀东政府独立”。当冀察政府的“自治机能发展到大体可以信赖时”，应尽可能迅速地促使冀东政府与之合流。虽然希望华北的自治是广泛的，但为避免刺激南京施行反对日满的政策，需要逐渐提高自治程度。加强自治机能的重点是“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及对广大民众的领导”。尤其要避免采取类似建设像处于领导地位的满洲国式的独立国家的措施，以及会被误认为是满洲国延续的措施。“经济入侵应以民间资本自由投资为宗旨”。内蒙工作虽继续进行，但要以不妨碍华北的工作为原则。“处理华北问题时，应掌握在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直接以冀察、冀东两政权为对象进行的原则，司令官要坚持秘密领导的宗旨。对于经济入侵，军队并不处于主动地位，而是从侧面进行引导”。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3个要点：（1）“分离华北五省”的念头未死，但明确表示不强制施行，而要用冀东政府为陪衬，把冀察政府拉到日本方面来。（2）决定不搞满洲

^① 关于此问题，请参阅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经济工作”与“经济侵略华北”》，该文载于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第54号。

^② 《现代史资料8》，第349—350页。

国模式，经济入侵以“民间资本自由投资为宗旨”，但也并非按以前中国驻屯军制订《领导纲要》的设想进行统制。（3）通过规定内蒙工作的范围，明确领导两政权是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任务。由此大体可以看出抑制关东军干涉华北、保护中国驻屯军的想法。纵观这一《纲要》，可以说，它是一个追认华北事态，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逐渐扩大“自治”，并为中国驻屯军树立威信这样一些想法的产物。中国驻屯军决定了经济统制的方针后，关东军的内蒙活动并未因此受到控制，对冀东政权的干涉也丝毫没有减少。1936年的局势很快就离开东京的蓝图，脱缰而去。其中一例便是2月制订的前述的《作为华北产业开发机关的华北兴业有限公司之设立计划纲领草案》。

实际上中国驻屯军并不受中枢决定的约束，它推行自己的方针。3月，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偕参谋林某（林政胜？）晋京，就《华北产业开发领导纲要》和《作为华北产业开发机关的华北兴业有限公司之设立计划纲领草案》与中枢机关协商。6月2日，满铁天津事务所给该社资料课长寄送《华北产业开发领导纲要》时补充说：纲要的“摘要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开发华北的最高领导方针，各方面工作均应以此为基础”。^①但实施起来却很慢，5、6个月以后，经济入侵才正式开始。

关于加强中国驻屯军一事，东京采取了重要的手段。1936年5月，向天津日军增兵3,000人，使驻天津日军达5,000人，建制是将步兵两个联队扩充为旅团。另外还增加炮兵一个联队，战车、骑兵、工兵各一个中队和一些通讯兵。改轮换驻防制为永久驻防制。在田代皖一郎接替多田骏出任司令官时，也把这一职务升格为与关东军司令官同等级别的候补特任官。其原因虽说是共产党和抗日团体的活动及日本侨民有增无减的趋势，实际上还有着“不便公开的目的”，岛田俊彦根据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资料说：“把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一职升格为与关东军司令官同等级别

^① 《支立案212》，第103—104页。

的候补特任官，以及增加兵力等等，均表示今后华北事态已完全由中国驻屯军控制，关东军免开尊口。”这一作法可视为1月决定的《华北问题处理纲要》的具体化，有了这个前提后，东京遂决定进一步推敲华北工作的方针。

从1936年春起，陆、海军之间首先就《国防国策大纲》重新协商。海军方面为推动“基础军备的充实与扩张”，与参谋本部的石原莞尔进行了谈判，6月30日作出了决定，接着陆、海军又邀请外务省协商外交方针，在8月7日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国策基准”。据此，首相、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共同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8月11日，有关各省决定了“对华施行策略”和《华北问题第二次处理纲要》等一系列方针。在东京制订的这些方针所包含的侵华政策，远比1月决定露骨。^①

“外交方针”基本上是根据1935年10月4日陆海外三省《关于对华政策条款》制订的，它强调“日中互助，日满华共同反共，华北地区特殊化”。“鉴于日苏关系的现状，在当前所要实行的策略中，首先是引诱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在获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的同时，应以诱发中国普遍的反苏亲日情绪的策略作为对华政策的重点。”《对华施行策略》接受这种观点，认为华北的“防共亲日满特殊地带”，“应以华北五省为目标”设立，首先徐徐而专心致志地完成冀察两省的自治，然后再转向另外三省，重点是山东。自治要弃名取实，给南京政府留点儿面子，以“取得与南京谈判中最大限度的成果”。《华北问题纲要》中有关“分治的内容”就是要造成“在财政、行政、产业、交通等方面行使实际权力的局面，……使有关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免受南京政权及其他方面的影响”。虽说不容许“把日本帝国的目的理解为制造‘独立国’或‘满洲国的延续’”，但前述这些方针不能不说是十分露骨的。该纲要除规定当冀察政权的“自治机能达到足以令人信赖的程度时”，要使冀东防共自

^① 《现代史资料8》，第359—371页。

治政府作为冀察政权的“特别区”与之合流，还规定要“用民间资本自由投资来开发华北经济”的宗旨，通过“权益扩增”，造成“日华不可分”的状态，在“有助于华北保持亲日态度”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开发国防需要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及与这些有关联的交通电力设施，所有这些都希望依靠特殊资本迅速进行”。在该文件的附录中还进一步举例说明了“对冀察政权执行措施的限度”和“按照计划在华北迅速开发的国防资源”。对冀察方面的措施是唆使其与南京政府谈判，从河北省关税中扣除分摊的外债及海关维持费，由冀察方面取得剩余部分。如果谈判不顺利，便设法猎取海关监督一职，以掌握海关的行政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武力接收海关，或用武力干涉海关人事、设立特殊关税地带。在金融方面，设想加强眼下的河北省银行，使之发展成为“华北的中央金库”。“为避免破坏中央税权的统一和重复课税现象的出现，按照原则上接收的办法，接收关税收入，而不触及应负担的外债。”显然，这是一个以不使用武力为限度，强迫推行“自治”的方针。但若以为用这种有限度的节制便能改善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那真是痴人说梦。

在《纲要》的《附录·第二、国防资源》中，分别列举了铁矿、炼焦用煤矿、盐、棉花、液体燃料、羊毛以及作为国防设施的交通——铁道、港湾等的具体处理方法。铁矿，开发龙烟铁矿和河北省其他有开采价值的铁矿，“令兴中公司具体实行，希望满铁予以帮助”。煤矿，除“向井陉煤矿输入日本资本，采用日中合营方式以期增产外”，还要合并山东的小煤窑，加强经营管理，对开滦煤矿要实行“日英中合办”的原则。盐，要求中国人经营的长芦盐、山东盐增产。棉花，计划改良山东、河北两省的棉花，使其增产，责成兴中公司成立棉花公司和运输公司予以支援。液体燃料，用山西煤搞煤炭液化。羊毛，改良察哈尔、河北、山东的绵羊，促使其繁殖。交通，除为开发龙烟铁矿、井陉煤矿对交通线路进行建设和改造外，还要改良有关港湾。平绥线

的改造和向西延长以及延伸山东铁路也很重要，故“希望逐步实现之”。

以上设想是通过中枢决定的，从1935年12月中国驻屯军开始构思，前后历时8个月，便被当作国策，例行公事地办理了批准手续。此后，中国驻屯军的工作便以经济为中心，高速向前进行。

5. 中国驻屯军与冀察政府

从1936年始，中国驻屯军与冀察政权的交涉日益频繁。1月，在塘沽和北平发生了侮辱日本人的事件，中日两国士兵在北平也发生了冲突。除了这些问题有待解决以外，冀察方面要求取消自治政府，而日本方面却主张华北五省自治和共同防共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年初要解决的。3月，由于中国军队从陕西进入山西，宋哲元在北平召开了军事会议，下属各兵团和驻华北各部将领万福麟、冯占海、商震等与会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把群众动员起来。^①估计就是因为这种令人惊慌的形势，宋哲元才与多田骏司令官签订了秘密的“防共协定”。^②因中日之间的冀察悬案了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36页。

② 《防共协定》与《防共协定细目》，见《岛田文书》第22卷《日华交涉之一》，昭和10年至昭和11年12月。抄写在海军用格纸上的这一资料，因为没有任何注释说明，所以不足以确定双方签字订约的事实。但存在着以下的旁证：1936年末，池田纯久会见了宋哲元，对宋说：“尽管日本与冀察缔结了防共协定和经济互助协定，但双方的关系仍像隔着一层纸”。池田纯久要求经济互助具体化。（见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中国驻屯军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第三次座谈会报告书》，第12页。）具体缔结与否留待以后考证。《防共协定》的正文如下：

日本军队与冀察地区中国军队根据绝对排除共产主义的精神，决定互相协商，为防范一切共产主义行动特缔结本协定。本协定的细目另行拟定。

本协定以日文文本为准。

昭和11年3月30日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多田骏 盖章 冀察绥靖主任 宋哲元盖章
《防共协定细目》包括：冀察方面，与山西的阎锡山合作“扫荡共匪”，若阎锡山不肯合作，则独自出兵山西；与山东合作；加强与西南的联系；进行反共宣传；镇压与消灭共产党、监衣社及其他类似团体与结社；与日方交换情报，允许日方增加必要的兵力；廉价售给武器弹药与飞机；绝对支持防共活动；与冀察方面交换情报；赞助山西、绥远、山东及西南之间的联合；“绝对支持冀察方面采取的遏止中央军进入华北的行动”。因该协定是秘密协定，故以日文文本为准。下署时间是3月31日。

却，日方要求的中心遂集中在经济帮助上。

5月，日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升迁为驻华大使。6月，太田一郎设想成立华北五省特政会，由该会负责处理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山东五省政务，办理共同防共、经济开发以及取得日本帮助等事项。领导长官为阎锡山，而一切事务掌握在秘书长王克敏手中。^①王克敏当时在上海，冀察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肖振瀛辞职后，王被推荐继任。他于7月8日离沪北上，到天津访问了田代司令官，并到北京拜访了宋哲元，在济南会晤了韩复榘。作为另一方，宋哲元在7月16日会见了日本记者团，表明了自己对中日经济协助的愿望，认为人心安定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双方都留下真正深刻的亲善印象和感情融洽时，才有可能开始实现经济协助。这番话可以视为宋为牵制日本扶持王克敏而作出的反应。宋、王之间关系微妙，9月，王克敏提出辞呈南下，可是宋并没有歇手，而是委托满铁天津事务所着手研究《华北经济互助纲领》。^②

根据《华北问题第二次处理纲要》，日方在十分微妙的情况下向宋哲元出示了经济互助方案。当时中国反日情绪高涨，从8月到12月相继发生了杀害日本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中日关系全面恶化。就在这种气氛下，9月10日到达天津的宋哲元与田代就经济互助与开发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意见大体一致，鉴于中方表示强烈的希望和想尽快实现的热情，决定不订立所谓的契约或协定式的东西。为给以后内部领导提供依据和查找资料方便，双方于9月30日把充分谅解的事项用纪要的形式形成了文件，10月1日宋与田代署名后交换文本”。^③这大概就是世间所

① 军司令部第2课存：《有关华北五省特政会的设立的文件（昭和11年6月12日太田试验方案）》，《岛田文书》第14卷《中国时局关系总结》，昭和11年至昭和12年1月。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41—242页。

③ 日驻天津海军武官久保田久晴致海军次官电，1936年10月3日。《岛田文书》第70卷，《关于华北经济互助的报告》，昭和11年。原件存军令部。

传的宋哲元一田代协定。彼此在“充分谅解的事项”上签字，真可谓微妙之至。该文件内容如下。

(1) 经济互助原则

- a. 根据共存共荣的原则，日华利益均等；
- b. 处理一切问题均采取日华平等的立场；
- c. 经济开发事业中的对日借款及日华合办企业，
由日本军方负责从日本募集巨额资本与先进技术；
- d. 主要要增进民众的福利和促进安居乐业；

(2) 经济开发纲要

- a. 开展定期航空业务；
- b. 铺设工业动脉铁路，首先要铺设津石线；
- c. 开发优质煤矿，首先促进井陉、正丰煤矿增产；
- d. 勘探并采掘铁矿，繁荣炼铁工业，首先开发龙烟矿；
- e. 为使华北物资易于输出，首先在塘沽附近调查研究、
选择地点，在建设铁路、开发矿山的同时修建港口；
- f. 发展电力工业，并开发水电资源；
- g. 把促进棉花、盐、羊毛的对日出口及治山修水利作
为振兴农村的策略，以培养民力；
- h. 综合改善已有的通讯设施，所需资本与技术由日方
提供。

津石线是联结天津与石家庄的铁路线，它与正太线相连，运送山西的煤一事日方已急不可耐。为了实现修建联结石家庄和津浦线上的沧州，以及联结太沽的沧石线这一计划，1927年7月由满铁的代理商号华昌商事与沧石铁路工程局签定了借款合同及承包工程合同。以后虽因中方要求而中止了合同，但日方仍把这视为自己的铁道利权。^①这次津石线计划只是更改了终点，改沧州

^① 满铁经济调查会：《关于修筑沧石铁路的经过》，昭和10年2月。

为天津，目的是便利煤矿的开发。

在与南京一起解决一连串杀害日本人事件的同时，为处理华北问题的外交谈判也在进行之中。在宋哲元与田代签字前一周的9月23日，川越大使、须磨总领事等人在南京会见了张群外长，双方唇枪舌剑地干了起来。从张群外长的发言要点可以了解到国民政府对此问题的严正的、戒备的立场。^①他说：“建立独立政权或半独立政权的要求，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行政权完整的破坏，断难认可。但关于防共问题和经济互助问题，对此没有异议，宜协商进行。”“为了表示对日诚意，决定与日方洽商两国共同防共问题，防共范围为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绥远、包头连线以北。‘经济合作’的范围为冀察两省，方法是在行政机关之外设立共同机构（辛迪加），日方以庚子赔款作为资本，具体实行办法由双方遴选专家制订。”从圈定的防共范围来看，仅限于战区和日军势力较强的内蒙，并不涉及平津地区。从经济合作来看，日方出资额仅在庚子赔款的数额以内。很明显，国民政府的防共、经济合作完全徒具空名。张群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以中方的希望的名义提出了以下5项提案：废除塘沽协定与上海协定；解散冀东政府；日本飞机停止在华北上空的自由飞行；停止走私活动，恢复中国的查禁权；遣散冀东和绥远北部的伪军。所谓在华北上空的自由飞行系指满洲——华北的空中航班；察东和绥远北部的伪军系指李守信部和田中隆吉拼凑的以德王为中心的杂牌军。这些提案在于取消日方既得权利和木已成舟的事实，带有挑战性质，它表示了国民政府的决心。但结果是，除了处理眼前的事务外，悬案依然未决，会谈在南京不欢而散。

宋哲元与田代签订谅解事项后，于10月6日致电行政院蒋院长，称：“关于中日互助，日方提案提出已久，然至今尚未进行商议。职于前月与田代司令官面谈数回，交换了有关经济开发的

^① 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1936年9月24日致外务大臣有田电，见《岛田文书》，第14卷。

意见。根据平等互惠、共存共荣的原则，就将来希望的事项达成了谅解，并无外界所传协定等类情事。”同时，他还把前述之谅解内容附上，请求南京指示。^①蒋院长命外交、财政、实业、铁道四部审议。10月4日，宋哲元对记者团发表谈话说：“余在天津与田代司令官会谈数次，他的态度甚为诚实恳切。”这番谈话使当时南京中央驻北平特派员甚为惊恐，认为冀察要脱离南京中央，改组后要采取宋哲元的独裁制，并委齐燮元以重任。只是由于29军的干部明确表示“迁延时日，静观南京谈判之进展”，才未改组冀察政府。10月8日，蒋委员长会见川越大使后，日本外务省公布了既不容乐观，又要避免分裂的宗旨。为使日方感到部分欲望已得到满足，华北方面又使出了九个花招：（1）10月12日，将龙烟铁矿国营化，并任命陆宗輿为该矿复兴委员会督办。（2）10月12日，任命李思浩为经济委员会主席，15日就职。（3）任命齐燮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驻会办事委员。（4）17日，李思浩与日本缔结了《华北通航条约》。（5）19日，任命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6）23日，在北平设立了惠通公司。以上涉及的人物中，陆宗輿、李思浩、齐燮元是北洋军阀的余孽，石友三是一个与田代有关系的西北军军阀。^②

但是，日本与宋哲元的融洽是有限的，一进入8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下便爆发了绥远事件。11月中旬，陈诚为总指挥，傅作义为司令官的绥远军队大败蒙古军，中国把这当作中国军队战胜身穿蒙古服装的日本军队而大事庆祝，抗日意识如同烈火熊熊燃烧，民族热情一股劲地上升。^③国民政府以此为背景，12月5日复电宋哲元，提出了反对八项谅解的理由，说一切均应由中央主

①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5）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中华民国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版，第464—465页。

② 关于宋哲元的动向，参见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出版社1973年版，第242—244页。

③ 《日中战争》（上），第230—236页，另参阅松井忠雄：《内蒙三国志》。

管部门协商，应遵守中央的法令（如禁止食盐出口等），交通水利事业事关全省乃至全局，应由中央统一管制，不能越出中央决定并已备案的范围，沧石铁路不能变为津石铁路。还批评合资企业所包括的内容除龙烟铁矿外，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地点和名称。^①当时中日关系恶化，很明显影响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地揭示中央的意图，处在中国驻屯军和南京政府的夹板中的宋哲元，滋味一定不好受。结果宋哲元也改变了态度，变更和中止了业已开始的经济合作的准备活动，停止了津石铁路和塘沽港的修建工程。至于合办龙烟铁矿并进行开发一案，宋也决定容后详细研究。这样，在天津所谈的“经济互助”毫无进展。1937年1月20日，宋哲元发表了拥护中央的声明，使在天津的谈判顿受挫折。^②

在这之前，南京谈判已陷入停顿，1936年12月3日张群与川越的晤谈成了最后的一幕。《华北问题第二次处理纲要》中规定的经济工作，在华北，在南京都告一段落。简单地说，该纲要的制订是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对付东京，东京也认可而使之“国策化”，进而在华北施行，造成木已成舟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国方面的抗抵，这个球又被踢回日方的场地，日方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

五、入侵的实际情况

1. 兴中公司的事业

兴中公司成立于1935年12月。它与满铁的微妙关系已如前述。据十河信二说，他不被满铁新任总裁松冈洋右信任。当他刚接受兴中公司经理职务时就收到松冈的来信，信中说，经营业务听

^① 《中日外交史资料丛编（5）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版，第466—467页。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50—252页。

凭十河，军方与满铁均不干涉；根据需要可以借用满铁的人员与资金，满铁负责为他筹措10亿日元股份资金。可是不久，松冈就委托关东军参谋花谷把信取回去了。股份资金减至250万日元，满铁职员也不能任意挑选。^①但无论如何，兴中公司事实上是“满铁在中国的代理人，负责日满华之间经济的协作工作”。这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兴中公司要“根据满铁的指挥进行活动”，“至少有2名董事，10名监察是满铁人员”。兴中公司的“重要事业，不论是否为自己经营都要听从满铁的指挥”。此外，兴中公司还使用满铁的调查机构，与满铁派驻各地的机构保持充分的联系，对满铁派出人员按本公司的高级职员对待。在重要的人事任免、预决算、发行债券、筹措资金及投资 扩增股份 等事项上，也均须取得满铁的同意。^②根据十河信二的回忆，从十河与松冈的关系可以推测，满铁与兴中公司之间未必没有矛盾。

最初，兴中公司的事业规划可以说是个包罗万象的百宝囊。据《关于兴中公司的备忘录》，^③兴中公司自认为是个纯经济机构，“负有统制对华经济工作，并使之贯彻执行的使命”，它要“以满铁为中心，取得日本各实力雄厚的商社的帮助来发展其事业”。具体地说，是“根据所需投资，共同对事业进行筹划”。但是，并不剥夺“各商社原有的贸易权”，满铁只是“充分参酌各方意见，把持中心的领导权”。兴中公司的事业蓝图如下：

（1）经营战区内各种矿产业，从事其他各种经济事业；（2）提出整理盐务办法；（3）提出棉花的改良与增产办法；（4）从事开拓、垦殖事业；（5）开采煤矿、铁矿及其他各种矿藏；（6）从事民用运输业；（7）进行金融活动；（8）进行贸易。此外，兴中公司还拟在华中与上海青帮合作，扩大贸易权；在华南与华侨合作；在其他地区，兴中公司的设想也是大同小

① 《十河信二与大陆》，北条秀一事务所1971年版，第52—53页。

② 兴中公司：《有关公司设立的经过》，昭和10年12月，第71页。

③ 同上，第63—67页。

异。这种设想可以说是前述十河个人方案的扩大。但这时形势已经发生若干变化：中国中央政府统治力量的加强，日本军方造成的既成事实和对这些结果的控制，中国方面反日情绪的高涨，这一切都需要兴中公司来对付。

兴中公司最初的活动是从福建输出豆饼，而其天津分公司和在华北的事业却是兴中公司全部事业的中心。1936年2月，十河访问天津时，宋哲元曾就“开发龙烟铁矿、津石铁路、种植棉花等”事项请求协助。^①以下分别就电力、盐业、炼铁、煤炭、棉花、运输等行业，介绍兴中公司的情况：

(1) 电业 兴中公司最初插手的事业就是天津的电力事业。天津及其周围地区因日本纺织工业率先打入，各种工业随之勃兴，人口显著增加，电力需求也相应增加。为此，天津日租界计划将原2千千瓦的发电设备扩建为4千千瓦。另外中国方面认为从英租界以每千瓦5分钱的价格买电不合算，也希望兴建新的发电厂。捕捉到这一信息的兴中公司与天津市交涉，收买了天津特别市经营的天津电业新公司，成功地创设了与天津特别市合办的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8百万元，实际上只有一半。这是“特殊资本”与中方合办企业成功唯一的事例，资本、重要职务双方各占一半。天津市的资本由兴中公司代垫。同时，兴中公司为这一事业从日本国内招来电力联盟，委托它经营并利用它的技术，兴中公司专门负责与中国华北地方当局及南京政府交涉。兴中公司把自己股份的一半与代天津垫付股份的一半都转让给了电力联盟，这是兴中公司引诱日本国内资本成功的一例，值得重笔勾画。最后，电业公司在白河岸边兴建了一座三万千瓦的发电站。对那些想要在天津开设纺织厂的纺织公司，电业公司也与中

^① 兴中公司：《煤矿交接的报告书总论》，昭和13年8月31日，第5页。本文件由十河信二赠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国驻屯军达成了协议，不允许他们私自发电，而要买电。^①

在冀东，兴中公司利用对电力事业的统制——一元化方案而登台。关于一元化方案早在满铁经济调查会立案。该地区原来有许多小型电力公司，后因受1933年战祸打击，其中不少已宣告停业。即使营业的公司也普遍无利可图。1936年12月立案的满铁方案，计划合并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潍县、唐山、芦台、通县等七地区的电灯公司，创建冀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冀东政府和满铁子公司——满洲电业公司也参与其中。^②但在这种情况下，兴中公司也出现于前台。1937年4月，中国驻屯军制订了《冀东地区电气事业统制方案》，用兴中公司代替满洲电业公司，使其成为契约的当事人。规定资本120万日元，实缴半数。其中30万日元归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剩下的30万日元由已建电力设备的业主承担。这里不包括秦皇岛与山海关。该方案还计划开发开滦的水力发电。根据这一方案，兴中公司于1937年6月盘进了通州电灯公司和芦台的芦汉电灯公司；8月，盘进了芦台的济兴电气公司；10月，盘进了昌黎的昌明公司。到了11月，它便把所有这些公司都转让给了新创立的冀东电业公司，交易额不明。^③

（2）盐业 当时日本的工业用盐主要来自非洲的恩托利亚^④，以及索马里的天然盐。因为价格昂贵，使用中国盐的愿望便十分强烈。但是，中国自古以来把盐税作为重要的税源，即便在那时，盐税在国家岁入中也仅次于海关税。盐税为岁入的24.6%，而海关税为47.4%。^⑤当时盐价是每百斤10美分，抽税6美分，另外还要课收地方税、附加税，以及附加税的附加税，总之税率

① 兴中公司：《电气事业交换报告书之一总论甲类1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昭和13年8月31日，第1—3页。《株式会社兴中公司事业概要》，昭和13年1月，第1—4页。以上两文件由十河信二赠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② 满铁调查部：《支立案563冀东电气事业统制方案及调查资料》。

③ 兴中公司：《与兴中公司有关公司的概要》，昭和14年7月，第15—17页。

④ 音译。——译者

⑤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华北经济资料第1辑华北财政概说》，昭和10年12月，第7页。

极高。①在华北，河北、山东沿海均产日晒盐，产量约占全中国产量的30%以上。②按照惯例，盐是禁止出口的。还是按照日本归还山东时的协定，只允许山东盐对日本出口，最高限额为3.5亿斤，最低限额为1亿斤。作为盐的专卖机构，“垄断河北盐的是七户盐商；长芦盐的贩卖区域，即所谓引岸，是指河北、河南及山西的部分地区，对每个县都规定一定的销售量”。③当时因重税和生产不景气，据说年产量仅60万吨，减产约35万吨。在约9,100町④的盐田中，有2,000町休晒。甚至在1936年年末还出现了60万吨的积压。⑤

日本方面在冀东政府成立以后，从1935年12月中国驻屯军制订的《开发华北产业领导纲要》中，便可以找到有关长芦盐输往日本的计划。以后在《华北问题第二次处理纲要》中又规定：“计划改良与增产山东盐与长芦盐，制盐事业要依靠中国人，委托民营，我方提供所需资金与技术援助。希望改良长芦盐、增加产量、对日出口等事项，均按既定方针迅速实现。”⑥所谓既定方针，是指1936年6月29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大藏省与对满事务局等各有关政府机构之间通过的长芦盐对日出口由兴中公司“一手包办”的方针。⑦这一文件的内容是外务省东亚局局长7月14日用《有关长芦盐对日出口事业及盐的洗涤加工事业由兴中公司处理的决定》的文件形式，传达给兴中公司的。接着，11月28日，兴中公司收到自昭和12年始负责对日出口事业的指令。11月25日，大藏省专卖局也指示兴中公司：假定昭和12年进口盐20—

①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满铁调查资料第167编华北情况总览》，第280页。

② 小岛精一：《华北经济读本》，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51—53页。

③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满铁调查资料第167编华北情况总览》，第280页。

④ 1町=0.992公顷。——译者

⑤ 兴中公司：《盐业关系交接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第1—2页。

⑥ 《现代史资料8》，第370页。

⑦ 《关于长芦盐出口日本的日本官方协议书》，载《岛田文书》第22卷《日中交涉之一》，以及兴中公司：《盐业关系交接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第1—2页。

25万吨，请据此确定价格。① 这些事情，可以说与兴中公司最初的业务计划相符。

上述计划确定的时间与冀东政府关系固然不大，但正值与冀察政府的关系冷却时期。因此要实现它是很难的。从1936年9月为出口谈判在汉沽安装输送带时起，到同年11月谈判妥贴，才开始动工安装。然而至1937年3月，南京财政部便发出了取消的命令，4月，输送带即将安装完毕之际只好忍痛拆除了。② 1937年度计划对日出口23万吨。1937年3月10日签订了第一批出口10万吨盐的合同，4月，南京政府财政部正式批准，这期间兴中公司向合同当事人芦丰商店捐赠法币2万元作为难民救济金。关于剩下的13万吨，在谈判中也曾想订立合同，但受日本与南京之间关系的影响，直到6月28日才好不容易地签订了10万吨的合同。③ 为能够长期大量对日出口，兴中公司通过日驻天津总领事于1937年3月与冀察方面谈判，要求“取消生产限额”。5月，得到了“放松生产限额”的允诺，为修复休晒盐田，还要求日方提供20万元的贷款。日方同意后，若干休晒盐田始得到修复。④ 关于兴建粗盐精制的洗涤工场一事，1936年3月，兴中公司通过日驻天津总领事与冀东方面谈判，5月14日，在了解到中方同意之后，便以中国人的名义，选择距盐仓较近的地点着手准备。⑤

从以上事实看，盐业可以说是在困难的时局中，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的一个部门。不用说东京的由兴中公司“一手包办”对日出口的决定是有效的，同样，也可以认为，冀察政府于1936年10月任命亲日派李思浩为冀察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是使事情得以顺利进展的原因。

① 兴中公司：《盐业关系交接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第4—5页。

② 兴中公司：《盐业关系交接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第19页。《十河信二与大陆》，北条秀一事务所1971年版，第127页。

③ 兴中公司：《盐业关系交接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第20—21页。芦丰商店是专门为对日出口业务而开设的。

④ 兴中公司：《盐业关系交接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第7—9页。

⑤ 同上，第15—16页。

(3) 铁矿业 龙烟铁矿位于察哈尔省南部,蕴藏量为9000万吨,因龙山、烟筒山两个主要矿山而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宗輿、段祺瑞等人创立了半官半商的龙烟铁矿公司,资金500万元,同时还在北京西郊22公里处的石景山修建了一座250吨的高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萧条,停止了采掘,高炉也停建了,该公司处于休业状态。1928年该矿山实行了国有化,但情形未变,一直延续了下来。^① 1934年,满铁把目光投向该矿,开始了调查。“运动中国驻屯军,渐渐地理出了头绪”。^② 另一方面,根据《华北问题第二次处理纲要》,兴中公司也把手伸向了铁矿业。该纲要规定:“令兴中公司实施”铁矿采掘,“使满铁协助之”。这当然意味着兴中公司要参与龙烟铁矿的开发。1936年10月,龙烟铁矿被冀察政府收归国有,陆宗輿被任命为该矿复兴委员会督办。这是否即为与日本人合办的前提,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兴中公司确曾“在得到中国驻屯军的同意后,极力坚持日中合办的方案。结果在年末,合办方案得到正式承认。昭和12年1月18日,在八幡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由兴中公司承担开发日中合办龙烟铁矿的任务。其后,兴中公司与龙烟铁矿复兴委员会进行了种种谈判,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爆发了七七事变”,^③ 开发龙烟铁矿的计划便不可能付诸实施。

龙烟铁矿的开发计划如下:随着龙烟铁矿公司的复活和采掘的恢复,兴办石景山制铁所,进一步添置炼钢设备,实行连续铸钢。具体地说计划在1936年8—9月期间,暂时先恢复采掘,缓办炼铁工业。矿石经秦皇岛、塘沽出口日本,由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接收,在价格上要保证企业的收益,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损失

① 兴中公司:《株式会社兴中公司事业概要》,昭和13年1月,第27页。兴中公司:《与兴中公司有关公司的概要》,昭和14年7月,第119页。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立华北铁矿公司方案大纲》,满铁调查部:《支立案4211开发龙烟铁矿的对策》,第19页。小岛精一:《华北经济读本》,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46—51页。

② 《支立案4211绪言》,第1页。

③ 兴中公司:《与兴中公司有关公司的概要》,昭和14年7月,第117页。

表 1

开发龙烟计划的变迁

(单位万日元)

	石景山 8 万吨、天津 20 万吨 计划	石景山 8 万吨 计划	石景山 8 万吨计划 (决定方案)
制铁所设备折价费	200	200	200
建筑工程费	4695 *	663 * *	353 * * *
铁矿采掘设备费 (包括运输线路)	783	108	93
矿山土地费	100	100	100
石灰石矿采掘设备费 (包括运输设备)	93	18	18
合 计	5871	1089	764

* 包括天津制铁所 4260 万日元。

* * 包括建设炼焦及其他副产品工场的费用。

* * * 不包括炼焦设备费。

据「支立案 4211」(第 251—254 页)制成。

由日本政府负责补偿。该计划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计划。① 1937 年 1—2 月,石景山制铁所建成,开始了年产 8 万吨规模的生产,同时炼钢设备也着手安装,并拟进一步在天津兴建年产 35 万至 40 万吨的制铁所。矿石与其说对日出口,倒不如说是留下自用,以迅速扩大制铁规模。② 在 1937 年 2 月中国驻屯军的《决定方案》中,把龙烟铁矿公司视为“经过华北政权特许的日中合办的中方法人”,规定资本减去 3/5,即 300 万日元。日本股东兴中公司出资 400 万日元,中方股东出资 100 万日元,共计资本 800 万日元,中方所出资金由日方贷给。③ 《决定方案》的事业规划十分庞大,包括复活烟筒山铁矿,兴办石景山制铁所,进一步兴建 40 万吨的天津

① 「支立案 4211」,第 25—62 页。

② 同上,第 63—88 页。

③ 从表 1 可知中方资本共计为 400 万日元,除股金外,还有矿山及设备折旧费 300 万日元。——译者

制铁所。同年2月,《决定方案》被提交陆军省,结果天津制铁所被否决。庞大的方案被大幅度削减,通过表1经费预算情况即可一目了然。^①

(4) 煤炭 在华北也是引人注目的重要资源。以冀东开滦为主,包括生产无烟煤的井陘、正丰以及山西各矿。总蕴藏量约12700万吨,号称居全中国蕴藏量之大半。兴中公司当然想竭力把它据为已有,具体的行动就是与京汉线石家庄附近井陘煤矿的德方就股份转让问题进行了谈判。该矿是中德合办公司,中国控股3/4,德国有股权1/4。澳大利亚人巴威尔(R·B·Bawel)担任副总经理,负责经营。关于德方股份转让问题,兴中公司是“在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与宋哲元签订有关经济开发备忘录之后,根据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关于在谈判中首先收买井陘煤矿德方股份的指示,与德方代表进行谈判的。经过经理间反复多次的谈判,9月8日草签了转让合同,买价为145万美元”。但是,10月1日交换签字合同以后,冀察方面态度发生了变化,具体地说就是负责该矿出口运输业务的津石铁路建设计划搁浅,收买井陘煤矿德方股份的谈判也随之陷入僵局。交易告成已是1937年10月27日的事了,当时价格为135万银元。

兴中公司还收买了邻近的正丰、宝昌两矿。1937年4月,只用24万元便盘进了宝昌矿。该矿总蕴藏量为1000万吨,出产含沥青50%的煤。该矿10年前因事故停产,有无生产能力,当时还很难说。^②

(5) 棉花与棉纺织业 开发华北的棉花,也是兴中公司最初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③为改良棉种、增加产量及合理交易,

^① 《支立案4211》,中国驻屯军的方案见第9—24页,陆军省的方案见第8页和第5页。

^② 兴中公司:《有关煤矿交接的报告书总论》,昭和13年8月31日,第4—6页。兴中公司:《株式会社兴中公司事业概要》,昭和13年1月,第1—4页。《十河信二与大陆》,北条秀一事务所1971年版,第130页。

^③ 兴中公司:《关于棉花事业接收的记录与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以下本文中有关棉花问题的资料未注明者,均见本资料。

兴中公司计划设立“华北棉花仓库公司”(暂定名)。1936年6月29日,这一计划得到有关政府机构的理解。^①中国驻屯军“为对华北农村施行普遍的领导,制订了设立华北农村苏生协会方案。兴中公司的棉花仓库事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设立该协会尚需中央政府批准,故暂时要等待时机”。随着1937年4月河北农村协会的设立,兴建棉花仓库计划也时来运转,一接到指示,便立即动工。1937年6月,经理十河到山西,与阎锡山会谈经济互助问题,达成了山西售棉1万担的协议。据说,十河还与阎锡山讨论了“兴中公司与山西省营23家工厂协作的问题”。^②

在山东,以后晋升为兴中公司董事的钟渊纺织株式会社青岛纺织厂厂长长泽董,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私交甚深。他计划在济南市郊建设日中合资织布厂。1937年2月,确定了工厂将占地4万坪。^③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提出的建议,由于处在与山西谈判经济协作的前夕而未能实现。^④

(6) 运输 最后补充说明一下兴中公司独家兴建的塘沽运输公司及其经营的天津港起运卸货业务。^⑤从白河口开始,包括塘沽、汉沽的天津港,吃水浅,距离长,需要在10—12海里处的河口码头太沽抛锚,利用大型钢驳船起卸货。计划运输盐、铁矿石、煤等大吨位货物的兴中公司,一方面让其在东京的分公司向海运部门筹措吨位,另一方面制订了自家经营大型驳船从事运输的计划。1937年2月,在大连汽船株式会社和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的参与下,天津设立了日本法人的塘沽运输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300万日元,实有63万日元。兴中公司持有60%的股份,另外两家各持有20%。该公司接手了兴中公司以前订购的总吨位为500吨的

① 《有关兴中公司设立华北棉花公司事》见《岛田文书》第11卷《日中交涉之一》,昭和10年1月至昭和11年12月。

② 《十河信二与大陆》,北条秀一事务所1971年版,第234页。

③ 坪为日本计算地积的单位,合3.3057平方米。——译者

④ 同②,第137页。

⑤ 兴中公司:《有关运输事业交接的报告书》,昭和13年8月31日,第1—3、38—13页。

6只驳船和4条牵引船，负责长芦盐的运输。这可以说是日本觊觎已久的，打破英美资本历来独霸天津驳运业局面的结果。

兴中公司的算盘远不止此。它要修建与改造天津塘沽港，敷设津石铁路，另外还有许多没有公开的蓝图。但是，在那个时期，由于津石铁路交涉出现暗礁，许多计划也只是一纸空文，只有盐业、电业与运输业按计划实施。作为小型“特殊资本”的兴中公司，在中日关系普遍恶化的气氛中，渐渐地步履蹒跚起来。就是在日本内部，它的地位也不稳固，经济参谋池田纯久中佐的两段话颇能说明问题。1936年9月28日，他在中国驻屯军与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座谈会上说：“开发华北的经济，要在日中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主要采用日本出资与中方出物资的中日合办的形式。不得已时采用借款的形式……中方绝对反对以满铁的名义行事，用日满华亲善的口号，中方也决不会允诺，如果用中日亲善的口号，中方则会同意。从这一角度出发，兴中公司障碍会少些，……只要取得实质上的利益，采用什么方式都行。”关于兴中公司，他认为不过是一种招牌。^①以后，他为津石铁路的建设资金问题晋京，1937年5月13日发了一番牢骚。他本以为津石铁路的资金由“满铁通过兴中公司来筹集”，不料晋京后得知已决定由东拓^②全部支付。他想到，满铁要“为满洲国建国开道”，而随着事业的发展它必然要“向南”扩展，因此他反对由东拓支付，而提出由东拓引路，“让兴中公司自己来干”。况且“财界对兴中公司的评价之坏不值一提，但从根本上说，兴中公司缺乏筹集全部资金的能力。革新政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从财界开始。在这种气氛下，兴中公司采取哪一种立场，需要谨慎考虑”。^③但正是这个“政治革新”促使十河信二于1937年1月底接受石原莞尔等人的劝说充

① 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中国驻屯军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座谈会报告书》，昭和11年9月，第30页。

② 全称不详，下同。——译者

③ 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中国驻屯军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第三次座谈会报告书》，昭和12年6月，第4—6页。

当林内阁^①的参谋长，并且推荐板垣征四郎为陆相、末次信正为海相，但最终因筹划失败而与林銑一郎分手。池田纯久的谈话暗示了兴中公司在军方的特定色彩和它与军方的人事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它与日本国内各界的摩擦。

2. “投资自由”企业

以前满洲国推行的“不许财阀染指”的满铁中心主义，招致日本财界一片反对。尽管满洲国的态度后来有所缓和，但财界仍没有兴趣对满洲国投资。在《华北问题第一次处理纲要》和《华北问题第二次处理纲要》中，均提倡“民间企业自由投资”，并决定促进以纺织业为主的各方产业投资，这可以说是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另外，日本财界对中国本土远比对满洲更为关心，它既看中中国的巨大市场，也看重原有的纺织工业。随着1935年以后形势的发展，日本企业迅速掀起了打入华北的高潮。

本文拟以纺织业为中心，摸索这股高潮的发展方向。自1932年日元汇价下跌以来，日本出口额惊人地上升，以此为转机，各公司的利润率相继回升，内部基金也丰厚起来。可是因为发展急速，使得国外对日本的棉花制品采取了森严的关税壁垒政策以及严厉的进口额分配制等手段。英国、印度、美国等国都围绕着限制日本棉纺织品进口问题举行了会谈，但问题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到了1934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额达到了最高水平，以后便基本保持这一水平。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积极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纱锭。生产与出口都在增加，1930年以来的生产限额也在逐渐打破，华北的新事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表3可以看出，从1935年末至1937年7月末，日本资本在华北，尤其在天津的扩张十分明显。^②自1932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纺织业如同恶病缠身，许多厂家纷纷倒闭。最大的裕大纺便

^① 即林銑十郎内阁。——译者

^② 参见小岛精一：《华北经济读本》，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114—136页。关于在青岛、天津扩张的具体情况，可参阅1937年8月《东洋经济》20号或《鲜满支汇报》（后者的作者不详）。

是1934年倒闭的一家，1936年被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盘进，成为公大六厂。以后天津华新毛纺厂也被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盘进，成为公大七厂。据说在购买时，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与东洋纺织株式会社之间展开了竞争，价格本来是80—90万元，后来竟被哄抬到120万元。^①裕大纺是1926年被东洋拓殖吞并，由伊藤忠株式会社经营的。宝生第三纺织厂也在1936年被东洋拓殖与伊藤忠盘进。唐山的唐山华新纺织厂也决定与东洋纺织株式会社合营。1937年3月，正在兴建和计划兴建的日本企业，仅青岛就有5家，计21.5万支纱锭，4,640台织布机。在天津，95万支纱锭，34,000台织布机为日方所有，其中新添置的纱锭达52万支，织布机达28,000台。打入华北的企业，除上述的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和东洋纺织株式会社外，还有大日本纺、福岛纺、吴羽纺、仓敷纺、岸和田纺和歌山纺等日本国内的大厂家，再加上内外棉、上海纺等日本在中国纺织业的大厂家，大资本可以说无一遗漏。^②

暴风雨般投资的依据是什么？不外乎中国工人的报酬低，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当地可供应原棉等等，这与明治、大正时期以来建厂前选址的条件相同。^③据说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盘进天津两家工厂的贷款，实际上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还清了。^④仅这一点还不能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当时的情况，《东洋经济》1937年3月13日曾有如下说明：“（1）由于日本国内纺织设备增加，造成大幅度地、持续地压缩生产时间，纺织联合会为调整生产量以适应棉布的需求，在1936年6月作出了进一步限制增加设备的决定，规定自1937年1月始，两年之内不允许增添新设备；（2）日本

① 石黑英一：《大河·津田信吾传》，钻石出版社1960年版，第177—181页。津田是财界中最积极主张打入华北的人物，是自由投资论的急先锋。

② 见大谷登：《川村利兵卫翁小传》，玉木永久发行，1935年版，第28页。

③ 关于日资打入天津问题，池田纯久曾说：“大藏省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一是担心生产过剩，二是担心汇兑管理出现问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所以必须规定“一个标准”。见满铁经济调查会：《中国驻屯军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第三次座谈会报告书》，昭和12年6月，第7—8页。

④ 石黑英一：《大河·津田信吾传》，钻石出版社1960年版，第180页。

厂家厌恶日本国内增税等做法，千方百计逃避；（3）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排挤了日货，加上高关税等原因造成对中国出口连年锐减，如果把生产移到中国，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4）中国政局稳定；（5）经济侵略政策起了推动作用；（6）华北棉花有增产的可能。”^①以上6点中，第1、2、6点是引起投资狂潮的重要原因。但认为日本军队控制了华北，给企业以安全感是其中一个原因的说法，也不能加以否认。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经理津田信吾在劝诱向天津投资时曾说：若在青岛，即便海军去开发也比在天津危险。从旅顺派海军到青岛需10数小时，可是天津驻扎有日军，增加人员问题容易解决。^②纺织业狂热地打入华北，是在国内外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为日后军方的行动制造了起因。

表 2 30年代日本纺织业的状况

日本全国纤维协会统计			大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			
棉织品产量 (百万码)	棉织品出口量 (百万码)		棉纱产量 (百万磅)	棉织品产量 (百万码)	纱锭数 (千支)	织布机数 (千台)
1928	2764	1419	980	1382	6,467	
1929	2647	1791	1117	1538	6,836	79
1930	2615	1572	1009	1388	7,214	79
1931	2840	1414	1026	1405	7,535	78
1932	3100	2032	1124	1533	7,964	79
1933	3611	2090	1239	1674	8,643	86
1934	4058	2577	1388	1794	9,530	91
1935	4112	2725	1424	1843	10,649	96
1936	4396	2710	1442	1802	12,139	101
1937	4826	2643	1586	1891	12,567	107

① 小岛精一：《华北经济读本》，千仓书房1937年版。

② 石黑英一：《大河·津田信吾传》，钻石出版社1960版，第178页。

表 3

日本在中国纺织业的发展

	纺 纱 机 (千支纱锭)					织 布 机 (台)			
	合 计	上 海	青 岛	天 津	与中国全 部纱锭比	合 计	上 海	青 岛	天 津
1925年末	1,234	976	238		30.5	6,340	5,312	1,109	
1930年末	1,478	1,109	344		35.0	12,341	9,172	2,869	
1935年末	1,869	1,352	492		37.7	22,932	15,518	7,114	
1936年末	2,068	1,350	523	170	40.8	27,788	17,298	8,790	1,400
1937年7月	2,093	1,358	592	219		31,010	17,370	11,238	2,102

日本方面的数字出自日本在华纺织联合会，中国方面的数字出自华商纱厂联合会总会的报告。根据小岛精一的《华北经济读本》（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115—120页）制成。

表 4

日本在天津纺织业增扩情况

厂家数字		纺纱机 (千支纱锭)	织布机 (千台)
旧有	4	170	1.0
新增设	5	180	21.4
正在建设中	5	340	6.3
计划增添	5	430	6.2
合 计		1,120	34.9
新建、增设		950	33.9

根据小岛精一的《华北经济读本》（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134—135页）制成。

关于纺织业以外其他各业的打入情况，通过“表5”1937年1月中国驻屯军所整理的资料可以了解到，在平津、冀东，“已开始经营和正在着手经营的企业，总资本为5600万元。决定投资企业的总资金也达2400万元，合计8000万元。这些大都属于非官方的

表 5

打入华北的企业一览

(1) 已成功地打入和正在打入的企业

行 业	投 资 者
A 冀东地区电话业	满洲电话电信株式会社
B 电灯电力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兴中公司
C 汽车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D 民间金融业	大公公司
E 冀东金融流通	冀东政府
F 耐火材料	大阪氮肥株式会社
G 卷烟	大阪氮肥株式会社
H 造纸	阪神财团
I 航空	满铁航空株式会社
J 玻璃制造	吕光玻璃株式会社、东洋拓殖
K 纺织	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东洋纺织株式会社
L 洗毛	钟渊纺织株式会社

(2) 已制订计划的企业

A 石油进口与销售	满洲石油株式会社
B 纸浆	
C 硫化染料	维新化学工业会社、三井、三菱
D 纺织	福岛纺织、上海纺、大日本纺
E 制药	日本制药会社
F 麻纺	天津宫崎商会
G 采煤	
(华北协会待成立)	

根据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的《中国驻屯军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 第二次座谈会报告书》(昭和12年2月,第36—38页)制成。

自由投资企业”。但这些企业大体上分别属于满铁集团、纺织会社集团及大阪集团和一些中小资本。据说维新化学与三菱集团的帝国染料结合，可见财阀此时也是比较慎重行事的。^①

1937年，日本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因此认为有必要对自由投资企业的资金，在外汇汇总方面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侵略华北计划出现新的转机不仅有日本国内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六、经济侵略的停顿

1. 东京与南京

1936年12月，以绥远隆隆的炮声为背景，中止了解决中日间悬案的谈判。数日后，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因兵谏被监禁。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提出了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方针，开拓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道路。^②在中国，无可挽回地排除了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就在这时，日本对华政策也从《何梅协定》发展到了《华北问题第二次处理纲要》的阶段。对华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变得比较稳健，它摸索着协调中日关系的道路，但为时已晚。

在东京政策转变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石原莞尔等人。他们认定日本5年后的目标是对苏决战，所以主张一切国力都要用在重要产业的建设上。充实国力论者石原对于《何梅协定》以来关东军、中国驻屯军的行动持批评态度，他根据绥远事变失败和西安事变以后的动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转变政策的重要性。在日本国内，广田内阁倒台后，石原等人企图阻止宇垣一成组阁，支持以板垣为陆相、山本铤十郎组阁的做法。林内阁成立后，开始改善财界与陆军的关系，设置企画厅，加强总动员体制，为军事工业和重

^① 《满洲日日新闻》，1937年3月23日。

^② 《日中战争》（上），第237—238、325—341页。

要产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自1月林内阁成立时起,陆军便首先主张重新认识对华政策。外相佐藤尚武也批评以前对中国的政策,海军与外务省随声附和。1937年4月16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共同决定了第二次《对华施行策略》和应该称为第三次《华北问题处理纲要》的《领导华北方略》。这一策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参照以前的《对华施行策略》,提出了“对南京政权所施行的策略”,认为“对南京政权及该政权领导的中国统一运动,应持公正态度”。比过去有很大变化的是,明确提出“要努力消除导致中方采取侮日政策的根源”,使其“抛弃容共及依靠欧美的政策,使之与日本帝国接近”。在第二部分“对华北施行的策略”中,仍然以“使该地区成为实质上的防共亲日满地区,并且获得该地区国防资源及扩充交通设施”为目标,只是特意加上了“实质上的”几个字。作为手段,明确指示“根据促进各项经济工作的需要”,对“华北施行自治”,当“中国内政有紊乱之虞时”,施行政治工作。以上这些可以看作是对开发经济资源、发展交通事业、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共同指导方针。对于地方政权,无论“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地方政权,还是图谋分裂的地方政权,一概不予援助。对内蒙的策略是,领导建设亲日满的“蒙古人的蒙古”,其势力范围维持现状。同时决定的《华北领导方略》也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特别强调避免产生历来的“扩大停战区域,扩展满洲国边境,以至图谋华北独立的误解”,希望达到“以华北民众安居乐业为宗旨,专心进行文化与经济工作之目的”。对冀东走私贸易和日本飞机在华北上空自由飞行问题,也明确指示“谋求迅速解决”。关于经济开发,尤其明确指示要“引诱、招引”中国资本。以上这些决定无疑都是对东京前一年失败的反省,可以说是为恢复中日关系作出的最大努力。但是,这种政策性的转变已为时太晚,于中国改变政策的设想丝毫无补。这一点可以从1937年3月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16

人经济代表团的南京、上海之行得到说明。^①

儿玉访华，表面上是对1935年10月吴鼎昌率领的经济考察团（前述之河北经济协会代表团）访日的回访，实质上是秉承当时广田内阁有田外相与寺内陆相的旨意，把前述的第二次《对华施行策略》修改稿，向中方通报，并告知对方日本还准备逐步解散冀东政权。儿玉一行受到隆重欢迎，蒋介石还与儿玉进行了会谈。但在会议桌上，中方的发言可谓态度严峻。中方提出经济互助的前提是日本首先停止使华北特殊化的活动，如必须解散冀东政权；取消冀东走私贸易；日本飞机在华北上空停止自由飞行；撤消日本在华北的军事特务机关。前外长张群与张公权、吴鼎昌、周作天在会见儿玉、船津辰一郎、油谷等三人时，更是义正词严。中方发言中有些话意味颇为深长：“华北问题是中日两国关系的癌瘤，目前华北存在的铁路建设、铁矿开采及以前成立的惠通公司等一系列问题，事前都未与南京中央政府商谈过。即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宋哲元及各当事人意见不统一，事先也未进行过联系，实际上是各当事人自己与日本派出的军人及其他人员随意进行交涉。……我们担心关东军今天不仅把冀东政权，甚至把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当作脱离中央政府的独立政权。”^②冀察方面使南京不满这是事实，而且它内部不统一也是人所公认的。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关东军比日本政府更加危险。冀察政府的其他成员比宋哲元更不堪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方认为东京与南京进行具体谈判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从日方来看，中央决定的事，下属执行者往

① 儿玉谦次：《中国回忆录》，日本周报社1952年版，第114—190页。

② 儿玉谦次：《中国回忆录》，日本周报社1952年版，第161页。所谓惠通航空公司是田代—宋哲元协定表现出实效的唯一一家公司。它是根据1936年10月17日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与宋哲元签订的航空协定，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企业。该公司对外称有股金450万元，实有270万元。中日双方出资各半，天津市长张自忠任董事长，前满洲航空公司重要干部儿玉常雄任副董事长。下面6名重要干部，中日双方各占一半。该公司经营天津—大连、北平—天津—山海关—锦州、天津—北平—承德、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4个定期航班。以上见北上春雄：《华北公司一览》，载《中央公论》临时增刊《开发华北》号，1937年12月。更为详细者容日后考证。

往会作各种各样的变更。即使强行谈判,也不可能敲开龙烟铁矿、津石铁路的大门,因为纵然在谈判中对手有所应允,但也常因冀察中央和南京方面的反对而发生动摇。所以说前述中方的这段话恰当地点出了当时的微妙之处。结果,儿玉使团此行唯一实质性的成果,便是运出了一批银块。这些银块是币制改革之后,由于中方一直禁止出口,而不得不度存在上海、汉口、广东各日本银行的银块。华北的情况没有变化,这可能是顾及中国驻屯军的意向吧。这一来,儿玉一行故意不在华北停留便直接回国了。从疏通信息上说,南京、上海之行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成功的,但缺少实质性的成果。东京与南京的关系就是在这种僵局中迁延着。

2. 天津的动向

《领导华北方略》在中国驻屯军的政策方面仅有一点变动,这就是把前述之“河北农村协会”计划视为既定国策中的面向民众的“文化经济工作”。6月中旬,陆军派出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访问华北,探询对方对解散冀东政权的态度,据说驻华北的日本军方大体上赞同解散该政权。^①

尽管中日关系在总体上说很不妙,但中国驻屯军、满铁、兴中公司从事经济工作的热情有增无减,对未来的推测持乐观态度。儿玉代表团回国后说:“以前对冀察的压力,日本与南京是各占一半,但很快地日本便减为2分,南京增至8分,这使龙烟铁矿、津石铁矿的谈判陷入僵局,对我们访华也产生了许多不满和牢骚。”^②传入儿玉耳中的不满也在天津流传着。在中国驻屯军与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座谈会上提到津石铁路问题时,经济参谋池田纯久说:关于津石铁路,1937年3月至4月他到北平访问宋哲元时,宋已同意,而且日本也表示“停止执行或南京或冀察政权的首鼠两端的政策”,一定支持冀察政权。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他是与秦德纯、齐燮元谈的。池田前往东京后,冀察内部开会讨论此事,

^① 《日中战争》(上),第240页。

^② 儿玉谦次:《中国回忆录》,日本周报社1952年版,第188页。

并派李思浩谋求理解。据说南京方面坚决反对从日本借款修路，甚至提出变更津石线的意见。宋哲元通过3月9日佐藤外相在议会中的答辩和儿玉代表团访华，了解到解散冀东政权将其并入冀察政府的可能性之后，对池田表示，希望将津石铁路问题与合并冀东问题一同解决。池田认为，从建设津石线问题可以看出“东京①对冀察方面完全不信任”，它用希望作为政治问题来解决的话搪塞，使修筑津石铁路一事完全陷入停顿状态。②据兴中公司的记录，1937年4月，兴中公司答应修筑津石铁路250万日元贷款的要求，并作好了承包建筑工程的谈判的准备。“5月，事情发展到了签字阶段，由于南京政府的抗议，冀察方面拒绝签字。”以上经过基本是事实。③这恰好是张群在南京向儿玉告状的明证。至于龙烟铁矿的开发，情况也不妙，开工不久便又停顿下来。这种不进不退状态一直持续到芦沟桥事变。

可以推断，日本当局认为冀察当局最终能成为日本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此外，中国驻屯军也要求满铁产业部（1936年9月改组为经济调查委员会）协助，制订《开发华北产业计划》。本文拟对制订“计划”经过及“计划”概要进行汇总介绍。满铁最初制订向华北投资计划的时间是1935年8月，它受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的委托，通过计划的制订“预先研究并决定国策方面最适当的投资机构形式”。经济委员会不仅考虑投资机构的形式，而且要对“投资余力、投资对象、借款条件、货币问题等进行综合考察”。同年9月成立了投资问题小委员会，1936年4月委员会便取得了成果，并将成果提交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④以后的工作便由满铁驻天津事务所接手了。同年12月，由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出面，

① 疑为南京。——译者

② 满铁经济调查会：《中国驻屯军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三次座谈会报告书》，第12—15页。

③ 兴中公司：《有关煤矿交接的报告书总论》，昭和13年8月31日，第5页。

④ 满铁调查部：《支立案32对华北投资策略，第一对华投资问题研究小委员会立案书》，第5—98页。

制订了《开发华北经济五年计划》和《开发华北经济五年资金计划》，^①这两项计划，估计司令部早在1936年10月便制订好了，目前的计划可能是修订稿。^②

计划内的工作真正大规模开展那是在1937年以后了。1936年，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莞尔为主，着手制订日满五年产业计划。计划规定：在满洲国，从1937年度开始实行开发满洲产业计划；在日本，以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为中心，对五年计划进行审查，陆军省则于1937年5月把《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作为决定方案与上述计划汇集到一起，要求政府实施。^③显然，这一计划的制订刺激了这种风潮，尽管石原的本意是极力控制打入华北，迫切希望产业计划也在“日本、满洲、河北北部、察哈尔省东南部的范围内完成”，^④而在华北制订的计划里，其范围则包括山东，即华北三省，也可以说是华北五省。总之，计划是从大规模开发的角度出发的，不过，这仍然是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关东军与满铁唱的独角戏。

1937年夏将要召开的“大陆经济会议的计划”，目前尚不清楚。它或许是包括朝鲜、满洲、华北的计划工作者在内的会议吧？会议虽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如期召开，但为了举行这次会议，满铁成立了大陆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于1937年6月拟订了计划方案。^⑤实行此项计划的目的是：“明确将来开发此产业的准则，待日满华一并纳入日本的经济圈时，要

① 同上页注④，第99—105页。

② 该文件仅在《岛田文书第72卷关于华北经济互助的报告》中所收的《关于华北产业经济开发文件》（昭和11年10月14日）中有目录，未见到文件全文。

③ 关于五年计划的决定，见《现代史资料8》，第719—732页。关于五年计划制订过程的各个方案，见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资料1》，1970年版。关于五年计划的制订过程，参见拙著：《分析战前日本经济的成长》，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235—253页。

④ 《现代史资料8》，第681页。

⑤ 制订的方案中有满铁调查部：《支立案32对华北投资策略》、《支立案51开发华北工矿业计划》、《支立案311华北金融策略》。估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方案。

使之成为适当调整相互经济关系的万全之策。”^① 本文的任务不是详细研究该计划的变迁，而只是对计划的三个演变阶段作一个大致的对比。该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对华投资问题研究小委员会于1936年4月制订的《华北投资设想》（简称A方案），第二阶段是中国驻屯军于1936年12月制订的《开发华北经济五年资金计划》

（简称B方案），第三阶段是满铁大陆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于1937年6月制订的《开发华北五年计划》中的《开发华北经济资金计划表》（简称C方案）。为方便起见，也把七七事变后满铁向东京提出的《开发华北产业计划》（简称D方案）放在一起加以比较。

②D方案是把开发目标扩大到华北五省，梦想以满铁为中心进行开发。这显然是C方案的发展。

通过表6 A、B、C、D 4个方案的对比，可发现下面事实：A方案是仓卒制订的，试行色彩很浓。似乎和满铁一样，把交通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而从修筑大运河到掌握纺织业实权的一系列方案中，反而没有把盐业、煤炭液化和铝等国防资源的开发包括进去。与A方案相反，B方案是在当时条件下，以中国驻屯军可能实施的地域为对象制订的。例如修筑津石铁路，在塘沽筑港，开采龙烟铁矿、井陉与正丰煤矿及长芦盐等当务之急，其资金限制在3.1亿日元、由日方负担2.7亿日元的可行范围内，承办者以兴中公司为主等等。C方案实质上仍旧是中国驻屯军的方案，只是范围增加了山东省。在炼铁规模上，复活了满铁视为重点的项目——天津制铁所；港湾方面，增加了青岛港。这不仅是A方案的翻版，而且还增加了重要的五年计划的内容。此外还包括煤炭液化和铝等资源项目，可以说是把东京的意图具体贯彻到了华北。C方案最重要的特点是不仅动用了满铁和兴中公司，而且还打算对日本本土的大资本实行总动员。计划要求东洋拓殖、三井、三

① 满铁调查部：《支立案32》，第1页。

② 《开发华北产业计划概要（试行）》、《开发华北产业计划明细表》、《开发华北事业资金表》，现作为《泉山文书》藏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资料》第2卷收有《开发华北产业计划概要（试行）》。

表6 A、B、C、D四方案对比

括号内的数字为日本方面出资

	A方案 (1936.4) 华北投资设想 (满铁制订) 华北五省 所需资金 (千日元)	B方案 (1936.12) 开发华北经济五年资金计划 (中国驻屯军制订) 冀、察两省 所需资金 (千日元)	C方案 (1937.6) 开发华北经济资金计划 (满铁制订) 冀、察、山东三省 所需资金 (千日元)	D方案 (1937.8) 开发华北产业计划 (满铁制订) 华北五省 所需资金 (千日元)
1. 交通 铁路	高密——山峰县 377公里 济南——清化镇 580公里 太沽——沧州——石家庄 344公里 共 9 条线路 2,986公里 改造平绥线与正太线 合计 347,680 (289,730)	津石线 25,500 济南——道口 19,550 改造平绥——八达岭 6,500 合计 52,050 (52,050) (全部费用由冀察政府向兴 中公司贷款)	通州——大清河 古北口——通州 龙玉线 以上冀东 32,900 高密——徐州 济南——道口 张梅线 以上山东 58,032 津石线 28,573 合计 119,505	改造北宁线 改造平绥线 改造平汉线黄河以北部分 改造津浦线韩庄以北部分 216,000 古北口——通州 石家庄——沧州——太沽 济南 道口 高密 枣庄 同蒲线中未完工路段 120,000 合计 336,000

续表 6 (1)

港湾	修筑塘沽港	25,000	修筑塘沽港	60,000	修筑大清河口港	12,000	修筑青岛港	10,000
	修筑秦皇岛港	18,000		(60,000)	疏浚小清河	900	修筑塘沽港	60,000
	修筑青岛港	16,000	(全部费用通过冀察政府		修筑青岛港	10,000	修筑秦皇岛港	5,000
	合计	59,000	在日本发行公债来募集)		修筑塘沽港内铁路	8,000	合计	75,000
		(49,170)			合计	30,900		
汽车	3万公里的汽车运输业务		华北长途汽车运输业务		冀东汽车运输	3,000	2.5万公里汽车运输业务	
		30,000		10,000				28,000
		(49,170)		(10,000)			修筑1.5万公里	45,000
							合计	73,000
航空	成立满华合营航空公司		华北航空公司	15,000	无		开辟5,000公里的空中航线	
		14,500 (12,500)		(10,000)			(扩大惠通公司)	7,500
运输	无		塘沽运输公司	3,000 (3,000)	无		无	
	投资华北通信株式会社		电信电话邮政广播株式会社					
通讯		25,000 (14,000)		14,000 (9,000)	无			
运河	改造大运河、南运河、北运河	100,000 (83,330)	无		无		无	

续表 6 (2)

	总计 576,180 (470,980)	总计 153,500 (143,500)	总计 153,405	总计 491,500 大部分为满铁投资或借款，只是道路方面为华北政权投资，日本共出资 491,500
2. 矿业	金：长城沿线 8,000 山东招远周围 1,700 铁：龙烟(包含制铁所费用) 68,500 山东省中部 12,000 煤：冀东地区 37,500 河北省西山 15,000 河北山西交界 7,000 其他各地 6,000	龙烟铁矿 16,000 (5,000) 涿鹿铁矿 5,000 (3,750) 井陉正丰煤矿 4,890 (4890) 长城煤矿及其他 5,000 冀东地区金属冶炼厂 2,000	铁：唐山制铁所(年产铁40万吨) 65,520 金岭镇制铁所(年产铁20万吨) 27,710 天津制铁所(含石景山铁58万吨，钢10万吨) 78,300 小计 171,530 煤炭液化：天津液体燃料公司 80,784	钢、铁、矿石(金岭镇、涿鹿、龙烟) 6,960 生铁(石景山、天津年产206万吨) 78,442 钢材(天津年产50万吨) 小计 85,402 (84,967)

续表 6 (3)

64	其他矿产	26,000		煤炭：出口公司 } 5,000 开平矿务局 } 冀东 19,525 淄川 } 1,900 博山一带 } 山东 24,750 其他 } 15,004 井陉 } 3,878 正丰 } 冀察 1,650 其他 } 10,216 金：冀东金矿 6,748 招远金矿 2,000 铝矾土：冀东 300 锰：冀察 100 石灰石：冀东 600
	合计	181,000 (135,700)	合计 32,890 (26,640)	煤炭液化：天津、平定（年产35万吨） 225,000 (158,667) 煤炭：开发株式会社（年产1,730万吨） 91,174 鲁大公司（中国资本，年产825万吨） 56,650 液化公司（年产446万吨） 42,471 小计 190,295 (147,813) 铝矾土、铝矿、铝： 7,000 (3,500) 采金：冀东、招远 9,750 (4,875) 石灰： 800 (800) 锰： 800 (800) 合计 519,047 (401,422)

续表 6 (4)

3. 工业及其他	增建、新建工业	63,800	电力	30,000	水泥: 冀东	7,000	硫铵: 淄川年产50万吨	11,000
		(31,900)		(15,000)	纸浆: 山东	6,000		(3,667)
	掌握已有工业经营权		制铁所	5,000	冀察	6,000	纸浆: 冀察、张店年产各25万吨	
		97,600		(4,000)	碱: 冀察	4,750		12,000
		(48,800)	棉花仓库公司	2,000	电力: 冀东年发电34万千瓦			(4,000)
	以上主要行业为制铁、纺织、电力。			(1,000)		98,143	电力: 5个电厂年发电共64万千瓦	
			水力(冀察方面在日本发行公债募集)	25,000	山东年发电15万千瓦			136,496
				(25,000)		36,346		(68,248)
	棉花增产	37,790	长芦盐买卖公司	1,500	冀察年发电10万千瓦	23,000	盐业(洗涤厂、青岛、汉沽、邓沽)	
		(7,000)		(1,500)	小计	157,485		9,560
	振兴畜牧业	5,200	领导合作社财团法人		硫铵: 山东	11,000		(6,207)
		(600)		5,000	盐业: 冀东	1,560		
				(5,000)	冀察	7,000		
			合计	113,500	农畜产: 冀东	77,986		
				(87,500)	山东	40,000	合计	169,056
					合计	318,781		82,122

续表 6 (5)

4. 金融	入股华北中央银行及 稳定通货资金 45,000 (30,000)	扩大河北省银行 (向朝鲜银 行贷款) 15,000 (15,000)	无	联省中央银行 50,000 (50,000)
总计	1,006,570 (724,980)	318,890 (272,640)	835,387	1,259,603 (951,257)

菱、日本制铁、帝国燃料、日本水泥联合会、朝鲜制铁、日本人造丝、王子造纸、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东洋纺、东京电灯、日本电力、东邦电力等公司向各有关事业投资。这虽然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但从中亦可看出军方动员本国资本的意向。就投资对象而言，D方案可以说是C方案的延续，而就铁路和港口建设的重点地位而言，又可以说是A方案的再现。此外，从扩大煤炭液化规模及开发山西煤矿可以清楚地看出生产军事化的趋势。再就是交通方面，即便在工业部门，也都贯穿着由满铁为主体的特殊会社控制经营的“满铁至上”原则，这赤裸裸地暴露了满铁包藏的祸心。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开发华北计划反映了那一时期各个阶段的局势。换言之，该计划可以说是当事人的意图与石原设计的蓝图相结合的产物。华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芦沟桥事变。

译自近代日本研究会编：《特集・近代日本与东亚》，东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

王玉平 唐克俊 译

国民党中国的 法西斯主义：蓝衣社

易 劳 逸

校者按： 易劳逸（1929—）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协会会员、清史研究学会会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华民国研究学报》顾问。主要论著：《流产的革命：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毁灭的种子：193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战争与革命》等。1987年10月曾来华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作了题为《力行社的崛起与覆灭》的讲演。

本文系易劳逸教授在香港、东京和台北历时3个月广泛搜集资料后写成。刊出后引起台湾方面的重视。力行社创始人之一的于国勋著文认为易劳逸的论文“侮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些“莫须有的误谬”（于国勋：《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20世纪30年代的蓝衣社是中国最有影响和最令人恐惧的政治运动之一。对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而言，蓝衣社运动已经成为一股虚幻的势力，大多数人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对它的主义或活动很少有确凿材料能阐述之。现在，基于回忆录、采访记录，特别是30年代日本谍报机关的报告，这个秘密组织粗糙的画卷能够

勾勒出来了。显露出来的画卷表明，此组织不仅是恐怖分子的组织，而且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反映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下许多中国人的利害关系和理想。笔者希望这项研究不仅提供对国民党统治本质的一种见识，而且能够显示出一种以前从未研究过的政治类型的类别：法西斯主义。^①

蓝衣社组织形成于1932年初，当时实质上，中国各种政治形式对国家外观上不可逆转的衰败感到灰心丧气，并且屡遭挫折。4年前，即1927至1928年，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乐观时期，当时很多人认为在国民党主持下建立起来的新政府会妥善处理国家众多的问题。^②但是国民党没能创造一种有效的行政制度，在重创稳定的政局方面也遭到失败，官僚主义使贪污之风盛行，派系之争屡屡发生，由此导致了无数次内战，政治镇压代替了民众的支持，而后者本应是国民党统治的拱顶石。到1931年11月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革命处于危难之时，整个国家已经逐渐丧失了对党的信任。”^③1931年12月，他屈服于各种政治压力，辞去了在政府中的所有职务。

无疑，蒋介石深切地感到失意和悔恨，因为这是出于政府的压力和外表上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失败。他能重新掌权吗？他得用崭新的方式去处理政府中的事务。

① 本文是一项大型研究课题的一部分。它得到亚洲协会和现代中国协议委员会的赞助。此两机构均属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此外还得到亚洲研究中心和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及伊利诺斯大学研究委员会的赞助。

应该指出，蓝衣社这个词（文字上应该解释为穿蓝衣服的社团）并不是官方的名称，此组织的原始名称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拥有其他名称，或者其组织中某些分支的名称，如“革命青年同志会”、“中国复兴社”、“力行社”（它的含义是致力于推行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主义）。关于蓝衣社组织的名称问题，在作者即将出版的另一部专著《流产的革命：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加以认真的讨论。

② 一位敏感的观察者乔治·索科爾斯基在1929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民间舆论发表评论时说：“在中国，没有任何政府组织在这方面能比得上南京政府，它拥有良好的开端。”“人民希望它成功。”见H·G·伍德黑德编纂，《中国年鉴》（天津出版社1928年版），第1373—1374页。

③ 《党内团结是我们的唯一出路》（载《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年版，第11卷，第44页。）

在蒋介石辞职前，接到了一项请他复兴革命运动的建议。这份厚达87页的论文题目为《改革国民党的一些主张》，作者是一位名叫刘健群的青年党员。他在文中写道：国民党在精神上枯竭了，缺乏革命激情。他认为，从理想状态上讲，有生命力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完全废弃。当然，他也认识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写道：“由于历史的和正统的原因，并且由于我们不愿激起大规模的争论（如果这能避免的话），我们主张保存党的旧壳，但是除此之外，得在党内组织一个‘布衣团’，它将给党带来活力，并且创造出党的灵魂。”^①刘健群阐述道，这个新组织只包括服从革命的成员，他们将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物质利益对他们毫无诱惑力。^②

蒋介石虽然处在“赋闲”中，但正密谋卷土重来。他读了刘健群意欲复兴摇摇欲坠的革命的论文。在杭州，蒋介石把一小群他绝对相信其忠诚的青年官员聚集起来，命令他们与刘健群商谈此事，并要求他们组成类似“布衣团”的组织。^③此外，他规定，以下诸条作为这个新组织的组织者的指导方针：1. 蒋介石必须是永久的最高领导；2. 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将担任领导工作，并以此为核心扩张势力；3. 必须执行三民主义，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并且补充武士道精神（此为一种说法）或法西斯主义（此为另一种说法）。^④

蒋介石在1932年1月21日重返南京，29日，在日本军队袭击上海的第二天，成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1月的最后一周，蒋介石召集力行社官员会议，众所周知的蓝衣社组织从此建

① 此文收入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版），第150—151页。

② 同上，第154—155页。

③ 《蓝衣社和他们的特殊机构部门的概念》（载《中国北伐军总司令部》，1940年版）无页数。

④ 《蓝衣社组织和反对满洲帝国、反日活动的例证》，收入《蓝衣社史料》（载《东洋文库》第11页）。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由外务省研究部颁发）第6页此文件的序言表明这项重要工作是由石井完成的。

立起来了。

蓝衣社的目标

蓝衣社运动起初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刘健群的论文就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感召下写成的，^①这种主义逐渐吸引着这项运动的组织者。这些人当中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在1969年提到：“现在看起来，法西斯主义是落后的，但是那时它似乎是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主义。”^②

值得重申的是，在30年代，许多中国人并不视法西斯主义为有害或堕落的主义；相反，他们感到这是一种最先进和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代议制政府在中国从1912年起就一再重演，但是很奇怪，它们都有着悲剧性的结局。而且，似乎在全球范围，民主和自由主义受到了个人或一党独裁专制的抵制。法西斯主义因此显得既是一种进步的主义，又能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维护国家利益是蓝衣社的主要目标。“国家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员的唯一责任是誓死保卫国家的利益，”^③对这点，只要读一下蓝衣社的“纲领”就再清楚不过了。

法西斯主义吸引蓝衣社的地方就是，它似乎提供了达到拯救国家的目标的一种业已证明可行的和明确的方法。蓝衣社的喉舌《社会新闻》的社论写道：“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它已经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此，再也没有别的路好走了，只有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

① 采访记录。（在台湾采访时，我发现采访对象很不愿意谈及政治问题，直到我保证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及资料来源后，他们才愿与我合作。因此令人遗憾，我从采访调查中得到的绝大部分资料无法标明其确切出处。）

② 采访记录。

③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87页。

了。”^① 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也持同样的热情，在一次蓝衣社的集会上他宣布：“法西斯主义是……对衰败、萧条社会的一种刺激。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是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东西。”蒋介石接着说：“在中国目前危机四伏局面的阶段，法西斯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一帖绝妙的良药，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拯救中国。”^②

蓝衣社对国家利益的全面提高可以和他们对个人主义的全面放弃相比较。贺衷寒也许是蓝衣社寡头政治集团中仅次于蒋介石的主要领导者，他号召人民放弃他们的自由，乃至他们的生命，这样国家就因此自由了。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自由”。^③ 《社会新闻》声称，对个人主义者来说，“神圣的原则”就是为国家服务和牺牲。^④ 蓝衣社的目标就是极权主义，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个人主义者“履行其职责，无权提出他的权利。”^⑤ 事实上，如果国家变得富强了，他就能从中获益。“但是在

① 《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社会新闻》上海，1933年8月24日，第1卷，第24期，第274页。）

我一直认为《社会新闻》是蓝衣社的出版物。读者可能会吃惊，这份杂志的政治倾向问题是值得怀疑的。包华德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版）第1卷第436页表明，这份杂志是C·C·派的出版物，但它并没有明确肯定其性质。《中国论坛》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它认为《社会新闻》是蒋介石地方蓝衣社的印刷品”（见《中国论坛》第2卷第12期，1933年10月22日，第4页）《中国论坛》是介于蓝衣社和C·C·派之间的一份模棱两可的刊物（见《中国论坛》第2卷第1期，1933年3月1日，第4—5页。）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广东《青年战士》杂志称《社会新闻》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喉舌（见《青年战士》第1卷第13期，1933年9月30日，第2页），并称蓝衣社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同上，第1卷第7期第5页和第2卷第6期第19页）。而且，还有事实可证实这一点，即《社会新闻》的编辑方针几乎和汉口的《前途》杂志（《前途》杂志在上海发行，原文有误。——校者）一脉相通，后者毫无疑问是蓝衣社的出版物。

② 《蓝衣社组织和反对满洲帝国、反日活动的例证》，第3及第5页。

③ 《今日教师应有的觉悟与责任》（贺君山讲，张明记），载《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1日，第1页。

《前途》无可争辩是蓝衣社的出版物，显然也是讨论这个意识形态问题的主要论坛。

④ 社论：《民权与自由》（《社会新闻》第3卷，1933年4月30日，第147页。）

⑤ 陈秋云：《法西斯蒂主义与中国》（《前途》第2卷第2期，1934年2月1日，第3页。）

服务之前，个人主义者绝对不能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社会之上。”^①

法西斯主义绝对服从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的原则，是蓝衣社意识形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蓝衣社的“纲领”指出：“蒋介石是国民党唯一至高无上的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因此，成员们必须绝对地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召唤，将他的意愿象自己的意愿一样去贯彻执行。”^② 贺衷寒被告诫要强调“服从领袖是无条件的，每个人必须真挚地、坚定地与他同生死、共患难。”^③

蓝衣社尊重领袖的原则可与他们憎恶民主制相比较。在他们的心月中，从1911年革命以来的中国政治无能和目前国民党内的紊乱，主要是试图建立民主的制度和实践的结果。蒋介石解释道：“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劳而无功地沉溺于建立民主制和鼓吹自由思想之中，结果怎样呢？我们堕入了混乱不堪、无法逆转的境况中。”^④ 《社会新闻》的一篇文章宣称：“继承有害无益的民主制已经使目前的国民党组织产生了离心作用和软弱无力的状况。即便是从苏联引进的委员制模式，它在表面运用于国民党内，但同样是令人失望的。”^⑤ 刘健群断言：“委员制的最大失败就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辩护，同时又能指责他人，因此浪费了党的精力……在革命的复兴中，没有人能行动自如……一旦开会，总是不了了之，达不成任何协议。内战的次数和会议的次数成正比。”^⑥

蓝衣社的理想就是成为一种社团，它在领袖的意识和民众的行为之间扮演出色的调整角色，没有尸位素餐者，没有首鼠两端者，只有献身精神和不加思索的服从。陈秋云在《前途》杂志上声称：“今天拯救中国只能通过以下途径才能达到，即无私的组织服从领袖，信赖领袖的政策，执行领袖的命令。当无数的群众有

① 同上页⑤。

②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88页。

③ 刘健群：《银河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5页。

④ 《蓝衣社的组织和反对满洲帝国、反日活动的例证》，第5页。

⑤ 《社会新闻》，1933年8月24日，第275页。

⑥ 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34—35页。

了唯一的思想，象一个人那样行动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①

为了达到此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理想，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坚定不移的精神，纯洁崇高的人格，他必须通晓军事和政治。”^②《社会新闻》承认：“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青年发展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个人主义，尊重崇拜落后的偶像，这是错误的。因为偶像是为加强社会组织的力量而服务，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提高民族文化的发展，统一民众的精神。”因此，社论断言：“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的第一步。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斯大林！”^③

那么，命中注定要当国家“中心偶像”的蒋介石，他是怎样对待这场包含一位全能且至高无上的领袖思想的运动呢？1933年9月在江西，蒋介石对一批党的干部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其中断言：

“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绝对信赖一位聪睿、极有才干领袖。除了绝对信赖一个人以外，不存在其他领袖或主义。因此，在一个组织之中，虽然有干部、委员和行政部门，但是这三者之间毫无冲突。只有对领袖的信赖，领袖对任何事情有最终的裁决权。

“但是目前在中国，我们没有这样一位领袖，我笃信，除非都绝对信赖一位领袖，否则我们将无法复兴我们的国家，无法完成革命大业……”

“因此，领袖很自然地将是位伟人，能够掌握革命的精神，故而他是全体党员的楷模。而且每位成员必须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组织行动，间接地为社会、国家和革命服务。

① 陈秋云文，见《前途》1934年2月1日，第3页。

② 《五中全会宣传提纲》，1934年10月21日。见《横田实报纸大全》，载《东洋文库》。它包括1924年至1946年的大事记，由89种贴报簿组成。

③ 社论：《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第3卷，1933年5月15日，第226页。）

从我们加入革命组织那天起，我们就完全地把我们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托付给组织了，并向领袖宣誓……这样，我们第一次真正地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了。”^①

在公开场合，蒋介石拒绝承认他想当独裁者。^②但是他声明表明，他并不想阻止不测事件的发生。

蓝衣社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认为国民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民族文化的崩溃。因此，他们争辩道，文化革新必须优先于国家的军事或政治革新。张云伏在《前途》上撰文指出：“国家的兴亡治乱和文化的盛衰成正比。如果我们不首先建立新的国民文化，那么复兴国家就无法成功。”^③茹春浦的观点认为，文化具有并且决定人类习性的特征，他强调，“文化统制是社会、政治、教育以及一切活动的症结……它是民族复兴的灵魂。它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将使每个人不知不觉就被它所统制。”^④

与19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不同，蓝衣社不希望简单地支持传统文化和摒弃西方文化。事实上，张云伏争辩道，自我牺牲、迷信、消极被动和个人主义在乡间农村的条件下就孕育出来了，它完全不适合“科学的时代”。他认为，正确的是4种传统的美德：礼、义、廉、耻（不久就成了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基础），这些是永恒的真理。无论如何，“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每件事物，都必须变化，改正或革新”。^⑤

①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38—39页。据我估计，石井是本次演讲的唯一资料来源者。这次演讲是在江西星子县发表的，时值1933年9月22日。蒋介石年表中表明，他9月20日在江西星子县发表过一次演说，而9月22日又在庐山发表了另一次演说。这两次演说均未收入蒋介石的演讲选集中。（见《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卷第46页。）

② 《北华捷报》，1934年10月17日，第113.3页。《中国年鉴》，1935年版，第96页。

③ 张云伏：《文化统制意义及方法》（《前途》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1日，第7页）

④ 茹春浦：《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同上，第4页。）

⑤ 张云伏：《文化统制意义及方法》（《前途》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1日，第1页）

而且，蓝衣社认为，西方文化的有害影响是中国精神和文化枯竭的根本原因。他们特别诅咒从五四运动以来毒害中国人思想的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从字面上解释是“自由”加上“主义”——对不同的中国人来说，它包含很多言外之意。但是对蓝衣社而言，它意味着无羁绊的放纵。自由主义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和个人主义，并且意味着，从最坏的角度说是个人主义。这使得人民承认他们自己的任性，蔑视社会的需要，自由自在。

在任何地方，蓝衣社都能辨别出西方自由主义的致命的后果。它带着一种颓废的消极主义观念，充斥在小说、戏剧和报纸之中，在文学中则充斥着无目的的浪漫主义和“幽默主义”，艺术家们沉湎于唯我论的为“艺术而艺术”之中。^①在普通百姓当中，自由主义迷漫在生活中，颓废的轻佻无聊和纵情逸乐的消费比比皆是。张云伏抱怨道，上海的男学生们在妓院和舞厅中流连忘返，而不是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而女学生们则整天涂脂抹粉，迷恋于奇装异服。^②《前途》编辑刘炳藜宣称，他反对上海的青年人每晚把3,000元花在他们的情人身上。他说，他们花掉的钱将能维持3万名农民一天的生活。^③自由主义是一种文化的疾病，许多人在城市中这样讲，并且已经传播到了农村。张云伏声称：“总而言之，亡国的气氛迷漫世上，如果这种文化的趋势不迅速改变的话，不但要亡国，而且要灭种。”^④

中国的新文化

为了战胜文化上的病症，蓝衣社用一种崭新的“国家至上的

① 社论：《改造文化的急务》（《社会新闻》第3卷，1933年5月30日）。社论《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社会新闻》第3卷，1933年6月9日，第354页。）

② 张云伏文，见《前途》1934年8月1日，第4页。

③ 刘炳藜：《农村复兴的意义》（《前途》第1卷第9期，1933年9月1日，第8页。）

④ 同②

文化，即建设性的、进步的和勇敢的”^①文化去取代颓废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此外，改变中国社会的工作也极需破坏性的文化。

《社会新闻》的社论说：“现在，我们必须不留痕迹地毁掉有害于国家的文化现象，否则，我们无法为民族的新生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中国也不能复兴。”^②在复兴民族的神圣事业中，蓝衣社在使用暴力上畏葸不前。在一次著名的评论中，《社会新闻》声称：“为了创造新文化，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旧文化发起了毫无怜悯心的、残酷的进攻，重演秦始皇的戏剧，焚书坑儒。事实上，这是必须做的。”^③《前途》重复了这个论调，李冰若写道，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行为不能由好坏来判断。他宣称焚书坑儒在当时是必要的，打下了这个伟大朝代的基础，并且“不必替他们感到羞耻，”“秦朝文化统制的成功恰好是我们今天要仿效的。”^④

这些赞颂秦始皇的言论——这位皇帝2,000年来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罪大恶极者——似乎第一次被渲染得太异想天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们与蓝衣社的决心毫不矛盾，他们运用一切对消除国家衰败有用的理论根据。以蒋介石为例，他告诉蓝衣社：“所有的同志必须统一他们的思想和信仰，基层党员必须有严格的保密组织，界限分明，他们必须掌握一切事物，按照以暴制暴的原则。”^⑤

“以暴制暴”的决定被蓝衣社的成员重复着，他们坚信，在当今世界中，道德荡然，只有权力才能衡量成败。余文伟在《前途》上强调说：“在世界上谁能找到真理及和平？所谓真理及和平只不过是欺骗人民的谎言罢了；至多是些词藻华丽的东西而已。”^⑥

① 社论：见《社会新闻》，1933年6月9日。

②③ 同①

④ 李冰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统制》（《前途》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1日，第3—8页。）张云伏文，见《前途》1934年8月1日，第4页。

⑤ 《蓝衣社组织和反对满洲帝国、反日活动的例证》，第5页。

⑥ 余文伟：《中国民族需要何种教育》（《前途》第1卷第7期，1933年7月1日，第4页。）

《社会新闻》的一位作者同样宣称：“在目前的情况下，真理已完全被暴力蹂躏了，因此，有暴力的地方就不存在真理。如果我们不以暴制暴，那么自由、平等、民主和解放的口号就无法认识清楚。因此，今日中国没有其他可复兴之路可走，只有用绝对革命的东西，如暴力，才能支持国家至上的原则。”^①

蓝衣社不仅用此暴力对付共产党、日本人，而且对付自己的政敌，所有和道德及文化衰败有关的人都是它的目标。《社会新闻》的一篇社论说：“必须有流血的决心——得有一种空前无比的暴力去消灭一切人民之敌。”^② 蓝衣社的“纪律准则”表明，“国力的衰败已经相当严重，人民遭受压迫，欲言无声……当困难极大的时刻……毫无头脑，毫无感觉，没有心肝的人不胜数，对国家丝毫无热爱之心，还有奸商、卖国贼和叛徒。我们仍用宽容的方法去对付这些腐朽分子吗？我们从不希望完全根除他们……现在我们必须惩处他们，用‘极刑’处死他们，唤起民众，使他们感到害怕，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敢犯法了。”^③

暴力甚至可以用来对付党内或政府内部一些和革命精神有距离的人，蓝衣社的“纲领”宣称对腐败的官僚主义要作“持久的清洗。”^④ 《社会新闻》的一篇评论说道：“为了消灭官僚组织，我们要创造一个群众性的暴力组织，使人民把国家视为最高的原则。一方面这将是打击腐败组织的直接方法，另一方面，用强大的暴力使这个忘记了国家的组织重新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人民很愚笨，不开化，但是他们还是痛恨这些剥削他们的官僚主义的。”^⑤

但是无论是暴力或者是政治镇压都无法满足使新民族文化大踏步前进的需要。蓝衣社在它的文化纲领的建设性方面毫不害躁

① 吕克仁：《社会民主主义是否可以救中国》（《社会新闻》第3卷，1933年6月24日，第435页。）

② 社论，见《社会新闻》，1933年6月9日，第354页。

③ 《蓝衣社组织和反对满洲帝国、反日活动的例证》，第5页。

④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88页。

⑤ 社论：《如何来铲除官僚政权》（《社会新闻》第5卷，1933年10月6日，第19页。）

地主张极权主义。茹春浦写道：“所有的社会现象，所有的行为，在理论上讲，都是文化统制干预的对象。”^①这意味着蓝衣社不仅要连根拔除旧文化，而且要将“新的共同生活的文化模式”深深地融进人民本能的行为中去。^②这样，人民就会用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去指导他们自己的行为。同时，他们将控制少数人，这种人的行为没有按照以上的准则去做。茹春浦说，文化统制的真正力量只能来自“群众自我统制。”^③

蓝衣社文化改造纲领的核心是教育。贺衷寒称：“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教育的失败。”^④

蓝衣社的教育政策集中表现在“国家化、军事化、生产化”口号中。教育的国家化，意味着国家和民族是同一含义，都成为教育过程的中心和存在的意义。从行政管理上讲，所有学校由国家管理操纵，在教育部的集中、直接领导下；地方自治的公立学校自然应该取消；教会和私立学校以及学院应该关闭或由国家接管。学校的全部课程也要“国家化”，重点讲授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国家化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创造使学生产生对国家忠贞不贰的爱，准备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⑤有关放弃中国传统的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可见余文伟的言论：“我们教育的儿童必须是国家的儿童，不是家庭或小集团的儿童，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国家。”^⑥

甚至教育技巧也必须强调集体活动、集体合作和集体谈论。在这种方法下，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令人厌恶的邪恶被根除了，

① 茹春浦文，见《前途》1934年8月1日，第11页。

② 同上，第8页。

③ 同上。

④ 《今日教师应有的认识与责任》（《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1日，第1页。）

⑤ 《今日教师应有的认识与责任》（《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1日，第1—3页。邱椿：《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前途》第1卷第7期，1933年7月1日，第1—12页。）余文伟文，同上，第1—6页。

⑥ 余文伟文，见《前途》第1卷第7期第3页。

学生学着首先证明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后是与国家的关系。^①

教育的“军事化”是改造教育体制，以便未来的教育能训练学生在大规模战争中成为战士。^②学校应象军事团体那样组织起来，教师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接受义务军事训练，必须体验军队那种俭朴、纪律性极强的生活。^③

儿童的军事灌输必须从幼儿园开始，给儿童的玩具必须是枪和军舰，墙上应挂打仗的图画，“以便从儿童开始就使他们对军事装备和战争环境感兴趣”。^④从那时起，必须在军事的环境中教育儿童，例如，中学生必须编入“童子军”，如同希特勒的青年运动，使青年有强健的军事体魄。在整个学校生活中，必须进行严格的体格训练，如负重训练。这些必须用组织的形式而不是以个人的形式来进行。还必须组织体育竞赛。^⑤用这种训练方法，过去那些被蓝衣社蔑视的虚弱和文质彬彬的学生，就会变成未来的勇士。^⑥

男学生的正式军训从高中开始，一直延续到大学。相同年级的女学生则接受护士训练。学院的课程训练笼罩着军事化的气氛。不鼓励研究人体，^⑦相反，实践和科学的课题，如物理、化学和机械，则明显为战时服务。以化学课程为例，强调研究毒气和爆炸。^⑧

“生产化”的教育目标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对抗，而传统教育在30年代曾盛行一时。蓝衣社认为，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没有作将来为国家生产而发挥有用的作用的思想准备，相反，令人

① 邱椿文，见《前途》第1卷第7期第8—10页。伊静：《民族教育的要义》，同上，第3—4页。

② 林适存：《国家总动员》（《前途》第2卷第2期，1934年2月1日，第4页。）

③ 邱椿文，见《前途》，1933年7月1日，第10页。

④ 余文伟文，见《前途》第1卷第7期第3—6页。

⑤ 邱椿文：同③。

⑥ 余文伟文：同④。

⑦ 同④，第3—6页。易仁：《中国革命进展中之教育问题》（《前途》第2卷，1934年1月1日，第3—7页。）

⑧ 邱椿文，见《前途》，1933年7月1日，第11—12页。

反感的偏见、颓废寄生的习惯被慢慢地灌输着，而且永远如此。

《前途》的一位作者说：“当学校里有一个学生时，社会就失去一个生产者；当一个学生从学校毕业出来后，社会就得到了另一个失业者。”^①在蓝衣社的教育体制中，学生不会成为有特权的所谓精华，他们的大量时间乃至生命虚掷在“死书”上面，准备以此为敲门砖，将来升官发财。可是，低年级学生1/4的课程是体力劳动训练。在学生时代，必须非常强调劳动训练。毕业前，中学生和大学生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去农村、工厂或商业界从事劳动。专攻机械的学生每天在工厂从事半天的机械劳动，余下半天在学校学习。蓝衣社成员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克服知识分子蔑视体力劳动的问题，每个人都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生产人才。^②

经济复兴

蓝衣社很敏锐地意识到经济复兴的重要性。用他们对社会的极权主义观点看，事实上在30年代经济受到打击的情况下经济的自由放任现象随处可见，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应完全计划化和控制经济，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称此经济体系为“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无疑是从希特勒德国那里学来的。^③

在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下，所有生产活动必须在国家计划机构范围之内，此机构拟定生产的目标和具体的发展计划。蓝衣社不准备攻击私营企业本来的体系。无论如何，经济的重大领域，如重工业、煤炭、运输和外贸，必须由国家直接管理。不存在禁止私营利益问题，但是应保证私有资本也为社会利益服务。由蓝衣社来进行经济统制是毫无价值的，它只与生产企业发生关系，经

① 邱椿文，见《前途》，1933年7月1日，第11页。

② 余文伟文，见《前途》第1卷第7期，第2—6页。

③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90页。

济分配则由市场的自由功能来实现。^①

蓝衣社在经济现代化方面的纲领和孙中山的国家复兴计划有着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无论如何，这里仍有不同的地方。对蓝衣社来说，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德国、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计划经济的优点。因此，他们想采用一个孙中山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提法，即经济统制。

蓝衣社对农业复兴怀着特别的兴趣，但不完全如此，因为在蓝衣社内部存在巨大的观点上的分歧，而且更多的研究所强调，这个纲领会使农村革命化，其彻底程度和共产党在这方面的主张完全一样。仲裁者主张批准蓝衣社的“纲领”。该纲领只简单地声称：“我们主张积极发展农业和改善农业技术。”^②这个观点由《社会新闻》加以详尽阐述，“纲领”允许在现存的土地所有制中存在某些“矛盾之处”。它特别反对用土地国有化办法去解决农村的危机，声称土地所有制是“经济需要和历史进化的结果”，认为破坏一种由历史形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只会使农村秩序更加紊乱。^③与此相反，《社会新闻》则主张在土地所有制或劳动组织中作某些变化，清理一下现有的农业机制。例如，降低税收及地租，清除腐败和碍事的官僚主义，在农村发展交通运输业。它还建议改善农民的科学种田技术和贷款机构、灌溉和防洪工程。^④

《前途》是蓝衣社最具权威性的刊物，它的声誉由于蒋介石的支持而日益提高，当然其中也和蓝衣社一些杰出人物如贺衷寒的努力分不开。正因为如此，往往存在着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之处，该杂志提出的土地政策和蓝衣社的“纲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途》的作者们提出要使土地和生产组织国有化，就是

①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215—217页。

② 同上，第190页。

③ 《所谓计口授田》（《社会新闻》第6卷，1934年2月27日，第269页；同上，第6卷，1934年3月6日，第301页。）

④ 同上，第6卷，1934年2月27日，第269页。社论：《国民经济重建运动》（《社会新闻》第8卷，1935年6月21日，第328页）；尹鲁：《农村复兴问题的事实》，同上，第350页。

说由国家来控制农业集体。这有点象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蓝衣社则寻求避免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处境的办法，这不仅包括实行大规模的地主主义，而且包括实行由“无数自私的小农”组成的土地所有制。认为单纯地将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只会使经济个人主义的文化污点永远存在下去。它主张创造一种大规模的、使国家拥有的农业集体感到合理的生产，而这种改善农村技术的做法将会制度化，并且会使得农村剩余农产品有所积累和投入再生产。《前途》的作者们同样强调，巩固现有小农经济，将它变为农村大经济，将会导致农村机械的运用，或一言以蔽之，将会促使“农业工业化”。^①

在主张土地国有化中，蓝衣社提出了一种异端邪说，因而受到孙中山教诲的挑战。许太空指出，国民党有的党员“相信土地国有化会违反孙文主义，会采用共产党没收财产的做法这样一种异端邪说”。^②为了平息这种恐惧，许太空争辩道，孙中山从未明确说过，最终的土地所有制是建立在私有制或国有制的基础上的。当然，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是许太空解决了，而且相当轻易地解决了这个异议，他断言：“这只意味着达到平均地权”，而平均地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个口号，这是一个关于农村经济的“我们所能明确断言的口号”。许太空固持己见，说：“平均地权的真实含义是用土地国有化的方法去解决土地私有制中的弊病。”^③

也许为了排除采用共党政策的嫌疑，由蓝衣社提出的土地国有化方法既不激烈也不革命。土地所有者将被要求出售超过60亩的多余土地，他们将得到政府发给的支付债券，刺激出售土地的价格将由递增的土地税提供。开头的20亩，土地税为1%，第2

① 刘炳黎：《前途》第1卷，1933年9月1日，第3页；白瑜：《非常态的中国农村衰落与复兴的先决问题》，同上，第9页。

② 许太空：《五十年平均地权论》（《前途》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1日，第8页。）

③ 同上，第5页。

个20亩为1.5%，第3个20亩为2%。^①

尽管此计划含有含蓄的渐进主义，但这些蓝衣社成员依然坚信，农业仍处在深刻的危机中。刘炳藜的言论具有代表性。他讲到土地改革问题时说：“如果中国革命忽视这些问题，那末它将同样是埋葬我们的坟墓。”^②《前途》的另一位作者孙伯骞也声称：“农业经济问题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且是民生革命的症结所在。”^③

蓝衣社和三民主义

《前途》某些作者对孙中山的农业政策所持的相当傲慢的态度给一些愚弄性质的报告增添了几分尖刻的色彩，这说明蓝衣社实质上把三民主义原则从它的纲领中剔除了。根据日本谍报机关的报告，蒋介石在1934年1月召开了一次有蓝衣社头头参加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消除蓝衣社内部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如何加强法西斯主义以便强化对日本人和共产党的进攻，以及如何加强对反蒋组织的恐怖活动。最后作出了决定，蓝衣社的主要纲领性文件相应进行了修改，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蓝衣社的指导理论基础。纲领的第2款改为：“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宣布使用法西斯主义，力争实现独裁统治。”^④“政治纲领”的第9款标明：“淘汰三民主义教育，主张生产教育，普及普通教育。”第11款说明：“迅速贯彻执行新的法西斯主义社会和国家。”^⑤“纪律准则”将“成员必须经常对三民主义原则绝对信仰”改为“成员必须经常对法西斯主义有绝对的

① 同上一页注②，第6页；参见白瑜文第11页。

② 刘炳藜：《前途》，1933年9月1日，第4页。

③ 孙伯骞：《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与农村经济的未来》（同上，第11页。）

④ 《蓝衣社组织和反对满洲帝国、反日活动的例证》，第5页。

⑤ 同上。

信仰。”^①

日本人的这个报告有何依据？能因此说蓝衣社放弃三民主义改信法西斯主义？毫无疑问，一些蓝衣社成员感到三民主义原则是一种累赘，而且当他们提出土地国有化主张时，这会使他们十分为难。孙中山的民主原则特别引起这些极权主义分子的惊慌失措。

尽管一些蓝衣社成员对三民主义原则有明显的疑虑，但他们还是积极地捍卫他们对孙中山教诲的信仰。“我们不希望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来取代三民主义”，陈秋云在《前途》杂志中说，因为这两种意识形态“具有共同的精神”。^②《社会新闻》转载的一篇文章对此表示同意，认为有必要使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坚定、富有牺牲精神和铁血的精神”结合起来。这样“假民主”才能破产，三民主义才能实现。^③

那么，蓝衣社真的用法西斯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吗？一位前蓝衣社成员最近指出，他很容易想象出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喜欢这样做。^④但他又补充道，如果说蓝衣社的意识形态、纲领有过改动，那他不可能了解到这一点，因为组织中的保密程度相当高（如果这一说法可靠，那么关于蓝衣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就值得怀疑了）。另外，蓝衣社的一位创始人坚持说，“纲领”从未修改过，理由是这个组织仅存在6年，没有时间加以修改^⑤（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

无论如何，一些作者为两个主义的相似作辩护这点说明，关

① 同上页注④，第23页。参见《论蓝衣社》（1935年版，第26页。）

② 陈秋云：《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前途》第2卷第4期，1931年1月1日，第6页。）

③ 《法西斯蒂主义与中国革命》（《社会新闻》第4卷，1933年9月18日，第413页）。比较法西斯主义和三民主义异同的文章请见：高敬斋的《国民革命与我们的路线》（《前途》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第5页）；《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社会新闻》第4卷，1933年8月21日）；社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新闻》第4卷，1933年9月18日，第403页。）

④⑤ 采访记录。

于放弃三民主义原则的争论事实上是发生过的。那么，日本谍报机关是从哪里获得蓝衣社接受法西斯主义的“纲领”修改本？它是官方的文件吗？或者这个文件只是由个别信仰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分子起草的？（它不象是真的，因为这份文件是用日文写成的，文件上标明“机密”，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下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么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就是既成事实，即三民主义原则不再继续成为它的意识形态的准则了。

蓝衣社也许从未发展到1万名成员的规模，这是1935年底的记录，^①他们最初从未把夺取、控制国民党作为目标，他们只可能将一种灵魂或新的革命精神逐渐灌输到这个旧党中去。而且，它是国民党内形成的2、3个最有权势、最令人恐惧的小团体中的一个，它的影响超出国民党，深入到社会中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蓝衣社的权力遍布整个军队，因为蓝衣社几乎完全控制了国民党的党组织机构和中央军的政治训练。^②1933年2月以后，政训遍及全国上下，从军队到政府和学校。当贺衷寒任中央政训处处长时，事实上全国的政训已处在蓝衣社的控制之下。^③蓝衣社的手同样伸进了蒋介石许多散乱的公安部门中去，如南京市公安局、中央卫戍部队、公安处、保安团。^④

1934年，国民党军事训练委员会成立，其目的是培养200万民兵，作为“军事化”的辅助目标。^⑤委员会13名执行指导中只有6名是蓝衣社成员，而委员会中大量的中级和低级干部却是蓝衣

①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31页。

② 同上，第150—155页。陈少校（陈方的笔名）：《黑网录》（香港春城出版社1966年版）第40—41页。陈少校已经出版了好几本关于中国史的著作，但绝大部分是相当不可信的，《黑网录》则比较可信，它的许多资料取材于石井的书，一些亲身经历30年代某些事件的人向我证实了这本书的真实性。

③ 包华德：《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2卷，第65页。包华德的辞典很少提及蓝衣社，对贺衷寒和戴笠也是如此。只有在讲述周佛海曾参与此次运动时才顺带提及蓝衣社（见第1卷第407页），而据我所知，这不是事实。

④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50—151页；《黑网录》，第69—70页。

⑤ 石井上书，第156页。

社成员，结果（按石井的话）“训练委员会的实际统治权完全落在蓝衣社手中。”^①在委员会的指导下，在高中和大学推行两年义务军训。特别是设在洛阳、南京的夏令营，那里的学生要接受额外的3个星期到1个月的军训。^②这些夏令营是蓝衣社新成员的一个来源。

1934年，蓝衣社致力于创造“军事化的社会”的思想已经冒头了。当时的观察家和历史学家同时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已经绝对地扎根于华中地区”这个事实。^③而且“新的军事精神已经越出了国界。”^④一位美国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执行书记对“这种‘中国军事化思想’竟会在近10年中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感到战栗。^⑤

政治灌输和军事训练只是蓝衣社关注的两个方面。仅用这小小篇幅及有限的资料来描绘蓝衣社的全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下面的篇幅集中在两项活动上，这是蓝衣社势力范围和派系的最佳说明。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有时被认为是与复兴国家无关的和滑稽可笑的运动，它复兴儒家的道德精神，规定个人行为的奇妙准则。对很多目击者来说，这项运动似乎证明国民党毫无希望，它完全脱离了国家的需要，蒋介石不过是个“老派的孔子”。新生活运动被称作

①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57—158页。

② 未署名者：《蒋介石发展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每周评论》第68期，1934年5月5日，第387页。）及《中国年鉴》1934年版，第300页。

③ 《蒋介石发展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第387页。

④ 詹姆斯·汤姆森：《中国面对西方之时：国民党中国的美国改良者（1928—1937）》（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68页。

⑤ 同上。

“蓝衣社的杰作。”^①新生活运动的规模向来被夸大了，不过仅从当时的规模亦可为新生活运动和蒋介石作出新的评价。

要说是哪一个人对新生活运动提供了内在的含义，那是不确切的。有些资料说，这个主意是蒋介石本人或蒋夫人宋美龄想出来的。^②石井声明是中国文化协会“创造”了新生活运动，而这个协会是蓝衣社的组织。^③许多中国资料表明，是蒋介石的主要私人秘书杨永泰授意搞这个运动的，这个事实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杨永泰和蓝衣社便是死对头了。^④

深究谁最初想出这个主意，那是毫无价值的。新生活运动从一开始就落入蓝衣社的思想和纲领的大网之中。蒋介石本人对这种关系相当敏感，1933年底或1934年底在蓝衣社领导人的一次集会上——也许在新生活运动开始的前夕——蒋介石列举了中国人的许多弱点，他说，中国人没有纪律性，自甘堕落。他告诉蓝衣社成员，如果中国革命要复兴的话，“必须将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到整个国家的民众中去，使他们相信我们的党”。^⑤

新生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蒋介石和蓝衣社要在中国人民当中牢固树立法西斯主义精神。为了将这个目标伪装起来，蒋介石动用了儒教，甚至天主教，他想用这些东西来改造国家。

蒋介石带给新生活运动的是衰落了儒教。它是业已衰败了的儒教，缺乏哲学的敏锐，剥去了道德的精华。它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儒教，把基本的道德压缩成四个字：礼、义、廉、耻。

观察人民的礼、义、廉、耻是很容易的，只要看看统治个人

① 《黑网录》，第54页。

② C·塞缪尔：《新生活运动》，载J·莱恩编：《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8种，1957年）第3—4页。

③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166页。

④ 欧阳山：《中国内幕》（上海1941年版）第17页；局外人（笔名）：《记当年传说中的“十三太保”》，载《春秋》杂志第116期第2部份，1961年7月1日，第4页。G·泰勒评论道，“新生活运动和民族经济复兴运动两者都起源于军事领域……关于国家强大的独裁主义概念就隐藏在这两者的背后。”（见《中国的复兴运动》，载W·荷兰和K·米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404页。

⑤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22—27页。

日常生活习惯的96条准则，便可得出结论。现在，中国人民必须反应敏捷，扣好衣服扣子，笔直站立，吃饭不出声音。^①这些准则成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那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它们与其核心很接近。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要过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么我们必须绝对重视避免心不在焉。”^②“如果我们要重建国家，要雪耻，那么我们不必谈论枪炮，而应首先谈论用冷水洗脸。”^③

这些评述经常会引起强烈的和屈尊的嘻笑，这是荒唐可笑的。我们认为，蒋介石相信，中国一旦起来抵抗日本人，那时全体人民会习惯用冷水洗脸的。

蒋介石对礼、义、廉、耻或96条准则并不抱幻想，认为它们会自行消失，但他坚信这些严格的习俗仪式将改变“灵魂”，最终创造出新社会和新国家。这场社会运动的模式是从西方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日本士官学校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想起他在日本的学生生活，相信军校学生的道德精神素质会通过兵营规则的严格仪式得到加强。他现在希望用日本士官学校模式来恢复中华民族的精神。“法西斯主义的组织、精神和行动必须完全军事化……在家庭、工厂、政府部门，无论何地、何时、何种环境，每个人的行动必须和在军队一样……简言之，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整洁、精确、快速、勤勉、保密……每个人都必须为组织和国家坚定地、勇敢地牺牲一切。”^④

通过军事学校的纪律、服从以及效率来观察整个中国社会，这便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蒋介石反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的民众生活军事化，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养成毅力和敏捷，坚韧不拔的忍耐力和对艰苦工作的承受能力，特别是统一活动的习惯和能力，只有这样，

① C·塞缪尔：《新生活运动》，第5页。

②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见《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09页。）

③ 同上，第110页。

④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37—38页。

他们才能在任何时刻为国牺牲。”^①

国家的军事化同样是蓝衣社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蒋介石毫无疑问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运动之间某些基本相似点。1933年9月，他解释道，社会的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三项基本要素之一（其他两项要素，蒋介石认为是国家至上和坚信领袖的意识）。^② 5个月以后，新生活运动开始了，蒋介石明确宣布社会军事化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无疑，蒋介石自己对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运动的一致性是很清楚的。

蓝衣社领导了新生活运动。此项运动是由“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的。一位蓝衣社的高级干部声称，此会“绝大多数”干部是蓝衣社成员。^③ 中国其他资料提供的证据很少，但在中国的西方人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的影响占压倒优势。传教士乔治·谢泼德1935年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者”之一，他在1936年抱怨道，运动被军官们把持了（这些军官很可能是蓝衣社成员）。^④ 1936年4月，相信新生活运动“真正是蓝衣社的运动，希望国家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运转”^⑤的人当中，至少有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书记。

补充一句，充分的间接资料表明，新生活运动发展的方向只会使蓝衣社感到高兴。根据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计划，政府官员、教师和学生开始领到军服，接受军训。^⑥ 在武汉，报道新生活运动的新闻说：“将注意力放在组织每条街上的行人上，将文学家分在一个单独的组织中，但是也必须以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⑦ 青年人逐渐地军事化是纳粹德国青年运动的反映，例如，

①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载《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

② 同上页注④，第36—39页。

③ 采访记录。

④ 汤姆森：《中国面对西方之时：国民党中国的美国改良者（1928—1937）》，第177页。

⑤ 同上，第183页。

⑥ C·塞缪尔：《新生活运动》，第8页。

⑦ 《蒋介石发展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第387页。

1934年5月，新闻记者报道：“群众大会经常在武昌和汉口的公园中举行，所有年级的学生挤满了街头，有人教他们用一种非常规范的态度前进，有时还组织提灯晚会。”^①

新生活运动同样表明蓝衣社对西方的娱乐和放荡的反感和憎恶。例如，《北华捷报》报道，在武汉，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强迫所有餐馆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午夜。中国人不许跳舞，音乐必须有“古典气质”。^② 新生活运动这项反现代化的举动被一些狂热信徒组织予以夸大，他们做得很过分，如冲进国营的舞厅和电影院，剪去人们的西服。而这些举动通常被认为是蓝衣社干的。^③ 他们到底是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值得怀疑。不过他们的言行与新生活运动的主张颇为一致，特别是他们也把这一切看作是颓废的西方文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还可见蓝衣社的刊物《前途》。

无论如何，蓝衣社对新生活运动是有影响的，但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这个运动的地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陈立夫全力支持这个运动的说法就不可理解了。^④ 况且，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其他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所有这些因素不体面地混合在一起，含糊的领导权和目标无疑都对这场运动衰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⑤

戴笠和恐怖主义

蓝衣社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几乎所有中国人普遍感到恐怖和憎恨的特务活动，或者特务机构——谍报和恐怖活动的操纵者。

① 同上页注⑦。

② 《北华捷报》，1934年8月15日，第238.1页。

③ 同上，1935年5月30日，第304.3页。《新交通系与蓝衣社之暗中斗法》，1934年4月4日，见《横田实报纸大全》（载《东洋文库》）。

④ 陈立夫：《新生活运动发微》，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第25—29页；参见汤姆森：《中国面对西方之时：国民党中国的美国改良者（1928—1937）》，第157页。

⑤ 同上，第180页。

1934年5月，新闻记者报道：“群众大会经常在武昌和汉口的公园中举行，所有年级的学生挤满了街头，有人教他们用一种非常规范的姿态前进，有时还组织提灯晚会。”^①

新生活运动同样表明蓝衣社对西方的娱乐和放荡的反感和憎恶。例如，《北华捷报》报道，在武汉，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强迫所有餐馆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午夜。中国人不许跳舞，音乐必须有“古典气质”。^② 新生活运动这项反现代化的举动被一些狂热信徒组织予以夸大，他们做得很过分，如冲进国营的舞厅和电影院，剪去人们的西服。而这些举动通常被认为是蓝衣社干的。^③ 他们到底是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值得怀疑。不过他们的言行与新生活运动的主张颇为一致，特别是他们也把这一切看作是颓废的西方文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还可见蓝衣社的刊物《前途》。

无论如何，蓝衣社对新生活运动是有影响的，但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这个运动的地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陈立夫全力支持这个运动的说法就不可理解了。^④ 况且，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其他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所有这些因素不体面地混合在一起，含糊的领导权和目标无疑都对这场运动衰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⑤

戴笠和恐怖主义

蓝衣社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几乎所有中国人普遍感到恐怖和憎恨的特务活动，或者特务机构——谍报和恐怖活动的操纵者。

① 同上页注⑦。

② 《北华捷报》，1934年8月15日，第238.1页。

③ 同上，1935年5月30日，第304.3页。《新交通系与蓝衣社之暗中斗法》，1934年4月4日，见《横田实报纸大全》（载《东洋文库》）。

④ 陈立夫：《新生活运动发微》，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第25—29页；参见汤姆森：《中国面对西方之时：国民党中国的美国改良者（1928—1937）》，第157页。

⑤ 同上，第180页。

些特征和行动方法，这是他用来指导秘密特务的教科书。^①他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凡是国家领袖权力所及的地方，他都必须备有“耳朵和眼睛”，必须防止受骗和伤害。这些“耳朵和眼睛”就是政治侦探，他们必须在社会各阶层加以培植，“而他们不必受国家的刑法的处罚”。^②

在这本著作的一个章节里，戴笠列举了政治侦探的使命。从使命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领袖至上的原则在戴笠本人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下面请看他的原话：

①保证领袖的安全。领袖的安危就是国家的安危。因此，必须时时处处保证领袖的安全。

②清除腐败。腐败是革命斗争中的蠹虫，如果不做好这项工作，那么清廉、忠诚的政府就无法建立起来。

③消灭所有反革命势力。这包括控制和调查某些委员会、社团和出版机构。政治侦探和反革命分子不能共存，无论是行动上和思想上都不能共存。

④协助民族复兴。如同农民播种粮食前要除去莠草一样，如果想使民族复兴成功，那么这项工作必须高效率地执行和推进。

⑤反对国际侦探和叛徒。政治侦探是国家安全的哨兵，当国家处于战时状态时，它的主要战斗力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幕后侦探斗争的胜负。^③

这本书还进一步详细介绍了特务如何完成这些任务。戴笠写道：大多数政治侦探的工作包含在谍报知识的积累中。他举例说明

① 戴笠：《政治侦探》（国民党除奸委员会惩处部1938年版）第224页。在蓝衣社中使用的另一部类似有吸引力的著作可能是汪培华（音译）的《革命之剑》（1936年，第522页）。

② 同②，第2—3页。

③ 戴笠：《政治侦探》，第61—62页。

如何秘密地检查信件，如何伪装，如何用密码和显影药水迅速而机密地汇报他们的发现。戴笠还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制造分裂与进行破坏是政治侦探另一种工作内容问题发表议论。^①

从戴笠所采取的行动来看，有趣的是，他在此书中很少提及暗杀。下面介绍他关于暗杀的描述：

“秘密逮捕和暗杀都是很简单的。当然，这种方法必须决不出差错。进一步讲，做这项工作绝对是重要的：谁负责望风，谁负责执行，谁掌握交通工具——每个人都得兢兢业业。而且，每人都必须检查武器，必须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如果都这样做了，那么十件事中不会出现一次失败。”^②

显然，戴笠是在掩饰政治暗杀，毫无良心谴责之意。但是这本书没有提出诸如不留痕迹地拆开私人信件等技术问题。

戴笠的特务机构到底完成了多少任务？事实上戴笠的第二处已从1932年的145人发展到1935年的1,700多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膨胀到4万或5万人！）。^③ 其实，这项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决定戴笠第二次的真正活动范围。戴笠的第一次政治暗杀，据说是在1933年2月间发生，其对象是一位老资格的与日本人合作的军阀张敬尧^④（张被暗杀于1933年5月，原文有误。——校者）。此后，每次暗杀——这种暗杀在30年代屡见不鲜——都归罪于戴笠的蓝衣社。1933年6月，杨铨被打死在上海的法租界，据称是他领导民权保障同盟的缘故。此次暗杀进展极为顺利，据说它被当作训练蓝衣社未来成员，使之具备暗杀手段的范例。^⑤

① 戴笠：《政治侦探》，第4章及第5章。

② 同上，第127页。

③ 《戴雨农先生年谱》，第25页。

④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

⑤ 陈少校：《黑网录》，第71—76页。关于上海暗杀的描写可见《中国每周评论》第65卷第4期，1933年6月24日，第146—147页。

1934年11月，上海最有影响的报刊《申报》的编辑史量才（史量才时为《申报》总经理。——校者）在沪杭路之间被6名身穿黑衣黑裤的凶手暗杀了。^①暗杀汪精卫和自由派记者罗隆基也是蓝衣社干的。^②（1935年11月1日刺杀汪精卫未遂的是爱国志士孙凤鸣，系由王亚樵所领导，并非戴笠的特务组织所为。1939年3月的河内刺汪事件，则是戴笠命令军统特务干的。——校者）许多家报纸如天津的《益世报》、《晨报》和《民生报》都收到恐吓的炸弹和遭到查抄。这一切同样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干的。^③

虽然戴笠在南京和上海感到了压力，但他的势力却扩张到了广东和满洲。据1933年底的新闻报道：“蓝衣社使广东感到兴奋和恐怖。”^④胡汉民在香港写了大量檄文，抨击蓝衣社。^⑤广东军阀陈济棠逮捕了74名可疑的蓝衣社分子，并处死了其中的9名。《北华捷报》发表观察家评论说：“共产主义在这些地方（广东）失败了。”^⑥1933年11月，福建叛乱时（指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反蒋抗日民主政府。——校者），一条最著名的标语就是“驱逐蓝衣社出境”。^⑦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导致叛乱〕不满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⑧日本方面也发表评论，

① 《申报》1934年11月14日，第3页。《申报》，1934年11月17日，第3页。陈少校：《黑网录》第77—85页。《兴安与蓝衣社的文化统制》（见《横田实报纸大全》，载《东洋文库》。）

② 局外人：《记当年传说中的“十三太保”》（《春秋》第118期）；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42页。

③ 局外人：《记当年传说中的“十三太保”》（《春秋》第118期）；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43页。

④ 《中国每周评论》第66卷第7期，1933年10月14日，第282页。

⑤ 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载《三民主义月刊》（广东）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15日，第18—22页。胡汉民：《在民主的口号下集合起来》第5卷第1期，1935年1月15日，第34—36页。

⑥ 《北华捷报》，1933年10月18日，第92.3、92.4页。

⑦ 《中国国民党史资料汇编》第9卷第1条；《人民日报》（福州），1933年11月22日，第2页。

⑧ 采访记录。

说蓝衣社在国内的处境“空前的紧张”。^①

受蓝衣社骚扰最多的莫过于日本人了。1934年，日本谍报机关的报告向东京发出了警告：“蒋介石将蓝衣社作为他反满、抵抗日本政策的核心。”^②报告说，蓝衣社负责暗杀高层次的日本人、满洲帝国的官员和汉奸；他们组织满洲的反日军事力量，抵制日货。如同石井描述的，这些行动是蓝衣社“长期抵抗”战略的组成部分。^③为了证明蓝衣社的态度，石井从“纲领”中摘录了一段：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可调和的死敌，我们绝对拒绝妥协和平的可能性。如果本党不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话，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摧毁中国。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对敌人的态度，抵抗日本是本党最重要和最神圣的工作。”^④

无疑，蓝衣社是日本人不可妥协的敌人。但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蓝衣社的反日行动只有在蒋介石明确同意后才能执行，而恰好在同一时期，蒋介石政府正受到学生运动和其他反日组织的压力，那么，蒋介石还想对日采取隐蔽的抵抗政策，而同时又向日本人秘密让步吗？或者蒋介石违背自己的真正

① 道木真彦：《中国政治形势之危机》，（《远东杂志》第6卷第5期，1933年，第45页。）

② 《蓝衣社重组思想的变化和它的最近趋势》（1934年版）第4页；陈少校：《黑网录》，第8—10页。他在此书中指出，1932年蒋介石提出蓝衣社反日的“计划”只不过是橱窗装饰而已，不过是为了炫耀于人，并没有实质性的立即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1934年以后，无可争辩的事实出现，即蓝衣社成为在华北和满洲的日本人主要担心的对象，这从蓝衣社不仅专门搜集日本人的秘密情报，而且其成员也被日本人逮捕这一点可以证明。（《北华捷报》，1935年11月13日，第262.3页。）1935年6月《何梅协定》的条款包括禁止蓝衣社，因为它“有害于中日关系”。（T·A·比森：《在华的日本人》纽约1938年版，第55页。）

③ 石井英一：《蓝衣社之调查》，第234、15—21、33—43、11—12页。

④ 同上，第229页。

意愿，批准蓝衣社的反日行动以保持他们的忠诚？虽然蓝衣社绝对忠诚蒋介石，并有着严格的纪律，但如果蒋介石不准它去反日，这种忠诚还可能存在吗？这是不可能的，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作出这种肯定的回答。但蓝衣社联想到蒋介石政治家族中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向人们暗示，蒋介石有可能在芦沟桥事变以前就进行过反对日本人的战斗了。

结 论

蓝衣社组织在1938年春解散。根据不可靠的报告，蒋介石是在作出一系列让步后才决定解散它的。^①事实上，从未有材料证明蒋介石向他的对手作过任何让步。^②在蒋介石决定抗日后，秘密反共和恐怖主义组织（如蓝衣社）的继续存在会妨碍与共产党的和解。

蓝衣社解散后，其精神依旧阴魂不散。1938年3月，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它是作为抗日时期团结全国的政治因素而出现的。这样，C·C·派、蓝衣社和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非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联合起来了。在三青团的执行委员会中，有5名委员是蓝衣社成员（贺衷寒和康泽在内）。^③在三青团成立的头几年里，旧有的蓝衣社的因素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个组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们在这个组织中的权力达到了极点。^④

“法西斯主义”是政治学词典中最含糊和最有感情色彩的词语。这个词语经常被简单地加以诋毁，而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阐述。鉴于这一点，我们还能坚持说蓝衣社是法西斯运动吗？

① 局外人：《记当年传说中的“十三太保”》（《春秋》第116期第二部分，1961年7月1日，第5页）；参见陈少校：《黑网录》，第58—68页。

② 莱曼：《敌与友：中国共产主义史中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1967年版）第84—85页。

③ 陈少校：《黑网录》，第67页。

④ 钱端升：《中国政府和政党》（哈佛大学1961年版）第126—128、130页。

法西斯主义没有简单的形式或简单的定义。正如S·J·伍尔夫观察到，而几乎是绝望地说的：“法西斯主义变化多端，臭名昭彰。”^①一些学者指出，纳粹运动，严格地说，是法西斯主义。最近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严肃地指出：“法西斯主义控制下的意大利不是法西斯国家。”^②

马克思主义者给法西斯主义下了定义，认为它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但是必须认识到，可能存在法西斯主义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形式，^③还有资产阶级的形式。这说明，用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名词来给法西斯主义下定义是相当不容易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历史业已表明，在广泛的社会中，它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欢迎，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众多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参加者都怀有一种政治绝望感，他们经常处在倒霉或真正的经济穷困、民族国家蒙受屈辱的状态之中，或者存在文化根源的失落感。法西斯文化通常表现出以下意识形态的特征，而蓝衣社同样具备这些特征，这就是：

1. 提高国家地位，鼓吹极权主义统制；
2. 一党专政统治和颂扬领袖，反对民主制；
3. 国家主义，它经常导致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兴起的古典主义，以及中国的新生活运动中的儒教；
4. 具有创造新法西斯主义的人的目标，这种人轻视个人的意愿，渴望共同的意愿。正如乔治·莫斯所说的：“所有法西斯者都相信，国家精神的统一能解决一切问题”；^④

① S·伍尔夫：《法西斯经济体制存在吗？》载伍尔夫编：《法西斯主义的实质》（纽约1969年版）第119页。

② N·科根：《作为政治体制的法西斯主义》，同上，第16页。

③ A·格雷戈尔：《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纽约1969年）第12页。

④ 乔治·莫斯：《法西斯主义和知识分子》，见伍尔夫：《法西斯经济体制存在吗？》，第208页。

5. 崇拜暴力和恐怖。^①

种族主义不是蓝衣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是否所有法西斯运动都强调这一方面。^②蓝衣社意识形态违背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模式”之处在于鼓吹土地国有化和建立集体庄园。例如，J·索利—特伯强调：“没有一场法西斯运动是会欢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③很显然，这在《前途》杂志中已有所表现。但我想，这不能说明蓝衣社就不是一场法西斯运动；相反，它再次证明，法西斯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

在研究蓝衣社的过程中，你会感到震惊，这些运动的许多目标和政策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政策居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蓝衣社推崇领袖，与此相对应，共产党提高毛泽东的地位；蓝衣社意欲创造新的法西斯主义型的人，他将个人意愿和利益置于社会之下，这与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生产成员，与毛泽东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实践相类似。当然，它们都强调国家主义、极权主义控制的共同目标，重视家庭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很明显，蓝衣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出发点。我想，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它既反映中国人对社会环境的机敏和重实践的秉性，又反应中国人习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和秉性使中国早期的政治运动以失败告终。例如，从推崇领袖这一点可以透视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一个既国土辽阔又多灾多难的国家是难以联合起来的，没有占支配地位和具有特殊气质的个人，要出现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也是极为不易的。使人人成为社会生产者的目标，无疑是对文人学士传统的一种反动，文人看不起老百姓，而官僚

① 这场辩论主要由伍尔夫编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引起。科根的文章有特别意义，见其书第11—18页。持反对意见者反对将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见该书第51—61页《辩论——法西斯主义和政策》。

② 科根声称：“种族主义并非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载《法西斯主义的实质》第17页）。论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的种族主义的文章，请参见格雷戈尔：《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第214—282页。

③ J·索利—特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手段”》，见伍尔夫：《法西斯主义的实质》，第44页。

也无视民众的要求。蓝衣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都反对自由主义，它们领悟到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众是不容易统治的。两者都放弃个人主义，因为它们反对将个人的意愿置于社会群众的意愿之上，而这正是现代文化和国家崩溃的主要征兆。

尽管有这些极为相似之处，但蓝衣社和共产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名称上，原因是它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力来源，有着不同的观念。毛泽东已经懂得了群众创造政治权力的道理。蓝衣社也认识到群众组织的作用和群众支持的意义，但它似乎只相信群众是容易操纵的对象，它没有超过毛泽东的理解能力，这实际上还是传统的观念在作祟。

也许，蓝衣社并没有因为不了解群众政治的动力而受到指责。的确，在30年代，很少中国人能超过毛泽东，他已经洞察了现代政治运动的核心。在蓝衣社的政治权力概念中它本身是其中的精华这个事实，很可能对这个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首先值得怀疑的是，蓝衣社是否坚定地将它的社会—经济纲领付诸实施，在这一点上是否超出了国家主义者官僚？因为这些政治原则缺乏内在的动力，它们是由于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和某一种政治运动才产生的。如果这场政治运动没有社会基础，没有政治选民的支持，那么它就缺乏保持那些原则的稳定性。没有社会基础，权力之争不久就会自行消失，这些纲领声明只会成为攻击宗派对手的政治武器。政治原则为政治权力作出了牺牲。蒋介石的前任私人秘书徐道邻（徐道邻曾任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秘书，为蒋的幕僚人物。——校者）写道：“C·C·派和黄埔系两者在党内都控制了大量的成员，时而升上顶峰，时而跌入谷底，都陷入一场不懈的竞争之中，去扩大在地方政府、政府银行和企业中的影响……他们对掌权和政府企业中的影响感兴趣；党的意识形态和纲领并不是他们争吵的话题。”^①

^① 徐道邻，《国民党政府治下的中国地方行政：民族和自治政府对抗传统的中央集权》，〈未刊手稿〉第1章，第31页。他将“黄埔系”很笼统地用在蓝衣社身上。

蓝衣社的由杰出人物掌握权力的思想也能帮助我们阐明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达到在国民党内重新振奋起革命精神的目的，以及为什么没能使南京国民政府获得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由于政治权力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蓝衣社只能依赖蒋介石本人，但是蒋介石只能同蓝衣社保持适当的联系。1934年，蓝衣社和C·C·派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一场斗争迫在眉睫，^①此时蒋介石只是安排了一下这两个对立派系之间的分工：C·C·派，工作集中在国民党内；而蓝衣社，则主管军队中的工作。这个调解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行之有效，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一个蓝衣社的领导争辩道：C·C·派的反对导致了蓝衣社的最终失败。^②

蒋介石并非绝对反对他的支持者中的派系之争，这些争斗能使他避免成为任何一派的俘虏。况且，他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态度摇摆不定。这些理论对他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信仰基督教，同外国传教士们周旋，但也相信一些和民主制有关的人。换句话说，蒋介石有形形色色的选民，他不认为他有意让蓝衣社超过其他派系去获得不致受到挑战的权势。

蓝衣社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某些基本弊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由于没有新的政治权力概念，因而变成了上述派系斗争、空洞的高调和无聊的政治活动的牺牲品，这使国民党及任期内的中国政府感到痛苦。

译自《中国季刊》1972年第1—3期。

徐有威 译 余子道 校

^① 《C·C·派之调查》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进行调查之结果。1939年，第101—102页；陈少校：《黑网录》，第44—46页。

^② 谈话记录。

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探讨^①

Г·卡拉-穆尔扎

孙文主义是随着中国近半个世纪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出现与形成的思想体系，探讨它的阶级实质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个问题不仅涉及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关键时刻，而且具有当代现实意义，因为对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现实问题的理解，主要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

孙文主义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广阔道路。它与民族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同时产生，并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阶段。处在腐朽的世界资本主义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半殖民地中国，以远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同俄国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1905年革命的历程相类比）走完了这些阶段。

当然，本文不可能全面阐述孙文主义的所有历史发展阶段，只能谈谈它的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因为总的说来，中国是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关系残余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发展阶段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不相同。我们在提出和解答这一问题时，试图依据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和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作用的学说，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而只有依据列宁的学说，我们才能弄清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正确评价孙文主义的基本条件是：从反帝和反农奴制斗争着眼，把孙文主义看作统一的整体，不然，就会否定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统一。

然而，在近几年我国出版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某些中

^① 发表本文是供大家讨论的。——原编者

国共产党人的看法中，关于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却是另一种提法和解答。

实际上对孙文主义的看法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孙文主义是反映苦力（？）和手工业者对资本主义的憎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从这个角度看，孙文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渴望在革命中拟定自己的路线的愿望。孙文主义作为在中国革命所有阶段和所有问题上的绝对的革命力量，最终将转到无产阶级、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来。孙中山是工农群众的领袖。

另一种看法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反，认为孙文主义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体系（顺便指出，这一见之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观点，同罗易最近在国外出版的一本书中把孙中山视作反动分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遥相呼应）。

因此，正确理解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的必要前提是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上述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的政治危害性日益严重，因为在中国革命现阶段条件下，前一种观点是在替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辩护，是在为假革命的改组派效劳；而后一种观点，实际上是托洛茨基论调的翻版，使党放下武器，放弃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的斗争，肯定民族资产阶级是一贯革命的。

一、孙中山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外国资本侵入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封建制即农奴制。中国农奴制的主要特征是地产集中在封建大地主和官吏的手中，他们或者以土地所有者的资格按对分办法，或者以封建酷吏的资格用地租的办法来剥削农民。腐朽的商业高利贷资本未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反而使古老的中国社会日益分化，它也未克服城乡在经济上脱节的现象。城市手工业生产是为封建官僚上层服务的，它没有打破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原有的统一。在农

村，“经济都是农奴制的经济，即象100年、300年或500年以前一样，地主奴役农民，迫使他们用……和自己的工具来耕种地主的土地。……这不是欧洲式的经营方式。……这是老大中国式的。这是土耳其式的。这是农奴制式的”。^①这种“古老的中国式的”农奴制经营方式是使中国停滞不前、难以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原因，它为外国资本、外国商品和英国鸦片的输入所破坏，而英国鸦片“并没有使人麻醉，反而使人觉醒”（马克思语）。外国资本的侵入成为中国社会爆炸的导火线（引起社会爆炸的内在因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本身），导致了太平天国革命。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具有想使历史倒退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反动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论，则是一场反对农奴制、争取广泛民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社会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给中国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但对中国来说太平天国革命，如同俄国的普加乔夫起义，未能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的任务，未能铲除中世纪残余，未能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中国农民在城市里没有找到同盟者，因为那里的手工业者正是仰赖封建官僚的钱财来维持生活的，他们既不支持革命，更不能领导革命，因此，农民遭到了失败。封建主义虽然元气大伤，但没有被消灭，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居于优势地位。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农奴制的国家。但外国资本的进一步侵入给中国腐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这种新关系与对农民的农奴制剥削，与腐朽透顶的商业高利贷这个社会赘疣畸形地结合在一起。外国资本在中国封建土壤上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在资本主义工厂和铁路建筑方面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即中国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萌芽。但是，在外国资本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道路基本上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中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封建高利贷者和买办、盐税承办人以及受过教育的官吏成了大资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力量，而大资产阶级一开始就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5——186页。

同外国资本相勾结，一开始就是反革命的、反动的。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之一张之洞，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的最早主持人“四品官”大臣盛宣怀，以及李鸿章本人就是中国“十月党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人物。

然而，外国资本在中国也产生了另一支社会力量——“下层”资产阶级。这是一支摆脱了土地占有制，脱离了商业高利贷剥削，脱离了封建手工业生产的力量，是从资本主义以前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当中孕育出来的力量。这支力量最明显的代表是华侨、旅外华商、业已欧美化的知识分子。它在封建中国的条件下是最进步的力量，给腐朽的中国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资产阶级在最初阶段提出的要求，还没有违背那些在外国资本影响下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中国开明士绅的愿望。在睦邻关系的情况下政治改革可能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而这种改革的最低要求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主义的最初要求。

孙中山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最初的社会活动远没有革命意图，远不是青年理想主义，远没有单枪匹马的革命者那样的热情。他把精力用在具体改革自己的家乡，用在提高家乡福利的平凡的实际工作上面。孙中山是以农村资本主义改造的实践家的姿态出现的。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写道：“文思所以广其农利……。遂劝农人栽鸦片，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户户欲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①孙中山生平中的这一倡举很难说明中国解放运动未来领袖早期活动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基本上代表了那些由外国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条件下一手培育并使其分化成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现代社会的独立部分已经完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1卷，第17页。

全丧失的”力量)的阶层的利益。这些蒸蒸日上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并没有掌权,但力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用孙中山的话说,他所代表的是那些不能以自己的资本报效祖国而被迫外出谋生的穷苦中国人的利益。他写道:“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离乡井,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①

孙中山在其活动初期的主要社会基础是最进步的自由派人士——海外华商。孙中山代表华侨界,既不反对资产阶级“上层”、自由派地主和绅士,也不反对资产阶级化的达官贵人,因为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与他们的利益密切关联的。孙中山认为在满清统治条件下改革之路是可行的,他同处于萌芽状态的整个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反映了力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对满清王朝。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提出必须变革的主张:

“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他历数中国的主要灾难,认为中国需要大机器工业,需要铁路,需要农业机械化,并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他列举机器的种种好处:“机器之大用不能遍举。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②

孙中山向往资本主义,但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这一点他很晚才认识到)。他直言不讳地声称:他所向往的是由中国富翁建设的资本主义工业。他津津乐道地向李鸿章历数铁路的好处:“铁路……必也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③

但是,清政府一味“抽捐纳税”,不让人民自由发展,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孙中山抱怨道: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1卷,第10页。

②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1卷,第12—13页。

③ 同上,第15页。

“试观南洋英属诸埠，其筑路之资大半为华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趋之。华商何厚于英属而薄于宗邦？是在谋国者有以乘势利导之而已。”①

外国人尚能关心中国富户，关心中国股东，而祖国却不“乘势利导”，不让中国资产者自由发展，一味抽捐纳税，忘了“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忘了“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②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尚未认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通过革命推翻腐朽的制度。他希望实行资产阶级改造，且认为改造之路是可行的。他吁请皇上改革，认为中国除皇上亲自下诏改革外，没有其他任何改革之路。

孙中山于1894年成立的第一个组织兴中会，远没有什么革命性。兴中会会章第五条规定：凡入会的任何会友须交会底银5元，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该组织的社会成分。这是一个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的组织，旅外华商的组织，也就是那些正在崛起的社会阶层的组织。这些阶层是帝国主义培育起来的，但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在大贸易垄断制度下，在操纵对外贸易和大型外资企业的大买办制度下找不到立足之地，它们属于积极探索振兴中华之路的自由资产阶级阶层。

这个商业资产阶级组织除提出采取自由这一政治目的外，还有其他目的，比如，设立独特的银会即独特的秘密商务组织，这是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畸形产物，是畸形的非婚生儿。兴中会会章第八条指出：“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这就是发行股票。该条款还指出：“每股科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1卷，第15页。

② 同上。

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①这是“当时兴中会基本纲领”的条款之一，它充分说明了兴中会的性质及其社会基础。中国资产阶级先行者希望拥有自己的国家，希望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腐败透顶的封建国家，因为他们“捐顶子、买翎枝”所化的钱，有去无还。孙中山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当局贪赃枉法造成的。他在评论广州筹建“肥料公司”一事时指出：“官吏们的贪欲并没有因疫病的可怕而放松一点。……一个著名的官员，在他允许开工以前要索很大一项贿赂，使得公司无力支付，不得不放弃了这项事业。……为公共卫生服务大于为股东利润服务而兴办的金融和工业企业，尚且还是要因为地方当局的贪污使得流产，纯商务性质的经营必然遭到同样的命运，就不足为奇了。未来资本家们不愿冒险在这样的国家里把他们的金钱拿来投资，这也就更不足奇了。在这个国家里，财产和生命以及公共卫生同样是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的，但是这些正是应当受到这些当局的保障的。”^②

孙中山很快就打消了关于在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条件下有可能改造中国的幻想。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帝国的虚弱，说明不能指望清政府进行真正的资本主义改造。他指出，失去朝鲜以后，满清王朝丧失了感召力，因为它在全体国民面前充分暴露了它的腐败无能。自然，孙中山放弃改良主义道路，这绝不意味着整个自由资产阶级业已革命化。孙中山早期所走的道路依旧是康有为明确提出并于1898年企图实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道路。所以，这种改良主义创举的失败，清廷对软弱无力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地主绅士反对派这种变革的坚决镇压，使孙中山更加认识到他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通过康有为失败的例证，他更加坚信在满清王朝统治的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1卷，第23页。

② 同上，第94页。

条件下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实现。他写道：“这些罪恶的来源是贪污，而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①

但是，这些单枪匹马的孙文主义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孙中山屡屡发动的未成功的反满起义，还不足以说明孙文主义已增加新的社会内容。就其阶级实质而论，19世纪末叶的孙文主义只能说是资产阶级—地主自由主义急进派优秀代表的个人抗议，他们和俄国十二月党人一样，在群众缺乏革命热情的情况下，只反映了摧毁旧社会的必要性。满清王朝作为陈腐的统治形式，不可能更多地满足其统治范围内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的要求。而反对满清王朝的斗争，也不过反映出自由派先进分子的不满情绪而已。在反对满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也从脱离封建主义生产的绅士反对派的某些阶层当中寻找支持者，难怪他在这一斗争中试图依靠并获得来自绅士军官的革命后备军。在中国，军官（在俄国沙皇统治下，军官是十二月党人的支柱）当中有没落的世袭绅士，因为，世袭绅士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某个阶段曾领导过反清运动。孙中山很晚才放弃与绅士的合作。在这一时期，他只是把所有有利于反清斗争的人召集到一起，因而他的活动还没有使孙文主义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孙文主义还未找到足以使其革命探索富有成效的可靠的社会支柱。后来，当孙中山找到民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农民这支真正的革命力量时，孙文主义才得以真正确立，它凭借农民才得以成为以后革命阶段的决定性力量。

二、社会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

“从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政策（土地政策和非土地政策）”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1卷，第95页。

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政策，是有相当可观的距离的。”^①

太平天国遭镇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趋向深入。秘密团体“哥老会”、“三合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组织是继续执行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路线即造反者路线的一个方面军。尽管它们具有许多互相矛盾的特征，但在客观上说明第三阵营即农民和城市贫民阵营的存在。这些组织虽具有宗教性质和宗派主义，且领导权往往掌握在反动的乡绅上层分子或无业游民和流寇手中，其成员很大一部分是流氓无产阶级分子，但它们毕竟是发展中国革命的一支力量。它们力图用民主主义摧毁农奴制度，坚决反对满清专制政体，反对外来侵略。它们反映了农民的民主主义要求，诚然，这种民主主义要求是以反动的复古形式作掩护的。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尽是“罪犯”。“最能说明其社会成分的是三合会，该会会众大多是犯罪潜逃分子，入会的目的是寻求保护。他们不是行劫潜逃者，……就是试图纵火行劫者，或干脆是孤儿，为了生计不得不入会。”^②孙中山对其中的一个组织曾作过耐人寻味的评价：他们干一切事情都很神秘，极力提防政府官吏，对知识分子也回避，把知识分子视为当局的耳目……他们的暗语和口号都是民间下流话，知识分子由于打心底里感到厌恶而躲开他们。国民党历史学家和能克服“厌恶感”的孙中山本人的这种不赞许的评论，足以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是那些在中国封建主义条件下唯一能进行坚决斗争的阶级力量。这些组织是最早的革命组织，在那里，中国无产阶级受到革命教育。萍乡煤矿以及其它厂矿工人参加的一系列起义是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他在寻找革命的同盟者时自然就不会忽视这支力量。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288页。

② 古扬：《中国的秘密会党》。

孙中山与哥老会领袖们过往甚密，从他们那里接受了革命传统，接受了贫民彻底摧毁旧社会的要求。1905年创立的同盟会是两股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股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洪流相汇合的产物。

“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从此，革命浪潮日渐高涨，不到一年，同盟会就拥有会员万余。”^①孙中山本人认为同盟会的创立是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他指出：“自1905年秋同盟会创立之时起，我就坚信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必将成功。不足一年，加入我们同盟会的达万余人。同盟会分会几乎遍布全国，自成立之日起，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出乎我所料。”按照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同盟会是否仅仅是兴中会的变种？它的出现是否偶然？当然不是，同盟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它拥有其他阶级成分，提出了其他阶级的要求。这种“突变”的奥秘就在于政纲中提出了平均地权，这说明同盟会申述了它充当农民领袖的意愿。同盟会的成立，意味着农村革命力量和城市贫民找到了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这个同盟军；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新生力量——知识分子和旅外华商也找到了中国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个支柱，并且领导了革命斗争。这是太平天国起义者未能做到的事，因为当时还没有那种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力量，然而它的后继者——“哥老会”和“三合会”这些秘密团体却做到了。同盟会的创立，它的纲领中提出平均地权的要求，其客观意义就在于此。尽管平均地权的口号很不完善，但它说明同盟会渴望成为农民的领袖。孙中山当年活动的主要革命意义就在于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获取胜利和成功的原因也在于此，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体系的孙文主义就是以此为开端的。

在孙文主义的发展时期，即同盟会活动时期，中国的社会情况要求更迅速地、更坚决地铲除中国土地所有制即中国社会经济

^① 郭士祺：《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载《湖北日报》，1929年3月。

制度中的中世纪残余，要求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如果不这样，中国会进一步衰败，进一步四分五裂，会屈从于向帝国主义最高阶段发展的外国资本。然而，早在中国身上打主意的帝国主义，越来越操纵中国的经济，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这些年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效劳、发展“十月党式的”反动资本主义的进程。帝国主义并没有改变农奴制的基础，却创造了更加残酷的剥削方式，因而越来越遭到民主阵营的反对。

列宁写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有黑帮十月党式的资本主义，有民粹主义（‘现实的、民主的、积极性十足的’）资本主义。……十月党式的资本从英国和法国转移到了俄国和亚洲。俄国革命和亚洲的革命＝为排挤十月党式的资本而代之以民主的资本的斗争。”^①因而，孙文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已成为这种“民主”资本的革命的思想体系。

假如把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条件机械地运用到殖民地的中国，那就错了。“十月党式的”资本不仅转移到了亚洲，而且是英国和法国人，也就是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它搬到了亚洲。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主义，而且要反对作为主要势力的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出现落后的、野蛮的亚细亚剥削方式。可见，中国革命最初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文主义是“民主资本”的思想体系。

中国面临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孙文主义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但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历最后几十年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列宁写道：“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卷，第455—456页。

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①所以，我们觉得，孙中山的学说受到西欧乌托邦社会主义很大的影响，明显地留有西欧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痕迹。在中国，资本主义分化并不严重，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也不存在，这给孙中山打上了乌托邦的烙印，指望中国能避免他在西方所见到的一切资本主义弊病。孙中山于1912年指出：“英国和美国有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工业，要在那里实现社会革命确是难事。我们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故社会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我们有可能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既得利益是紧抱不放的，要打破这种利益是困难的。在中国既无资本家，也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进行这种革命就比较容易。”^②因此，他极力寻找预防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从这一点看，孙中山是一位反动的乌托邦主义者，当然，这不是他的学说的革命精髓。列宁认为，是社会关系的辩证法使这种反动的说教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纲领。孙中山以反动的乌托邦形式表达了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追求，这是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孙文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着重阐述的正是这一点。他以中国为例，再次向孟什维克指出以民粹主义反动形式出现的运动的客观进步性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列宁写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列宁从中国民粹主义中看到“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③

很明显，列宁对孙中山的民粹主义问题分析得非常精确，但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却出现了许多实际上与列宁主义观点毫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154页。

②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2卷，第325页。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154页。

无共同之处的著作。然而，关于孙中山的民粹主义问题却是孙文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对孙文主义的整个社会性质的看法主要取决于对前一问题的认识。对孙中山的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这犹如石蕊试纸，能显示对孙文主义的本质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所持的政治见解。众所周知，孟什维克对待俄国民粹主义，往往只看到其反动的一面，只看到其表面，即形式上倒退和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面。由于对民粹主义有这样一种认识，孟什维克必然轻视农民，看不到这支能为社会的民主主义改造而奋斗的力量——农民的革命作用。列宁认为民粹主义这种认识是“最坏的学理主义”。①

人所共知，列宁对民粹主义的评价是：民粹主义是进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体系，其客观意义就在于同农奴制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美国式的”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大家对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评价是不一致的。许多同志认为，孙文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们正是这样看待民粹主义的。比如，达林同志认为，孙中山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保护小资产阶级免受资本主义的腐蚀”，“孙中山代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中各个阶级以至保守党人的利益，因而孙中山的改革与11世纪王安石的伟大变法有许多共同之处”。②

达林接着写道：“孙中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敌人。他对资本主义的敌视反映了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中各个阶级——手工业者、苦力、商人、知识分子和小农……的利益。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客观上保护了小资产阶级免遭破产……例如，他在南方客观上

① 列宁在给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信中写道：“孟什维克在把民粹主义当作一种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与之大战的时候，教条主义地忽略、遗漏了民粹主义的历史现实性和进步性的历史内容，没有看到民粹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自由派地主资本主义而主张民主资本主义、反对‘普鲁士式’资本主义而主张‘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理论。由此便产生出他们那种极为荒诞、愚蠢和叛变的思想，说农民运动是反动的……”（《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卷，第116页。）

② 达林：《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俄文版）第84、85页。

阻止了大资本的侵入。”^①

维连斯基同志写道：“由于孙中山并不是完全主张承认阶级斗争，所以他的整个学说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方面，孙中山提出了不无益处的土地纲领，其实质是平分土地（所谓平均化），它很象俄国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社会化的主张，也很象亨利·乔治所提出的单一税。”^② 安东诺夫同志似乎综合了所有这些观点并简要地提出以下公认的看法：孙文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大资本的痛恨”。^③

在论述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中，有数十处实际上都承认孙文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因而是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即使引用孙中山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论述，也足以说明孙中山本人是非常反对所有这些观点的。列宁对整个民粹主义，包括孙文主义在内的中国民粹主义的看法，同样驳斥了以上这些观点。众所周知，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把孙中山的纲领称作“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列宁写道：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革命’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不会带来其他实际的东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

① 同上页注②，第85、87页。

② 为了说明产生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社会经济前提，很有必要援引维连斯基同志的话：“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分土地这一主张，是他的社会纲领的首要任务，他提出这一主张的依据是：中国是一个正经受人口过剩之患的农业国。”〔《孙中山——中国革命之父》，（俄文版）第28页。〕

③ 安东诺夫：《孙文主义和中国革命》，（共产主义科学院出版社1931年俄文版）第110页。

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①

可见，列宁认为孙中山的纲领的宗旨是消灭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他强调指出，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正在于此。他同资本主义的所谓斗争，是一种说教，是反动的说教，用列宁的话说，“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②这一反动的说教。

然而，许多论述孙文主义的同志，恰恰把这种不是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的说教提到了首位，从而忽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即孙文主义的进步意义，并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孙文主义是主张走“另一条道路的”。他们把孙文主义视为“小资产阶级企图走中国特殊发展道路（既非资本主义道路，亦非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③

列宁在批评对民粹主义的这种看法时说道：“但是，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直到现在还没有从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学会了解，这些在错误思想体系中表达出来的要祖国按照‘另一条道路’发展的半世纪的愿望有什么现实的意义，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很糟糕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就不懂得，“民粹主义者的思想体系的现实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把两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立起来”。^④在封建的和殖民地的中国的条件下，孙文主义是第二条道路，即美国式的、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体系。安东诺夫、维连斯基和达林同志，以及其他认为孙中山是在走“另一条”道路，认为孙文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同志，对此一无所知。然而，根据两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即可明了列宁对孙文主义的评价。下面这句话非常确切地表达了列宁的看法：“从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政

①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卷，第155—156页。

② 同上，第155页。

③ 安东诺夫：《孙中山——中国革命之父》（俄文版）第111页。

④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卷，第99页。

策（土地政策和非土地政策）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政策，是有一个相当可观的距离的。”^①

孙文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体系。而希望最纯粹地、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迅速而坚决地消灭一切中世纪封建残余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文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体系，是民粹主义。但这是否说，孙文主义作为殖民地的中国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的、唯一的社会基础是农民？这是否说，农民与城市的各个阶级不同，进行了斗争？因为在城市无产阶级还未发展成为独立的力量，尽管有崛起中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但资产阶级是由资本主义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发展而来的，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曾遭受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农奴制的压制。如果是这样，那对城市的作用应当怎样看，对那些曾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或在其他地区领导中国农民与中世纪制度进行斗争的城市的进步资产阶级的作用又应怎样看？换言之，崛起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是革命力量？它是革命力量。列宁说：“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有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②

可见，孙中山所代表的这个小资产阶级领导了农民，依靠了农民的强大力量，在它的思想体系中也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因为“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③“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它的一些领袖是曾在外国留学的知识分子”。^④

此外，列宁在《新生的中国》一文中把孙中山称作自由党人。列宁指出，中国有三个主要政党。“第二个政党是自由党。它与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288页。

② 同上，第15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396页。

激进社会党联合，共同组成‘国民党’……它的领袖就是人所共知的孙逸仙博士”。^①这是不是说，列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放弃了认为孙中山是民主主义者这一看法，从而放弃了与此相关的、他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对中国革命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当然没有，在这里并没有“任何别的”论断。列宁把孙中山视为“中国工业较发展、较先进、较发达的南方”的代表人物，这与我们认为孙中山是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丝毫不矛盾。在分析这个“别的”论断的含义之前，应考虑到列宁在该文中是把孙中山和俄国民粹派重新作对比的。列宁在上述引语后紧接着说：“现在他忙于制订大规模的铁路网计划（告诉俄国民粹派：孙逸仙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命运！）。”^②

能否认为，为了证明被反动的乌托邦外衣掩盖的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实质，列宁举自由主义者为例，以说明我们是怎样学会认识俄国的自由主义的，即怎样把自由主义看作无力与中世纪制度作斗争的非革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

当然不是！列宁写道：“农民民主派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争得了自由。”^③

孙中山是这个联盟的代表者，在他身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初阶段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二者兼而有之，就象俄国的赫尔岑一样。假如不懂得列宁的辩证法，按照我国的发展情况类推，把我国的后期发展阶段机械地运用到中国的初期发展阶段，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孙文主义是工业资产阶级即业已把自身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分开的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依据列宁主义学说对孙文主义所作的第二种评价。照此看法，必然会完全否定农民，完全否定民粹主义，看不到农民是农奴制度下资本主义倾向的代表者，以为民粹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这种观点在艾森什塔特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39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同志的《孙中山学说中的土地国有化》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孙中山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平均地权问题：第一，按照民粹主义者的方式；第二，按照亨利·乔治式的资产阶级急进改革家的方式。”①当然，民粹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急进改革家显然不同。假如进一步分析“第一种情况”，那可以看到，孙中山被视为“现实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因为他“撕下了温情主义的外衣，暴露了资产者的贪欲，向封建主义残余大举进攻，损害占有小土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虽说不是填满个人的腰包，可是富了国库”。②对孙中山的这种孟什维克看法，与列宁对资产阶级、农民和民粹主义的看法有着严格的区别，与孙中山本人的整个主张也是矛盾的。问题在于孙中山这位民粹主义者曾经反对过封建主义，高举过农民的民主制旗帜。然而他却抛弃了这面旗帜，拒绝了农民的要求，成了不反对封建主义反而与封建主义联盟的自由主义者。推动孙中山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是农民，正是在他领导农民的历史时期，他极力反对封建主义；反之，在他背离农民的历史时期，他则成为政治空谈家，以至有可能变成平庸的军阀。孙中山这种“自由主义”表现，与列宁把孙文主义视为富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看法是否矛盾？不矛盾。“知识分子民粹派爱讲调和的或‘全人类的’词句。这些词句总令人感觉到他们是自由主义者”，③所以，孙中山作为知识分子民粹主义者，只能在一定时期内反映农民的利益。从他的整个发展阶段来看，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既可以与袁世凯妥协，与他订立同盟，也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总之，自由主义者要比民粹主义者强，因为他们寄希望于资本主义。

哪些社会成员是中国农民民主制思想的代表者？列宁在阐述

① 《中国问题》（俄文版）第4—5期，第119页。

② 同上，第120页。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553页。

德国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时写道：“共产主义的主要宣传者，是同我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等等相仿佛的人物，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些善意的资产者，多少有些痛恨政府的人。”^①在中国，“痛恨政府的资产者”和“曾在外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也一度高举民粹主义旗帜即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旗帜。我们重复一下列宁对1911年中国革命的实质所作的精辟论断：“农民民主派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争得了自由。”所以，从思想上促成1911年革命的孙文主义，是这个联盟——曾经在象俄国民粹主义时期那样的历史时期内起过作用的联盟——的思想体系，它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民粹派运动合为一体。列宁指出：“当时各政党和运动的阶级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民粹派运动的混合，其中学生和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②很清楚，列宁未曾作过其他任何评价，列宁对孙文主义的看法没有任何矛盾。这是辩证的矛盾，是孙文主义本身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体系是对立的统一。所以，唯一正确的看法是：把孙文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体系，看作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看作具有反动的空想形式即民粹主义形式的革命的思想体系。孙中山这位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是反动的空想主义者，即所谓社会主义者。直到晚年他仍充满着小资产阶级幻想。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学说所阐扬的思想体系是小资产阶级、苦力和手工业者的思想体系。把孙文主义简单地称为孙中山学说，显然是不懂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显然是把孙中山的主观愿望与他的学说所阐扬的思想体系的客观效果机械地割裂开来。

孙文主义不等于孙中山学说。孙中山学说不能统称为孙文主义。孙文主义是形式（孙中山的乌托邦学说）与内容（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体系）的统一体。马克思通过蒲鲁东这个例子，精确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卷，第560页。

② 同上，第328页。

地阐明了形式与诸如此类思想体系的内容的统一，阐明了思想家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和内容（产生这一学说的思想体系的内容）的统一。蒲鲁东是不是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当然不是。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产生其学说的社会条件的辩证法，即他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社会条件的辩证法，使其学说变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①

孙文主义是不是1911年革命阶段的革命思想体系？孙中山学说是不是革命的学说？他所提出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主张（即使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是不是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样提出问题很不妥当，因为孙中山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实现平均地权和民主所作的斗争，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上述问题也存在着另外一种答案，我们认为，这是孟什维克的答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艾森什塔特同志说：

“看来，平均地权这一主张实质上是革命的，但这种革命性仅仅是表面的。”②他拿自由主义改革家亨利·乔治与民主主义改革家孙中山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孙中山的学说与亨利·乔治的学说很近似，但不同的是前者资产阶级急进主义成分较少”，“孙中山的纲领显然比亨利·乔治的纲领狭小”，“孙中山不如他的老师大胆”。③这一看法对吗？如果看法对的，那么对“不如亨利·乔治大胆的、畏首畏尾的”孙中山先后进行九次以失败告终的武装起义和两次发动4亿中国民众进行革命的举动该作如何解释？亨利·乔治是资产阶级改革家，他生活在资本自由发展的国

① 《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80页。

② 《中国问题》（俄文版）第4—5期，第139页。

③ 同上，第143页。

家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而孙中山是革命家，他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即资本没落时期，而在民族资本主义遭受帝国主义摧残的殖民地中国进行活动。这些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对两种学说的性质势必产生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下，必然造就平庸的改革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造就杰出的革命家。

在中国封建的与殖民地的条件下，孙文主义是主张走第二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革命的思想体系，是主张搞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走美国式发展道路的革命的思想体系。那么，在同盟会活动时期，谁代表“第一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孙中山的美国式的、“闵采尔—平民式的”、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发展道路相对立的道路），即普鲁士式的、“路德—骑士式的”、十月党式的、普里什克维奇—古奇科夫式的、或象列宁所说的自由派地主式的道路？在1911年革命时期，“第一条”道路及其代表者已经非常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列宁指出，在这一时期，“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①

在1911年革命中，袁世凯是以“十月党式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出现的。为数不多的论述1911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往往把袁世凯说成是不代表任何资本主义新趋势的封建中国的典型人物。这不确切，要是持这种看法，那就无法理解1911年革命及其随后各个发展阶段，无法理解孙文主义及其阶级实质了。

列宁于1912年3月指出：“自由派关心的是不要破坏地主的政权，以便同地主平起平坐；自由派关心的是怎样同地主瓜分政权，才能使工人和民主派毫无所得；只有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取得胜利，政权才会真正‘离开’地主的手‘转到’自由派手里。证据是什么？是法国的整个历史和中国的现代史：如果中国民主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153页。

派没有违反袁世凯的意志取得胜利，政权决不会，即使是暂时地，即使是有条件地转到自由派袁世凯的手里。”^①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分析，即可回答自由派代表即“十月党式的”资本的代表袁世凯的作用问题。中国“十月党式的”资产阶级是与封建地产和封建官僚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它是依靠封建官僚逐渐变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是与外国资本和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它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逐渐变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并不热衷于翻推封建主义和摆脱外国资本，恰恰相反，它只有依靠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的统治才得以生存。袁世凯在他整个活动时期，代表外国资本和与其相关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大封建商业性农业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利益。他在镇压义和团起义中的作用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天津的改革活动，如推行自治、鼓励工商业、创办中国第一个工商业品陈列馆等等，足以说明这一点。1911年也说明了这一点。

袁世凯取胜后，中国是否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的胜利是否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解决？当然不是。在中国殖民地的条件下，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无论是美国式的还是普鲁士式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都是无法实现的。袁世凯的上台，说明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妥协，是“十月党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无疑是孙中山投降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从孙中山身上可以看出，自由主义者的势力大于民粹主义者。但不久，袁世凯不得不恢复摇摇欲坠的整个封建制度乃至官服上的珠子，因为中国只有作出抉择：要么把封建主义连同帝国主义一起推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要么恢复整个农奴制度，镇压民主主义革命，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1925—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形势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卷，第461—462页。

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三、孙文主义和中国民族运动

“目前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前美国在统一为一个国家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从前德国在形成为一个国家和实现统一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也就是从前意大利在实现统一和逐走外敌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①

1911年革命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改造中国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叛变，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无产阶级的相对软弱（无力领导革命和率领农民进行斗争）——这些因素对于革命的失败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农民运动高潮中取得初步胜利的、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城市失去了乡村，乡村转过来反对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革命的失败，决定了袁世凯的胜利，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的失败。

1911年革命没有着重提出反帝斗争，然而，这是表明民族资产阶级萌芽时期革命性的一个基本条件。业已展开的反封建斗争吓坏了在中国殖民地的条件下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农民民主派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开始瓦解。孙中山迫于国民党（1912年由同盟会改组而成）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压力，放弃了土地国有的口号，即平均地权的口号。②这一历史性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242—243页。

② 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土地国有化是孙中山的设想，但在1911年，它并没有被视为通过土地革命来没收地主的土地，而被视为通过“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赎买地主的土地。因此，关于“国民党已放弃自己的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并且在它的纲领中再也不提这个口号”的论点和关于“在1923—1927年期间再也不提土地国有化”的论点，都是错误的（马扎尔：《中国革命的两块土地纲领》，载《中国问题》第4—5期，第62页）。在《三民主义》一书中多处提到通过赎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计划。

步骤意味着孙中山与农民决裂，意味着他离开农民。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且与袁订立协议，辅助他工作，也就是说，向袁公开投降。把外资吸引到铁路建筑、矿山建筑以及其他建设上去，扶助民族工商业——这些旨在与帝国主义合作，以便在反动势力统治下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措施，是孙、袁订立协议的条件，是两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代表人物坐到一起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孙中山过去和未来的同路人进一步背叛革命。胡汉民、陈炯明实际上在孙中山所作出的原则性让步的基础上变本加厉，镇压农民运动，枪杀为谋求解放而坚持战斗的农民。迫于自由资产阶级压力而被抽掉精髓的孙文主义，背叛了农民，而资产阶级也背叛了它，终于成了毫无根基的、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说教。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在欧洲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下很快把革命成果摧毁殆尽，取得了胜利。

鉴于形势的变化，孙文主义作为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的思想体系，在这一阶段不再发生作用。但是，中国的殖民地条件决定了另一种发展趋势，决定了另一种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列宁指出：“一个时期是1789—1871年，那时欧洲的战争无疑大都与最重大的‘人民利益’联系着，也就是同强大的、涉及千百万人的、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着，同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外国压迫联系着。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保卫祖国’这一概念，即保卫解放了的资产阶级民族，反对中世纪制度。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党人才主张‘保卫祖国’。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也不能不主张‘保卫祖国’，例如保卫波斯或中国免受俄国或英国的侵略，保卫土耳其免受德国或俄国的侵略，保卫阿尔巴尼亚免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侵略等等。”^①

资产阶级（其上层已投入反动营垒）没有掌权，帝国主义作为中国经济的统治力量，仍在扼杀崛起中的民族资本主义，为帝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419——420页。

国主义所扶持的农奴制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保卫解放了的资产阶级民族，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的历史任务。此外，中国的社会条件由于新的因素而复杂化：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生下了中国军阀制度胎儿。早在19世纪末叶就已孕育的军阀制度，在1911年革命失败后兴盛起来。侵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角逐导致了军阀混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改造中国的任务，不但没有完成，反而更加复杂化。因此，排除中世纪的壁障，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这仍然是孙文主义急待解决的任务。

众所周知，俄国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的“民族”问题是土地问题。列宁反对把别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机械地搬到俄国来，强调指出，比如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问题绝不是土地问题，而是统一问题，也就是在封建割据的德国建立统一市场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的“民族”问题（包括孙中山的整个活动时期）是什么？决定革命性质和阶级力量配置的是什么？决定孙中山的革命性——甚至在他放弃平均地权这个革命的基本口号（这在俄国意味着放弃革命）时——的条件又是什么？由于中国是深受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但这是不是说，中国不存在土地问题？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的农奴制只能说明帝国主义的危害的一面；正是由于保存落后形态的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的农奴制才得以存在。因此，彻底的反农奴制斗争不能离开反帝斗争；反过来，反帝斗争也不能离开彻底的反农奴制斗争，因为农奴制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创造了条件。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的“民族”问题是指把土地问题和民族解放结合起来，把土地革命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也就是摧毁帝国主义与农奴制的联系。

但在一定阶段内，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不可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反帝斗争，反对国内民族分裂的斗争和

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是首要任务。正因为这样才有了革命的资产阶级。而正是这一历史条件，甚至在放弃土地国有化这一口号的条件下，促进了革命的孙文主义。孙中山仍然是革命家，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士，是反对军阀统治、争取国家统一的斗士，即在客观上反帝的斗士，尽管他的斗争的客观意义还远没有被他所认识。这位单枪匹马的革命家很快丧失了合法斗争的条件，他虽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的亲密战友相继背离他，民众运动也明显低落，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武器。在以后的革命活动岁月里，孙中山在斗争中虽然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提不出深得民心的口号，但他一直在为反对反动势力而斗争，为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而斗争。

在这一时期，支持孙中山的是什么阶级力量？既然在1911年“能够代表真正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战友的资产阶级”现在背叛了革命，那么，孙中山的阶级基础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个阶级力量是农民吗？孙中山本人早已与农民决裂，因为他从自己的学说中抹掉了1911年曾导致他取胜的那些被歪曲的农民的口号。当然，孙中山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主张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是那些已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的思想家，即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由于旧生产方式的解体而被推到上层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与新生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站在一起，这个阶级正在成长当中，但当时它还没有越过历史所规定的阶段，还没有变成已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以此对抗剥削阶级的这样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运动是“民众”运动。孙中山继续前进。从昨天的角度看，他在前进，因为他走到了停留在现历史阶段上的资产阶级的头，成了自由主义者；从明天的角度看，他放慢了脚步，以便与那个昨天声称自己有权生存的资产阶级齐头并进。在这一阶段，孙文主义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美国式的”、革命的发展道路的代表思想。

显而易见，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也是反帝斗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条发展道路的概念并不是针对土地问题而言的。众所周知，列宁关于两条发展道路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业发展问题，而且从广义上说也适用于国内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列宁说道：“土地国有化等于由农民来破坏旧土地所有制，这是美国式道路的经济基础。……由地主来破坏旧土地所有制，这是普鲁士式道路的经济基础。1905—??年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两条道路进行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时代，这和1848—1871年在德国是实行统一（即解决德国资产阶级发展道路这个民族问题）的两条道路进行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时代有类似之处。”^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条发展道路的概念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所以从这一点看，孙中山仍然是一位“美国式的”、革命发展道路的代表，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但在这个时期，孙中山的斗争是无望的，徒劳无益的，因为他失去了群众，而且群众性的革命高潮也没有出现。在这个时期，中国各个军阀集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争战不休，孙中山对此袖手旁观。在这个时期也出现过反对正在着手恢复帝制的袁世凯的斗争，但孙中山对此持旁观态度，没有领导这场斗争，因为这是军阀分割死亡了的封建中国的斗争，而不是争取建立新中国的积极的斗争。蔡锷、梁启超等人在云南发动起义，出兵讨袁，但支持他们的阶级力量与孙中山格格不入。诚然，孙中山在这场规模不大的讨伐反动势力的运动中找到了同盟者，而且也支持这一运动，但他的路线是建立民主主义中国的斗争路线，奋斗目标不一样。这场反袁斗争是非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最后爆发，因为袁世凯很快便出卖了他们的利益，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孙中山的真正道路应该是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但他还不懂得这一点，不过他已感觉到这些年来自己的地位日益不稳固。这些年来孙中山在政治上一无所就，因为他背叛了农民，而资产阶级也背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卷，第117—118页。

叛了他。孙文主义陷入了死胡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转折点。大战期间，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使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处在萌芽时期的、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封建官僚毫无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成长为真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且由于工业的繁荣，它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于是，孙中山意识到自己是这个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孙中山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一文中表达了资产阶级企图获取统治地位、全面发展生产力的愿望。但他尚未认识到这种高涨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减弱而造成的，仍以为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能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幻想与外国资本合作，不明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他的庞大的计划是建立在利用外资这一基础上的。孙中山希望实现资本主义，但他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还不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敌对力量。他说：“通常称之为苦力的我国工人，往往受失业之苦，因而非常欢迎一切资本家，哪怕是经营糖果铺的资本家。在中国，资本家还稀少，只是在通商口岸才开始出现。但中国务必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工业。”

可是，帝国主义的再度入侵，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大战期间已撤回本土的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拼命索取它们在中国曾经失去的利益。侵华的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发生了变化，日本取代了德国的地位，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体系，但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年轻的日本帝国主义日趋壮大，不满足于原先的“影响”方式，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被合法化，凡尔赛和约确定了中国的殖民地地位。刚刚尝到繁荣甜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被捆住了手脚。斯大林指出：“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

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触犯了他们，引起他们的不满。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①

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同时，与它对立的阶级，一个崭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比资产阶级晚一些，在这个时期，它还没有以自己的阶级要求来对抗资产阶级的要求。民族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领导的，他们领导工人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前进，并且曾经毫不动摇地进行过反帝斗争。但这是来自上层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同反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斗争一样，只限于抵制洋货，而主要是日货，因为日货把国货从中国本国市场挤了出去。既要进行反对仰赖帝国主义生存的中国中世纪制度的阶级斗争，又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广泛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还没有出现。在此时期，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是指与所谓的帝国主义作斗争，也就是说，在其他“善心的”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下与最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领导这一斗争的，在北方，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陈独秀，后来他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成为昙花一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南方，是革命运动的领袖孙中山。在这个时期，孙中山的主要任务是为振兴中华而斗争，但他当时还未认识到，离开与反对中国农奴制斗争密切关联的、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坚决斗争，振兴中华是不可能的。他于1922年写道：“善用外资，投之实业……谋社会之繁荣。转危为安，悉系于此。”^②

为了实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孙中山希望与帝国主义合作，因此，他采取直接与美帝国主义联盟的做法。这如同他30年前主张以栽种鸦片来达到禁烟的目的一样，妄图通过与帝国主义联盟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个时期，孙中山的学说充满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03页。

②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6卷，第146页。

着小资产阶级幻想，充满着空想，但此时期的孙文主义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然而，资产阶级不是一成不变的：迫于收买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压力，迫于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和正在上升的社会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的出现，资产阶级日益分化，其上层愈来愈倒向反革命营垒，动摇不定的上层愈来愈倒向自由派和反动分子（帝国主义和农奴制的同盟者）营垒。但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运动进程给革命的资产阶级队伍输送了新生力量，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由于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在封建的与殖民地的中国的条件下，势必会引起革命的抗议。在这个时期，如同在其他时期一样，孙文主义成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旗帜，即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诚然，从孙中山身上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成长，但他总是把握不住社会运动的规律，有时他向前奔跑，有时却落在后面，或者与那些昨天还和他并肩战斗、而今已不再是同路人的人一道走下坡路。1922—1923年（连同1912年）就是这种落伍时期。孙中山与军阀制度作斗争，但他本人却有成为军阀的危险；他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但却有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危险，因为他还没有看到群众的力量。而正是这个时期，群众愈来愈成为唯一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任务的力量，成为既与帝国主义，又与农奴制进行彻底斗争的力量。孙中山为了倒吴佩孚（当时已准备与苏联决裂），与张作霖订立了军事同盟，对镇压广州工人运动表示默许，并讨好美国——所有这一切使他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共产国际及时指出了这种危险：

“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但是，我们要求国民党通过系统的宣传鼓动阐明孙中山军事行动的意义，开展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此外，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勾结……这种勾结将使国民党的运动有堕落成为军阀混战的危险……为了防止

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发生类似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开展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①

孙中山在这个活动时期是不是革命家？孙中山与美国联盟，这难道不说明他已脱离革命，变成一个普通军阀，变成帝国主义的傀儡吗？换言之，这难道不说明卢森堡及其他民族问题理论家是正确的吗（他们断言，当时不可能有进步的殖民地民族战争，认为这种战争必定转变为只是打着殖民地“民族”战争旗号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容置疑，孙文主义在这一时期显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既然如此，孙中山的这些举动不正是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而共产国际关于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指示是错误的吗？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托洛茨基反对派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们重弹已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关于不可能有殖民地民族战争的老调。倘若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机械地运用到殖民地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难以理解：在殖民地国家以及封建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内即在无产阶级还未作为独立力量出现之前，不可能不是进步力量。

“反对派看不见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反对派在殖民地国家革命第一阶段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上背弃了列宁的策略。”^②孙文主义曾是一种革命力量，正如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曾是反帝的革命力量一样。假如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话，就会否定孙中山的革命性，认为孙中山已经脱离革命。艾森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

②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33页。斯大林同志认为：“第一阶段是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14页。）

什塔特同志说道：“孙中山热情鼓吹亨利·乔治的‘革命’思想的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他那双本来干净的手为所欲为地干起了中美资本的勾当。”^①这是对中国革命家的诽谤，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他竟然讽刺性地用引号来否定孙中山心目中的革命前辈，但任何理由、孙中山正大光明活动中的任何事实都不能证明这种责难是正确的。艾森什塔特同志为了证实他这种指责的正确，列举并且反复强调“孙中山之子”的一系列投机行为。但是，孙中山的“儿子”有他自己的名字——孙科，有他自己的政治面貌，他显然是中国革命的孽子，他与孙中山毫不相干。当然，象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对叛徒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负有责任一样，孙中山对孙科也负有责任。

无须置疑，孙中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但这位脱离群众的革命家的客观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指责他参与“美国资本的胡作非为”，指责他不择手段的理由。从历史的合理性角度看，利用北美的帮助，尽管有种种危险，但还不是反动的或违背解放战争的革命目的的做法。列宁指出：“北美人在18世纪末的反英解放斗争中曾利用了竞争者以及象英国这样的殖民强盗——西班牙和法国两国的帮助。据说，现在有些‘左派布尔什维克’竟坐下来在写论述这些美利坚人订立的‘不干净的协定’的‘学术论文’。”^②列宁对“左派”共产党人这一深刻讽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适用于此。孙中山作为谋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的思想家，即使与美国订立“肮脏的协定”，也还是革命家，因为订立这种“协定”的目的是要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日本和英国作斗争。

局势在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各阶层愈来愈脱离革命；南方买办资产阶级公开背叛，以武力反对孙中山；陈廉伯（“纸老

^① 艾森什塔特：《孙中山学说中的土地国有化》，载《中国问题》第4—5期，第135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7卷，第22—23页。

虎”）发动叛乱；陈炯明乘孙中山暂遭挫折和与广州工人（他们不支持孙中山反陈炯明）断绝来往之际发动叛变——所有这一切使孙中山看清了他前进道路上的危险。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又使孙中山看到了充实革命队伍的新生力量。他开始懂得，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群众，于是，他转到了群众方面来。共产国际关于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动无产阶级，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为孙中山后来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使孙中山以及追随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走上了新的斗争轨道，使他们由对军阀的上层斗争走上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的轨道。

四、“三民主义”和阶级斗争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①

“我们决不害怕这个字眼，我们不论现在和将来都要从原则上‘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忘记工人阶级既要反对米留可夫，又要反对孙中山的特殊任务。”^②

其实，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是头一回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并且懂得，群众是唯一能把他40年梦寐以求的中国解放事业进行到底的力量。宋庆龄写道：“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③孙中山看到了群众，并且在中国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卷，第22—23页。

② 同上。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共产党、苏联、鲍罗廷顾问的帮助和关怀下走到了群众中间。但是，当广泛地提出关于孙文主义的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时，我们要问：孙中山转向群众这一步骤说明了什么？支持他的是什么阶级力量？在孙文主义主要发展阶段促使这一思想体系发展的是什么阶级力量？

安东诺夫同志写道：“我们根据列宁的直接论断，难以解释这一阶段孙文主义的自相矛盾的内容”，^①可见，安东诺夫同志以及其他许多论述孙文主义的作者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否定了列宁对革命现阶段所作的指示的意义，在“揭示”孙文主义这一内容时，不考虑后来直接成为共产国际指示的列宁的指示，对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作了另外一种分析，背离了革命前早已制定的列宁主义路线。

他们认为孙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是错误的），但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不可能执行自己独立自主的路线（这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孙文主义已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们认为，“在小资产阶级独立的纲领中已加进无产阶级的内容”，^②孙中山是“具有非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达林语），已成为工农群众的领袖，成为阶级斗争的思想家。维特弗格尔同志在论述1922年时期的孙中山时说：“从此，孙中山和共产主义只有一步（当然，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之隔了。”^③有人认为，最后几年弥补了过去的不足，孙中山已“声称自己是列宁主义的拥护者”。^④是什么东西对这位新“列宁主义者”产生了影响？拉狄克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孙中山“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由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转而接受社会主义观点”。^⑤所以，如果孙中山“还没有宣称自己是苏维

① 《孙文主义和中国革命》，载《权力的革命》第6期，第57页。

② 同上，第59页。

③ 维特弗格尔：《觉醒的中国》（俄文版）第94页。

④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孙中山》，无产者出版社俄文版，第5页。

⑤ 拉狄克：《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序言”，第23页。

埃制度的拥护者，仍然坚持自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只是对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解释带有某种苏维埃倾向，那我们决不会感到惊讶”。^①然而，孙中山不仅限于此，看来，他已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当时，连无产阶级自己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承认无产阶级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锋”。达林认为，“无产阶级和他一样，是在为实现同一目标即社会主义而奋斗，他承认无产阶级有权进行阶级斗争”。^②

对孙文主义在中国革命关键阶段的作用，通常的评价是：孙中山“已经成为”工农群众的领袖。诚然，我们所引用的许多著作大都写于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因而革命热情代替了深刻的分析，但这种评价至今“颇为流行”，难怪有人（见共产主义研究院1931年出版的安东诺夫同志著作）在工人集会上作关于为中国苏维埃而奋斗的报告时，竟根据这一评价提出如下问题：“孙中山逝世以后，谁领导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个革命阶段的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也有与上述观点根本对立的另一种看法，但它同样是不正确的。艾森什塔特同志在《孙中山学说中的土地国有化》一书中，把这个阶段的孙中山视为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实的政治家”，说他撕下了温特主义的外衣，露出了大资产者的凶相，陷入了美国资本主义投机活动的泥坑。“他的面目暴露无遗”，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他的三民主义纯粹是“公开为大资本侵吞小农的土地辩护”（《孙中山学说中的土地国有化》第120-121页）。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讲讲这两种观点的错误。首先，应该解释清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究竟是什么？因为“三民主义”是产生这两种截然不同见解的根源，同样，不同的错误见解导致极其错误的政治结论。

① 维连斯基：《孙中山》（俄文版）第27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维连斯基同志对苏维埃的认识，他曾与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反对及时地建立苏维埃。——原编者

② 达林：《孙中山》，载《真理报》1927年3月12日。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1924年他在广州大学讲演时最终形成的。1924年是揭开新社会革命序幕的一年。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京汉铁路，试图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农民由分散的、无组织的、秘密结社的发动进而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农民协会，成为自觉的革命力量。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农奴制残余势力勾结，公开反对革命，形成了强大的反动营垒。反帝浪潮日渐高涨，而站在反帝浪潮即民族解放运动前面的，仍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仍旧带领群众进行反帝斗争，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帝任务，然而，他们的斗争愈来愈不彻底，因为他们的死对头——无产阶级日益发挥作用，因为土地革命更加发展，而土地革命势必触及因国内市场萎缩而日益不安的民族资产阶级。

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拯救中国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是在孙文主义整个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这一时期是三民主义发展的完全成熟时期。新的社会条件在孙文主义中是否得到了反映？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民族主义最初把矛盾指向满清王朝，后来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民权主义最初的主张是建立民国，后来发展为统一中国（在形式上平等的基础上），即反对中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但这也只是一个方面。

民生主义是孙文主义的社会原则，在三位一体的学说中占主导地位。它在形式上包含两个内容：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实际上主张全面发展生产力。“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②这就是孙中山给民生主义所下的定义。

^① 汉语叫“民生主义”。在我国的文献、书籍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被译成“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和从语义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在汉语中是另外一个术语，孙中山并不采用它。

^②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9卷，第355页。

孙中山认为人民受苦受难的祸根是什么？振兴民族之路是什么？依他看，中国的一切灾难的根源，人民痛苦和民族衰落的根源不在于剥削，而在于缺少剥削（他本人在举糖果铺这个例子时就是这样认为的），认为中国的生产力不发达势必导致失业、贫困。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认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发展工业和运输业、农业商品化、国家工业化。发展机械化重工业……这就是拯救中国之路。

“节制资本”是在工人运动和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影响下，作为同无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而被纳入民生主义的，^①它意味着走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的道路，因为在中国殖民地这样的条件下，唯有国家垄断才能与外国资本相抗衡。平均地权将通过按价（由地主自己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来实行。这说明资产阶级对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何况它还不~~敢~~触动私有制。“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想把土地私有权以国有的形式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②

马克思这段话是理解孙中山的土地纲领的钥匙。孙中山作为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即作为即将取代封建主阶级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已懂得发展最纯粹的农业资本主义的途径；可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即作为正在被无产阶级取代的阶级的思想家，不敢触动私有制。中国同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的《论

① 在中国共产党1928年非公开出版的名为《论“三民主义”》（大概是瞿秋白写的）这本小册子中，有一段关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颇有趣味的史料：“请读者注意！最初，民生主义只包含‘平均地权’，不包含节制资本。只是当共产党员同入国民党、无产阶级开始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只是在这之后，才把‘节制资本’写进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我记得，起草这一宣言草案时，参加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曾多次向我解释：‘节制资本这一主张原先并没有被纳入加民党的理论’。”（见《论“三民主义”》第58—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2册，第39页。

“三民主义”》这本小册子中所阐述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断言，孙中山不想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中国城市资产阶级与土地所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政治代表”。①

可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这个革命口号与如此温和、实质上是立宪民主党式的土地纲领怎能相容？根据孙中山这个口号，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换言之，孙中山对体现“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的群众性农民运动采取什么态度？孙中山欢迎作为能实现民族解放的力量的群众运动，却又害怕作为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的群众运动。孙中山所欢迎的群众是作为革命的反帝同盟者即同路人的群众，在一定阶段内他们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作为共同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同路人，事先表明，其阶级利益终将使他们分道扬镳。孙中山力图实现曾为发展地方工业开辟道路的“民族”革命，极力实现曾为业已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带来政治自由的“民主主义”革命。他不希望社会革命，不希望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势必把矛头指向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他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目的，就在于维护这一势力。孙中山害怕社会革命。他于1923年指出，如果我们能解决民生主义问题，就可以避免将来的经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民生主义”指的是什么？或者是指社会生存，或者是指民族昌盛，孙中山本人是怎样解释的呢？马克思曾问道：“就实质而论，社会财富、民族昌盛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真正含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中国的封建条件和殖民地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在它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是在欧洲资本主义趋于没落、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由于外国人在中国兴办工业而成长起来的本国无产阶级进一步壮大的情况下

① 《拥护列宁主义，反对孙文主义》，见《苏联中国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资料》，第10期，第56页。

发展起来的。这在它的思想体系中也得到了反映。正是这些情况（且不论其他许多情况）造成了孙文主义特有的两重性：既有在西方资产阶级“正常”发展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身上那种常见的东西，又有许多同志机械地加给孙文主义的东西，他们以小资产阶级的特有本性来解释孙文主义的“自相矛盾的内容”。

孙文主义作为“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力图追上西方资本主义，超越作为农业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土地国有化、国家工业资本主义等许多阶段，但它同时又主张，必须锻造反对社会革命的武器，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远比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的无产阶级快得多。

孙中山指出：“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①孙中山害怕社会革命。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孙文主义这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彼此怎能统一呢？其中任何一个原理都是正确的，同时又是彼此矛盾的，而且还是互相制约、互为补充的。中国的客观条件要求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本人所认为的社会革命，是必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方革命，即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孙中山害怕这样的革命，企图防止这种革命发生。由此不难看出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空想主义，他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及孙文主义在形式上即孙中山的反动的空想与内容上即孙文主义（旨在反封建和反帝的思想体系，旨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之间的矛盾。

“民生主义”就是这样自相矛盾的。民生主义对于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来说，是目的，而对于预见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来说，是手段，因为它可以避免这种阶级斗争。

在农民问题上，孙中山并没有采取“俄国”革命的办法。他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7卷，第61页。

说：“照我们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①他不希望农民搞“过火行为”，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失地的田主便要受损失……”“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络的方法……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②

这就是孙中山在其活动后期对待群众性农民斗争的态度，他就是这样的“小农思想家”。

孙中山对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持什么态度呢？用达林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他在晚年是否已经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孙中山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取决于他对工人在民生主义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这种理想中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这种理想中的民众丰衣足食、民族幸福是什么样的？社会繁荣的源泉是什么？孙中山认为：“因为社会上的生产很大，一切生产都是很丰富，资本家固然是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钱。象这样看来，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③

中国共产党十分正确地认定，《三民主义》一书中的上述这段话是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大成”。^④遗憾的是，这一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9卷，第388页。

② 同上，第10卷，第556—558页。

③ 同上，第9卷，第368—369页。

④ 向忠发认为：“孙中山的社会学说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整个资产阶级理论的核心是阶级合作。自孙中山到陈公博、谭平山，他们都主张合作。”见《布尔什维克》（中文版）第13期，1930年12月1日。

看法发表得太晚了。

自然，孙中山对无产阶级独立斗争的态度是由他上述观点决定的。他反对无产阶级有权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希望工人运动服从反帝斗争的利益。他和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样，评价工人运动的标准是它对他们获取胜利能起多大作用”。①

总之，孙中山就是从这种角度评价工人运动的。当他发现工人中出现独立斗争的“有害倾向”时，便婉转而巧妙地把他的民权主义运用到工人运动中去，宣扬完全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个人平等，实际上是私有者和无产者的平等。他写道：“现在中国的工人讲平等，也是发生平等的流弊。比如前几天我收到由汉口寄来的一种工报，当中有两个大标题，第一个标题是‘我们工人不要穿长衣的做领袖……’由于这种标题，便可知和欧美工党排斥非工人做领袖的口调是一样。”②

中国工人逐渐走上西方无产阶级的道路。但这是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于是，孙中山的学说中开始加进“无产阶级的内容”，他声称：“工人又没有知识去引导自己”。③工人运动由于受资产阶级的控制，它反对帝国主义等于维护资产阶级的中国，而且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在这方面，孙中山运用了他的第一个革命主张——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它和其他两个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样，不仅是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是防止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

孙中山用什么组织形式来对抗工农的阶级组织？他采用“民族”联合和宗族联合的组织形式。他说：“比如中国现有400族，好象对400人做工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

① 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

②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9卷，第296—297页。

③ 同上，第296页。

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比如姓陈的人，因其原有组织，在一乡一县一省中专向姓陈的人去联络，我想不过两三年，姓陈的人便有很大的团体。”^①

孙中山这番话是在陈炯明发动叛变，陈廉伯发动叛乱和吴佩孚枪杀京汉铁路工人之后讲的。

这是否可以说“独立的小资产阶级纲领中加进了无产阶级的内容？是否可以说孙中山已经转到列宁主义方面，已经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孙中山于1924年发表的有关工人运动的观点足以驳倒1931年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他所作的评价，它完全证实了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他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大会指示：

“正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了利用苏维埃俄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威望，为了迎合工人的阶级本能，往往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改头换面，使之披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外衣（……在中国，某些国民党代表人物所吹嘘的‘国家社会主义’），以使用这种方法（有时连他们自己也不意识到）使第一批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小组放弃其阶级组织的直接任务。”^③

孙文主义作为社会学说曾经是中国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思想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9卷，第239页。

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提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此注文中未标。——译者

③ 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第79页。

体系，曾经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其中，民生主义就是主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现在，业已摆脱陈独秀孟什维主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看待孙文主义的。中共中央在非公开出版的《论“三民主义”》这本小册子中完全正确地指出，“孙文主义力图建立资本主义”，如果用通俗的话讲，“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孙中山希望实现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尽管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把它说得那么美好，但客观上民生主义始终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①孙中山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他是直言不讳的。他批评马克思的学说，拿汽车大王福特来反对马克思，“批驳”马克思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推翻，“只能逐步改造”。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反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如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由于辩证法的作用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样。

但是，这是不是说孙文主义于1924年已蜕变为平庸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了呢？对它的任何支持都是多余的，是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策略？当然不是。孙文主义在萌芽时期虽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成分，但它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思想体系。在这一阶段，起主要作用的始终是民族主义，它能使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引导群众进行斗争。在土地革命还未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前，在无产阶级还未登上历史舞台，还未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还未率领农民并以自己的阶级利益对抗资产阶级的利益之前，孙文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是政治遗言，直到最后，他仍未改变革命初衷，始终带领群众进行反帝斗争。但这是不是必然使群众在革命中最后获胜的唯一路线？当然不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可以指出相距日远的两种运动

^① 《论“三民主义”》，（中共非公开出版物）第31、57、58页。

的存在。其中之一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的独立；另一个是贫穷和无知的农民和工人群众争取从一切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① 孙文主义在其革命发展后期已形成了“前一种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思想体系。

这是否完全象我们某些同志在论著中所说的，孙文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当然不是。那么认为孙文主义是在“为侵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行为辩护”这一相反见解是否正确？当然不正确。这两种见解都忽视了辩证法，忽视了孙文主义思想体系赖以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孙中山在为那些看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危险性的资产者说话，但他不是为一般资产者说话，而是为那些已看到帝国主义的现实危险性的资产者说话。在无产阶级还未向资产阶级提出阶级要求之前，他们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不过他们一步步阻止无产阶级前进，力图使斗争转上他们的阶级轨道。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孙文主义号召并率领群众进行斗争，在反帝斗争中把自身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等同起来；但它又是为本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斗争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其自身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最终不能相容，因此它警告群众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希望把阶级斗争纳入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所以，我们完全应该按照列宁对待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态度去对待孙文主义，列宁是这样说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②

① 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卷，第412页。

五、孙文主义的历史意义

“孙文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起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国内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和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它由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思想变成束缚革命的桎梏。①”

孙文主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唤起民众进行反帝斗争方面起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它是革命的思想体系。但作为在萌芽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与列宁主义并不对立，列宁没有对它进行批判。

其实，列宁远在革命以前就已表明对孙中山的态度，他的态度应当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策略的基础。列宁在《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中说：“我们决不害怕这个字眼，我们不论现在和将来都要从原则上‘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忘记工人阶级既要反对米留可夫，又要反对孙中山们的特殊任务。”②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工人阶级这些“特殊任务”连同反帝斗争总任务被遗忘了，正如列宁指出的，它不可能“率领孙中山们”，③不仅如此，它自己还充当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可是，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的孟什维克领导却从马克思主义对孙文主义的评价（客观上助长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中找到了为自己对孙文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进行辩护的理由。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和孙文主义的历史意义评价过高。许多同志过分颂扬孙中山，把他直接比作列宁，称他为列宁第二。达林同志认为，“列宁和孙中山是我们

① 见《共产国际纲领：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敌对思想体系》。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288页。

③ 同上。

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孙中山的工业化计划就是列宁的电气化计划”。① 勒扎诺夫同志认为，“在世界革命史上，两位最伟大的领袖互相影响这一事实，是丝毫不容怀疑的”。②

由于对孙文主义评价过高，自然会得出孙文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起了绝对肯定的作用的结论。论述孙中山的同志们并不认为孙中山的社会学说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征，对其整个学说不加以通盘研究，仅仅把他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因而对孙文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必然得出象我们文献中那样的评价。

所以，由此得出，必须深化、发展孙文主义的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所以说，勒扎诺夫才极其错误地断言，孙文主义的“使命不仅是实现革命，而且要完成革命”，因为孙文主义所指导的“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去，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未来；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昨天，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明天”。所以说，拉狄克才断言，中国革命将同孙中山学说一起发展。最后还有一个达林，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对孙文主义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出这种评价的根源何在？凡是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不仅是反帝革命，而且是土地革命），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了解农民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人，就会认为中国革命不过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对孙文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就只能得出由拉狄克、维连斯基、达林等同志提出并得到追随他们的其他同志附和的那样一种看法。③ 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帝国主义和农奴制机械地割裂开来，否定中国的封建关系。这样，势

① 达林：《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俄文版）第26、86页。

② 勒扎诺夫：《处在革命道路上的中国》，（俄文版）第74页。

③ 安东诺夫同志的观点是滑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社会条件，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促使“孙中山痛恨资本的下列社会条件：1. 土地关系中的封建主义残余；2. 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封建主义残余；3. 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在这里，显然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全机械地割裂开来，不懂得这两种对立物的辩证的统一，即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统一是对立的统一”。

必会忽视土地革命，只从反帝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角度来看待孙中山。

斯大林同志在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如果承认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看法是正确的话，那就必须承认，蒋介石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既不要工人革命，又不要农民革命，只是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关税自主而斗争。这么一来，对孙文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势必作出相当错误的估计。中国革命是反帝革命，而孙中山是反帝斗争的领袖，所以自然要承认他是极其革命的和绝对革命的，自然要承认孙文主义是整个革命阶段和所有革命问题上的“革命旗帜”。

1927年，达林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对孙文主义的作用提出了彻头彻尾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这是和他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分不开的。他写道：

“如果实行符合中山精神的政策，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国将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得到统一。但必须无条件地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为完全实行孙文主义而奋斗……只是在这种条件下，也就是在实行符合中山精神的政策条件下，中国革命才能获得胜利，中国才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①

如果忽视孙文主义的社会实质——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体系，那就会认为“孙中山的奋斗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这样就不可能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会错误地把孙中山的所谓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用孙文主义取代列宁主义。此外，有人把孙中山的所谓社会主义看作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看作列宁关于殖民地非资本主义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勒扎诺夫同志写道：“在继续叙述以前，

^① 达林：《孙中山》，载《真理报》，第59号，1927年3月13日。

我们要指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的纲领的决议中，孙中山的整个纲领变样了。”^① 这么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点，“借鉴”了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不但“超越”了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超越”了成为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基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提纲，而且还“超越”了马克思—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学说。我们的观点是，落后国家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种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且是在世界1/6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勒扎诺夫同志却荒唐地把我们的观点与孙中山反动的“社会主义”词句混为一谈，这些词句完全不能掩盖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性，但它们恰恰不是孙中山学说的革命核心。

安东诺夫同志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作为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工具”，^② 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根据列宁对孙文主义的评价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即可看出，安东诺夫同志这一结论显然是在为中国机会主义即陈独秀主义辩护。早在1922年，共产国际就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要过分相信打着“国际社会主义”旗号的冒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中共领导实行了机会主义策略；陈独秀的理论观点是人所共知的。在这里，值得以他对孙文主义的态度为例来说明其观点，因为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中国各式各样的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实质。1926年6月，即三二〇事件后，陈独秀针对蒋介石的指责曾作过一番表白，他说：“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我不明白这

① 勒扎诺夫：《处在革命道路上的中国》，（俄文版）第62页。

② 见《革命的权利》，1929年第6月，第60页。

句话指哪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①

这就是三民主义的“正确利用”！陈独秀以共产党为招牌做资产阶级的的工作！难道还需要用更多的事实来证明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本质吗？还需要证明中国机会主义分子在利用三民主义方面

“正确”到何等程度吗？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员……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②

陈独秀和俄国孟什维克一样，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由于他如此利用孙文主义，把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混为一谈，因而列宁主义未能占领阵地。他总是荒诞地试图把“精神上的和理论上的”领袖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歪曲列宁主义。安东诺夫同志也认为这样利用孙文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他解释道：“中国共产党以孙中山的纲领为基础，在发展这个纲领的革命内容的同时，企图巩固自己对群众的影响”。③历史表明，这种“巩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中国党的孟什维克领导歪曲列宁关于“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派订立临时协定乃至联盟的主张”，致使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丧失了独立性，放弃了斗争，屈从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联盟是为了共同反对主要敌人，但由于陈独秀之流的错误领导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加以辩护，致使这种联盟成了向敌对思想体系不可饶恕的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不妨重复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其他历史条件下针对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册，第231—232页。

② 同上，第230—231页。

③ 《革命的权利》，（俄文版）第60页。

另一问题所说的、但在这里原则上大体适用的话：“只要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思想体系，就不可能有任何合作、任何利用，就必须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敏锐性”。①

按照对孙文主义的这种评价，对现阶段中国革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小资产阶级的独立自主路线势必使其倒向反动营垒，小资产阶级已经掌权，已经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联盟，镇压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革命已经丧失信心。安东诺夫同志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小资产阶级参加了（！）这一集团，在其中扮演了‘任人摆布的小伙计’角色。”②这种说法对吗？当然不对！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参加统治集团”，因为如同在其他革命中一样，“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已不再被资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同盟者”

（恩格斯语），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统治的矛头既对准小资产阶级，也对准无产阶级和农民。那么，这是否说，小资产阶级仍然是独立自主的革命力量？孙文主义作为一面白璧无瑕的旗帜，是否依然是汪精卫、谭平山、陈公博——改组派和第三党手中的革命旗帜？根据这一观点得出这种结论，本来也是合乎逻辑的，但它同样是错误的。孙文主义这面旗帜，不管掌握在没有掌权的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手里，还是掌握在蒋介石之流手里，都只能成为欺骗群众的工具。为什么？因为孙文主义绝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独立自主路线。在革命中有两条路线（在革命第一阶段已呈现出这种趋势，在后来的实际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即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不存在第三条路线，因为小资产者由于其阶级本性不可能有自己的路线，“在经济上它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那只不过是一些自命不凡、妄自尊大的人的空谈和幻想”。

① 《孔德拉季耶夫主义、恰亚诺夫主义和苏哈诺夫主义》，（国际史学会1930年版）第85页。

② 《革命的权利》（俄文版）第64页。

错误的方法论前提势必导致错误的结论。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过作用，它没有参加统治集团，因为它在革命中没有独立自主的路线，至今仍然没有独立自主的路线（无论是革命路线还是反革命路线）。“小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去起过，将来也会起重要的作用，但它不能独立行动——它要么跟随资产阶级，要么跟随无产阶级。”^①

新的革命高潮业已转入最高阶段——建立苏维埃阶段，它又一次唤起小资产阶级，把它推到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一边。小资产阶级已不指望资产阶级解决历史矛盾，重新转到了无产阶级方面来，并从无产阶级那里寻找保卫者和领袖。

从对孙文主义“左的”评价（把孙文主义视为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体系）角度看，孙文主义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根据这种评价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首先，他们作出这一评价的方法论前提是什么？他们的方法论前提是，把帝国主义和农奴制这个统一体机械地割裂开来，过分强调革命的一面，即过分强调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完全无视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仅从土地革命的角度来评价孙中山的作用。因此，由这种“左的”观点得出的政治结论再次表明，诸如此类“左的”观点的根源是孟什维主义，这种“左的”观点事实上导致了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往往是左倾，可到头来却是右倾。在这种情况下，“左的”路线也会造成对当代现实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解释。按照艾森什塔特同志全面论述的这种“左的”观点，孙文主义不是革命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本人陷入了美国为所欲为的投机阴谋中，他当然不是革命家；孙中山的纲领是大资产阶级的纲领，其矛头不仅对准无产阶级，而且对准小资产阶级。孙中山在广州（中国革命的广州时期及全民族阵线时期）所进行的旨在剥夺小资产阶级的全部活动，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对广州政府的怨恨”。但是，孙中山在广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第57页。

州的这些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活动并没有取得成功（看来，革命终究起了阻碍作用！），“他的计划只是在3年之后（1929年12月），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由另一个政府即南京政府重新施行”。所以，从我们的观点看，广州时期的革命政府与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的南京政府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区别只在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换了一个政府”，仅此而已。当然，上面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活动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但已不是“怨恨情绪”（不过也没有什么和缓！）。独自“掌握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多年来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孙中山学说具有十分明确的阶级内容，这在他逝世以后施行的、根据其民生主义制定的法令即南京政府土地法草案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个法律一字不差地照抄孙中山的规划。它与孙中山学说有密切联系，就其阶级内容而言，完全适用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后阶段。”

可见，南京政府的阶级性就在于它是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政府，南京的土地法足以说明处在该集团中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提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然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争论，因为事实上它推行的是一条从孙中山到南京政府的阶级路线。关于南京政府与孙中山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说法对不对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用机枪向工农“讲解”孙文主义的蒋介石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在革命最初阶段对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任何支持是极端错误的。但这是不是说，孙文主义已被扼杀，已蜕化变质，已被反动派出卖了呢？这是不是说，“反动派阉割了孙文主义的精髓，在群众面前败坏它的声誉”（安东诺夫语）呢？是不是说，“反动派企图抽掉孙文主义中一切有关阶级斗争的提法，但这是难以办到的”（维连斯基语）呢？也不是。如果这样，那真理就在改组派和第三党一边，它们极力使孙文主义在群众的心目中复活，因为它完全赞同安东诺夫、维连斯基及其他同志的看法，断定孙文主义

已被蒋介石扼杀了。

孙文主义已经死亡。但作为当今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它仍然活着。怎样解释这一矛盾呢？孙文主义不等于孙中山学说。孙中山学说不能统称为孙文主义。孙文主义是孙中山学说的形式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的内容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遭到了破坏，内容突破了形式。与新的革命内容——无产阶级领导权——同时出现的是孙中山学说形式所不能容纳的、突破已经过时的形式的新的思想体系内容。当今的孙文主义是另一种新的统一体，其中的孙中山学说的残余部分对于资产阶级-地主统治的反革命内容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孙中山学说包含能赋予新内容以形式的成分，但它不是孙文主义，也不是那种在革命第一阶段能满足革命要求的统一的思想体系。

孙文主义作为促成统一战线的思想体系，作为以中国资本主义分化为标志的思想体系，作为象民粹主义那样标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列宁语）的思想体系，已随着统一战线，随着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分化，随着革命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而死亡。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意味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是列宁主义。

孙文主义在其历史发展的全部时期内带有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相混合的痕迹，因为当时既没有很自觉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也没有自觉的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孙中山是1925—1927年革命的先驱，如同民粹派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先驱一样。“民粹主义在1905年革命中已经死亡”（列宁语），孙文主义在1925—1927年革命中也已经死亡。在1905年革命的俄国，“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与自由主义的倾向不同，彼此界线分明”^①，在1925—1927年革命的中国，孙文主义这个中国革命的不固定的思想体系，已分化成戴季陶主义（接受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成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民主主义（为无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卷，第106页。

所接受)两部分。无产阶级现在不抛弃,将来也不会抛弃孙文主义的革命遗产,绝不会抛弃它的革命传统、它的彻底的革命斗争精神及对压迫的深恶痛绝,因为无产阶级懂得,孙中山在中国这块遭受双重压迫、备受欺凌的大地上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孙文主义是为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打下基础的必不可少的阶段。无产阶级懂得,孙中山所以动摇不定,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动盪不定,那时唯一坚定不移的和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

我们认为,孙文主义必然会死亡,从历史角度看它注定要死亡,因为孙文主义“所经历的变化,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变化。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①但是,我们对孙中山要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作为“运动的领袖”,为无产阶级今后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我们不能玷污孙中山的英名,^②不能把他推到敌人一边。

革命的孙文主义已经死亡。使它复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改组派和第三党试图在群众心目中恢复孙文主义威望的一切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当前,阶级分化显然决定了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级的思想体系的作用,孙文主义只能成为欺骗群众的工具。

结论是:我们反对把作为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立自主路线的孙文主义看作会为陈独秀机会主义辩护的观点。但在当前情况下,这一观点可能使人们承认小资产阶级已对革命丧失信心,也可能使人们承认仍在利用孙文主义与反动派“作斗争”的假革命改组派是正确的。

我们反对把作为自由资产阶级非革命的思想体系的孙文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406页。

^② 然而,发生过这样的事,比如在广西百色苏区,居然把令人看了发笑的孙中山的画像挂出来,后来它们又在学校里被烧掉(见《科学研究所通报》1930年第6期,第48页)。用这种态度纪念革命家孙中山,显然是“左倾”托洛茨基情绪的表现。

看作会导致承认在国民党尚未完全丧失革命可能性时就要求与之决裂的托派是正确的观点，以及在当前情况下会使人们确信始终实行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会获得政权，从而承认刽子手蒋介石在历史上是正确的观点。

我们认为，孙文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初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是促成统一战线的思想体系，是指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人士的思想体系，是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条件下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认为，孙中山作为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先驱，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尽管我们知道，他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曾经动摇不定。我们重复一下列宁关于赫尔岑所说的话：“可是，平心而论，赫尔岑虽然常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①

在孙中山身上，民主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临终前关于联合苏联的遗训，以及遗嘱中的两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译自《中国问题》，1931年第6—7期。

吴永清 译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13页。

陈公博——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民党理论家

索 外 超

陈公博的一生（1892——1946年）反映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几个重要的里程碑。^①他曾参加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1931年间，是国民党左派的主要理论家；1932——1935年间，任国民党政府的实业部长；最后，在1944年当上伪南京国民党政府主席。他的后期生涯——进入日本人扶持的政权机关——使他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叛徒。甚至今天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学家们，尽管对20世纪中国历史问题的看法上有极大的分歧，但在强烈谴责陈公博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的许多年间这种观点仍将为中国历史学家们所坚持。^②

本文既不是重新考察容易引起争议的陈公博在40年代的政治生涯，也不是研究他早年在中共以及二、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内的经

① 关于陈公博出生日期的传记资料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本文中的日期是根据周化仁（1940——1945年日本扶持的南京伪政权的主要参与者）编的陈公博的年谱。见周化仁：《陈公博先生年谱》、李钊等编：《苦笑录》（香港1979年版，第377页）；另见韦慕庭：《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纽约，1960年版，第3页。

② 尽管如此，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一份中文刊物上的宁志仁的文章要求同情汪精卫和他1940—1945年间在日本扶持下的南京政权中的追随者，见宁志仁：《汪精卫是大汉奸吗？》，《南北极》，第109期，第19-25页，1976年6月。

历,^①而是着眼于他的思想倾向和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思想影响。尽管他在20年代初期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宣称信奉三民主义,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陈公博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代。来北京之前,陈曾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也进过新式学校,如育才学校和广州法政专门学校。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找些粗活干,以求自救。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个时期,他当上了广东一个县议会议长,随后加入了学生军。但是,陈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渴望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因此,从广州法专毕业后,便决定继续深造。在北大期间,他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学习上,就连“五四运动”对他也毫无影响。^②在北京的生活经历从两个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从理论上讲,他扩大了知识面,并逐渐接受了陈独秀、胡适、蒋梦麟、李石曾和章士钊等人宣传的思想观点。他还开始与谭平山、谭植棠等北大同学建立了联系。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回广州后仍继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③

现有资料表明,陈在北京期间对马克思的思想观点没有任何兴趣。^④只是在1920年他回广州之后,才开始明显地向共产主义转变。在广州,他在谭平山和谭植棠的帮助下开始创办报纸——

① 对陈公博生涯的描述,参阅韦慕庭:《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3—13页;又见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纽约,1971年版,第455—470页。对陈公博的思想和1928—1938年间的经历较为深入的研究,见李鐸:《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革命:陈公博和他的思想,1928—1937年》(论文提交1983年香港大学的《南京十年专题论丛》);又见李鐸:《国家重建与民族生存:陈公博对解决方法的探索,1928—1938年》(1984年5月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协会准备的论文)。

② 见陈公博:《少年时代的回忆》,载《苦笑录》,第396—402页;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载《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1967年版,第4—6页。

③ 陈公博:《少年时代的回忆》,第402页;《我与共产党》,第7—10页。

④ 韦慕庭认为,陈公博在北大期间曾把自己划为复兴派(五四之后涌现的组织之一)。据陈说,许多共产党员来自这一派,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结果使共产党深受影响。见韦慕庭:《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5页。

广东《群报》，目的是传播“新文化”。同时，陈独秀这个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两位苏俄代表也来到广州，他们想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通过在北大时的关系，他们逐渐与《群报》同仁们建立了联系。后来，《群报》同仁同意承担在广东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结果，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开始负责那个地区共产主义者的活动。^①陈公博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看起来主要不是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他在晚年坦率地承认，他只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只是为了宣传，对它并没有较深的理解。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对他产生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陈说，他对当时的北京政府不抱任何幻想，同样，他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感到失望，因为它为内部的派系斗争所困扰，并且处于混乱、松散的状态。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所以，在陈独秀的鼓动下，他准备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以拯救国家。^②

显然，当陈公博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确实知道的很少。他的转变很不彻底，因为他没有从思想上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毫不奇怪，在1922年下半年，当中共因他不遵循党的路线，并在广东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而宣布处分他时，他便决定退出共产党而到美国继续深造。^③

正是在美国，陈公博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1922年初至1924年末，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三年留美期间，他仍然书生气十足，第一年，他买了所有当时流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④现存的而且是仅有的关于陈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最好描述为陈本

①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第12—17页。

② 同上，第15、31页。

③ 同上书，第37—44页；周华仁：《陈公博先生年谱》，第385页。关于陈公博是否支持过陈炯明（而不是孙中山）的问题的讨论，见韦慕庭书第7—10页。

④ 陈公博去美国之前，已经学了四至五年的英语，并曾当过英语教师。看来陈公博理解马、恩的英文版著作是不成问题的。见陈公博：《我与共产党》，第47—48页；《少年时代的回忆》，第400页；周华仁：《陈公博先生年谱》，第382页。

人在1943年与日本人勾结之后所作，他声称，在美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专心研究使他能够用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看待问题。但后来，他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他认为，实行三民主义是振兴中国的唯一途径。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陈说，他遂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集中精力研究美国的经济。^①1925年2月，陈完成了他的学业之后，离开纽约返回广州。1925年4月到达广州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参加了北伐。

从陈在1920到1940年间的大量著作来看，他在1943年的描述可能是真的。在美国潜心研究期间，他好象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回国之后，也没有向党和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在1943年写的自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然而，他忽略了一点，而这一点对理解他的思想又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陈较为成熟的政治作品《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在1927年10月出版，这部著作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他的影响的痕迹，而陈在1943年写的自述却没有显示出这种思想来源。这一遗漏是由于有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由日本人支持的汪精卫南京政权，其本质是反共产主义的，它不允许陈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任何倾向性。从现有的有关资料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可能是他在美国期间留下的，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似乎也不是从苏俄思想家那里得来的，因为他完全能看懂马、恩的原著。^②

在下文中，我不想叙述陈的全部思想，我将只限于通过考察他的哲学观点和历史观念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他的世界观的影响程度。

①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第48—50页。

② 有趣的是，陈公博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很少提到列宁。看来，列宁没有从思想上对陈公博产生太大的影响。

一、能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陈公博基本的哲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恩格斯思想的烙印。早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就曾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哲学观点可以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学派；他还说，当时他还不能断定哪一派更有理由证明其作出的论断。^①1928年，当他发表他的论文小册子《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时候，明显地站在唯物主义一边。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唯物的（物观）。他没有再继续详细地阐述这个概念，只是简单地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立场。在涉及文化结构问题时，陈论证说，所有文化的差别都可以由“环境”的影响来解释。^②关于他的哲学观的较为详细的解释，陈在他1930年写的《物的基础与解释》一文中作了尝试。^③但是，用一种综合的和清晰易懂的方式来阐明其世界观的文章，是他在1936年发表的《革命与思想》。^④这是陈公博所写的哲学著作中最有系统的一篇，而且正是这篇杰作表明了他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在《革命与思想》一文中，陈公博使用了“动的物观”一词来阐述他的基本观点。“物”和“动”是两个主要的哲学范畴。^⑤陈首先声明他相信“一元论”，而相信一元论的既可是唯物主义者，也可是唯心主义者，他进一步说他属于前一类，因为他反对

①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第10页。

② 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1928年第2版，第81页。

③ 陈公博：《物的基础与解释》，见多野见一：《近代中国实录》，第368—381页，1930年4月。

④ 1938年在成都对学生的一系列讲演中，陈也略述了他的一些哲学观点（这些观点，陈在《革命与思想》一书中已作过较为详细的解释）。陈的讲话，见陈公博的《三民主义与科学》，调查局档案，121.1/372。

⑤ 在他的早期著作《物的基础与解释》中，没有出现“运动”这一哲学范畴，只是在《革命与思想》中，这种范畴才成为陈公博的主要哲学观点。

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他把他的世界观描述为“唯心主义一元论”。^①他认为，“物”是世界的基本要素，“物观”应当成为人类思维的“出发点”。

陈通过强调“客观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来证明这种“物观”的正确性。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选择了人类文化的4个分科——宗教、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这在多数人看来与物质毫无关系）来证明，它们都是由“外界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在宗教方面，陈认为，正是客观环境的不同才说明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在不同地方的存在。在伦理学方面，“至善”的概念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改变的。美学中“美”的概念也是如此。而且，在心理学上，人的主观反应只不过是与外界物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设想的基础上，陈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大胆的主张：全部的科学研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必须以“物观”为基础。这种“物观”的逻辑结果，自然导致了陈使“心”服从于“物”。因此，在阐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时，陈主张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在一个人产生感觉之前，必须有一个外部的客观物质世界供其“感觉”。此外，他还必须有正常的感觉器官来体验这些感觉。“大脑”，在陈看来，不是别的正是物质，而“意识与思想”（心）只不过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映象。^②毫无疑问，“物质”在陈的世界观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同样，“运动”是他思想上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哲学范畴。

陈似乎曾认为“运动”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宣称“运动”是世界进化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声称，他对历史、社会制度和科学知识的认识 and 了解使得他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争辩说，历史、社会制度或科学知识方面的任何事物都从未停止过发展或增长。“运动”是历史所固有的，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它在不同时代

① 陈公博：《物的基础与解释》，第368—369页。

② 陈公博：《革命与思想》，南京1936年版，第1—2、31—35、72—74、81—90页。

持续发展。同样地，社会制度在不同时期也在发生变化。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反映了运动的状态。这一切都证明了运动是构成世界进化的基础。^①随着“物质”和“运动”作为世界的本质被抽象出来，能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形成了。

陈公博的能动唯物主义深受恩格斯的影响。他对“物质”和“运动”的解释，只不过是恩格斯的观点的一种简单重复。陈的基本观点是：哲学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学派，这可追溯到恩格斯1886年写的专题论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论述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两大学派。^②陈在《革命与思想》一书中所表现的哲学观点正是围绕这一问题论述的。与恩格斯一样，陈也站在了唯物主义一边。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陈再次遵循了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所持的观点：

“（我们的）意识与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意识却是物质的最高产物。”^③

“运动”，陈的另一个主要的哲学范畴，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有其先例。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反杜林论》一书中一再强调，“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从来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不可能没有。”^④很明显，陈公博深受恩格斯这种解释的影响，他曾把它（运动）列为他的能动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范畴之一。不可否认，

① 陈公博：《革命与思想》，第96—110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选集》，伦敦1950年版，第2卷，第334—335页。

③ 同上，第337页。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莫斯科1987年版，第77—78页。

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在其基本的特征中，能动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份直接遗产。

二、历史经济主义

陈公博的历史观同样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恩的主张与此相反，常常被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学说，陈公博就是属于这一派。陈把他的历史观描述为“历史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①然而，从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很粗略的，很肤浅的，他完全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方面，而忽略了许多其它基本要素，因此，陈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为“历史经济主义”，即把经济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在美国学习期间，陈公博就曾试图从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在他写于20年代初期的一篇优秀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简要地论述了1911年中国革命的真正原因：

“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上的压迫，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1911年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求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第一步。满清政府的被推翻，在那些只观察表面现象的人看来仅仅是由于种族仇恨，而实际上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②

从此，经济解释法成了陈公博对待历史的主要特征。在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即1928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1936年出版的《革命与思想》中，一种成熟的关于历史经济主义

^① 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前言》，第6页；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n.p.1928），第2页。

^② 韦慕庭书，第70页。

的学说发展起来了。陈的论点的核心体现在他的一句名言之中：

“人类的历史主要地是经济关系的历史。”历史上的所有变化，不论是改良式的渐进，还是革命式的突变，都是由经济上的变化引起的。种族、语言、风俗、宗教、艺术和地理等都在历史进化中起着推动作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经济条件的改变，引起文化运动的变化，没有经济上的原因，革命就难以发生。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只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没有经济，就没有政治。^①所有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1859年写的著名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简单重复。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②

陈还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并把它作为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在《革命与思想》一书中，陈写道：

“随着锄头的发明，游牧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随着蒸汽的发明，农业社会又转变为工业社会”。^③

这简直是对马克思在1843年所著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注释：

“手工磨给人们带来一个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给人们

① 陈公博：《革命与思想》，第97、125、133、160页；《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第8—7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328—329页。

③ 陈公博：《革命与思想》，第92、107页。

带来一个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

然而，马克思更为精练的用语，如“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没有被引进陈的历史经济主义之中。在多数情况下，陈使用了“经济”一词来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不易理解的地方，这正是陈的整个历史学说的关键。

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特征，陈公博便开始把它们应用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的研究上。他认为，路德新教的传播是由罗马天主教会和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冲突造成的；美国的独立运动是一场反对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的革命。他把法国革命的爆发看成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兴起，而俄国的革命却有其变化的根本原因。^②他在解释中国过去的各种起义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一书中，陈运用他的历史经济主义学说来验证他的观点，他认为，只是推翻一个朝代的起义不能称为“革命”。“革命”，就其本义而言，有两个不同的方面：（1）它是由于经济贫困而导致的一场运动；（2）它有广大人民群众起义相伴随。在此基础上，陈标出了清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四次革命——反秦、反隋、反元、反明群众起义。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阐明了一个朝代的没落是由于国内形势中严重的经济问题引起大规模的起义造成的。^③他的文章仅仅是为了说明经济因素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陈公博完全明白，他的历史经济主义将因为或多或少地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而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但是1928年他宣称，这种攻击丝毫不会干扰他的计划，他断言，还没有人从经济角度分析过历史。他希望在将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时，他的方法论能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恩全集》，伦敦，1976年版，第6卷，第166页。

② 陈公博：《革命与思想》，第125—133页。

③ 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处处都有，还可见《革命与思想》，第137—146页。

被学者们所采纳。①他认为，历史经济主义是理解历史的最佳方法。

三、陈公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陈公博的世界观与马克思的一些主要观点之间的惊人相似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在1927年清党之后，陈常被他的政敌污蔑为“国民党中的共产主义分子”。②在清党初期，陈在其著作中使用共产主义的概念是他本人已经承认了的。1928年4月，他坦率地表示，在阐述他的理论时曾使用过共产主义的术语，他说，只要这些术语符合“科学习惯”和“事实”，他就使用。③后来，当政治气候变得日益反共时，陈公博发现，公开地持这种态度是不明智的。④1928年12月，为了减轻说他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支配这种指责，他竭力争辩说，儒派思想家孟子也采用过对历史的经济解释法。⑤此外，他还试图把他的能动唯物主义学说置于中国的传统之中。⑥“唯物主义”，陈争辩说，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是许多杰出的儒派思想家如朱熹、王阳明等人一个不可缺少的观点。除此之外，“运动”的观点和能动唯物主义观点也早已包含在古典著作《易经》之中。陈又补充说，那些精通中国古典著作的人，如果不是昏庸或不诚实，就不会否认“唯物主义”和“运动”这些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

① 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第97页。

② 见苗平：《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革命论坛》，第1期第35—42页（1928年9月15日）；庆明：《杨振平试图证明陈公博是灰色共产党》，上海，1928年版；《苦笑录》，第266页。

③ 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前言》第6页。

④ 这个表述未在此书第3版中重复；见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第3版，上海，1928年《前言》第1—6页。

⑤ 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第5—7页。

⑥ 在他30年代早期的著作中，陈公博已经指出，唯物主义是《大学》与朱熹、程颢和王阳明的思想精华。参阅陈公博的《物的基础与解释》，第368—381页。

性。①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中国改革家一样，他被迫把自己“非正统”的观点追溯到中国的传统上去。

更为重要的是，陈公博在1928年后，故意疏远马克思主义。他宣称，他经常从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吸取各种观点，但不属于任何特殊的学派。他只不过是一个结合体。②在他的著作中，他从不承认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曾几次试图批驳马克思的理论，尽管这种批驳是极为有限和肤浅的。他的驳论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言未被事实所证明。马克思曾经预言，中产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而被逐步淘汰，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亦将随之尖锐化。但是，陈解释说，事实却恰恰相反。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条件的改善和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皆与马克思的预言背道而驰。第二、马克思的辩证法也站不住脚。陈争辩说，如果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正题、反题与合题是正确的，那么，他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会如此疏忽，以致于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陈看来，马克思的判断常常“过于武断”。第三、陈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一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象许多不同意这一特殊理论的经济学家一样，陈推论，剩余价值不仅仅是由劳动创造的，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因素。陈没有宣布他不同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然而，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否定，势必导致他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继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分析。第四、陈认为，马克思的弱点在于他强调“斗争”。具体地讲，陈认为，阶级斗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他指出，国民党能够起到协调不同阶级的利益的作用，并由此来消灭阶级斗争。③这种观点是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愿意接受的。

① 陈公博：《革命与思想》，第31—51页。

② 同上书，《前言》，第1—2页。

③ 陈公博，《革命与思想》，《前言》，第1—8、120—123页；《我与共产党》，第48—50页；《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第111—112、127—132页；《物的基础与解释》，第376—377页。

陈对马克思所作的这些批判使得人们很难把他看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此外，尽管陈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并未接受这两大原理的基本要素。恩格斯的著名辩证法则——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对立统一^①这些辩证唯物主义必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规律，在陈的哲学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也没有被他的思想所吸收。所以，仔细观察一下，陈的“物质”和“运动”的概念不完全与恩格斯对这两个哲学范畴的理解一致。恩格斯认为，物质本身就必然含有“运动”意思，二者都是“不生不灭的”。此外，矛盾对恩格斯的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矛盾是运动所固有的，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②所有这些细微的差别在陈那里都消失了。至于历史经济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的共鸣，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陈影响最大的一点。然而，其它一些基本特征——概念的结构，如生产关系、“前科学”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内在本质和全部有关上层建筑及其基础之间关系的论述——皆未被纳入陈的历史观。事实上，陈从来没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从整体上说不完全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符。

关于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写道：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毫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不是信仰这个或那个观点，或是信仰对一

① 恩格斯的3个辩证法则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第一次得到详细的阐述。他另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在1925年他死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不知道陈公博在写他的哲学著作时是否查阅过这部书的英译本。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66—167页。

本神圣的著作的解释，相反，正统观念专指方法。”^①

基于这个观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必接受马克思的所有观点，也不应该坚持这个或那个具体的思想。他可以怀疑马克思某些观点，但是，不能拒绝其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陈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他之所以最终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他没有从本质上采用马克思的方法论。辩证法则这些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关重要的东西，从未成为陈的观念结构的一部分，因此，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解开自然和历史逻辑的钥匙。确实，说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恩本人也肯定不会同意，然而，由于陈的世界观在本质上最初是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影响的，由于他的能动唯物主义和历史经济主义是分别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那儿继承下来的，所以最好把陈的思想倾向说成是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

陈公博不是第一流的理论家，因为他的思想既无独创性又不深刻。他的思想观点主要是从马、恩著作中得到的，而且对它们的理解是简单而又肤浅的。^②“物质”、“运动”、“经济”等概念在陈的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也是他的思想核心，但他却从未对这些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微妙的论证不是他的长处，然而，他的著作在总体上表现出一致性。他成功地阐述了一个思想体系，即能动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经济主义，这在国民党领袖当中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成就。

在本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中国理论发展的一个

① 见《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载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伦敦，1971年版，第1页。在这篇文章中，“方法”专指辩证唯物主义。文章写于1979年8月，这时，乔治·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已明确地属于黑格尔派，它在一些基本方面不同于列宁主义。

② 这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在共和时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普遍的现象。

主流。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在这个时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潮流发展的结果是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与中共决裂之前，国民党内部没有多少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留俄归国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国民党党员，他们在分析中国的国民革命时，实际上应用了马克思的术语。^①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如施传统、刘侃元（他们是左派党刊《革命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非常精通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他们信奉唯物主义并提出了“对三民主义的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的一些术语，如“运动”、“矛盾”、“超越”、“全面”、“阶级斗争”以及“历史的经济解释”等充斥于他们的作品之中。^②由此看来，陈公博仅仅是受这个潮流影响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陈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少数几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民党著名领袖之一。除他以外，胡汉民、戴季陶是另外仅有的两个曾经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民党上层领导人。^③1919—1920年在写给《建设》的文章中，胡和戴都采用了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法，并热衷于在中国宣传他的思想观点，尤其是，胡汉民在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在这一点上，陈公博从未超越他。在1919年12月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评论》一书中，胡汉民证明自己早在19

① 见邓文仪：《中国革命与民生问题》（1927年）。关于20年代留俄学生的回忆，见何汉文的《致留学生》，载《湖南文史资料选集》，长沙，1981年，第6卷，第39—72页；李巴夫：《留学苏联的片断》，同上书，第6卷，第173—184页。

② 见施传统：《目前的改组问题》，载《复兴中国革命》，上海，1929年，第61页；刘侃元：《湘案一事的争端》，载《革命评论》，第12期，第19页（1928年7月23日）；刘侃元：《1928与我们》，同上，第1期，第26—33页（1928年5月7日）；马骏：《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见《近代中国》，第2、3期，第4页（1928年9月16日）；马骏：《中国革命的解释问题》，同上，第2期，第1—19页（1928年8月16日）。

③ 另外两个党的著名人物：林云陔是自同盟会以来的国民党元老；周佛海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加入了国民党。他们也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林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坚定地保留着马克思的思想，见林云陔《近代社会主义思潮》，载《建设》，第2、3期，第435—437页和《阶级斗争之研究》，同上，第2—6期，第1087—1102页（1920年8月）。周佛海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不知道他受它的影响有多深。

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了解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欧洲的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且，他站在考茨基一边反对“修正主义观点”。^①然而，与陈公博不同的是，胡和戴于1924年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转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当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时，他们成了杰出的国民党理论家，写了重要的理论著作反对马克思主义。^②这时，陈公博是国民党最高领导集团中唯一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的人。诚然，在1932至1938年“汪蒋合作”时期，陈不再公开提倡他的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看来，他已经与国民党的正统路线一致起来。只是在1936年，当汪精卫引退到了欧洲，陈辞去政府职务之后，他才在《革命与思想》一书中表明，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能动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经济主义仍然是他的思想核心。陈公博以一个在坚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家而著称。

译自《远东历史论丛》1987年9月，第55—70页。

张士义 刘德喜 译

① 见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载《建设》，第1—5期，第945—989页（1919年12月）。关于戴季陶的观点，见戴季陶：《从清史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同上，第1—2期，第345—363页。

② 在1927—1929年间，胡汉民、戴季陶和周佛海是国民党三个重要的理论家，他们写了颇具说服力的论文小册子，试图消除马克思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较为重要的有胡汉民《三民主义之认识》（1929年）；戴季陶：《青年之路》上海，1928年，周佛海：《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上海，1931年。

斯内夫利特和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由来(1921—1923)

安东尼·塞奇

作者简介：作者全名Anthon James Saich, 男性，1953年生于英国伦敦，英国籍。1975年7月毕业于英国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大学，读政治和地理学，获学士学位。1976年春至1977年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1978年9月获硕士学位。1986年4月在荷兰莱顿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毛泽东身后中国的改革——平民教育和技术部门研究》。主要著作有：1. 《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斯内夫利特的作用》(2卷集)；2. 《80年代的中国科学政策》；3. 《中国的政治与政府》等。

1927年4月，蒋介石下令他的部队在必要时用武力从他的共产党同伴手中夺取上海，自此，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就实际宣告破裂。共产党拟定的通过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以逐步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策略也因此告终。对蒋介石来说，这意味着他得以消除双重的威胁：其一是，共产党在方兴未艾的城市工人运动中日渐增强的作用；其二是，正在破坏国民党与农村传统势力关系的农村革命运动。此外，蒋介石还可因此赢得上海资产阶级的好感，并且摆脱对苏联武器和援助的依赖。在对统一战线的研究中，人们一向比较注意的是统一战线的活动(1924—1927年)，而较少注意它的成因。

本文拟就国共合作的由来问题再作一番探讨，着重论述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合作的发起及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斯内夫利特同许多西方人士一样是到中国传授“真理”的。在别人用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时候，他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使中国的同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联系。斯内夫利特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到达中国的，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设法吸收这种新思想，并摸索建立相应的政治组织，宣传这种思想。虽然斯内夫利特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他以为凭借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以前在荷兰工人运动中的经验，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斗争经验，他有权压制中国同志的反对意见。然而，他对中国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缺乏了解，这使他在中国工作的整个期间产生了不少问题。

斯内夫利特是第一个受共产国际派遣前往中国执行其不太明确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政策的人。因此一开始，斯内夫利特对共产国际的意图和中国的现实的感性认识就在确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性质和范围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斯内夫利特发觉自己处在一个时而尖锐时而缓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中心。在苏俄，他发现共产国际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宗旨相互冲突，自己则处在夹缝中。正如惠廷所说，苏俄领导人必须同时按革命家和俄国民族主义者的双重身份行事。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外交活动各有渠道。然而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并非总是互相分离的，而且“它们的方针间或互相交叉，便产生使人棘手、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① 在中国，斯内夫利特试图在北京“政府”、各派军阀、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运动和以上海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代表的利益之间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① A·S·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36页。惠廷认为，从整体上看，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反对资产阶级，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则持亲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两种不同立场导致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指导着这两个组织的行动。

来华前的经历

斯内夫利特来华前曾投身荷兰工人革命运动，其后又在印尼社会主义联合会（ISDV）中从事政治活动。这些经历对于他的政治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①在荷兰，斯内夫利特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植根于工人运动，而非党的活动。是工人运动造就了他作为组织者、宣传家和领导者的才能。这种早期经历给他灌输了劳工第一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也使他相对地缺少时间进行理论研究。他基本上属于一个“具有自发的革命热忱，具有强烈的、真正的国际主义信念的实干家”，而且“显然是一个全凭经验办事的实用主义者”。^②

在印度尼西亚，斯内夫利特又取得了联合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其中活动的重要经验。在那里，经过与伊斯兰联合会党短时间的接触，他和他的追随者把注意力转到了伊斯兰联合会这个组织上面。这是一个社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中央控制薄弱的组织。^③在中央机关对地方组织难于实行有效控制的时候，它很容易向其内部渗透并扩大影响，按狄克曼的话说，这种谋略的展开，是一种“凭经验和实验在黑暗中进行的试探性摸索”，而且在当地竟取得了成功。^④

① 关于斯内夫利特的详细传记，见M·波特斯：《亨克·斯内夫利特——欧亚革命社会主义者》，1976年，荷兰，奈梅根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更为详尽地分析斯内夫利特参加革命左派活动的传记，可见F·狄克曼教授的《亨克·斯内夫利特传记》，1974年阿姆斯特丹出版，以及安东尼·塞奇与F·狄克曼合写的《一位世界舞台上的荷兰革命家》，见《共产主义研究》杂志，1985年第1卷第2期。关于印尼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详见F·狄克曼：《社会主义在印尼，印尼社会民主党》，第1卷（1897—1917年），1985年荷兰文版。

② 见狄克曼书，1974年，第14页。

③ 见R·T·麦克威：《印尼共产主义的兴起》，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0—12、21—25页；狄克曼书，1985年，第24—27、37—40、48—51页。

④ 见狄克曼书，1985年，第26页。

由于具有这些斗争经历，斯内夫利特出席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7年7—8月）。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第一次注意到殖民地国家以及如何把这些国家个别的解放斗争同世界革命的战略结合为一体的问题。斯内夫利特作为印尼共产党和伊斯兰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①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他表现得十分活跃，受到足够的重视，遂被任命为该问题委员会的秘书。^②

众所周知，列宁和罗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两个主要人物，他们在有关殖民地国家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③在倾向上，不妨可以简单概括为：就战略问题而言，斯内夫利特倾向于罗易的观点；就策略问题而言，则倾向于列宁的观点。因此，他认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的关键就是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但是，由于印尼的经验，他所采取的立场与列宁的相似，强调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广泛合作的必要性。在委员会内部和大会讨论中对这种策略的批评意见对他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注重实际，所以对政策中含混之处，对会上通过的列宁和罗易两个提纲中的互相矛盾之处，他都置之不理。当大会讨论白热化，分歧明显增大时，他便出面进行调和。他声言看不出列宁和罗易的提纲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两种观点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进而指出：

“困难只在于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

① 斯内夫利特任命书原件存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斯内夫利特档案中，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04号。道夫·宾曾经指出这一任命的日期是1921年9月5日，所以，看来斯内夫利特并没有得到正式任命以这种资格参加大会，见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载《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第678页。

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自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和自7月23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的会议记录（汉堡，1921年），第137—143页。

③ 关于所争论的战略与策略两方面的区别，见E·H·卡尔和S·R·施拉姆著《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伦敦：艾伦，莱恩，1969年版），详载第5页。有关争论的更为详尽的论述，见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第3卷，（贝辛斯托克，麦克米伦出版社，1978年），第250—260页；惠廷书，1954年，第42—59页。

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上找到一个准确的准则。实际上这个困难并不存在。我们在实践中感到，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须的，假如我们忽略民族革命运动，扮演空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只是做了一半工作。”^①

共产国际这时起草了一个行动计划，能够用以推动中国的革命活动并把此种活动同世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但这项计划并不明确，可以有各种解释。基本问题是，在不妨碍无产阶级本身力量发展的同时，要全力支持资产阶级。但是，这种联盟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临时”意味着持续多久？都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许多代表来说，并不需要有这种解答，因为等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对斯内夫利特来说，在他要在20年代初期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设法找到问题的答案时，这些问题便使他整个在华期间一直忐忑不安。

斯内夫利特第一次来华

虽然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后不久就指派斯内夫利特来华工作，但他直到1921年4月才动身。^②他的具体任务是，到上海进行一番考察，不仅同中国以及远东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而且要看看能否在远东建立共产国际的一个局。^③

斯内夫利特6月初到达中国，他发现这个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定。特别在城市和知识分子中曾唤起激进思潮的“五四”运动

^① 引自J·尤登和R·C·诺斯：《苏俄与东方（1920—1927年）——文件研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41页。

^② 见《马林同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存拉夫斯坦档案第79号。见斯内夫利特旅行笔记，载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29号及H·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中国问题（1920—1923年）》，载《中国季刊》第45期，第102页。这份记录是根据1935年8月19日在阿姆斯特丹与斯内夫利特的一次会见整理而成的。

^③ 见《马林同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第1页。

(1919年)仍对这个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场运动主要是针对维护日本利益而无视中国利益的凡尔赛条约的一次反帝之举,但同时也引起了对名义上控制全中国的北京政府的不信任。斯内夫利特抵达中国时,华北及中央大权由联合击败皖系军阀的直奉两派军阀分别把持,直奉两系都企图操纵和组织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在所难免。1922年春,直奉战争爆发,直系获胜。^①尽管曹锟是直系首领,但有直系“真正军事领袖”之称的吴佩孚影响日增。^②

在一段时期内,吴佩孚曾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允许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当中,特别是在铁路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共产国际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早期的政策是想得到吴佩孚的支持,但斯内夫利特坚决反对,他赞成与孙中山领导的华南国民党力量联合。孙中山于1920年11月下旬结束了在上海两年半的“流亡”生活,回到广东,掌管了广州军政府。他在上海期间就与苏俄建立了初步联系,当然,还只是零星的接触,包括函电来往,而且函电丢失和迟到的情况经常发生。孙中山第一次会见的是维经斯基,时间是10月底或11月25日以前他回到广州的这段时间内。^③

在上海,斯内夫利特首先同初出茅庐的中国共产党和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及至斯内夫利特到达中国时,国内其他5个共产主义“小组”也已建立。^④但是斯内夫利特发现,此时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经

^① 见A·内森:《北京的政治,1918—1923年的派别活动和立宪的失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28—175页。

^② 见J·E·谢里登:《军阀时代:北京政府统治下的政治和军阀主义(1916—1928年)》,载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2卷,“共和制的中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13页。

^③ 见C·M·韦慕庭:《孙中山——屡经挫折的爱国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12—118页。

^④ 其他小组分别建立于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和山东。

费，二是“临时党中央”的委员们没有时间从事党的工作，再就是因为当时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与李汉俊（陈在广州工作时，他在上海代理陈的工作）在党的组织采取集权制还是分权制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①虽然斯内夫利特和6月份由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派到中国的尼可尔斯基帮助筹备并实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斯内夫利特对这个党的组织并不满意，^②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运动合作问题上所持的宗派主义的敌视态度以及大会确定的只注重工人阶级的方针，同斯内夫利特的观点完全相反。斯内夫利特原拟找机会就大会的这种决定发言，但在他开始讲话以前，大会因怕警方搜捕而休会。大会后来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继续举行，为安全起见，斯内夫利特和尼可尔斯基都未参加。^③斯内夫利特把中国各派力量奇怪地分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已建党的共产主义者，据此，他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宣传团体更好些。^④尽管斯内夫利特的主张一再遭到强烈反对，他的看法始终没有多大改进。他经常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1923年6月他还写道：“它（中国共产党）太早产（1920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硬行组建的，仍然是强加的。”^⑤

① 有关党的创立、斯内夫利特来华前党的工作的停滞以及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详细资料，见安东尼·塞奇：《探索昔日之谜：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新资料》，载《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15卷，第2部分，1985年，第167—182页。

② 据“一大”的参加者李达称，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在与斯内夫利特和尼可尔斯基接谈后根据二人的联合建议决定的。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册，第10页。据另一位参加者包惠僧称，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在斯内夫利特、尼可尔斯基和李汉俊三人讨论的基础上决定的，见包惠僧：《回忆马林》，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5页。包惠僧在这个回忆录中还指出，如果不是同意马林的意见，代表大会也许要延迟“一至两年甚至更多年”才召开。同上，第106页。

③ 见安东尼·塞奇书，1985年。

④ 见《马林同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⑤ 见斯内夫利特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的信，1923年6月20日，载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他在同一信中提到：“这个党太早产，国外给予的支持也过于强大。”

斯内夫利特遇到的问题和他自己的偏爱，使他在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中看到了较好的前景，尽管他也看到了这个范围内的种种局限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内夫利特建议成立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配合工人工作。大约在1921年8月中旬，^①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建立。斯内夫利特亲自为它起草了宣言，并让人译成中文。^②对劳动组合书记部参与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的秋季罢工运动，斯内夫利特看来是满意的，^③甚至不顾1923年2月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吴佩孚军队的镇压，仍然认为在“工人的组织方面”取得了最重要的进展。^④

1921年底，斯内夫利特将注意力转向与国民运动建立联系的问题。据曾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担任斯内夫利特翻译的刘仁静回忆，斯内夫利特感到共产党的力量不足，于是便与孙中山会晤。^⑤12月10日，他与担任翻译的张太雷离开上海，经汉口、长沙于12月23日晚抵达桂林孙中山的大本营。^⑥他们的会谈涉及了许多方面，^⑦其中自然谈到了同苏俄联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斯内夫利特的提议未被接受。孙中山认为，在胜利完成北伐之前，建立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方面如得此消息，会给他制造麻烦。^⑧看来斯内夫利特肯定还同孙中山谈到了与中国共产党

① 见蔚宗龄：《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间的问题》，载《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52—55页。

②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又见包惠僧：《回忆渔阳里6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载《“一大”前后》，第2册，第354页。

③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175页。

④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⑤ 见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载《“一大”前后》，第2册，第215—216页。

⑥ 这次行程的活动纪要，存于斯内夫利特笔记本，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29号。

⑦ 伊罗生书中的第104页和斯内夫利特的《与孙中山的会见：个人印象》中都提到了孙中山与斯内夫利特会谈一事。会谈记录和有关斯内夫利特的桂林、广东、汕头之行的记录，可在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92号和第3193号中找到。

⑧ 见邓家炎：《马林谒总理实纪》，载《革命文献》，第9卷，第1409—1411页。

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尽管现在还无原始资料加以证实。^①不过,斯内夫利特确实向孙中山讲述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经历,特别是关于伊斯兰联合会这个“民族主义群众组织”的发展情况。^②斯内夫利特在讲述这些问题时绝不可能不联系中国的局势。

斯内夫利特离开桂林之前根据与孙中山讨论问题的要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标题是:“中国的复兴与对俄关系”,^③这份文件的目的是何在尚不清楚,也许斯内夫利特希望以此确定两人首次会见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但是,这份备忘录没有发表,也不清楚是何人授意起草的,如果确有人授意的话。可以肯定,斯内夫利特似乎是有意识地把孙中山的想法,如中国需要在不加政治控制的前提下从外国获得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以发展其经济写进这份备忘录。备忘录对中国的形势做了如下几点论证:第一、华盛顿会议表明,主要强国之间的战争推迟了,它们当前的合作将使中国和俄国成为它们的牺牲品,因此中俄有必要实行合作和联防;第二、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具有真正独立性质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不单纯是一国的问题,而且具有更直接和重要的国际意义;第三、要建立这样的政府,就必须进行“纯粹民族主义”的宣传,只有通过这种宣传,国民党才能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完成其革命使命”的政党;第四、在既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又不能指望它们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苏俄已经表明,它是强烈支持所谓落后国家为政治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的。这就意味着,第五、一个革命的中国政府应当尽快与苏俄达成明确谅解,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如果为此能缔结条约,就会使中国人民以有别于看待其他军阀头目的眼光看待南方的革命运动。最后,如果采取此

① 据一份有关他们会见的报道记载,这次会见讨论了三个问题:改组国民党问题;建立一所军校的必要性问题;国共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这份材料载于《蒋介石秘录》,广东历史博物馆翻印,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

② 见伊罗生书,第104页。

③ 《中国的复兴与对俄关系》1922年1月10日,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11号第3112号。

种步骤尚不可能，也应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建立秘密的联系。

斯内夫利特在结束这次访问时对孙中山的印象是复杂的，但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当时和以后都为孙中山的尚武精神和坚信能以武力迅速解决问题的想法而感到担心。

① 离开孙中山的大本营，斯内夫利特又南下到了广州，那时恰逢香港海员罢工，这次罢工对于形成他对南方和国民党的态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支持罢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次罢工的领导权在国民党的手中，还认为支持国民运动的现代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② 相比之下，他对广州当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青团仍在进行不合法的活动，不利用时机参加国民党左翼组织，仍在进行自己的宣传工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③

斯内夫利特回到上海后和1922年4月24日返回莫斯科之前，同共产党领导人和当时也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进行过多次会谈。④ 道夫·宾有点夸张地描述的1922年4月第一次杭州全会就是指这几次会谈。不过很清楚，当时并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全会，唯一的一次杭州全会，是在1922年8月底举行的。⑤

①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见下文。

② 见伊罗生书，第104页。

③ 见皮特斯书，第251页。

④ 见《马林同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⑤ 道夫·宾在他的《斯内夫利特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见《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第677—697页。并在《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中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护，见《中国季刊》，第54期，1973年，第345—353页。《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一文的答复》，见《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第751—761页。当时，道夫·宾的见解曾受到A·蒙捷维尔夫的《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挑战，载《中国季刊》，第53期，1973年，第159—168页。A·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载《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第749—751页。陈学稼：《关于马林在中国的活动》，载《问题与研究》，第9卷，第2期，1972年，第48—55页。最近以来，大陆学者也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的三篇文章都反对所谓4月和8月先后召开过两次杭州会议的观点。这三篇文章是：杨振亚：《关于杭州西湖会议的一场争论》，童志强：《对1922年4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的质疑》，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209—220页；魏关松：《1922年没有召开过两次西湖会议》，见《中学历史教学》，1982年，第1期，第23—25页。虽然本章因篇幅所限，难以概述上述文章的观点，但已足以证明道夫·宾的见解不能成立。

在这些会谈中，斯内夫利特提出所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应当参加国民党。这个建议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在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提出了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陈独秀指出，两党的基本政策各不相同，国民党与美国、张作霖、段祺瑞等的合作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除广州外，在人们眼中，国民党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陈独秀最后指出，来自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的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①斯内夫利特在1922年7月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谈到，他没有说服共产党，使他们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并到国民党内开展活动。他报告说，国民党领袖已表示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宣传工作。他认为，“只要这些小团体不愿意与国民党联合，他们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就颇为暗淡”。^②

斯内夫利特1922年4月下旬离开中国，他对此前在这里的工作还是相当满意的。虽然没有使共产党人认识到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必要性，但在广州，他看到了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看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同情工人斗争和苏维埃国家的国民党。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他看到了未来工作的广阔天地，同时也看到了在中国其他地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是大有前途的。留待他做的，依然是说服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这是他整个第二次来华期间始终考虑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报告，并制定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

向莫斯科报告（1922年7月）

1922年7月，斯内夫利特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

^① 见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2年4月6日，载《“二大”和“三大”》，（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② 见《马林同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出了一份叙述他中国之行的报告。按他的说法，国民党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由四部份人组成的联合体。这四部份人是：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一部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富有的海外华人资本家，他们提供经济支援；南方军队的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工人。尽管这种定义不太确切，但它为后来斯大林主义者四个阶级联盟的构想埋下了伏线。另外，斯内夫利特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本来就不很赞成，这更使他认为有必要支持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况且国民党领导人还曾答应他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据此，斯内夫利特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可是，尽管他在建议中肯定中国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一建议遭到了上海等地共产党员的反对。^①

对于斯内夫利特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目前还不清楚。7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简短纪要没有提到他的“加入国民党”的建议。^②这可能是因为委员们虽然知道他的7月11日的书面报告，但并未进行讨论。也很可能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太敏感，不便公开。其他材料表明，尽管那年下半年反对意见有所加强，斯内夫利特和他的立场还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斯内夫利特声称，他曾带回对中国的一项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组织内帮助开展国民运动”。这个指示虽是拉狄克写的，但依据的却是斯内夫利特对中国问题的论述。^③在斯内夫利特档案中有有一份材料，标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驻华南代表的指示”，^④看来这份材料就是斯内夫利特3月份带回的成为杭州全会讨论基础的那个对中国的指示。

① 见《马林同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② 见《1922年7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载《国际新闻通讯》，第145期（柏林，1922年7月25日），第929—930页。

③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④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13号。

这个指示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把共产国际1920年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一切活动的准绳，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两项任务：第一、中共要培养“有独立思想的分子”，他们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第二、要把国民党和工会中那些亲共产党分子组织起来，共产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日益发展的分裂”而壮大起来，而在此之前，共产党必须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支持国民党中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的派别。另外，为了同包括日、美、英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宣传组织，可能的话，这个组织要与国民党分开。最后，关于组织工人的问题，建立工会应当成为主要任务。

斯内夫利特第二次来华

1922年7月24日，斯内夫利特陪同越飞启程来华。越飞此行是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的身份同北京的吴佩孚进行公开谈判。他的秘密使命则是通过斯内夫利特与孙中山在上海进行谈判。斯内夫利特的第二次在华逗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越飞的关系。他陪同越飞来华的意见是在同拉狄克的谈话中提出来的，并为拉狄克所接受。^①这意味着，“在这方面”，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越飞同共产国际代表斯内夫利特之间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到1923年2月底之前，斯内夫利特更多地忙于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越飞几乎成了他的直接上司，向他指示工作并按期听取他的工作汇报，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斯内夫利特离华。斯内夫利特的这种工作重点以及他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推崇，无疑总是引起他的共产国际上司的强烈指责。

斯内夫利特第二次来华期间面临三个主要问题：（1）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他的策略有相当大的对抗情绪；（2）在中国应当

^① 见伊罗生书，第107页。

支持什么人，怎样支持；（3）共产国际内部对他的对华政策的反对意见日益增多。在一段时期内，对涉及面甚广的各方不同利益，斯内夫利特尚能从中周旋，但越来越感到自己在中国问题的决策上处境孤立，影响日下。

斯内夫利特第二次来华前不久，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23日）。虽然大会通过了关于需要与国民党合作的宣言和决议，从而放弃了过去的宗派主义立场，但这种宣言和决议与斯内夫利特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①宣言中没有论及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问题，只提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特别着重强调了阶级独立问题。在《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定，为了同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决定以临时联盟的形式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只代表资产阶级，所以党必须保持独立性。正如勃兰特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党外合作”，是与国民党并驾齐驱的联合形式，与斯内夫利特的参加进去的策略不同。^②

杭州会议——与国民党合作问题

回到中国后不久，斯内夫利特为使中国共产党接受自己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1922年8月28—30日）。^③会议召开之前，斯内夫利特与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在1922年6月16日因陈炯明叛变离

^① 关于宣言和决议的英文译文，见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韦慕庭编辑，并加上绪言（纽约，奥克特贡出版社，1966年），第105—117、119—121页。另外，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其中尽管仍然坚持对国民党的批评态度，但提出了通过“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采取联合行动。

^② 见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纽约，诺顿图书馆，1966年版），第30页。

^③ 斯内夫利特关于他自己1922年8月12日至9月3日的活动笔记记载了这个时间。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42号。

开广州后于8月14日来到上海，他此时正处于力量微薄的脆弱境地，在上海，他急于寻找新的盟友。毫无疑问，他所处的逆境使他认为，同苏俄建立关系，能以某种形式与中共合作，都是比较有利的。

斯内夫利特这次到上海，随身带着给中国共产党的两项指示和越飞给孙中山的一封信等要件。^①在张太雷的帮助下筹备了一次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从北京来的李大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日期很可能是1922年8月25日。^②全会讨论了越飞的信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和合作问题。^③人们总是推测，斯内夫利特向孙中山通报了即将召开的全会，而且可能也获得了孙中山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可能性的认可。如果斯内夫利特事先知道国民党不会接受他的政策，他似乎不大可能在杭州把这项政策完全强加给与会者。^④

当斯内夫利特回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内似乎出现了混乱。1923年6月，斯内夫利特写道，党的“二大”以后，张国焘立即

① 韦慕庭援引孙中山于1922年8月30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孙中山告诉蒋介石：“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以一一答之。”按韦慕庭的说法，“函”普遍认为是越飞写的。“代表”可能是斯内夫利特。见韦慕庭书，1976年，第130—132、332—333页。斯内夫利特在他的笔记中谈到，他到上海以后曾与孙中山讨论过这封信，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42号。《革命文献》中也提到，8月越飞曾派人拜会孙中山，讨论中俄关系和国民党改组的问题，见《革命文献》，第8卷，到1039页。

② 见杨振亚所引马湘回忆录，其大意是，8月25日李大钊与斯内夫利特一同拜访了孙中山，见杨振亚：《关于西湖会议的一场争论》，第92页。斯内夫利特本人的记录不明确，在页边空白处记有8月26日的字样，但对这次会见的记载他只作了一半。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他对8月27日他们讨论那封信的情况作过一个解答，可是信的内容我们还不知道，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42号。

③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42号。

④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曾拜会孙中山，提出关于两党合作的建议。据说孙中山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得到了上海一些很有影响的国民党员的支持。《简史》表明，这一事件发生在杭州会议之前，这次会议通过“共产党以内部组织形式实行国共联合”的决议，见英译文，载韦慕庭和夏连荫编：《关于1918至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在华顾问的文献》（纽约，奥克特贡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2页。

在党内组织了一个“小组织”，想通它来加强党的活动。1922年8月，5位中央委员中有4位是这个“小组织”的成员，而且陈独秀交出一封信，表示不想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①达林也在留给斯内夫利特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央“二大”以后，领导立即一分为二。^②斯内夫利特回到上海时，陈独秀接受劝告继续担任工作，而且，大概在杭州，这个“小组织”也被取消了。但在以后的一年中问题继续存在。斯内夫利特坚持认为党内分支机构中发生的多数冲突都是由这个“小组织的歪风”引起的。但他又令人费解地补充道，这“与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无关”，而是一个“破坏党组织的问题”。^③

在杭州全会上斯内夫利特的提议遭到了反对，尽管就反对的程度和有否以共产国际的权威逼人就范等问题，人们还有争论。从陈独秀和张国焘^④的叙述看，对于这一将被遵循的正确策略还存有相当大的异议，然而斯内夫利特却要贬低这两种意见冲突的程度。^⑤另外，斯内夫利特在1935年也否认他曾以共产国际的纪律压人，声称他“并没有接到过莫斯科给他的具体明确的指示”，但如前所述，他的确从莫斯科带回一项指示——他实际参与制定的指示。

①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如果这个情况属实，假定陈独秀不是“小组织”成员，那么“小组织”成员就将是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但斯内夫利特说4人中仅有1人再次当选，这就是蔡和森。因此，斯内夫利特一直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他认为此人是中央委员。5人中央（或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名字是根据徐世华所撰《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名单的考证》一文中所提示而得，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48—49页。

②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达林是苏联派驻中国进行青年工作的代表。但1922年4月以后，他继续在中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协助进行党的工作。

③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④ 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2页。英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1970年春。又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253—257页。

⑤ 例如，1923年6月他写道：“在这个‘小组织’中出现了许多分歧，但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关于集权问题，而不是对策略的不同态度问题。”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又见斯内夫利特有关8月指示的笔记，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14号，以及伊罗生书，第106页。

尽管存在许多反对意见，杭州全会最终还是作出了一个历史性决议，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将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员作出指示，还要领导组织工会的工作。在斯内夫利特看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必要的自由，而且有一份独立周刊将对国民党进出批评，敦促它不断加强反帝活动。^① 全会之后，将这个决议通知了孙中山，并安排了具体的实施办法。斯内夫利特还与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同张继^②、孙中山^③ 讨论过。共产党员开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与此同时，越飞代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同吴佩孚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但是到1922年底，越飞开始感到谈判无望。他看到，吴佩孚在北京的权力正在衰落，新闻界的敌意日益增加，而且还有中东铁路问题，这一切都成为他达到预期目的障碍。^④

由于在北方的谈判陷入僵局，越飞便把注意力转向孙中山，并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越宣言。这对双方都提供了有利的宣传机会。越飞作出让步，承认中国无法引进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因为它缺乏必要的条件；表示苏联在外蒙没有帝国主义企图。孙中山表示愿意接受根据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宣言^⑤ 对中东铁路理事会进行临时改组的建议。孙中山还提出，这一问题应

①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14号。

②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42号。

③ 斯内夫利特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43号。

④ 见越飞1922年11月7日和17日写给斯内夫利特的信，载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27和3028号。

⑤ 在宣言的另外一份较早的译文中（1919年7月25日），苏俄提出把沙皇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但以后苏俄又否认在这一慷慨的承诺中包括铁路问题。1923年9月宣言就更加谨慎了。宣言在提及中东铁路的利用时，同时提到了苏俄的利益。关于中东铁路及其前途问题成了以后谈判的主要障碍，这个问题的讨论见惠廷的著作，第28—33页；又见肖作良：《中苏关系，第一阶段（1917—1920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1年）。斯内夫利特极力反对俄国后来采取的对中东铁路问题的立场。

同张作霖商谈，因为铁路通他的辖区。^①宣言中没有提到苏俄对孙中山的援助问题。据韦慕庭教授引英国情报部门所保存的报告原件，在孙越会谈中双方都同意苏俄对孙中山给予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以此作为将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承认苏俄政府的条件。^②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难以接受的，虽然它没有直接表示反对，但是很明显，由于从未就宣言的有关问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商议，并且由于宣言称中国不能采用共产主义制度，这一来损害了它在中国的作用，故此，中国共产党十分反感。^③

莫斯科的反对意见

斯内夫利特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他同国民党关系过于密切和忽视共产国际的工作等问题，在莫斯科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④共产国际虽在1922年7月基本上采纳了斯内夫利特的意见，但是仍不断有人反对，反对意见基于这种看法，即中国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斯内夫利特认为持这种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在莫斯科的拉狄克和萨发洛夫二人。他在谈及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时指出了在莫斯科发展的一种倾向：以为让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便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斯内夫利特指责拉狄克在代表大会上“基于对中国情况的错误认

① 当时，孙中山与张作霖为反对北京政府而勉强结盟。1923年2月，斯内夫利特代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走访张作霖，就中东铁路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斯内夫利特在2月15日的报告中提醒俄国方面不要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并建议俄国利用孙中山向张作霖施加压力，见《斯内夫利特2月15日给加拉罕、越飞和政治局领导人的报告》，载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39号。这个问题在以后数月中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② 见韦慕庭书，第136—137页。

③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268页。

④ 张国焘在评价作为孙中山和越飞之间的联系人斯内夫利特的工作时说过这样的话，斯内夫利特“不免忘记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搞上层政治活动”，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268页。

识”，助长了这种观点。^①

到1922年底，越飞也开始对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对有关中东铁路问题的政策感到担忧。基于这种原因，1922年12月，斯内夫利特被派往莫斯科，讨论苏俄对华政策问题。^②他随身带去一份与越飞合写的提纲，概述了他们自己对这种政策的意见。提纲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由于阶级的分化还没有进行得那么深入，因而，纯粹的共产国际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单纯开展党的活动也不适宜，必须同有条件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重要的是苏俄对外政策应坚持这一点，因此他们要求苏俄的对外政策成为“民族友好的和有反帝性质的”，绝不可让人感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相似。这显然是指中东铁路问题，它妨碍北京的谈判，而且开始伤害中国人对苏俄的同情心。他们进一步要求苏俄允诺对国民党的援助，促进国民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而对“谋求私利的各种党魁”则不予支持。^③

1923年1月，共产国际在布哈林起草的一项决议中再次肯定了斯内夫利特的基本政策。决议批准了8月份的指示，通知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尽管如此，反对斯内夫利特的人依然存在，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对斯内夫利特及其政策表示不满。他们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因中国同志的批评意见，特别是张国焘的批评意见而进一步确定的。虽说无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存在，可是共产党的独立性究竟保持多久，国民党应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应在哪些问题上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凡此种种，

①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0号。

② 斯内夫利特可能参加了最高层的讨论。在布哈林写给斯大林的介绍信中，介绍斯内夫利特是越飞的助手，并请求斯大林与他商议中东铁路问题。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32号。也许正是因为参加了在莫斯科的这种讨论，斯内夫利特接受了1923年2月去中国东北的使命，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5和3166号。

③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A·越飞和H·马林的提纲，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16号。

都令人感到困恼。^①

斯内夫利特申辩说，他的策略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确定的，他不是鼓吹他为印度及荷属群岛制定的那种策略。他认为这是防止小小的共产党出现宗派、避免“我们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作用的唯一道路。^②有人指责他，说他所担负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对他影响太大。他声明，他的意见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国的任务无关，他早已作出与国民党合作的结论，而当时外交人民委员部甚至还未提及这个问题。此外，他也不明白，在他无论如何也要遵循与外交人民委员部无关的同一方针办事时，他的工作怎么会因与越飞合作而遭受损失。^③斯内夫利特这种说法很难博得共产国际中他的反对者的好感。

斯内夫利特还感到自己与1923年苏联与国民党合作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抵触。他坚决反对苏俄政府从1923年5月起向孙中山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保证。^④尽管他本人是联合策略的主要倡导者，但他看到在国民党改组前提供这一援助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认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改组，是党的民主化和政治宣传工作。他对孙中山的“幻想”和“极为轻率的愿望”持怀疑态度。因此他说：“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如果国民党不进行改组，广东也不适于作战，那么就不宜给予支持。”斯内夫利特为他所看到的国民党内部种种军阀主义的倾向深感不安，感到“国民党

① 斯内夫利特甚至由于没有对张作霖向二七罢工运动受害者提供援助一事表示反对而受到批评，这是因为张作霖被认为是日本的代理人，见斯内夫利特1923年5月30日给拉狄克和萨发洛夫的信，载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56号。

② 见前页注②

③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④ 看来俄国人已于1923年8月作出决定，向孙中山政府提供200万美元的援助。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中山，表示“愿随时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见韦慕庭书，1976年，第140—148页。孙中山显然收到了这份电报。他在5月24日致北京全权代表和越飞的私人电报中，要求他们立即电告莫斯科，索取援助的第一批款子。（孙中山致全权代表和越飞电，1923年5月24日，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07号。）感谢韦慕庭教授向我指出这封电报的重要意义。电报还表示，党的改组将很快开始，但这个问题的进行，如同下文将要指出的那样，并没有像斯内夫利特所期望的那么快。

非但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反而变成了众多封建军阀中的一个”。^①相反，他赞成通过中共革命宣传的激励，使国民党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尽管这种政策也许能够避免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但是，假如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现实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这种选择是否可行，就很难说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代表大会上的摊牌

对斯内夫利特的政策的反对意见在莫斯科依然存在，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尚未完全接受这种政策。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6月）提供了一个机会，对于与国民党联合的性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党面临着严酷的现实，由于吴佩孚军队镇压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党对工人运动所寄予的厚望破灭了，党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斯内夫利特所描绘的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二大”以后的工作的凄凉情景，也为陈独秀向“三大”所作的报告所证实。按陈独秀的说法，在上海，为党工作的同志为数太少；在北京，同志们并不理解党的建设工作，因而发生了许多问题；湖北的同志则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制止有碍于工人力量发展的种种冲突。只有湖南的同志有资格说他们做了出色的工作。斯内夫利特对这种评价表示同意。^②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争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其一是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问题；其二是两党关系的性质问题。首先争

^① 斯内夫利特1923年7月21日给廖仲凯的信，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85号。

^② 见《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61页。斯内夫利特发言赞赏湖南支部能拿出自己一半资金这一与其他支部不同的做法。他是根据中共要求苏俄将每月1,000卢布的资助增到1,400卢布这一情况发言的。尽管他提出了批评意见，但对中共提出的所增加的数额至少要在1923年底付给的建议，表示支持。（斯内夫利特1923年7月3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发洛夫的信），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76号。

论的是一月份“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①“一月决议”坚持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要的革命组织。考虑到中国工人运动还很薄弱，还没有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以及中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革命等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协调行动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党员仍需留在国民党内。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治面貌”就随之消失，党应该保留自己的组织，应有一个把权力集中在中央的机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重要的是组织和启发工人群众，创建工会，“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打下基础”。在这种工作中，中共要完全独立地行事，但也不要与国民运动相对抗。另外，中国共产党要设法影响国民党，使它与苏俄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欧、美、日帝国主义。最后，“决议”明确指出，中共绝不可“把自己与国民党完全融合在一起”，一定不要卷起自己的旗帜。

会上就如何正确解释这一决议，以及就陈独秀据此提交大会的提纲展开了争论。②争论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是斯内夫利特和张国焘。③张国焘指责斯内夫利特实际上是通过他的政策来葬送中

① 看来，“五月训令”当时还没有及时传到广东，交付大会讨论。我感谢Y·契瑞埃尔教授向我指出这一点。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把“五月训令”与“一月决议”搞混了。他说他一到广东便看到了一份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的训令，但他所记忆的训令的四个主要问题实际上都是“一月决议”的内容，与“五月训令”无关，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99—300页。另外，从斯内夫利特档案所存的有关讨论情况的记录看，很清楚，会上讨论的是“一月决议”中的各项内容。我在概述和引用“一月决议”时依据的是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21号中所存“一月决议”的文本。它虽然在文字表达上与刊载在尤登和诺特所编文件集（1957年，第343—344页）上的官方发表的译文略有出入，但总体内容是一致的。斯内夫利特档案中的这一文本大概就是瞿秋白译成中文并在这里加以引用的原稿。

② 斯内夫利特在1923年6月20日的信中归纳了陈独秀的“详细提纲”中的主要论点，并指出，这个提纲是根据布哈林起草的决议拟定的，但提纲中还有几点是关于农民问题的。斯内夫利特指出，现时只能争取他们参加国民运动。（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可以断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草案就是由陈独秀的这个提纲形成的。

③ 据张国焘称，争论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开始。张国焘说，由于他与斯内夫利特两人意见截然相反，大会推迟了一个星期，希望双方能够和解。调停无效，便决定将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讨论，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02页。

国共产党，斯内夫利特则批评张国焘“左倾”和幻想中共可以迅速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中国同志中，支持陈独秀提纲的主要是李大钊和瞿秋白。^①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的领导力量，因此他坚持认为共产党人不必惧怕参加国民党的活动。^②瞿秋白则根据中国当前革命的阶段对提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虽然资本家阶级是从封建分子发展而来，但它毕竟已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因素。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大小资产阶级”都会起来革命的。为了把各种不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瞿秋白声称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无产阶级同时也在发展，脱离资产阶级并不能限制它的发展。他认为，国民党已从过去的“无主义”发展成为“有主义”，这种主义符合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去推动国民党，把它从奉行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状态中拯救出来。因为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力量，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就不能发展。如果无产阶级不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就会寻求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助。瞿秋白争辩说，党在国民运动中有充分发展的机会，国民党不应在对共产党不利的情况下发展自己。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将单独进行。因此，瞿秋白得出结论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带领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行列，促使它革命，而不是使它到别处寻求帮助。

张国焘对此表示反对。他争辩说，如果全党党员都参加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就将化为乌有。国共两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只是为了国民革命，两党才应切实加强联系。张国焘尤其反对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或从事工人运动而与国民党无联系的党员

① 张国焘承认陈独秀的作用，但指出，陈对“斯内夫利特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做法也持审慎态度，并且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斯内夫利特的解释作了一些修正。同上，第307页。

② 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讨论记录，载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4号。

参加国民党。^①他还建议只在国民党与群众建立联系的地区支持国民党，而在没有国民党组织存在的北方地区，则可不必要如此。张国焘的建议得到了北京支部的支持，他们认为在北方有自己发展组织的可能性。^②张认为，党需要领导独立的工人运动，并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③在张国焘看来，虽然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但若领导他们参加国民党的工人运动则是不可思议的。^④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唯一可能开展的是反日运动，而不是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运动。^⑤张国焘在发言结尾时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代表大会作出一个“左一点的决定”，声称“左的毛病”总比右的毛病好纠正一些。^⑥张国焘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在莫斯科有一些劲敌反对斯内夫利特，不同意他对国共合作的看法，认为在中国有可能建立群众性的政党。实际上，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张国焘就提出斯内夫利特的观点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同，这使斯内夫利特极为恼火。^⑦张国焘的主要支持者是蔡和森，他强调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蔡和森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国共应该实行合作；二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保持。他指责陈独秀把工人阶级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与决议的精神背道而驰。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孙中山不

① 张国焘建议，如果这些人也加入国民党，则不应在国民党内积极地工作。他声称，否则，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就不会专门规定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这一条。他所提到的这一条是指“一月决议”的第4条，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04页。

② 见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记录，载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5号。

③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④ 在这一点上，张国焘也得到了坚决的支持，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4和3165号。又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05页。

⑤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5和3166号。

⑥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5号。

⑦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06页。斯内夫利特在一次大动肝火的发言中指责张国焘，说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对在北京的“一些同志”讲：“共产国际对马林（斯内夫利特）的工作不满意，将来要发电报召回他”，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仅对军阀，而且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妥协的倾向。他认为国民会议比国民党更具有革命性。蔡和森因此得出结论：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对国民革命的促进，而不是障碍。他看不出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国民运动中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党。^①

张国焘还提到毛泽东也反对陈独秀和斯内夫利特。据张讲，毛泽东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强调国民党的地方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注意全国各地的广大农民群众。^②斯内夫利特也提到毛泽东的反对意见，不过他认为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另有原因。据斯内夫利特的笔记，毛泽东认为，加入国民党无碍大局，但是“在中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推翻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成功以后，中国才可能有国民革命。^③

辩论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斯内夫利特在大会上发了言。^④他在发言中为自己和陈独秀作了辩解，驳斥了说他们企图使党消失的指责。他说，如果有人“相信”他的目的是要“断送党的生命”，那是“愚蠢的”。同样，他也不认为自己犯有崇拜国民党的错误。他感到不悦的是，大会的讨论没有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依据。他认为，讨论本来只应涉及实际问题，而不应发展到在别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如：共产党员是否应当加入国民党；是否应当为“还未完全分化为独立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在斯内夫利特看来，问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两个决议决定的，因此他建议：“大会应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这个命令如张国焘所说，是经过共产国际内部并与一些最重要的

①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5、3066号。

②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08页。毛泽东肯定了工人运动的软弱性，强调大多数工人所关心的还只是改善其物质生活状况，对政治和阶级斗争还不理解。据斯内夫利特称，毛非常厌倦工人组织，并且态度悲观，以致认为只有苏俄介入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办法，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6号。

③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4号。斯内夫利特认为，正是这个推论使得毛泽东和其他湖南的同志在表决时反对陈独秀的提纲，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④ 张国焘坚持说争论持续了一周。有关张对斯内夫利特讲话的评论，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09—310页。下面的记述出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66号中斯内夫利特的讲话文本。

国际运动领导人充分讨论后下达的”。

接着，斯内夫利特又对蔡和森的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和“大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并无重要性”的分析进行了批驳。斯内夫利特指责蔡和森和张国焘无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1月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因此国民党与“年轻的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协调一致的这一规定。斯内夫利特援引共产国际关于工人阶级“还没有分化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的论断，反驳蔡和森提出的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意见。他最后总结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和蔡和森的幻想之间”，他拥护前者。斯内夫利特抨击蔡和森对“大资产阶级”的看法是静止的，而不是能动的，并声称，蔡不会辩证地分析问题”。用斯内夫利特的话说，蔡应该懂得，工人发展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与资产阶级的发展有依存关系。

在斯内夫利特看来，过分强调工人阶级，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潜力。与此相对照，他引用另外一些代表如毛泽东、邓培、王用章等人的说法，强调工人运动的薄弱性。这种薄弱性，加上工人阶级因物质条件而产生的急需，说明“现代工人”最关心的乃是国民运动。

最后，斯内夫利特又批驳了张国焘关于只可能发动反日运动而不可能反对其他在华帝国主义列强运动的观点。斯内夫利特认为，反日是国民运动的明确表现，这不足为奇。但他认为通过较有成效的宣传工作，运动的目标还可以扩大。没有必然的理由限制其他反帝运动的开展。对他的对手作了这一番批驳之后，斯内夫利特又为陈独秀的提纲进行了辩护，指出，这份提纲是对如何同国民党进行合作问题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声称有必要使大多数人赞成这个提纲。

辩论结束之后进行了投票表决。据斯内夫利特记述，反对者由于在辩论中没有获胜，便提出对三个问题的修正建议，其目的

是要使决议丧失其明确性。^①张国焘提到，他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包括三点主要内容的他的建议的修正案，以供表决。^②斯内夫利特坚持说，投票表决的是关于“提纲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曾受到攻击”。^③这很可能与张国焘说的是同一次表决，但我们不能断定，尽管在斯内夫利特当时的信件、报告中只提到过一次投票表决。按张国焘所说，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7名，在陈独秀未投票之前，赞成票与反对票的比例相等，陈独秀以他决定性的一票使自己原先的提议获得了通过。^④据斯内夫利特记述，实际上所有到会代表都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表决，表决结果是陈独秀的意见以21：16的多数票获得通过。^⑤

按张国焘所说，表决之后斯内夫利特仍向他施加压力，声称他所持的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但保留个人意见的态度，意味着他将继续反对这个提纲。^⑥尽管张国焘表示反对，但是大会还是把陈独秀的提纲的内容写进了“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⑦毫不奇怪，张国焘在本来可能获得的40票中仅得到6票，在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中落选。^⑧对比之下，和他持同样反

①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②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10页。这三点是：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从工人群众中发展党组织；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应同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及工会会员紧密配合行动，但不是工人中所有中共党员都得参加国民党；第三、既然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应采取积极鼓励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可是它既不妨碍国民党的工作，也不阻止工人参加国民党。

③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④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10页。但是，“关于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到会者中有19人有投票权，大约10人有发言权，还有来宾和非正式代表10余人，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41页。

⑤ 在16张反对票中，湖南代表占6票，汉口代表占6票，他们有特别委任书，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⑥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10—311页。

⑦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忽略了这个决议，仅仅提到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所以他作出评论说，尽管宣言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也表示希望所有革命力量都聚在国民党周围，但斯内夫利特的“高调”却一点也没有被采纳。

⑧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6号。

对意见的蔡和森却以37票当选。^①

结 局

虽然党的代表大会作出了决议，但是会后这一政策并未立即得到顺利贯彻，主要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尽快迁往上海。这样一来，要同孙中山继续保持必要的密切接触就困难了，^②因此必须尽快与孙中山磋商，把组织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开展起来。可是孙中山对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似乎并不热心，在5、6月间，孙中山专心注意军事局势，特别是东线局势，无暇顾及其他问题。还有，孙中山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取得苏联的援助，而不是该党的改组。

1923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未来的工作。这次会议作出了4项决定：1. 发表一个关于政局的宣言；2. 致函孙中山，请求他放弃军事行动，赴上海召开国民会议；3. 尽快召开工人组织代表大会；4. 指示各地支部，组织工人、学生和商人游行集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③在致孙中山的信里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北京局势捉摸不定，没有总统，没有统一的内阁，会议分裂，这一动荡的局势“为我党（可能指国民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良机”。信中首先呼吁孙中山在上海或广州组织一个坚强的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全体党员的行动，加强广泛的宣传工作。其次指出，国民运动绝不可仿效封建军阀依恃武力去夺权占地，不能用旧的方式和依靠旧社会的力量建立新中国。要把商人、学生、农民和工人团结起来，形成一

^①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8号。

^② 斯内夫利特显然对这个决议很反感，他在一次报告中说，党“宁愿在上海非法活动，也不愿在广州进行合法活动”。斯内夫利特关于1923年6月2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华工作与情况的报告，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81号。张国焘把党中央迁址的决定说成是陈独秀不完全赞同国共合作政策的一个标志，并认为陈对留在广州的想法不高兴，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版，第314页。

^③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8号。

支新的力量。信中认为，力量集中在南方，对国民革命的发展不利，因此要求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在那里召开国民会议。信中说，这样做就会形成一支可以“解决全国问题和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①

我们知道，斯内夫利特对孙中山热中军事行动、轻视宣传工作的做法是不满意的。因此他自然也对孙中山对北方局势的反应感到不快。在7月15日的报告中，斯内夫利特对国民党置历史转机于不顾、坐失开展宣传工作大好时机这一事实提出了批评。斯内夫利特还多次试图改变孙中山的态度，但均没有取得成功。孙中山显然认为一切进行顺利，党没有必要介入。斯内夫利特所坚持的党的作用的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人中也未得到普遍赞同，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就曾对斯内夫利特说：“总强调党的作用不是中国人的做法。”^②

《向导》周报的几位编辑在斯内夫利特的促使下，在中央迁往上海前同孙中山讨论了他的计划。这次会谈结果更加深了斯内夫利特对孙中山的看法。除其他问题外，孙中山认为国民会议不可能召开，他说，一旦商人阶层理解了他的想法，他们会支持他的。孙中山再次强调军务重于党的发展，重申在东北和西北发展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这样做，革命才会取得胜利。党员不必干涉国民会议运动，他们只需以个人身份参加反日运动。听了孙中山这些想法，斯内夫利特觉得再也不要指望孙中山会主动地把国民党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中共中央也因此改变了在北方通过新建立的地方组织促进国民党向现代政党转变的战略。^③

虽然斯内夫利特使别人接受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但他也开始面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采纳了他的政策，可是也因此造成了党内严重的分歧。很显然，并不是人人都积极地贯彻这一政策。斯内夫利特因孙中山的态度而灰心丧气，而且担心在国民

^① 见斯内夫利特1923年6月25日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的信，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9号。

^② 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81号。

^③ 同上。

党尚未改组成为拥有共产党为其左翼的革命群众性政党的情况下，苏俄提供军事援助会产生不良后果。另外，莫斯科也有反对国共合作政策的劲敌，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更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对斯内夫利特更为不利的是，在1923年5月至7月间，他与他在中国的保护人越飞发生了齟齬，其原因不完全是政治问题，还有越飞对斯内夫利特就其个人的事和经费问题无休止的抱怨，并通过正式途径发泄这种不满感到恼怒的因素在内。斯内夫利特虽然在许多信中一再表示，他希望等到1923年7—8月份来华工作一年期满时才离开中国，但他又似乎愿意作为领事继续留驻广州。后面这个消息是越飞在北京的下属达夫谦误传给他的，因此越飞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越飞能够委派给他的工作只不过是作为华俄通信社（罗斯塔）的一名代表，以掩护他的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内夫利特认为这个职务有失他的身份。由于同拉狄克不和，以及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持有不同见解，斯内夫利特可能感到自己在共产国际担任这类工作前途渺茫。越飞在两封电报中很生气地谈到：“请允许我以一个老同志的身份坦率地说，您最近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好同志绝对不能接受的。您在接到指示后仍然不断地强调个人问题。”在第二封电报中更有一些有伤感情的话，越飞说，领事的职务与共产国际的工作目标难以结合起来，并说，“不能设想您可以做个好领事，因为这项工作需有更重要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您并没有”。^①

就这样，斯内夫利特回到苏联，再次商讨对华政策。然而这一次他发现几乎无人洗耳恭听了。以后，他与维经斯基和片山潜一起被派往共产国际符拉迪沃斯托克局工作，这意味着他在共产国际的生涯快到尽头了。在莫斯科呆了一段时间之后，1924年初，他返回荷兰。接替他在中国实施这种政策的是鲍罗庭。鲍罗庭是苏俄党和国家的代表，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刘延国 译 林海 李玉贞 校

^① 这些电报存于斯内夫利特的笔记本中，见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04号。

魏德迈在华回忆录(续)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意见

我于1946年5月抵达美国，向陆军医院提出做外科手术，然后在等待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同时，被指派在陆军部担任临时工作。7月初，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要我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马歇尔将军给总统的电报。电报说，关于任命魏德迈为驻华大使的消息已经泄漏，使他在与共产党的微妙谈判中相当为难。他们抗议对我的任命，理由是我在他们与国民党之间不会持公正态度，因为我在战争年代与委员长交往甚密，还因为我在战后立即采取果断步骤，保证将国民党军队运送至华北关键地区。

迪安·艾奇逊说，他很抱歉，但任命我为大使一事必须取消。我回答说，原先我并未想做大使，同意接受这一任命只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紧急要求。但是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想法：共产党有权决定美国政府内部任命谁担任这一职务。我还请他注意一件小事，即我已花了800美元制作了执行大使职务的文官服装。艾奇逊并未注意主要问题——以取消我的大使任命来表明对中共令人无法容忍的姑息——而是急忙向我保证，我的花费会得到补偿！

得知我是中共不受欢迎的人之后，陆军部接到通知，给我另行分配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我接替托马斯·汉迪将军，他正要被派往德国。汉迪表示要在他的办公室为我放一张办公桌，并建议我立即开始工作。我告诉他，参谋长本人未向我讲具体任务，但已表示了他的意图，要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我还

说，我被弄糊涂了，也疲倦了，想暂时离开华盛顿，彻底思考一番。汉迪回答说，从海外回国的高级指挥官均已给了一两个月假期，并建议我去佛罗里达好好休息一下。我告诉他，并不是因为我身体疲倦，我宁愿在某个地方繁忙地工作，但不在华盛顿。实际上我所想的是寻求繁重的工作，以麻醉自己，好使我减轻对美国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所遵循的政策之忧和焦虑，我担心这种政策将是灾难性的。汉迪说，有两个军可供我选择，即第二军和第六军。如果我愿意，可以立即去指挥第二军，因为辛普森将军就要退休。或者等到春天，去指挥第六军，那时史迪威将军即可退休。我选择立即去第二军，并被任命，该军司令部设在巴尔的摩。后来我才明白，汉迪敦促我休假是对的，我在佛罗里达州美丽的萨尼伯尔岛上度过了六个星期。

尽管我极想离开华盛顿，去指挥军队，将政策问题留给政治家们去处理，但我和我的国家的关心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极度忧虑迫使我作出另一种努力，指出马歇尔将军先是作为驻华特使后来又作为国务卿所循方针的危险性。

离开华盛顿去指挥驻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第二军时，我应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的要求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加深了我与我尊敬的上级马歇尔将军之间的裂痕，我怕他因我反对他的对华政策而永远不会原谅我。

我写道，马歇尔将军曾“试图使中国问题求得迅速解决”。现在他是悲观的。有些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可能认为，中国复兴之道在于：首先让旧秩序遭到破坏，然后新的较好的秩序就会产生。我指出，这是马克思的学说，在苏联已经应用过。与美国利益和整个自由世界利益相一致的较好解决办法是：承认中国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将处于动乱之中；苏联共产主义将是“进入因国民党政府崩溃而出现的真空的那种力量”；因此美国“别无他法，只能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

为了向马歇将军和他当时代表的强大政治势力挑战，我在备

忘录中写道：

问题是马歇尔是否明白围绕巴黎和平会议所产生的微妙局势，是否明白目前使我国政治策略和政治关系保持十分稳定的必要性。

问题是马歇尔国务卿完全了解，当今世界局势牵连的一切问题在涉及苏联和要害地区中国（不论是好是坏）时，都要保持某种世界均势。遗憾的是马歇尔将军并未利用对俄国状况明白而有力的研究成果，这是应杜鲁门总统的要求而准备的。

我知道，总统曾要求对我国与俄国的关系进行彻底的分析，并要求提出建议。我们所有军事方面的研究都得出结论：对美国利益极端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中国——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如果可能的话。现在唯一被五角大楼看到的是一个俄国控制下的中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处（G-2）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中共与莫斯科有直接联系。我写道：“陆军部档案中有正式文件表明，几天以前总统还确信美国必须将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作为它的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马歇尔将军有关中国问题的声明被美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余大部分人奉为经典。因此当他说“中国有内战而且将继续下去”时，就存在着美国决定撒手不管中国的严重危险。我以下述一段话结束了阐明我的观点的书面声明：

目前能够采取的唯一有效行动，是向马歇尔将军表明，以暗示或明示的办法提出我国对华政策（有内战或无内战）可能改变的提议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目前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抑制自己，不要谈美国的态度。而且他也不应暗示承认共产党（这一点他在许多讲话中尚未做）。最后，如果

马歇尔将军还未得到关于世界形势和俄国情况的指示，他就应当接到一封总统概述问题的严重性的电报。

我对马歇尔将军的这种建议感到愤慨：取消我驻华大使的任命是因为共产党反对。不过我相信，或者想相信，一旦得到正确的情报，他就会理解中国局势的现实及其对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的含意，这种斗争后来被称之为“冷战”。

无论在这时（1947年）还是以后，我都未怀疑过马歇尔将军的动机。我极不同意麦卡锡参议员的企图：将他描绘成有意与叛徒相联系，或把他说是颠覆分子和在我国政府中的中共同情分子的工具。今天，也如在战争年代我在他手下工作并帮助他为战争胜利制定计划时一样，我相信他是忠于自己的国家的。但我也明白，在他负责美国对华政策时，他年迈了，而且由于作为参谋长为获得胜利而作的极度努力，他已精疲力尽了。

他曾经受到许多各式各样的人的经常指责，这些人只注重自身利益，或者只注重他们所代表的其他国家的自私利益或意识形态，而指责他置美国的长远利益于不顾。他不断受到英国人的干扰，他们以“在外围吹毛求疵”的办法破坏美国的战略。他既没有时间，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研究共产主义的斗争方法；他绝对相信他的故交史迪威将军的报告，后者将中国的一切灾祸统统归咎于蒋介石政府。马歇尔还得与罗斯福总统的异想天开相抗争，在罗斯福第4届任期内，即使在健康衰退以前，也已被阴谋分子和对共产主义温情的知识分子所包围，这些人受总统夫人的庇护，总统所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等人又给了他们以别人难于对付的权力。

马歇尔将军本是一位军人，对世界性冲突的复杂性知之不多，又不懂共产党人用以歪曲人们对社会主义伟大而高尚的渴望之情来支持他们自己罪恶目的的那种手段。而且在到中国执行他不幸的使命时，马歇尔将军已身心交瘁，无法正确估计形势了。

最后，尽管我不愿承认（因为我敬重马歇尔将军胜过任何人），他还是避免不了登上权力或势力顶峰的大多数人一再犯的那种恶习。

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所有权力都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马歇尔将军从未获得过绝对权力，但在战争结束时他的声望很高，因而他的政治影响也极大，致使他认为自己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他就成了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或同情共产党的谄媚者的牺牲品，他们利用他的虚荣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否则他就决不会相信，他能调和国民党与莫斯科支持的中共的根本对立的目的，而将油和水溶合在一起。

1946年11月18日，我在国立军事学院发表了一次演说，在认真概述我在中国战区的经验之后，我说：

这些经验告诉我，中国的局势是能够得到迅速改善的。所取得的巨大收获和1945年得到的教训都已为时过晚，对于测定最后胜利的时间起不了很大作用。但是人们不能不考虑，本来可以用来在太平洋地区与我军对抗的150万日本人被扣留在中国。我们知道，委员长及其同僚能够，也愿意合作。他们能够，也确实改善了他们的军队和人民的生活。当他们受益于美国友好而实际的忠告时，他们就会有迅速的进步。

为与马歇尔将军和国务院的政策进行辩论，我继续说，依我之见，“如果委员长有了美国的实际援助——不以它的大小来衡量，而以它所提供和运用的智慧来衡量”，他就能够在统一中国和他的政府立宪化方面取得进展。

我说，中国的复杂性是由全面规模的、互相谩骂的和不时发生战斗的内战复合而成的。我继续说：“有人告诉我们，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府是极权主义的、腐败的、压迫人民的，而中共在

农业经济和政治机构方面都是民主的。”我承认这类报告有其真实的因素，但它们并未勾画出亚洲局势的真正图景。

在我们当时在中国的人看来，日本投降时，中国显然要面对许多严重而紧迫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在8年战争和日本占领期间遭受过可怕的蹂躏，它的经济已经混乱，而且还因为有“25年前即已开始的根深蒂固的内部问题，互相间的刻骨仇恨和政治诬蔑”。

为与马歇尔将军对中国局势的分析进行辩论，我继续说：

经常要问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卡尔·马克思学说的真正信徒？卡尔·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在解释和应用上已经历过多次改变，连列宁和斯大林也这样做过。在苏俄之外，人们发现，声称忠于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的个人、集团和政党，在机变地实施共产主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人们必须注意基本学说，而不为局部地区的或转瞬即逝的应用所迷误。中共领袖们自己直言不讳地声称，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只有处在与当代共产主义的联系之中才有意义。我肯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始终遵循着莫斯科的路线。人们只要读一下中共的党章，就会证实，中共在基本哲学和基本目的方面与它的世界各国兄弟党相比，差别非常之小，如果有差别的话。在运用上有显著的不同，但在最终目标上肯定没有真正的差别。我曾同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交谈过，尤其是周恩来，因为他会讲英语。他们首先忠于斯大林和他的纲领，其次是忠于自己同胞的利益。

作为我的论点的证据，我指出下述事实：1941年6月22日以前，当纳粹进攻苏俄时，中共强烈谴责了英国所作的战争努力。后来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象我们的美共及其同路人一样。尽管有1945年8月1日宋子文与莫洛托夫签订的协定，根据协

定莫斯科只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但苏俄仍一贯与中共合作。这是普通常识。战争结束后委员长重新部署他的军队时，俄国人甚至不让中国使用大连港（该港规定为开放港口）。由于这一切和其他许多原因，我说：“我完全反对这种意见：中共不是与莫斯科秘密合作的真正的共产党。”

我告诉我的国立军事学院的听众，尽管我是一个军人，我的主要努力是在我所在的战区致力于对日作战，但不可能使自己完全脱离政治和经济问题。作为委员长的参谋长，我接触过各个方面的情报，我的任务要求我了解这块大地的宽度和广度。

我接触过中国各阶层人士，曾与共产党人、国民党员、民主同盟的信徒、农民、商人和学者讨论过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在分析中国战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时，我竭力使自己客观，不动感情。根据我的经验，我真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徒，他们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为此，他们可以采取能提供最好胜利前景的任何手段。”

我补充说，中共“并不马上强调要应用苏联的经济制度”，因为他们最近的目标是“夺取政治上的控制权”。因此他们暂时“毫不犹豫地使用某些民主方法，以促进他们的最终目的的实现”。

我在这次演说中指出，尽管中国国民党政府经常被断然描绘成独裁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政府，但与它的共产党仇敌之间有个根本的区别，因为国民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立宪共和国，而共党要建立的则是苏联模式的极权专政。在我与蒋介石的两年密切接触中，我确信，他本人是一位率直而无私的领袖，十分关心人民的幸福，希望按孙中山的设想建立一个立宪政府。只要中国首先要对日作战，然后又要与苏俄支持的中共作战，这显然就是不可能的。后来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我说：“单独一个人是无法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的。”“我只能向你们保证，委员长是诚挚的，我从未发现他玩弄诡计或花招。他对我总是很坦率的。”

在我看来，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他对朋友和老部下的忠实。在他的顾问圈子里，有一些肆无忌惮的无能之辈。如果他不接受劝告将这些人撤掉，很难设想中国局势会如何发展。我本人曾向他指出，他的许多官员非常无能或不忠实，只要保留他们，他为人民制定的好计划就永远无法实现。因为他的这伙官员阻挠他接触中国许多最爱国、最有能力的人，并赢得他们的拥护。我承认，蒋在政治上是精明的，见解合乎道理，有魄力。然而在我看来，他也被儒家哲学压得透不过气来，这种哲学要求人们对家庭和朋友忠诚。由于拒绝抛弃他周围的那些宗派集团，他已和中国最优秀、最有能力的人疏远了。

依我看，委员长还因“惊人地缺乏行政官员和技术专家”而障碍重重。中国人80%是农民，甚至很难估计文盲所达到的程度。中国有一个由极富有的中国人构成的空壳，一个很小的脑力劳动者阶层，一个小中产阶级，而大量的人在赤贫和愚昧中生活。中国政府为竭力使中国摆脱长期贫困、实现统一、促进进步而面临的一切困难，都被残酷的破坏性的8年对日作战、尔后又被共产党的劫掠和破坏大大加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实行改革，使政府民主化，无异于告诉一个处于12级飓风中的人，说他应当修理装饰他的屋顶。

在我演说后的提问中，我指出，中国改革的进程必然是缓慢的，并说：

我们美国人性急，效率高。英国人也一样。我们看见目标就想达到。我们不能容忍拖延和绕圈子。我经常确定我要达到的目标，并向委员长提出这些目标，但出现的是令人沮丧的拖延。我不得不不断地控制自己。在中国，生活的节奏和方法并不打算急剧而迅速地改变。大家都熟悉欧洲的历史。你们知道，制定和实施“权利法案”并建立立宪政府，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在中国，这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从封

建的或中世纪的状态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完成的程度和前进的速度要受中国国内外那些无法估计、无法捉摸和无法预言的势力的影响。

一个学员问，如何才能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局势的实情。我回答说，共产党有一种令人无法思议的宣传系统，而且在世界各地有一批训练有素、大事张扬的人宣传他们的事业，而委员长在传播消息和宣传方面则组织得非常薄弱。我告诉我的听众，我回到美国后在阅读报刊杂志和社论时，对于我所认为的对中国和共产主义的歪曲报道留有深刻的印象。我认为，美国人民所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而且经常是被歪曲的。

我说，我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与我们在欧洲的利害关系同样重要，而且有基本相似的正当理由。“在我们的利益和我们在欧洲介入的背后所存在的基本相同的宗旨，都与远东有关。”

约在12年前，我还提醒我的国立军事学院的听众，在决定对委员长及其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或轻率地忽略这一事实：战争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优惠媾和条件。倘若接受了这些条件，那么日本就会腾出大约150万军队，用来在菲律宾、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斯群岛和琉球与美国作战。委员长坚强不屈地拒绝媾和，忠诚不渝地对待与盟国共同作战的保证，“挽救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对我们的最后胜利自然是一种贡献”。

我在结束演说时说，既然美国在中国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从而保证我们自己在华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我们就应当采取适当的步骤，包括……

……部署军队，保证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企图干涉我们实现自己的目的。

对远东当前局势的现实态度要求我们立即并继续支持

委员长及其政府。我们应当继续以贷款和供应物资的办法进行经济援助，并伴之以保证措施，以确保这种援助用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大家全都会犯错误。伟大而谦恭的人承认错误，并谋求改正，他们知道，正如孔子所说：“过则不惮改。”

我依然尊重马歇尔将军，认为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伟大人物，只要他承认他在中国的基本错误，即相信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只不过是在中国争夺权力的两派，因此他在1946—1947年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以此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便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从未否定过他竭力迫使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让步的错误政策。1947年1月离华任国务卿时，他谴责了国民党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反动集团”，说他们反对他“为促成真正的联合政府而作的一切努力”。在1947年1月的公开声明中，当马歇尔将军把这些中国人描绘成反动派，说他们“在公开声明自己的信念时迅速而坦率地声称中共在政府中合作不可思议，只有武力政策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进一步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是缺乏了解的。

马歇尔将军总的来说似乎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和目的，尤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目的。他在1947年1月的声明中承认有些“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破坏中国的经济，以利于他们推翻国民党政府。然而，尽管有一切相反的证据，他还是继续坚持说：“在共产党人中有一个自由派，他们将中国人民的利益置于在最近的将来以无情的手段建立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一行动之上”。

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和平”来临时，国民政府的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必须拨出越来越多的款项，修复铁路、矿山和工业，军费则膨胀到从未有过的大比例。因此，陷入混乱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腐败，以及信心的总的下降，都比长期的抗日时期严重得多。当时总还抱有希望。但现在美国似乎变成了敌人

即共产主义的朋友，或者说至少是拒绝支持中国的反共势力。

我们坚持蒋介石既要实行民主、改革，又要与共产党合作。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但又拒不给国民党政府以物质上、政治上的援助和支持，没有这些，它就无法粉碎共产党。

我们敦促国民党实行的改革，即使在和平时期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也难于行，在内战中更是完全不可能，这场内战实际上是一场中俄之间的战争。

中国的真正需要在于有一个有权力进行统治的政府。在我看来，中国最大的不幸——腐败、管理不善、无效率等等——不是由于它的政府的独裁性质，而是因为政府缺乏权力和权威，使它有令必行。而蒋介石，由于他始终被无穷的战争和为避免中国分裂而保留忠心干部的这种需要束缚着手脚，未能彻底整顿他的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虽不是整个来说）是可以原谅的。把蒋介石叫做法西斯独裁者，就象在美国的叫法一样，是对实情的可笑的颠倒，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会使美国的政策建立在虚假的前提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决不是极权主义的，而是非常有限的。它对个人的干预太少，而不是太多。使它最终垮台的是无作为罪，而不是违法罪。它的最大的缺陷是行政上的无效率，以及因此而未能实行改革，这种改革在官方文件中写得非常漂亮，而且已经颁布。

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对1776年以前的历史知之不多，又从不到国外旅行，以便对人类的大部分——尤其是亚洲——的状况有一个了解，所以如果他们到了中国，自然会把赤贫、悲惨状况和管理不善都归咎于国民党政府。

正如我的总部教育处的一位干练而富于洞察力的军官林顿上校1945年在《星条旗》上所说：

这几乎是悲剧性的：美国士兵有眼不看，有耳不听，有

头脑不理解。他们看到了贫困、污秽，看到人们如负重的牲畜，但不理解所有这一切如何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历史的固有性质，这个国家正在苦斗，要摆脱手工业时代，出现在现代技术的时代。他们听到了一种异国语言，但不去听一个民族歌唱它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中国是异样的，与他们所知道的生活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也象我们自己和所有一切国家一样，今天必须从它原来的地方起步。

马歇尔将军1947年1月离华就任国务卿时，就不再管倾向西方的国民党与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了，似乎此事与我们无关，我对此感到吃惊。此后，作为国务卿，他曾建议给希腊4亿美元，以阻止共产党夺取政权，而对我们的中国盟友，则继续拒不给予军事的或经济的援助，除非蒋介石同意容纳共产党。这时他似乎不再欣赏他的政策的模棱两可了。

直到1948年3月10日，他还对下述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杜鲁门总统1945年12月15日要求将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否仍是我国的政策。杜鲁门总统1948年3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中国政府容纳中共的提问时则说，他于1945年12月15日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作为美国援助和支持的绝对必要条件，“依然成立”。

不过这里应当注意，杜鲁门总统想左右逢源，但由于他那个“只要我们有办法，就不要共产党人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进入政府”的自相矛盾的声明，结果使问题比以前更加混乱。

尽管我力图重返军队，避开政治，但当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4月正式重申他3月11日的声明（该声明再次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以此来回答蒋介石要求发表坚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进攻的声明的紧急呼吁时，我就不禁要为中国表示极度的沮丧和同情了。

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杜鲁门总统说他的声明已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时，蒋介石和一切反共人士（不管赞同还是反对委员长）一定都处在绝望之中。

对于这类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声明再也无法有什么要求，这一点大致是清楚了。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意味着这种结论：或者美国政府不知道它的政策为何物，或者它依然赞成中国屈服于莫斯科，而又向美国公众隐瞒事实真相。

所允诺的援助，国会已于1948年4月通过，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的信中也提到过，但未运到。美国政府拖延向中国装运军火，直到那些危急的年代结束，从而挫败了援华法案所要达到的意图。

我也象其他人一样，犯过许多错误，在我于1946年11月18日在国立军事学院发表演说之后的那一年，我准备犯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接受了一项任务，有一切理由相信（我被允许写给我自己下达的命令）这会提供一个机会，使我能协助制定美国对华和对整个远东的现实主义政策。我的幻灭经历将在下一章里讲。然而如果不是自负和虚荣，我或许会得到许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情况比我的同时代人看得清楚一点，并以此得到补偿；他们都缺乏我在欧洲和亚洲认识共产主义真相所具备的优势。

我在国立军事学院演讲时，有人问我，我是否相信，在美国势力从亚洲大陆撤走以后，中国或朝鲜有能力抵抗俄国的人侵，我回答说：

肯定没有。我不认为没有与俄国相匹敌的外部力量的援助，与苏俄邻近的任何势力、任何地区或任何政治组织能够抵抗俄国的侵略、渗透或侵袭。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我说：

国民党政府有能力立即将共产党击败、打垮。它的军队的大部分装备都是美国的。如果我们不继续向它出售弹药，使他们保持和运用这种装备，他们就会在军事战役中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外，这还要视中共军队从外部接受援助的情况而定，而这就非常非常朦胧不清了。

我的听众自然知道，是马歇尔将军4个月以前对中国禁运了一切武器弹药，直到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妥协为止。

我知道在这次演说中所发表的观点与马歇尔将军的观点相反，因此我明白，我越过的如果不是鲁比肯河^①，也是它的一条支流。我安下心来在米德堡执行我的任务，相信我射出的这支箭将排除未来对我在外交上的任命。不过事情尚未结束。

我最后一次赴华使命

1947年春，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派我到英国伦敦帝国国防学院、坎伯里参谋学院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去讲学。按他的想法，已故的克利夫·罗斯福慷慨地提供了一笔基金，供美英军队间交换讲学之用。我在英国讲学时，英国的赫尔中将正在华盛顿国立军事学院、利文沃思堡总参学院和西点军事学院讲学。

在伦敦，我看望过美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拜访过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英国同事。在我准备回国时，接到马歇尔国务卿通过道格拉斯大使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他要发电报发到米德堡时才得知我在欧洲，他建议我访问几个欧洲国家，回国后写一个报告给他。我去了几个国家，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我看到许多我的德国军事学院同学的遗孀，包括弗劳·尼娜·冯·施陶芬贝格和弗劳·马德·弗赖塔格·洛林霍文。在她们的丈夫

^① 位于意大利北部，公元前49年恺撒曾越过这条河与罗马执政官庞培决战。
——译者

因与流产的谋杀希特勒的企图有共谋关系而被处死以后，她们都曾在纳粹监狱里蹲过几个月。我还看望过以前德国的贡特尔·洛曼将军和他的妻子马利亚，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躲藏起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1947年7月的第一周，我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并将我在欧洲之行的见闻向马歇尔将军作了简要的梗概说明。于是他问我是否愿意去中国出任大使，并说明司徒雷登健康状况不佳，因此不够得力。

我提醒马歇尔将军注意一年前他所提出的要求，当时我接受了这一职务，后来又取消了任命，原因是对共产党人来说我是不受欢迎的人。马歇尔将军对于容许共产党人否决对我的任命一事丝毫未表示困恼，也未表示遗憾，他大笑，并说他或许也是不受他们欢迎的人。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宁愿留在军队里。

然后马歇尔告诉我，他一直在与总统和其他内阁成员商讨远东局势，已决定对中国和朝鲜局势作一客观调查，以此作为未来政策的基础。他要我负起这一使命，并向我保证，这只是一项临时任务，时间不超过两三个月。

我问马歇尔，他希望我揭示的国务院和陆军部报告中尚未得到、使馆人员无法得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于是马歇尔承认，有来自国会（国会议员沃尔特·贾德，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等人）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他们指责政府对华采取消极政策，这迫使我们重新估价美国的政策。

我在陆军部与他的一切接触中（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旅途中，在从迈耶堡营房步行到我们五角大楼办公室的路上，以及在中国，当时他是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他似乎总是心事重重。总有某种神秘的、看不见但又经常出现的东西使他陷入沉思。

现在我想了解他提出让我去中国的目的。我对他的正直，对他忠于原则忠于朋友所抱的信心已经动摇，不过并未因他在调查

珍珠港事件的陆军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而遭到毁坏，也未因1945年他在上海对我的警告所作的恼怒反应而破灭，当时我警告说，在中国搞联合政府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我对我以前的这位上级依然非常敬重，这使我很快就相信，他终于明白了政府有关远东政策的设想的谬误，现在在谋求改正。我还这样问自己：除非政策有急剧改变，与我以前被拒绝的建议相一致，否则为何要选我担当这一使命？或许现在我们要现实而坚定地对付那些共产主义的信徒吧！

当马歇尔告诉我，我可以给自己写赴华使命的指示时，我确信了我的这一想法。我同意赴华，认为我被任命不单单是要对我们的对华政策摆出一付表面上的“新面目”，而是要提供根据，实行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在很久以后，在我的报告被压而未呈交总统之后，我才开始明白，选择我是为了缓解国会和国内的疑虑，并为继续执行灾难性的老对华政策提供辩解的理由。

当我坐下来在马歇尔将军国务院办公桌上起草给我的指示时，他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在门口他又转身对我说，他要把给我大使衔的事告诉总统。我告诉他，没有必要。他坚持说这对提高我的威望有重要意义。我回答说，我认为中国人敬重我，我在远东进入任何圈子都不困难，不管头衔如何。

由于马歇尔将军说任务紧急，我遂返回我在巴尔的摩的第二军司令部，准备及早赴华。次日，我再次与马歇尔交换意见，他告诉我，据他看，我所起草的指示不错，不过他已交给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建议我去见文森特，讨论我所起草的指示。

在我的草稿中，我精心排除了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撮合在一起的任何建议，而且在与文森特及其他国务院代表讨论我所起草的指示时，我决心不接受实质性的更改。我和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讨论时并未遇到麻烦，他们只提了一些词句上的更改，未变动指示的基本思想。我就按照杜鲁门总统的最后措词并签署

的文件，对中国和朝鲜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当前的和设想的——进行估计。

给我的指示的全文见本书附录5。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给我的指示是：我必须在报告我的“实地调查任务”时，“对于我所提出的援助的性质、范围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如果不给援助可能产生的后果”，尽可能加以简要的叙述。

由于我未忘记我在1944—1946年在上海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所受的折磨，我请马歇尔将军允许我选一个人帮我与公众联系，特别是使我能应付新闻记者。因此，《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部的一位杰出的编辑、普利策奖金获得者马克·沃森被邀与我同行。事实证明，他是我此行中可贵而忠诚的成员。我的随行人员中还有政治、财政、经济和工程方面的专家，他们以顾问身份进行工作。

1947年7月我们一行到达南京时，中美官员，包括司徒雷登大使，都来迎接。在我检阅仪仗队并向老朋友致意之后，司徒雷登大使坚持要我陪他去他的官邸。一位中国官员事先通知我，委员长已为我安排了住处，并有仆人供我使用。我倒希望与我的随行人员住在一起，好共同商讨我们的计划。最后，还是司徒雷登大使好意劝我与他同住，他还为我的行政官员C·E·哈钦上校、我的副官J·J·博伊尔上尉和我依然信任的前翻译霍勒斯·恩格上尉提供了膳宿。

在我们乘车前往大使馆时，大使解释说，他那里有各种设备和办事的帮手等等，可以为我提供方便。他还列举了他为便利我的实地调查任务而作的各种准备，包括报道中国局势的使馆人员所提供的报告。大使家里非常宽敞、舒适，但这无法缓解令人窒息的湿热，这种湿热在当时就象是华中上空罩着一个天蓬。

我询问中共和苏共对我的到达有何反应。他们告诉我，莫斯科把我的赴华、赴朝使命看作是美国对远东政策的转折点。这种态度证实了我在1945年的想法：克里姆林宫从未指望美国会让他们实现首先接管满洲、最后赤化中国的阴谋，否则他们就不会在

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立即运走或破坏满洲的工业设备。

有人告诉我，共产党人认为我的到达是美国准备一场新战争计划这一重要决定的结果。他们得出结论：我的使命是打算为这一目的准备条件，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全面合作。其次，他们推测我是在查明美援应取何种形式。如今莫斯科确信，在当前形势下，如无美国的重要援助，国民党中国无论如何也无法生存。所有的苏联代表都得到指示，要密切注意我的动向、行动和我所进行的接触。在上海的许多苏联官员表示，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在未来的半年中将发展成为一场美苏之间为控制中国而进行的斗争，并有可能变成公开的冲突。中共散布消息，支持这种观点，并私下暗示，他们预计整个远东局势的发展将非常严重，因为(1)魏德迈使华；(2)业已安排蒙哥马利陆军元帅访日；(3)西方各国报纸反复指责苏联实行对华侵略政策。

当时为我提供消息的人极为准确地推断了从个别苏联代表那里得到的某些情报，例如塔斯社驻上海的官方记者雅克·沙明就曾说过，魏德迈将军长期以来就以具有强烈的反苏倾向而闻名，并被苏联官员视为反动派。一年前考虑任命他为驻华大使时，苏联报纸和苏联官员即已告知华盛顿，这一任命被认为是在华执行反苏政策的表示。雅克·沙明还说，司徒雷登大使的任命宣布时，苏联大大减除了忧虑。既然华盛顿赞成委派魏德迈将军担负赴华、赴朝使命，苏联官员自然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向在中国和整个远东执行强烈反苏政策的方向转变。他们预料，美国将开始给蒋介石委员长以非正式的军事支持。雅克·沙明补充说，魏德迈赴华使命是上海苏联人士的主要话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我此行的反应，进一步表现在中共广播的下述引文中：

陕北广播

1947年7月16日

美帝国主义者希望委派臭名昭著的魏德迈返华，放手侵略中国，并支撑蒋介石摇摇欲坠的统治。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者那位在普鲁士受过军国主义教育的魏德迈是太熟悉了。他的在华记录如下：

日寇投降后，他急忙派遣美军占领人民解放军（中共军队）所包围的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同时命令日伪军把守这些城市，拒绝向人民军队投降。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最强大的空运，将蒋介石的6个军空运到上海、南京、北平、青岛和天津。后来他又经美军占领的秦皇岛将蒋介石的5个军海运到东北打内战。在东北，义勇军积极活动已长达14年之久，而这块领土早已为蒋介石所放弃。

在这些罪恶活动——帮助独裁者蒋介石和反对中国人民——之后，艾尔弗雷德·魏德迈的名字已象帕特里克·赫尔利一样可憎了。在马歇尔要以“中立的调停者”出现时，他别无他法，只能将魏德迈送回美国。

现在美帝国主义者杜鲁门和马歇尔看到，蒋介石处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们早已把“中立”的假面具扔进了垃圾堆，现在又放手将臭名昭著的魏德迈派回中国，并支撑蒋介石行将垮台的统治。所有这一切表明，现在美帝国主义十分恐慌，需要采取野蛮的、公开的和直接的手段在中国进行干预，正象在希腊一样。

中国人民象希腊人民一样勇敢、坚决，而力量超过希腊人民许多倍。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定能赶走美帝国主义。

我自然未把我的观察、会谈和讨论局限于南京，而是在华北、华东和华南作了广泛的旅行，访问了满洲的沈阳，还有北平、天津、福摩萨、上海和广州。我在每一个地方都研讨局势、

摸清大批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美国人所持的观点。我既同政府官员和军事领导人，也同持各种政见的人磋商。在几周的旅行之后，我到达南京，准备回国，并开始起草报告。

委员长要我给他的军政官员讲一次话，向他们讲述我的观察所得、印象和意见。他极力主张我开诚布公，即便讲了我认为应在非正式的秘密谈话中讲的，也不要不在乎。我对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是否明智有严重的疑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疑虑是非常正当的。但司徒雷登大使坚持要我接受这次讲演，说：“你的讲话或许会有很大好处，再没有其他入——中国人和外国人——能作这种宝贵的贡献了。”他说，我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们会把我的批评视为朋友的批评而加以接受。

在我最后答应发表讲话时，我是受下述考虑的影响的：我已决定建议杜鲁门总统立即给中国以援助，包括军事的、物资的、道义的支持。我对劝说我的政府采取必要步骤，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稳固的政治和稳定的经济，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散，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我也十分明白，只有美国得到保证，我们的援助才能积极有效地使用，这一切才有可能。

我已经发现了弊政、腐化和懒散的证据。我知道得很清楚，在我国政府和新闻界里，有一股反对中国国民党人尤其是委员长的强大力量。我也明白，中共在美国的朋友的影响也不可轻视。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必须说服美国政府各界和公众，我对中国局势的观察是全面而清楚的，既未受我个人对委员长敬重之意的影响，也未受我对中国人民钟爱之情的影响。

一方面，我必须表明，我主要关心的是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我必须竭力说服国民党政府，如不实行某些实质性的改革，就不可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从共产党手中挽救中国。一句话，我负有双重任务：说服中国人，使他们拿出证据，证明美国的援助不会白费；说服华盛顿，使他们相信这种援助必须给予。如果我知道《魏德迈报告》会被国务卿扣压，我就决不会在南京

发表讲话，因为这两个目的是互相依存的。

在对与会的中国最重要的官员讲话时，我的开场白是，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是应委员长的强烈要求，我不是以美国总统的使节，而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讲话。我还说，我是勉强给他们讲话的，要将我所看到的实情告诉他们。我希望我的讲话不致伤害他们的感情，而能被他们以他们所向往的积极的精神加以接受。然后我开始描绘我所看到的情况，并列举事例，说明引起我注意的弊政和腐败现象。

在我诚挚地叙述我所发现的体制上的缺陷、官员们的缺点，以及效能低下和不称职时，会场上寂静无声。

在我讲话结束时，委员长、蒋夫人和几位官员与我热情握手，对我表示感谢。

与司徒雷登同车回我的寓所时，他赞美我，并向我保证，我所说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感情，据他所知，别人谁也无法如此令人信服地说出自己的见闻，又有如此有益的效果。我依然有疑虑，但我希望我坦率的揭露能使委员长坚决采取激进步骤，消除腐败现象，使弊政得以纠正。

我后来得知，出席会议的一位资格很老、很受尊敬的行政院官员哭了。问他为何痛哭，是否魏德迈将军使他不舒服时，他回答说：“我确信魏德迈将军是中国的朋友，他讲的都是实情。这就是我哭的原因。”

回到华盛顿一个月后，当我检查美国大使发出的有关我访华的公文信件时，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些信件给人的印象是我伤害了中国人，包括委员长的感情。可是司徒雷登并未提到，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我才发表讲话的。

在这里我要回顾一下我在南京发表讲话前发生的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头一天晚上，我将讲话要点列了出来，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次日清晨它却不见了。我问我的随行人员（哈钦上校、博伊尔上尉和恩格上尉），他们说只知道我临睡前把它放在了床边的桌

子上。我以得体的方式询问侍者，他们都说不知道此事。我未向司徒雷登提及，只和一位使馆人员谈论过，他推测是被一位名叫傅泾波的中国人窃走了，他是大使的知己。我由此得知，使馆人员曾接到指示，不在大使住宅给他送机密文件，因为这个姓傅的在燕京大学时是当时该校校长司徒雷登的学生，现在和大使住在一起，并以半正式资格受雇。曾经发现，只要绝密文件送到大使住宅，未经批准看文件的人不久就会获悉文件内容。经调查，每次怀疑都落在大使的这位门徒和知己傅先生的身上。

我在1947年8月24日离华前夕向新闻界发表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体现了我在中国实地调查所得出的某些更为重要的结论。在批评中国的腐败现象和弊政时，我是坦率的。正如我给国民党中国的军政首脑讲话时一样，这次公开这些缺陷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能采取激烈行动，并创造一种气候，使我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能够实际而有效地加以利用。

我的聪明的新闻事务助理马克·沃森极力劝告我，不要发表这种批评性的谈话，遗憾的是我并未接受他的劝告。毫无疑问，正如在其他场合一样，在这种场合我也未能成为一个有见地的外交官。我未能推进我心目中的事业，反而为共产党攻击国民党的恶毒宣传火上加油；未能实现具有积极意义的目的，反而帮着削弱委员长的地位，对他能够提供鼓舞人心的领导的能力无意中进行了诽谤。因此不久我就明白，我本应听取沃森先生的劝告，只发表一项声明，对我们在华期间中国方面给予代表团成员的合作和善意表示感谢。

不是作为托辞，只不过是说明我的严重错误，我要再次提醒读者，我当时是受了我的这种认识的强烈影响，即认为我国政府的负责官员实际上毁了中国，他们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内部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苏联共产党在煽动、鼓励、支持对国民党政府的颠覆活动，使改革或任何民主目标的实现都成为不可能。我希望向国民党领袖们猛击一掌，使他们采取行动，让美国

相信他们是值得支持的。此外我要重申，我当时无法知道我给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的增加对华援助的建议的报告会遭到扣压和忽视。相反，我确信，只要我回到美国并指出如不立即帮助我们战时的忠实盟友中国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就要接管，那么我的建议无疑会被接受并付诸实施。我的根本错误是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明白，我在中国从事调查时并非毫无决断。换言之，我不抱偏见、未受战时在中国战区的友谊或密切关系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说并未被人们所接受。我的目光盯着美国，中国的命运就靠它了。我希望由于如实地叙述我在中国发现的弊端，我依然倡导援助中国的诚意能够确立。

在我的《关于中国的报告》的绪言中，我强调了下述事实：联合国的目标、原则和目的正在遭受“象过去10年中在欧洲和亚洲起作用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凶恶势力”的危害。和过去一样，存在着人们所熟知的同样的方式：使用搞颠覆的代理人，渗透、煽动骚乱和混乱，破坏正常的经济，从而破坏人民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信任；不顾人民的意志，攫取权力。总之，使用一切巧妙谋划的手段，并无情地加以推行，以便创造有利的条件，强迫人们接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言以蔽之，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8年创造“间接侵略”一词很久以前，这对任何了解中国既受暴乱威胁也受直接侵略威胁这一事实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

我继续写道：“苏联在它已占领或控制的国家所实行的，是通过残酷的秘密警察手段和对人们日益加剧的政治奴役和经济奴役而构成的一种杂凑。”总之，苏俄业已在言行上暴露了“一种明确的扩张计划，这种计划在野心规模和危险意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纳粹主义”。因此我写道：“过去两年所发生的事件表明，除非作为策略上的权宜之策，否则建立在这种希望上的姑息就是徒劳无益的，即苏联在其势力大大加强情况下会采取和解或合作的态度。”

因此我断定，美国“抓住一切机会建立保卫自由的防波堤”

是非常必要的。

我指出：“尽管人们在中国看到了腐败和无能，但可以肯定，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实行的办法”，当然有些人也在“对暴虐的警察措施、腐败行为和弊政的抗议声中”加入了共产主义的行列。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在现行领导下丧失了一切希望”，在绝望中转向共产党，这就再清楚不过了。然而我指出，由于雅尔塔协定（该协定给俄国进入满洲提供了方便），由于此后我们拒绝给我们的忠实盟友中国国民党政府以武器援助和政治支持，我们美国人自己对这种后果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美国“促进了苏联在远东的计划”。

我推断，“如果我在这份报告中所提的建议获得批准”，美国就会建议中国，“由它正式通知联合国，它要求美国给予物资援助和派顾问帮助，以促进中国的战后复兴和经济恢复”。

就希腊和土耳其的情况而言，此种行动将表明，既不避开联合国，美国又“不侵犯中国的主权”，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世界和平和远东的稳定（随之而来的也是全世界的稳定）而进行的积极合作”。

我还反复阐明我在一年半以前就赞成的对满洲的监护，以防止满洲“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和丧失中国（或许是永远丧失）”的那种危险。现在满洲的局势已恶化到这种程度，需要迅速采取行动，防止该地区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因此我建议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实现停火，并以此作为序曲，建立中国提出的监护或托管。

在我的报告中，我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恶化和政治、军事机关的腐败无能，都应当与全面情况对比来加以考虑，“以免不成比例地突出不足之处”。

在我看来，我们在西方非常易于因我们的祖先为我们赢得的物质上的繁荣、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其他一切自由和机会而感到自豪。我们总是不理解不太幸运的国家 and 民族，它们正经受着

我们这一代人根本不懂的苦难与忧伤。这在我们考虑中国时尤为真实。因此我写道：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从未无阻碍地专心致力于被8年战争弄得混乱不堪的内部问题。在资源和精力都已大量消耗的时候，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竭尽全力应付恢复时期各种问题的时候，当前的内战给他们增加了不堪忍受的财政经济负担。

蒋委员长已明确宣布：“不管能否得到美国的道义鼓励和物质援助”，他都决心“反对共产主义，并按孙逸仙博士的原则创建民主政治”。他已向我保证，我也相信他，他计划对政府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撤换腐败无能的官员。不过我和他都知道，“由于盘旋上升的通货膨胀、经济压力和内战”，要实现这些目标是不可能的。很明显，若不将苏俄支持的共产党镇压下去，或至少使它停止前进，委员长就无法急剧削减军队，集中力量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虽然我相信蒋介石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我还不能肯定，如果这需要“制服他周围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他是否有足够的决心这样做。接受美国的实际援助，这要求他提出证据，表明他有这种决心。因此我写道：“如果美国采取的政策只考虑共产主义的扩张，不注意一个不得人心的、镇压人民的政府的继续存在，就会使任何援助都不起作用。”

我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弱点和暴虐的性质，以及它的日益不得民心，但我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更是坏得无边。最后我认识到，只有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才能造成一种趋势，使中国最好的、最进步的而且是自由主义的势力赢得影响和权力，对他们的国家实行改革。迄今为止，中国真正的自由主

义者只能在国民党（尽管它堕落、腐败）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依附。我们自己对这种可悲的事实负有大部分责任。我们提出以在中国建立一个我们自己和共产党都认为是民主的政府作为我们援助和支持的条件，这就把问题弄得更加混乱了。既然共产党对民主构成的看法与自由世界截然相反，我们就使中国人处于无法解释的两难境地。马歇尔将军把民主等同于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将那些认为“中共能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争端”的人斥之为反动派，以此积极鼓励自由主义者投向共产党一边，或者至少支持他们反对国民党政府。可悲的是，如果不是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赖以建立的虚伪的均衡，我们本来能够加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的影响，而不至于使他们或者在绝望中退出斗争，或者在期待美国人对他们有利的看法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情况下投向共产党。

在1947年出使中国时，我认为要纠正我们以前对华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还不太晚，这种政策是建立在有关共产主义的幻觉和神话之上的，一般说，这种幻觉和神话在我们对希腊和对欧洲的政策中早已被抛弃了。我认为，如果我们给蒋介石以军事上的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使他反对共产主义威胁，而且不得不如此，或者激励他在政府中实行必不可少的改革，中国最优秀的分子就会重新聚集在国民党政府的周围。我在报告中写道：

虽然中国人民在不惜任何代价企望和平上是一致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实现和平似乎没有可能。一方面是国民党，它的反动的领导，它的镇压和腐败已使政府丧失了人们对它的普遍信任；另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上决心倾向于苏联的中共，它的最终目标是公认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有些报告表明，共产党在土改中所采取的措施获得了他们统治地区内大部分农民的支持。而另外一些报告则表明，他们分配土地的残酷手段和恐怖行动疏远了大部分这类农民。但他

们把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农村地区成功地组织起来了。温和、稳健的集团就处在国民党的暴政和压迫与共产党无情的极权主义之间。小党派缺乏有力的领导和大批拥护者。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无论是稳健派（有些在国民党内），还是那些小党派，都无法施加使人能感知的影响。

在这里我要略去我对朝鲜的访问以及我对那个不幸的国家所提的建议，该国已被另一种灾难性的雅尔塔协定在三八线上分割开了。简言之，我建议对朝鲜实行在联合国主持下由英、苏、法、中、美五国构成的托管。我的目的是排除苏联在朝鲜的颠覆行动。

在伟大的爱国者李承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为他们完全控制该地区创造了条件。

我将报告送交总统后，暂时在国务院占有一间办公室，准备进一步阐述已确立的前提，以及我的结论和建议产生的背景。马歇尔将军在设在成功湖的联合国，他建议我到纽约去见他。关于这份报告，他口头表扬了我，但又说还无暇彻底研究，等他回华盛顿以后我们再讨论。

在纽约时，我曾与我的朋友，《时代》、《生活》、《幸福》等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共进午餐。我们在瓦尔多尔夫大厦他的房间里进行过有趣的谈话。但由于马歇尔严格告诫我不要同任何人谈论我的报告内容，我得避开卢斯询问的问题，并说明我不能向他透露有关我的报告和建议细节的原因。

新闻界的其他人，以及电台评论员、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的官员都经常找我，企图从我这里得到某种消息或我的报告内容的某些暗示。我无法理解对这一报告如此保密的决定。我认为，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当然还有参院和众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充分的权利知道这一报告，如果要求说明和阐释，他们也有权接近代表团成员。我的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受到压力，同样被警告

不得泄露内容。不久，各界都知道是总统和国务卿夹紧了坚硬的夹子。在以后国会委员会的证言中，马歇尔国务卿承担了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

在我继续待在国务院，希望我的报告和建议最后能加以讨论的时候，当时的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先生来看过我几次。但只有一次我们考虑了我的报告所依据的调查结果。当时巴特沃斯先生告诉我，国务卿要我删掉某些特定的部分。我告诉他我不同意这样做。于是他提出，如果我不按他的愿望行事，他可能会恼怒，因为他要公布我的报告，除非去掉某些说法，否则无法公布。我告诉巴特沃斯先生，我要立即见国务卿。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他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因此我挂了长途电话，告诉马歇尔，我确实无法删掉他要求删掉的那些部分。马歇尔国务卿并未恼怒，而是理解并接受了我的意见。

然后，我向巴特沃斯解释说，重要的探讨、分析和思想都已渗透在报告的准备工作之中。如果删掉他所提出的那些部分，思想的连续性，实际上报告的真正核心，都将被排除。他本人任何时候都未对我的建议的优缺点进行过评论，国务院的其他任何人也未这样做。没有人要求我说明或阐释，只让我呆在国务院宽敞的办公室里闲得无聊和发慌。直到最后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白费劲，我怀着如此大的希望所提的建议正在不声不响地遭到忽视。

无疑，我是太天真了。我已受到过有关国务院所持态度的多次告诫：国务院对于给中国国民党政府以任何军事援助，或采取任何实际步骤以阻遏前进中的共产主义浪潮，都持否定态度。它始终拒绝给中国政府以那怕是使其维持军队士气的政治上的和道义上的支持。我越来越感到灰心和惊骇。我知道，延误我所提的立即给中国国民党政府以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援，都是为共产党的目的服务的。国务院象我一样知道，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但不干涉的态度依然占上风。我以日益增加的焦虑反问自己，为何

要派我去中国。难道马歇尔将军只是要我送上一份完全证实他无所作为的现行政策的报告，以此加强他自己的观点吗？难道他要我加入马屁精的行列？他在早年是鄙视这种人的，当时他告诉我，他最尊重那些坦率表示自己真诚意见的人。

当国会委员会和新闻界问到我给总统的报告为何被压时，马歇尔国务卿表示，其中有绝密材料，发表该报告可能使有关国家为难。当然，确定体现在我的报告中的情报资料所产生的影响，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作出这种决定。不过结论和建议的措辞都是慎重的，保证不会触犯谁，而且实际上所有的意见事前都与蒋介石委员长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讨论过。今天，我确信，公布我的报告不会使我国政府或中国人、朝鲜人为难。如果我错了，那么以后于1949年在《白皮书》中公布我的报告，似乎就成了外交上的一个严重错误。

我去见艾森豪威尔将军，并告诉他，我想重返第二军任职。他答应要求对我重新任命，并指出，会议乐于通过此项任命，因为我的司令部就设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

以后再未找我商量过，也未讨论过我的报告。这份报告被完全埋葬了，直到最后参院委员会的审查人员对中国即将落入共产党之手引起警觉，这才把它挖掘出来。在此之前很久，司徒雷登大使从中国发来的急件（人们发现这些急件埋藏在1949年国务院《白皮书》长达600页的不带索引的附录里，我那被压下来的报告最终也在《白皮书》中发表了）即已重复我在1947年春季所提的建议了，而我的建议他本人并未支持。

1947年7月1日，司徒雷登报告说：

直接与在农村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接触的人说，有足够的轻武器和弹药用来武装正在作战的一切战斗部队。

1947年9月20日，司徒雷登报告说：

如前所料，中央〔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境况在最近几个月内继续恶化。当前，对魏德迈使团的大量经济援助的期望和军事援助的短缺以及共产党新的军事活动，正在加剧中国危机时期的恐慌趋势。

1948年3月17日，我们这位大使知道国民党军队已到了耐力的极限，报告说：

在绝望中，所有集团都因美国强烈要求组织结构的变化……或者说改革而指责它。它们认为，如果最近的国内问题不是如此尖锐，它们自己也会实现这种改革的，可是美国却依然迟迟不提供长期以来许诺的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援助。

若干天以后，即1948年3月31日，司徒雷登写道：

中国人民并不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看到，共产主义的浪潮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滚滚向前。在这种混乱和无所作为当中，委员长作为唯一有作为的道义力量巍然屹立。

最后在1948年8月10日，谋划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马歇尔—艾奇逊政策处于危急恐慌之中，此时司徒雷登报告说：

即使目前某种形式的联合是可能的，但我们认为，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这种做法并不适宜。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把共产党包括在内的联合非常清楚地表明，共产党有能力以政治手段取得对政府的完全控制，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某种国际承认……因此我们建议，美国应致力于防止联合政府的组成。为达此目的，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如果可能，就继续增

加对现政府的支援。

1948年11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博士在巴黎求助于马歇尔国务卿，询问如何才能使美国帮助中国。他提出让美国军官“象在希腊一样，借口当顾问”，实际指挥中国军队。他还请求提供武器弹药。最后，他问马歇尔将军：“中国求助于联合国是否可取，因为苏联训练和装备日本军队，还训练和装备朝鲜人。”

马歇尔将军随即说，他将把蒋的要求和提议提交华盛顿，但未“对此进行鼓励”。他拒绝了中国人求助于联合国的建议，说：“我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与其以此种行动进行还击，倒不如借此讨论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

美国政府拒绝给蒋介石长期以来要求的军事上的指点，这或许比马歇尔将军1946年的对华武器禁运和政府未实施的1948年4月授华法案更对共产党有利。该法案提供的1.28亿美元的武器援助直到1948年底才交付中国，这对制止共产党来说已经太晚了。

中国国民党军队能指挥大部队的将领不多，因此蒋介石要求美国让它的军官给他以俄国人给共军和我们给希腊人那样的帮助，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

现在回到1945年夏季日本投降的时候，当时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计划刚刚开始。由于计划在美国陆军人员的指导下已经开始，由于战争期间我们的努力即使有限，却取得了成果，因此委员长要求这种对华援助继续下去。随着美国陆军部的批准，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立即在我的领导下制订了建立军事顾问团的暂定计划。

所提出的军事顾问团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美国陆军人员领导，另一部分由美国海军人员领导。陆军部分又进一步分为地面部队、空军和后勤三个组。从陆军和海军调派的人员，头一年前后约有1,000名军官，2,600名士兵，以后缩减了。这项计划要求进行为期5年的训练，时间延长与否取决于中美两国达成的

协议。

一个精干的军事顾问团能够给美中两国带来无数的好处。两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建立的密切联系将继续下去，两国的友好接触能对世界和平作出很多贡献。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将获得对远东的语言、习惯和文明的宝贵经验。顾问团将由美军中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在自愿的基础上服役。

主要受益者当然是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在建立国内和平方面能得到援助（只有军事力量才能保证这种和平），它最终就能向现代民主国家迈进，这种前景在日本侵略前的1937年似乎已见端倪。中国军队机构的改革无疑也会导致其民政的改革。

这一计划从未实行过。一个很小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建立起来了，但接到命令，不许进入作战地区帮助中国国民党军队使用我们给予的有限数量的装备（以同样资格与希腊人一起工作的美国人员却被允许随希腊部队进入作战地区）。

在迪安·艾奇逊引用“我们实地军事观察员的话”作为他发言的根据，说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作战中并未因缺乏武器弹药而打过败仗时，他不是听了错误的消息，便是有意要将国会引入歧途。多亏了国务院，美国军事观察员才未被允许进入作战地区，因此才未弄出那种性质的第一手报告。代表纽约J.C.怀特公司的一位文职工程师在作战期间曾到过苏州地区，他亲自告诉我，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作战时英勇顽强。他看到数千名伤亡者，共产党的和国民党的都有，后者只在弹药供应枯竭时才撤退。

在我的关于中国和朝鲜的报告被压下后我重返军队岗位时，我也许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对我的国家不负责任。如果我辞职，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我或许会使美国人民深入地了解实情，从而把中国从共产主义的征服中挽救出来，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征服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血腥而无益的朝鲜战争。但我是一个军人，所受的教育和训练都要求避开政治，认为执行军事任务就是

我的首要职责，即使我个人不同意政府的政策，也是如此。我对马歇尔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更难使我放弃军事生涯，在政策问题上向他（实际上是他的顾问们）挑战。同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立场意味着什么。人们对别人的判断表示怀疑时是犹豫不决的，尤其是对那些身居高级负责岗位，有权接触机密情报，又有专家可以磋商的人，更是如此。然而我知道，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实际上是他们周围那些人（他们的顾问们）的俘虏，这些人现在作为显贵护卫队常被提到。送交给一位忙碌的总统、国务卿或任何高级官员的情报，出于必要，必须短而扼要，几乎要采取简略的形式。写进浓缩报告中的内容要成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能影响最高机构的决策的东西。我以应有的虚心态度认为，根据我在国际局势发展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有资格贡献自己的意见。至少我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的动机是非常纯正的，即要卫护美国的利益。除非我掌握无可辩驳的证据，我是不怀疑别人的动机的，但我也不时地被迫怀疑那些判断、政策和决定。没有人无所不知，我在权衡国务院专家所提的涉及英国人、中国人、俄国人、印度人——实际上涉及任何国家的行动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利弊时，始终想保持虚心、坦荡的态度。

在局势发展时，一个组织的某个成员如果认为自己已无法问心无愧地赞同并支持他的领导，他就有必要辞职。这并不意味着他停止战斗，如果他的知识和经验依然支持他的信念的话。因此，我最后离开了政府的工作，希望能提出我的见解，并支持在政府中与我思想相同的那些人。在离开军队时我这样做了，遗憾的是我喜爱这种工作。我非常感激西点军校和军队，也重视与在政府工作中献身的男女工作人员愉快交往的那些峥嵘岁月。

我从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与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因此我无法想象他们能够或者愿意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建立的政府与苏联势力范围内红军早已强加给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是同一类型的极权专政，这似乎是显而易

见的。无论中国国民党政府如何反动、腐败，我认为，我们都可以用支持与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真正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的办法来净化它。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没有一种政权能象苏联支持的共产党集团那样对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构成如此大的威胁。

在美国，人们并不了解，我们给中国的援助若与给联合王国和苏联的相比，其数量是微不足道的。

在以后的一本书里，我希望对这种“中国议题”提供详尽的证据，这种证据在本章和前几章里只作了简略的概述。现在，在结束我对美国在华的拙劣工作的令人痛心的叙述时，我只想概括一些突出的事实。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明白，美国的美中友好合作政策若不被艾奇逊时代的国务院所逆转，中国作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就不会与它的主子和盟友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相等或超过它。国务院的“等等看”或“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使共产党征服中国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中国人民是现实的。他们被我们的态度弄得如此沮丧，如此士气低落，以致终于停止了对共产党的抵抗。如果连美国都要求与共产党妥协，那还能有什么理由继续反对它们？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除了向共产党的征服屈服，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因为连美国也要求他们这样做，并以此作为美国援助的绝对必要条件。

回顾以往的整个岁月，我现在坦率地承认，我本人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完）

译自《魏德迈报告》第366—404页。

林 海 译

新文化运动回顾

——新文化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 及其社会革命观

阿里夫·德里克

1919年5月4日刚过午，来自北京3所大学^①的3,000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在山东问题上作出有利于日本的决定。学生们原打算到北京使馆区继续示威，但为守卫使馆的巡捕所阻。他们便改向曹汝霖公馆行进，该外交官因亲日而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愤怒。守卫曹宅的军警关闭了森严的木门，把学生暂时挡在外边。突然，北京高师四年级一个名叫匡互生的湖南籍学生冲向曹宅，砸毁了大门上厚实的木窗遮板，爬进院内猛力推开大门，放进了门外的学生。然后，他首先用预先携带的火柴点燃了房子。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②

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来干这件戏剧性的、触发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五四运动的事，是顺理成章的。匡互生并非等闲之辈，虽然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一个爱空想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勇士，但他的行动却把无政府主义对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戏剧化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很快就过时了。五四运动预示着爱国主义的兴起，使无政府主义逐渐失掉其在中国激进思想中的地位。^③但在五四前后的岁月

① 应为13所。——译者

②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4—4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③ 许德珩回忆说，在五四运动中，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爱国主义，使他们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大为降低。最终的实际情况也许正是这样。然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青年中的影响也正是在1919年5月以后的两年中达到了顶峰。

里，无政府主义却在中国的激进思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五四运动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它唤起了整整一代人的激进的空想，似乎还赋予了他们的各种乌托邦理想以实质性内容。匡互生回忆他们向曹宅行进的情况时说：“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抛弃了自我，大家都同声高歌，并肩前进。”^①他的这种情绪代表了五四运动在青年学生中唤起的革命理想，而无政府主义正是表达了这种理想。

从20年代后期起，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在中国的激进思潮中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学家对它的忽视。不过这种历史上的遗忘还有其它原因，这就是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散乱和活动上的分散，使它的作用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纷乱思潮中难以显示出来。构成新文化思潮的某些独特思想和无政府主义颇为一致，但无政府主义者从未能把这些思想变成一种指导行动的思想体系或一个首尾一贯的运动。换句话说，对于倾向以至于坚信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理想的人来说，没有必要忠于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或指导行动的思想。可以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又因中国思想界的另外两个特点而显得更加突出：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最激进的一派，特别受到政府的镇压，被迫秘密地进行活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使用假名以防不测，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个人是难以被识别的。其次，一些十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由于个人的思想倾向或信念，时常与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其他人士进行合作，从事非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尽管他们的思想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社会联系却使他们不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潮纷杂，使无政府主义湮没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之中。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回忆道：

^①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4页。

“在这个时候〔1918—1919〕^①，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②

周策纵认为，“当时的这种‘思想大杂烩’并不是某一个青年学生所特有的思想状况。实际上，它代表着五四运动中那些活跃而躁动的青年们的思想主流。”^③中国青年热烈响应自1915年以来充斥于思想界的新知识热潮，寻求思想解放的这一代人如同海绵一样吸收着每一种自称可以实现思想解放的学说，而不太在意其思想来源及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含义。当时流行的思想方式不是进行思考鉴别，而是兼收并蓄，各种学说只要看上去是进步的、民主的和科学的，就把它们看作是基本一致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无政府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宣传的学说是不能被看作是无政府主义的，尤其因为他们并不明确声明这些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不过，无政府主义思想这种开放性也表明，它有利于其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毛泽东在谈话中所说的“乌托邦主义”，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一个产物。虽然那些后来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流行的各种思想不全是由无政府主义而来的，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无政府主义者确曾是那些思想最坚定的倡导者。在运动中，他们站在新文化思潮的左翼，准备从在中国知识界当中传播，并得到他们拥护的思想中得到好处。

可是，对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中所起作用的忽视，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归结于其自身思想体系的散乱和活动的分散。正如周

① 作者注。

②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格罗乌出版社，1961年，第147—148页；三联书店，1979年，第125页。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75页。

策纵在其前几年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所说的，由于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日后还会成为一个有许多争议的历史现象。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竭力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以胡适为杰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倾向，并把中国思想界后来的激进化(或叫政治化)，说成是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理想的退化。而共产主义者则以1921年中共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在20年代初的传播日广来说明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1939年，毛泽东甚至把五四运动归功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实际上，五四运动看来是中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由自由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一个标志。保守主义者同意这一看法，他们看到，在运动中中国青年在道德上和思想上开始堕落。到了五四运动成为我以上所说的政治神话中的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时，无政府主义者就不再称之为自己的运动了。

史学家们参与制造这些神话。那些并不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史学家们，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代表，如胡适身上，甚至在这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自由主义的证据。^①把新文化思想意识和自由主义等同，从而导致了轻视非自由主义思想对新文化思想意识的影响的倾向，有时甚至造成对新文化思想和语言的误解。近年来对当时流行的“博爱和互助的模糊含义”的研究，以充足的证据表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虽然并不敌视社会主义，但更多地偏爱自由主义。^②虽然不能肯定说，在1919年，“博爱和互助”是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的特征，但却可以肯定，它不是当时自由主义的特征。这个口号在中国最热烈的鼓吹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互助(mutual help)”一词(或者按周策纵的译法“mutual assistance”)反

^① 参见杰罗姆·B·格里德：《知识分子和近代中国》，纽约，自由出版社，1980年。

^② 马金柱(音译)：《1915—1926年的〈新青年〉杂志研究》，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53页。

映了无政府主义词汇在中国思想界广为流传，上面列举的只是“互助”一词的几种译法，它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传播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而广为人知。周策纵本人倾向于把新文化运动解释成自由主义的运动，尽管这与我以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大杂烩”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的有洞察力和比较准确的论断自相矛盾。我认为，就是这种倾向性使得象周策纵这样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也把1917年出版的明显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杂志说成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杂志。^①

思想自由并不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一种思想倾向，而是一种具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构想的政治意识形态。新文化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反政治的，或者说，是反对新文化的知识分子所认为的各种政治意识的。无疑，自由主义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其它许多思想流派也有着同样的作用，按照其在西方的本来意义，它们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思想开放（这种情况还会在中国思想界再次出现），但是在我看来，由此而把这场运动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却是错误的。对运动的缜密研究表明，尽管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新思想都持开放态度，但即使就他们的思想倾向来说，也很难认为他们就是自由主义者。从参加运动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看尤其是这样，他们左右了运动的大方向，并在后来决定了中国的思想和政治状况。

共产党的史学家们从上述情况后来的发展趋势来推断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同样导致了对运动的偏见。我们似乎无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前尚不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一支。毛泽东对他本人当时思想的评价同样适用于许多在1921年后成为共产党领袖的人。俄国革命对新文化运动不无影响，但是其直接影响不过是助长了早在俄国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而不是掌握了中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研究指南》，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5页。

国思想界，也没有把中国知识分子全都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直到1921年中共建立若干年之后，才在中国的激进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不过，共产党的史学家们在近年来解释新文化思潮时已开始了重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变化是由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不过，这些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新史料的发掘，使人们有可能更准确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发展情况。中国的史学家已开始特别注意无政府主义，有人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顽固影响，有人认为，这种影响早在建党时期就被党的缔造者们带进了党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曾经经历过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阶段。^①这些人还认为，甚至在2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者在与中共的论战中败北以后，无政府主义也从未声誉扫地，仍在中共党员的头脑中占据一席之地。清除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残余，仍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并非所有中国史学家都认同这个政治目标，而且，对20年代早期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已越来越显示出当时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与思想的重要意义。这项研究本身是重要的；而且从五四时期的有关史料中得出的新观点，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下面我概括一下无政府主义对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我所强调的与中国史学家所强调的略有出入。如果强调无政府主义思想玷污了共产党的纯洁性，那就埋没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作用。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思想的影响确实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在20年代初期的传播，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也可以有根据地说，无政府主义者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那些观点，甚至他们表达这些观点时所使用的语言，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好几篇论述五四前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章都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前，中国思想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所起的

^① 李振亚：《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今昔》，载《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

这种作用。^①不过这些研究都着重于辛亥革命前及革命期间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比它们更大。此外，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无政府主义偃旗息鼓后仍在中国继续存在来说，这些思想非但没有歪曲共产主义，可能还为它提供了群众基础。

我在这里并不是象有些史学家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运动那样，把它再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运动。新文化思想过于含混、芜杂，无法把它归并到任何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里去。对于那些在五四时期流行的思潮和思想方法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既是贡献者又是受益者。显而易见，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对推动新文化运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从未能发起一个持久的运动去实现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不过，在中国的条件下，他们的确形成了一个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较为紧密的核心。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在中国的激进思想中却起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显著的重要作用。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 当时的见证人

1920年初，美国国务院指示其驻华领事人员报告“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情况。在随后的一年间，关于“共产主义活动”的报告潮水般地涌入了国务院的卷宗。美国驻华领事们在全中国搜寻“布尔什维克分子”，并不时求得英国同事们的协助，而且还尽可能地说服中国地方当局禁止这些活动。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活

^① 参见李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动并不像所预料的那样多，但所发现的一、两处却令人十分惊恐。发出电报最多的是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它发现，在福建漳州地区，“布尔什维克学说”已经惊人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20年4月10日发出的一份关于“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电报透露了很多情况，在此值得全文引用：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在厦门地区的内地漳州市，即统帅着南方军队的陈炯明将军的军政府所在地，^①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动。

“据说漳州的官办学校中的教师们一直在传播布尔什维克的学说，他们有时还挥舞红旗罢教。^②在最近的一次大型运动会上，流传着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中文小册子。兹附上这本小册子的一个粗糙的英译本，这是陈炯明将军亲自送给一位出席运动会的外国人的。据说陈将军在运动场上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向在场的官员和外国人发表了讲话，亲自宣传了小册子里的一些社会主义观点，并且对在场的外国传教士说，耶稣本人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就是布尔什维克。”^③

一份于4月24日发往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电报，附了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小册子的译本，以及一份厦门地方官的布告。布告说：

“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宣传，破坏纲常礼教和五大人伦（父子、夫妻、兄妹、^④君臣、朋友）。

“嗣后敢有散发此类宣传品者，人人得拘之送官，严惩

①② 原文如此。

③ 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厦门领事区内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动》，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1910—1929年）档案，1960年，第71卷，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藏，第306号（1920年4月20日）。

④ 原文如此。

不贷。”^①

美国外交官们在这些公文中将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混为一谈，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水平。然而，这却是当时对这些激进思想之间的关系的典型混乱看法。也有若干明眼之人，约翰·杜威是其中之一。他在1920年呈给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个两个月前在北京因散发“布尔什维克”的印刷品而被捕的学生，他研读了这些印刷品后发现，“它们其实是无政府主义号召废除政府和家庭的宣传品，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他继续说，“尽管中国可能有几个布尔什维克，但他们与该国的激进思想的整个倾向并无关系。”^②要是厦门的美国领事能用杜威那样的敏锐眼光去研读在漳州发现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品”，也许他们同样会认为，这些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而它们是由1918年随陈炯明来到福建的刘师复（死于1915年）的追随者们印发的。

事实表明，杜威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前景的估计是错误的；不过，他对1919—1920年间局势的判断还是很正确的。在当时的人看来，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激进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派。

1919年6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清末之时，官府对政治上可疑的人都以“同盟会”会员定罪；辛亥革命后他们又都纷纷赞扬同盟会。他抱怨说，尽管目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很少，但却把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斥之为无政府主义者。^③

这段话表明，是政府对激进分子的偏见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传播，造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遍及中国的印象。这是有根据

① 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档案，第71卷，第313号（1920年4月24日）。

② 约翰·杜威：《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工作报告），1920年12月2日，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1910—1929年）档案，第71卷（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③ 陈独秀：《同盟会与无政府党》，载《每周评论》，见《独秀文存》，上海，1922年，第44页。

的。当时中国到底有多少无政府主义者，也许永远也无法准确地推算出来，不过，活跃的、具有献身精神的无政府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几百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既松散又短命，没有严格的成员标准；他们不愿意受组织纪律的约束，无法建立起严密的组织。

然而，中国的官员们竭力压制无政府主义活动，这是无政府主义团体不稳固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的组织有官府密探混入，他们的出版物往往一出版就被查禁，他们不得不经常转移以躲避官府的搜捕。^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官府严禁之下不得不经常隐蔽地进行活动，这一来反而使官府以为无政府主义的阴谋活动比比皆是。

不管怎样，当时的中国政府认为“过激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一面不懈地追捕过激分子，一面却在帮助散布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从北京政府的内部文件可以看出，他们对在全国各地邮局里不断发现的“煽动性”印刷品对学生、工人，特别是对士兵的影响是严重关注的。1919年5月，一个官员在谈及保定一个名叫李得胜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写的致士兵的呼吁书时这样说道，如果让这种“狂悖之说”存在，“听其蔓延”，就会“扰乱秩序、破坏治安”，“不但国家无以存立，人类且随以灭亡，星火燎原”。^②1919年6月底，直隶督军曹锟也预言，如果听任无政府主义鼓吹的“纲常革命经济平等”和“劳动界自由团体之结合”、“人道自由”等在刚从五四运动的活动中安定下来的学生中传播，那结果也将是如上所述。^③1920年的一份报告又说，鼓吹“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过激党人，虽不能与盗匪相提并论，然而对于国家来说，过激党要比盗匪更危险。^④

虽然如陈独秀所说，无政府主义的声势是由于官府对无政府

①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中警署的报告及第78页的内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③④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9、31和75页。

主义者的迫害才给人以强大的印象，但有此印象的人并不少。胡适在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中，把无政府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除外）空谈主义的一个例子。^①陈独秀在批判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时，含蓄地承认了无政府主义的诱惑力。1919年的陈独秀已经是无政府主义的死敌了，他的话反映了他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泛滥而深感忧虑。1921年，有人建议把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搬到广州，他回答说，“这里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污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②1921年底，苏俄政府邀请中国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团访问苏俄，希望他们皈依布尔什维主义。^③

在2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者也许是势单力薄的，但在激进的社会革命的倡导者当中，他们仍是人数最多的一派，并且较其它派别更有组织；比起当时中国的其它任何西方思想流派来，他们更系统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了自己的学说。虽然事实上他们终究未能组织起一个严密的运动，但在20年代初期，他们却在全中国，至少在各大中心城市里，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组织。然而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散乱特性，它们只能是一些松散不定的组织。在五四运动后的短短几年内，他们的团体相继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漳州、汉口、成都和长沙等地建立起来，在有的地方甚至不止一个。在海外，他们在法国、新加坡、菲律宾、旧金山和温哥华，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④这些组织出版自己的时事通讯和期刊，传播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一旦局势有利，它们就变成煽动和组织群众的核心。

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影响，主要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在

① 《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③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77—79页；梁冰弦：《解放备忘录》，无日期，无出版地，第33页。

④ 《五四时期的社团》（四），三联书店，1979年，第152—351页。

各地的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并且到处自办刊物。1922—1923年的两年间，国内外曾出现70多种无政府主义刊物。^①当然，这些刊物和它们的出版者一样短命，许多刊物只出了一期就夭折了，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是它们登在其它无政府主义刊物上的出版消息。它们的发行量很小，传播范围可能只限于出版地以内。但是，这仍足以显示无政府主义学说在当时流传之广。当时也有一些存在时间较长、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如《民钟》，1922—1927年先在广州，后迁至上海出版；《学汇》，系在北京出版的《国风日报》的副刊；《工余》，在巴黎出版；《春雷》（后改名《警世》），在广州出版。这些刊物一面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一面在1921年后变本加厉地攻击共产主义和苏联。通过这些刊物，中国人得以了解世界无政府主义的最新发展动向。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直至1919年，在中国人所能看到的宣传品中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要比属于其它任何社会主义流派的多得多。可见，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在前十年的不懈努力，使得有兴趣的中国人能够通过中文资料对无政府主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他们了解其它任何一种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却没有这种便利条件。无政府主义杂志《自由录》1918年5月号的目录上，列有克鲁泡特金、巴枯宁、高曼和托尔斯泰的文章。^②《进化》杂志1919年3月号的目录列举了克鲁泡特金的另外一些著作，还有格拉佛、若可倡和路易斯·布兰的著作。^③1921年起复刊的《民声》，登载了该杂志于1911—1920年间发表的文章目录，其中有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和马拉特斯塔的著作，当时有的版本的发行量在5,000本以上。^④此外，中国人还通过民声社在1913年所发行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在法国的德属殖民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5万张明信片，得以一睹他们最推崇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尊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325—351页。

②③ 《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66、190页。

④ 《民声》，1921年3月15日。

容。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对他们的作品介绍。

1919年以后,无政府主义者人数的增加及其思想的广泛传播表明,新文化运动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达到全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的确,1915年以后所发生的后来演变为新文化运动的社会与思想的动员,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实现了他们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应取的方向的企望。在前10年里,无政府主义者站在中国激进思潮的前列,系统和不懈地鼓吹社会改造的思想。由于这些激进思潮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及其社会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逐步从外围进入了中心,这不仅是一个比喻;从具体的地理位置上说,其活动由广州和巴黎移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无政府主义者和新文化运动

有迹象表明,那些非无政府主义者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也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胡适之流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而厌恶无政府主义;而其他人则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在1919年以后转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陈独秀,早先可能曾对它有过某种程度的赞同。陈的传记作者当中不止一人指出,他早在1911年以前就了解并赞同无政府主义。^①不过,即使有这种可能,现在也无证可查。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北大过从甚密,而且陈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期间,似乎很乐意刊登无政府主义者的稿件。1917年,他受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一次讲演的启发,写了一篇重要的评论,力主把社会改造的注意力从政治上转到文化上来。他所吁请来支持他的观点的思想界权威,除李石曾外,还有吴稚晖、张继等人,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②1918年,他还向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劳动》投稿。^③因无

① 李费刚 (Lee Fei-gon):《陈独秀:中共的缔造者》,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新青年》,第3卷,1917年5月1日。

③ 陈独秀:《人生真义》,载《劳动》,第1卷,1918年3月20日。

政府主义宣传恐怖活动而对其持批评态度的李大钊，在1913年也受到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的吸引，他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颇有一致之处；五四时期，甚至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是“互助”口号的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①易白沙经常在《新青年》上撰稿抨击儒学。按周策纵的说法，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其兄长易培基更为人所熟知（后来担任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上海劳动大学校长）。^②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钱玄同和周作人——这两个新文化运动中思想界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无政府主义者。^③

无政府主义者本身对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从1915年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就存在着两个关系密切、性质相同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一个由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是1911年前在巴黎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这个组织由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元老组成，其中有一些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同属一代人，由于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对中国的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另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是由与刘师复有关系的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总的来说，后一个组织比前一个更加年轻，更具有地方性，更加严格地恪守无政府主义的信条。尽管他们没有第一代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大的影响，在地方上却显得更为活跃，更多地致力于社会组织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学生和中、小学教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社会活动的一支生力军。1919年以后，他们就以无政府主义运动思想领袖的面目出现了。虽然他们基本上效法老一辈无政府主义者，但在无政府主义要求个人生活的纯洁性问题上，与其前辈发生了齟齬。

①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4—144页。野原四郎（音译）：《五四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译文刊登在《Libero International》第1—4期（1975年1月—1976年4月）上）。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01页。

③ 梁冰弦：《解放备忘录》，第7页。

在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最显著的贡献。与其说这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影响，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教育方面所从事的活动。他们在1919年以后所发起的工读运动，在那个时期成了培养无政府主义者的场所和传播其学说的有效途径。的确，工读活动所产生的一些思想不但哺育了无政府主义者，在无政府主义衰落之后，还对中国革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吴稚晖和李石曾，回到新生的共和国继续从事活动。1912年，他们成立了“世界社”（以1906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命名），以推动教育活动，特别是出国留学，希望以此来解决阶级的划分等问题。该社的宣言称：

“远见之人以高等教育之不普及为阶级产生之缘由。他们为此而痛心，认为医治此病之方即教育之普及。”^①

为此，他们又创立了“新社会运动”，旨在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增进他们的幸福生活。同样亲法的“世界社”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深信，具有自由和革命传统的法国，为渴望受到新式教育的中国学生提供了最理想的环境。抱着这个目的，他们于1912年成立了“留法俭学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节俭不仅有助于实现运动的实际目标，而且有助于道德品质的培养。

“俭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派遣了不少学生留法及留英，后因大战爆发而中止。大战期间，中国几乎无人去法国留学；然而，无政府主义在法国的活动却因华工的到来而兴旺起来。大战中，约有20万华工进入法国，弥补因战争造成的劳力短缺。他们有的人在陆军中作苦役，有的进了工厂。大战结束时，许多人继续留在法国做工。

^① 保罗·G·克利福德：《吴稚晖的思想发展：晚清和民国的社会与政治的写》，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第325页。

1914年^①，无政府主义者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勤工俭学会”，主要目的是训练在法华工。1911年前，他们已在他们用来资助自己的活动的印刷所和豆腐公司雇用华工。对这些工人进行的教育活动为他们以后从事的教育工作提供了范例。

大战中，无政府主义者为向法国输送华工起了关键作用。1916年，他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与法国的商界和学界的领导人开展合作。该会的主要活动是为法国招募华工。在他们为工人开办的学校里，他们致力于教育工人，改进其举止和品行，也进行文化和劳工组织的启蒙教育；无政府主义者担任教员，蔡元培即其中著名的一员。^②

大战一结束，“勤工俭学会”又把注意力转向学生。他们把教育工人的经验运用到学生身上，为学生在法国安排工作，以便让他们自己筹足学费。到1919年，中国已有约10所留法预备学校；到1920年，在法国已有1,000多名由该会介绍去的留学生。

工读活动对中国激进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由无政府主义者赞助赴法的学生都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和爱国主义的青年党的领袖。然而，工读活动的直接影响是在中国宣传了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而且，即使是那些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工读毕业生，有些也经历了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并由此转而信仰激进主义。

无政府主义纲领这些思想分支同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在法华工的广泛接触，首先使无政府主义者，其次才使中国的其它政治势力，提高了对劳动和工人问题的认识。正如我下面将要谈到的，工读活动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有的人来说，它不过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实际的手段。但由此也产生了对新文化思潮和一代新文化青年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好

① 原文有误，应为1915年。——编者

② 这些讲稿发表在《华工杂志》（1917年1月创刊）上（原注误为1971年。——译者），该刊名义上是为留法华工而办。

理想。

那时，和刘师复有联系的、或者是受刘师复的追随者的启蒙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也起着虽不甚明显但却同样重要的作用。刘师复在1915年的早逝，使他们在这几年里一直没有明确的领导人。不过，这几年，广州籍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广州纷纷来到了各大城市，在那里传播了无政府主义，建立了一些团体，成为日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核心力量。

在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最主要的活动是以劳工组织工作为中心。1915年前，他们对工团主义和劳工教育就表示了兴趣，并且，按照詹明（音译）的说法，他们的思想在那时对工人已经产生了影响。^①谢英伯在广州是个有影响的劳工领袖，早在1911年前就与刘师复在支那暗杀团中有过来往，他是一个工团主义者。两人的这种关系可能给无政府主义渗入劳工运动提供了方便。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1918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②同年，在他们帮助下成立了广州茶居工会，该会拥有来自同业工会和茶馆雇工的11,000名会员。^③次年，广州的理发师在他们的影响下也成立了组织。他们还通过谢英伯对手工业工会产生了影响。这些工会被看作是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会。

无政府主义者还经常打着开办世界语学校的幌子传播其学说。1915年，刘师复的同伙被逐出广州，迁往上海之后，在两地先后开办了世界语学校。有人说，到1914年，天津、福州、上海、北京和成都等地也都有了世界语学校。^④这些学校不可能都

① 詹明(Chan Ming):《劳工与帝国:1895—1928年广州地区的工人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42页。

② 原文如此。实自1913年起，广州每年都举行纪念五一节的活动，见北京共产党小组1921年5月1日散发的宣传品《五月一日》中的第9节。——译者

③ 詹明：《劳工与帝国》，第50页。按詹明的说法，1920年谢所建立的互助社到了1922年，100多个下属团体中已有10万多名会员。

④ 王炎：《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广州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页。

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更不必说是由刘师复的同伙建立的。不过，这些年来，世界语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颇深，世界语的教科书，如区声白在广州编写的那一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媒介。^①

前面提到，广州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1918年跟随陈炯明来到福建，并在他的庇护下在那里传播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和劳工领袖谢英伯的情况一样，陈炯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也是私人性质的，他在支那暗杀团同师复也有过来往；1911年后他为师复及其追随者提供了保护，然而这种保护已经超出了纯粹私人的情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炯明这样一个军阀竟会对无政府主义抱有同情。据温斯顿·谢说，他当时还资助过里昂的中法大学。^②当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回忆说，在陈的治理下，漳州成了一个“模范”城市。即便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在陈的保护下仍能自由活动，甚至还出版了一份报纸。

上述两种无政府主义活动方式，即在法国的工读活动及刘师复同伙在中国的活动，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所要推翻的强权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反映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顽癖，即以无政府主义为工具，努力实现与其公开宣称的观点相悖的目标。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公开地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界名流过从甚密，中法教育协会就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当时，更具有无政府主义特点的师复的追随者们，只要有可能，也接受来自官方的保护。

这样做，部分地纯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需要。研究中国当年激进主义活动的人很少注意当时激进分子所处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当年，吴稚晖的大名上了上海警察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黑名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随时准备镇压“过激”

^① 同上页注④，第41页。

^② 温斯顿·谢：《陈炯明：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哈佛大学有关中国的论文，1972年，第16号，第214页。

又见 梁冰弦：《解放备忘录》第10—12、15—18页。

活动；即使有陈炯明的保护，美国领事们仍能让地方官员出面干涉福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激进主义的宣传品经常被复以伪装的封皮进行传阅，以防被查获，当局就曾在了一本中文《圣经》的封皮里发现了一份在保定印发的无政府主义宣言。^①

无政府主义者与官方的交往是两者之间长期以来的私人关系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关系常常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自相矛盾，并使他们不切实际地幻想可以信赖表面上赞成他们事业的官方。但他们感到遗憾的是，1928年他们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献媚，结果却招致蒋介石对他们的背叛。他们当中包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元老，显然把个人的私交和官职看得高于他们“长期”以来的思想信仰。

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总体上和新文化运动一样，获得了新的活力。他的上任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长期以来与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来往（最近又参与了巴黎的工读活动），并且从世界观来看，也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

从1917年起，北大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中心。没有人会认为蔡元培试图在北大鼓吹无政府主义，但他在北大的改革却为无政府主义的活动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他还宣传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尽管在具体方式上不那么直接。他的改革把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吸引到了北大。这些人10年来一直都是他思想上的亲密伙伴，如李石曾（教授生物学和伦理学）、吴稚晖（被任命为学监）；还有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和袁振英在北大任教授，区声白等人则就读于北大。许德珩回忆说，无政府主义者是当时北大教职员中三大主要派别之一，另两派是《新青年》派和《国故》派。^②

① 《京津时报》，1922年3月22日。

②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2-213页。

蔡元培的所作所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至少是有利于他们的主张的。他的教育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要培养团体精神和互助的习惯；为此，他鼓励学生建立从研讨会到合作社的各种社团。他出任校长不久，就发起成立了进德会，^①该会的名称和纲领都来自辛亥革命后不久成立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该会的宣言特别提到，早先的进德会是由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社会主义者发起的，旨在解决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和废除婚姻等问题。^②五四时期，该会的会员约有1,000人。

教授世界语是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另一领域。无政府主义者孙国璋（后参与编辑鼓吹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杂志《奋斗》）就教过世界语。1917年12月《北京大学日刊》上的一个公告说，他教的那个班已接收了53个学生，尽管很难说他们都是北大来的。^③同月，该刊开始连载区声白论世界语创造者柴门霍夫的文章。

显然，无政府主义者在北大的学生活动中也很有势力。1918年2月，孙国璋任《日刊》的编辑后，就开始刊载世界语的文章（陈独秀是该刊的指导教授）。^④1920年，那个后来被尊为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的朱谦之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编辑后，《周刊》登载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和劳动问题的争论文章。

《周刊》有两期都以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画像为封面。^⑤此外还有一些情况可以间接地反映无政府主义在北大的影响。1918年，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团体，取名爱国会，以抗议日本敌视中国的行动。但据许德珩说，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压力下，该团体改名为救国会。^⑥

在北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不甚明显的各种组织中，无政府主义者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1917年，北大师生成立了“实社”以实践无政府主义学说，其成员有黄凌霜、华

①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8—165页。

②③④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9日；1917年12月31日；1918年2月8日。

⑤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2和16号。

⑥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12页。

林、袁振英等，都是2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①

1919年，该社为“进化社”所取代，从而使北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来自中国其他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以朱谦之为首的北大的另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则于1923年成立了“奋斗社”，以传播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得到了反映。他们通过向《新青年》投稿而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吴稚晖、凌霜、震瀛、华林和冰弦等名字经常出现在1919年前的《新青年》上。不过，这些稿件的思想倾向不甚明显。^②他们的文章既有对尼采哲学的研究，又有托尔斯泰和高曼著作的译文，基本上都是赞同《新青年》提倡个性解放的主张的。尽管这些文章在使《新青年》的读者熟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了解他们关于个人、婚姻和家庭的观点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把无政府主义明确地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综合性的社会政治哲学而加以介绍。

有助于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更重要的材料，是他们自己出版的，或者是他们所控制的大量杂志。1916年8月，旅法华人开始出版《旅欧杂志》，该杂志表面上是华法教育协会的机关刊物，实际上是宣传支配该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其编者即《新世纪》杂志社的无政府主义者褚民谊。给该刊物投稿最多的人中有：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和王世杰。1917年1月，面向在华工的《华工杂志》继而问世。该杂志登载文章，教育工人革除陋习，其宗旨为“勤、俭、学”。李石曾和蔡元培在华工学校的讲义，占去了该杂志论说栏目的大部分版面。

1917年7月起，北大的“实社”开始出版《自由录》。按黄凌霜的说法，“实社”是与广州的“心社”，南京的“群社”“鼎足而三”的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9年，第8集上册，第215页。

② 从英国的无政府主义杂志《自由》上摘译成中文的《血与铁》（同时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例外。这篇由汝飞翻译的文章，用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公开提倡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见《新青年》，1915年12月15日。）。

无政府主义团体。①《自由录》“于政治上则蕲无政府之组织，于经济上则主张共产之真理”。②其撰稿人中有后起的一代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人物黄凌霜，以及华林、区声白和袁振英。

1918年，又一批无政府主义期刊问世，其中有南京群社的《人群》，山西平社③的《平社杂志》。内部的困难和当局的阻挠使它们寿命不长。1919年1月，4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广州的民声社、南京的群社、山西的平社和北京的实社）合并为进化社，并开始在南京出版新杂志《进化》，可是五四运动尚未结束，它就被查封了。④

在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里，最令人瞩目的两种无政府主义杂志是1918年工人创办的《工人宝鉴》⑤和《劳动》。二者中又以《劳动》更为重要，它是中国第一家专为推动工人运动而办的杂志。《工人宝鉴》主要是在继续早期的《民声》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观点的讨论时，顺带提一下劳动问题；而吴稚晖主编的《劳动》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劳动问题。它探讨劳资冲突的原因，赞成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一冲突。在其创刊号上就进行了对五一节和中国工人活动的意义的讨论。它也是中国第一家较为深入地探讨俄国革命意义的杂志。

革命的辩证法：无政府主义学说 中的社会革命和道德改造思想

在组成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思想流派中，无政府主义很早便以激进左派思想意识的面目出现，试图把这场文化革命引向社会革命，把中国社会的文化变革看作是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途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册，第215页。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64页。

③ 原文为山东，为山西之误。下同。——译者

④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9页。

⑤ 原文《劳动宝鉴》应为《工人宝鉴》。——译者

径：并且至少是在理论上，企图使文化革命超出知识分子的范围，把“平民”包括进去。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包括共产主义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都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直到1919年以后，社会主义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如果我们否认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就会产生上述的误解，并且还可以找出事实作为依据。的确，1919年以前，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在新文化运动的文献中很少出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在《新青年》、《进化》等当时的主要杂志上撰文时，并未大肆鼓吹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甚至连“无政府主义”一词也很少使用，即使他们在翻译介绍托尔斯泰和高曼等人的哲学著作时也是如此。当时鉴别无政府主义文章的标准不是看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而是看其是否赞成社会革命。1905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标志就是如此。在新文化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激进的社会革命论者，他们已不仅仅要求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而且，尽管他们的学说也许还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然而，他们不仅把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词汇，而且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引入了新文化的论坛。这些工作不但为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五四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比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各流派更为流行的原因。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革命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是一场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其次，它是一场全体之革命。^①

革命的这种广泛的意义可以有各种解释，可以容纳任何一种主张——从消极厌世思想到阶级斗争观念，那些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和活动来找出他们的社会革命思想的一些基本特点的。

① 褚民谊（民——笔名，下同。——译者）：《续无政府说》，载《新世纪》，第34号，1908年2月15日，第4页。

首先，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意识地对政治采取反对的态度。五四以前有关社会革命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如同盟会的主张），使社会革命成为更广泛的政治革命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把政治革命看作是“少数人的革命”而加以反对，然而却把他们自己的主张看作是唯一可取的革命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涉及全社会的广泛的社会革命才是克服“自私”和建立公道的不二法门。^①

不过，无政府主义反政治是以一个思想前提为基础的，这个前提比对政治革命局限性的重重疑虑要深刻得多。革命的根本目标是从社会中扫除强权，其它更具体的目标都以此为基础。无政府主义者把强权看作是人类自然的美德被歪曲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一旦强权扫除，人类的基本美德就可以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中得到维护。他们认为，强权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成为其各种制度的柱石。正如黄凌霜所说，我们所说的强权，不仅仅是德国和奥国的军国主义，或是尼采的“超人主义”，而是“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的现存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和资本家。^②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国家是强权制度最集中的体现，它既是社会中最大的压迫者，又是保护其它所有强权制度的堡垒，因而消灭国家是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废除所有强权的先决条件。^③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看作强权的堡垒，这说明他们反对政治的原因，即他们认为政治，以及各种政治活动，都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革命的真谛就是消灭国家，而不是使之永久化。

其次，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传统也是产生强权的一个原因，提出要解除它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的束缚。他们并不是最早怀疑儒学

① 李石曾：《答旁观子》，《新世纪》，第11号（应为第7号。——编者）1907年8月8日。

② 黄凌霜：《本志宣言》，见《进化》，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20日，载《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85页（原注误为第186页。——译者）。

③ 参见师复：《无政府浅说》，载《师复文存》，无出版地（应为广州。——译者），革新书局，1927年。该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五四时期广为流传。它就是美国领事馆在漳州发现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品。

的人，但可能是率先提出“革孔子命”的人。^①在他们看来，孔子是多种迷信之源，迷信又是强权的基础，只有破除迷信才能消灭强权。因此，在中国必须废除儒学。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厌恶儒学有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中国，孔子的信条是家庭的基础，是仅次于国家（在中国，它也许更重要）的强权之源。就象巴黎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说：“今之社会……其现象，宛如一高塔，婚姻为其基础。”^②家庭不仅是使强权永久化的一种制度，而且，按照湖南无政府主义者1925年的宣言所说，还是“制造自私的一种工具”。^③总之，在他们看来，废除婚姻和家庭，破除三纲五常，是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他们认为，必须进行一场“思想革命”，把个人从家庭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要进行一场“经济革命”，使人们能在经济上脱离家庭而自立。^④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消灭阶级压迫，或叫做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行使强权。他们认为，这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之上的社会所造成的自私的又一种表现。他们在阶级问题上的立场是模糊的。他们对阶级压迫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但在阶级压迫产生的原因及消除的方法等问题上，又与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存在着分歧。他们注意到了阶级压迫的经济根源，并把废除私有财产及追求利润的生产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任务。师复在这方面较之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激进，他把资本主义看作当今社会的两大罪恶之一（另一个罪恶是指国家）。^⑤然而，一般说来，他们更多地是从

① 《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第4页。（该杂志上原为“孔丘之革命。”——译者）

② 《新世纪》第38号，1908年8月14日，第4页。

③ 《湖南区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宣言》，1925年，载《哈德逊收藏品》，无日期，第6件，第2部分。

④ 李石曾：《三纲革命》，载《新世纪》，第11号，1907年8月31日。

⑤ 德里克和克雷布斯：《民初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载《近代中国》，1981年，第7卷，第2号，第133—134页。

道德上来评价阶级压迫，而不是象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多半是从生产过程来理解阶级的划分和对抗问题。在谈论阶级问题时，尽管他们经常提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更多地是讲穷人与富人的对立、不劳动者与劳动者的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这种提法，与他们关于权力和强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私归根到底都是造成经济上不平等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谈论阶级问题时言辞激烈，实际上，他们是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消灭阶级压迫的。五四运动后，在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早在1910—1920年间无政府主义者发表的文章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只不过是社会中自私行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能使之在另一种伪装下永久存在下去。无政府主义提出了用和平方式来解决阶级压迫。正如吴稚晖所说：

“《劳动》杂志即欲阐明其理，研究其法，以与世界劳动者解决此问题，求正当生活。”^①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从社会制度上废除强权，才能最终消灭阶级。

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社会革命的理论根据，尽管是用中国的方式表达的，却仍然符合无政府主义哲学。该理论根据以个人为出发点：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当今社会中被强权扭曲了的人的本来面目。无政府主义者确信，随着强权的废除，人类固有的基本美德就会得到维护，当今社会中的那些自私、掠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就会一扫而光。正如漳州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篇宣言所

^① 吴稚晖：《劳动者言》，载《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3月20日，第2页。（原注误为吴稚晖的《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经查原文，当为《劳动者言》之误。——译者。）

说：“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要旨”，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真实”。这个真实（“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规范”），“不是别的，就是劳动和合作。”①二者都是人类的天赋，无须从别处获得”。②因此，个人道德的改造，更确切地说是个人道德的恢复，是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们认为教育是实现其设想的社会革命的最好方法。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其文章和纲领中经常流露出的对暴力的嗜好，掩盖了其为实现社会革命而提倡的基本上是改良主义和温和主义的措施。尽管“以行动来宣传”是其纲领的一般特征（湖南无政府主义者在其1925年的宣言中说：“一枚爆裂弹，胜过十万卷书。”），但是在实践中，他们还是把和平方式的宣传及教育看得比暴力为重。③无政府主义到底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他们所鼓吹的暴力，还须作多方面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是说，无政府主义也可以起到温和主义的作用。最明显的例证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杰出领袖刘师复，当他转变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时，就诅咒起1911年前他在支那暗杀团中所干过的暗杀勾当。④

无政府主义者重视教育，把它当作社会革命的一项策略，这一点在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中是有所体现的。他们把革命看作一个过程，或概括地称之为进化。《新世纪》的一篇文章把革命解释为“重进化”，称革命是进化的动力。⑤黄凌霜在进化社的宣言里也有同样的说法，⑥把革命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

① 原文如此。

② 见《新世纪》，厦门美国领事馆第306号公文的附件。这是师复的《无政府浅说》的一个变动不大的改写本，翻译时尽可能依照了原文。（查原文，此段话应出于师复的《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译者）

③ 哈德逊收藏品。

④ 埃德加·克雷布斯：《刘师复和1905—1915年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5章。

⑤ 李石曾（真民）：《革命》，载《新世纪丛书》，第1集，1907年。（原注有两处错误：一是称该文作者为李和Chen Miny（疑是褚民谊之误），实该文为李一人所著；二是年份误为1906年。——译者）

⑥ 黄凌霜：《本志宣言》，载《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85页。

任务的观点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革命观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们不愿意区分目标和手段，即革命的目标和为达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孕育其所追求的社会的社会制度，而这些制度反过来又会保证革命的深入发展。这种革命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排除了任何与革命的最终目标相矛盾的手段运用。

在这个革命进程中，暴力是其消极方面，教育是其积极方面；革命的消极目的，是要扫除那些阻挡人类潜在能力解放的制度上和物质上的障碍，而其积极方面——教育，却能培养出无政府主义理想所要求的道德，并有可能创造出标志着社会革命发展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的胚胎。^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学说最终可归结为个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无政府主义道德在人们当中的普及，将使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的萌芽取代强权的社会制度，继而进一步促进无政府主义道德的完善，直到使无政府主义最终贯穿于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换言之，教育即革命，革命即教育。

无政府主义者把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作为他们所提倡的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世纪》刊载的一篇文章断言：“智识以外无道德。”^②北大的“实社”把“进德修学”作为其宗旨。^③“进化社”1919年的宣言引用托马斯·赫胥黎的话说：

“若是现在知识的进步，不能够将多数人类堕落的情形，从根本上求个改变，我就敢大胆说一句，快请那慈悲的慧星，将这地球用尽力一扫，使我们同归于尽了罢！”^④

① 《新世纪》，1908年3月28日，第2页。

② 吴稚晖：《〈论智识以外无道德〉按语》，载《新世纪》，第79号，1908年12月26日。

③ 《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62页。

④ 黄凌霜：《进化杂志宣言》，1919年1月10日，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第494—495页。

无政府主义者普遍认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与其知识水平是成比例的。换句话说，知识的进步本身就是朝着他们理想的社会迈进，这是他们提倡教育普及的根由，他们把它当作人类进步的先决条件。

然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个人的道德改造。无政府主义者既不象自由主义者那样，把个人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也不象自由意志论者那样，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中国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把绝对的个性解放作为革命的最终目标；而对他们的大多数来说，革命来自对人类必须社会化的坚定信念。他们相信，人类的社会化只有通过个人真正的社会化才能实现。基于这种观点，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教育对于创造无政府主义道德的必要性。教育的目的是把个人的思想从强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结果可以说，却是使人们恢复了本能的社会性。

无政府主义的教育观及其社会革命观，来源于其对于美好社会的憧憬。我这里所说的憧憬并不是指乌托邦的蓝图，甚至也不是那些蓝图中所包含的对人类的幻想，即对于人类如果能自由发展就将会实现的一种憧憬。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在1915年前就描绘了许多乌托邦的构想，其中在新文化时期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师复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他有关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学说在五四时期被称为“师复主义”。他把中国的乌托邦思想与克鲁泡特金的未来主义相融合，描绘了一个没有国界、国家、私有财产或家庭，没有法律和强制机关，没有宗教迷信的未来社会。^①

无政府主义者意欲废除的这些制度，在他们看来，都会把人们彼此分割开来，并且有碍于建立一个利用人类自愿结合的“天然”属性而不是依靠强制来获得内聚力的有机的社会。^②他们认为，这种社会能够实现的信念的立足点，在于他们对自然界美好而有理性的人类的向往。黄凌霜在《自由录》的弁言中写道：“无政

^{①②}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载《师复文存》，第45—52、49—50页。

府至美也，共产至善也。”^①这种理想的核心是深信人的本性是善。登在《自由录》同期上的一封信写道：“无政府之世之道德，平等也，博爱也，自由也，无非顺乎人类天性自然之发育。”^②前面引用过的漳州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也说：“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要旨，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真实。”

如果说这里有些字眼听起来近似孟子之言，而且带有神秘的孟子色彩，那么，无政府主义的性善说则主要来自克鲁泡特金，其次来自托尔斯泰。一篇很可能是出自师复在漳州的一个门徒之手的宣言说，这个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真实，“不是别的，就是劳动与合作”（后者的原意可能是“互助”）。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克鲁泡特金一样，把互助作为其道德的基石。克鲁泡特金在其《无政府主义道德》一书中写道：

“蚂蚁、飞鸟、土拨鼠和野蛮人，都不曾知道康德，也不知道神父，更不知道摩西，却都有同样的善恶观。如果你思考一下这种善恶观的来由，马上你就会发现，蚂蚁、土拨鼠、基督徒和无神论的道德家，都把凡是对同类生存有利的事物看作是善，而把有害于同类生存的就看作是恶。”^③

因而克鲁泡特金把休戚相关看作“比生存竞争重要得多的自然法则”，并断言，“互助的法则”，而不是竞争，是“进化的法则”。^④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遵照克氏的学说，把这种互助的自然属性看作人类良心的基本内容，称之为普遍的科学公理，并用它来批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说它教唆“人吃人”。华林则称，19世纪的科学已证明，“人类者，群生之动物也”。^⑤蔡元培对在巴黎

① 黄凌霸：《自由录弁言》，1917年7月1日，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第491页。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67页。

③④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道德》，克鲁泡特金的革命小册子，伦敦，本杰明·布罗姆出版社，1968年，第95页。

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四），第216—217页。

的华工发表演讲，说劳动分工和社会内部的相互依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①互助之所以是理性的，不惟它是人类的天性和宇宙合理运动的自然规律，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它也为近代科学所证明。^②

如果说，互助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那么，劳动则是人类的另一种本能。师复在1914年就说过：“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他又解释道：“劳动乃人类天职，互助乃人类固有美德。”^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劳动不仅仅是功利的，是谋生的一种需要，它还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道德准则。现在的劳动之所以令人不快，是因为它还具有强制性；随着人类的解放，劳动将会恢复其作为人类本能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强调互助是人的本能的观点，最初是由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在1911年前提出，通过李石曾的文章和译文而传播开来的。李本人是个生物学家，他把克鲁泡特金关于互助是自然和社会进化的动力的观点介绍到中国。1911年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很少涉及劳动问题，在这之前出版的百来期《新世纪》中，只有两篇文章泛泛地提到了劳动问题。从刘师培开始，对于劳动对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才给予更多的关注。^④刘师培这个东京无政府主义者的头面人物，把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与人人都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他的无政府主义具有农民倾向，并受到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中国的农业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影响。他的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反进化的。他并不同意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随着技术的改进，即使劳动不会完全消失，也会变得更令人愉快。

①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年，第539—541页。

② 无政府主义的“科学性”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大加宣扬的。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证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不用说，它们的最高权威是克鲁泡特金。

③ 《师复文存》，第49—50页。

④ 刘师培（中叔）：《人类均力说》，载《天义报》，第8卷，1907年7月10日。

1911年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问题日益重视起来，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加强了同中国工人的联系。在广州，他们参与了工团主义的活动；在巴黎，他们从事对赴法华工的教育活动。在这几年间，他们对劳动问题的看法有了微妙的然而却非常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前面所引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中，师复对劳动问题也表现出暧昧的态度。他把劳动说成是人的本能，但又说随着将来技术的改进，劳动会使人更愉快。及至新文化运动，无政府主义者并未把劳动说成是一件不可避免的痛苦之事，而是说它表现了无政府主义的道德和人类本能中的精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受到了克鲁泡特金赞颂劳动的思想的影响，他的《面包略取》和《土地、工厂和作坊》两本书，曾于1910—1920年代后期在中国广为流传。可以断定，1915年以后，随着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问题的日益重视，强调劳动是人类的两大本能之一，是表现人类精神所固有的善与美的一个道德规范观点，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他们的文章之中。到1919年时，很多人已把互助和劳动看作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基石和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社会的途径了。

无政府主义者还认识到了教育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作用：一个是积累知识的作用。它对于扫除人们的“迷信”观念，包括有利于强权社会的巩固的各种思想上的盲从是必需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教育必然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即人们一旦摆脱了现存的强权制度的束缚，就能实现自己社会化的愿望。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它能够建立起促进互助和自愿劳动的社会制度。在意识与社会制度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上述第一种作用是第二种作用的基础；这个社会制度，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

无政府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直接表达了上述社会革命思想。他们在这几年所写的文章中鼓吹了这些思想。然而比这些文章更给人以深刻印象，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更有成效的，是他

们为了使自己的理想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变为无政府主义社会早期阶段的现实所作出的努力。他们的社会活动不仅为我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提供了具体的思想材料，而且使他们自己得以明确地表达其人类理想的具体内容。

这些活动包括从留法勤工俭学到国内的无政府工团活动，从北大的“进德会”到“新村运动”——周作人是其主要倡导者。而在五四运动前后，主要是工读活动在中国学生界形成了一种“思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影响范围和赞助者大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青年人提供一个社会环境，以培养其互助和劳动的习惯。至少对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些活动相当于一些小团体，它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把社会改造成一个由小团体组成的大的联合体的出发点。^①

在这些活动中，工团主义活动和在法国的工读活动最为重要。无政府主义的工团活动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出现的标志。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湖南，可能还包括上海，都是工人运动的先锋。除了广州之外，这些地方的无政府主义活动都是短暂的。1921年共产党一成立，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就开始超过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不管怎样，无政府主义者比中国其它任何激进派别都更早地认识到了劳动问题，并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传播这种认识作出了贡献。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工人时所采取的策略，后来成为中国工人组织的共同策略方针，这就是建立工人学校和俱乐部，以便在发动工人的过程中教育工人。^②他们实行这种策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文化太低，无法马上建立工会组织。迟至1918年，吴稚晖在《劳动》上撰文还说，在中国建立工

① 《湖南区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宣言》，载《天义报》，1907年7月10日。

② 詹明：《劳工与帝国：1895—1928年广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师复文存》，第36页。这一策略与无政府主义所说的工人组织必须脱离政治是一致的（参见《师复文存》，第83—84页。）。

党必须先使工人阶级受教育。^①无政府主义者确信，要使工人组织发挥作用，并遵循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就必须使工人自己组织自己。这就要求教育工人和组织工会的工作同步进行，以使工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

然而，这些策略同样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把社会革命看作一个教育过程的坚定信念。对他们来说，工团不仅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而且是培养无政府主义道德的新的社会机构。当最终的社会革命到来之时，这些机构就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组织。^②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把这个目标看得比为工人谋利益还重要，也许这就是他们认为在20年代无法与共产主义者相抗衡的一个原因吧。

不管无政府主义工团活动成败的原因何在，重要的是，这些活动第一次把中国的工人和学生结合起来了。它对中国工人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还很难说，但它无疑地在学生的思想上打下了烙印。这种结合最终导致了在20年代的城市社会革命中所实现的工人和学生间迅速的联合。

这种结合更重要的直接结果，是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工读运动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他们进行的劳动试验的一个产物。正是他们对赴法华工进行教育的经验，使他们产生了使知识分子劳动化的灵感，这就是发动工读运动的初衷。的确，正是在1916和1917年先后在巴黎创刊的《旅欧杂志》和《华工杂志》等杂志上，他们最先开始宣传劳动和学习相结合的思想。^③

工读运动的基本动机是非常实际的。对工人进行教育是利用业余时间在校进行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则用部分时间作工以筹措学费，用部分时间来学习。对许多中国人，包括参加勤工

① 吴稚晖：《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载《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3月20日，第13页。关于工团的教育职责，参见《师复文存》，第81—83页。

② 《师复文存》，第81—83、56页。

③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册，第193—203页。

俭学的人来说，工读运动的吸引力主要在其实用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即使是家境贫寒的人也能受教育的方法。胡适和汪精卫（汪曾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并一度任《旅欧杂志》的编辑）等人认为，这种实用性是工读活动最重要的特点；胡适认为这一活动与他在美国见到过的半工半读活动很相象，但是他不赞成它过于理想主义的方面，认为这将妨碍它获得成功。^①参加这一运动的许多学生似乎没有它的创始人那样多的理想主义。后者经常抱怨，学生们不爱劳动，只是因为劳动能获得受教育的条件才“干一干”。^②

对那些发起工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思想有其更为重大的意义。华林强调说，中国若发生变革，必将由参加工读运动的人来完成。^③《劳动》一篇文章说：“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正当社会，有可预料。”^④蔡元培可以说是工读运动最有力的鼓吹者，他认为这种工与学的结合，不仅可解决“青年就学的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最重要的问题”。^⑤

如上所述，随着工读运动的发展，无政府主义者颂扬劳动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1918年的《劳动》，把“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作为杂志的宗旨，劳动被认为远比其对生产的意义更为重要。从伦理上说，劳动是“人生最大之任务”，是“文明之渊源”；从道德上讲，劳动是“免于道德败坏、促进道德提高的方法，是锻炼精神意志的途径”。它的宗旨还认为，劳动不仅有益于个人，而且有益于全社会。^⑥五四时期，“劳动主义”如同

① 胡适：《工读互助团问题》，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第2页。

② 黄立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1页（查该书，此处无此内容。——译者）。

③ 华林：《工学主义及方法》，载《旅欧周刊》，第45号，1920年9月12日，第1页。

④ 《劳动》，第4号，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第177—178页。

⑤ 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⑥ 《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3月20日。

“互助”一样，也成为新文化的常用词汇。但是，当时最能激起人们遐想的是蔡元培在1918年末的一段讲演。他热情洋溢地说：

“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全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①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劳动是一个“大平衡器”。如上所述，无政府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同，是以劳动与否来划分阶级的。他们认为，当今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由于劳动者受到了赖其而生的寄生阶级的剥削造成的。正如蔡元培在讲演中指出的那样，阶级的差别，不是体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是体现在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这种差别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儒学的统治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作为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依据。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是消除社会中经济剥削现象的途径。我们有必要详细引证蔡元培的话，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对劳动，以及劳动对于实现社会平等的意义的认识：

“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便是工；不管它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都是。所需有两者：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

^① 蔡元培：《劳工神圣》，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又载《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上的需要，如学术界。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没有。这不是文化的大障碍么？我们要除去这个障碍，就要先来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①

无政府主义者坚信，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并且可以避免因暴乱导致的一切流血事件；而如果人类的现状不能改善，暴乱和流血就一定无法避免。

赴法勤工俭学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想观点，推动了1919—1920年间以工读主义为指导的公有制试验的“热潮”。这些试验名目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1919年底在北京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发起人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领袖王光祈。他曾赴法勤工俭学，那时他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工读互助团几乎齐名的是同年5月3日由北京高师的学生建立的“工学会”，其成员之一匡互生，在该会成立的第二天就带头冲击曹汝霖的住所。在这个“热潮”中还有“新村运动”，周作人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些试验也推动了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的类似活动。

这些工读团体互有异同，但都带有某些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互助和劳动是它们基本的活动内容，它们都期望用本组织开办的企业或个人的劳动收入为成员提供学费，这两种来源的经费都要集中起来，作为成员共同生活的基金。团体内实行劳动分工，以促进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大多数组织的宗旨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其中一些团体的宗旨，可参看《五四时期的社团》

① 蔡元培：《国外勤工俭学会和国内工读互助团》，载《蔡元培先生言行录》，第58—59页。

（四），第360—528页】。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独特之处的“新村运动”。按照周作人的设想，办“新村”的主要目的不象其它工读团体那样，是为了学习，而是要提倡劳动（有特殊才能的成员除外）。然而，新村主义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它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农村的利益：新村被看作一个农业公社，能够把无政府主义传播到农村去。五四时期的“新村运动”是受了日本类似的运动，特别是武者小路发动的运动的鼓舞，而武者小路又是从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那里得到启迪的。^①另外，江亢虎等中国社会党人和刘师复及其追随者们，在五四前都曾试验过自己的“新村”，师复等人在一次公有制试验中，甚至还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②

新村运动的影响虽然不及工读运动，但在北京还是颇有影响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建起了自己的“新村”，从事一些农业劳动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③

所有这些试验很快就失败了。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只存在了约4个月。五四时期公有制的种种试验，均因经济活动和就业上的困难，很快就成为资金拮据的牺牲品。正如戴季陶等人所断言，工读团体并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痼疾，而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恰恰寄托在这样的社会上。^④

然而，只要工读团体还存在，人们似乎就能瞥见知识分子在美好社会里的理想生活。有人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文章，称工读运动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工读主义是人生进化的一个

① 对周作人的“新村运动”的详尽评论，可见丁守和等人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8年，第215—219页（原注误为人民出版社。——译者）。关于“新村运动”和“工学会”二者的宗旨的比较研究，可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第299—300页。

② 莫志鹏（Mo Chi-peng）：《纪念师复》，无日期，未刊印手稿，第66—77页。

③ 丁守和等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215页。

④ 戴季陶：《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第5—12页。

新阶段，是20世纪新思潮的美好产物，是未来新社会的基石。”^①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对工读运动的前景更是想入非非：

“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②

然而，工学会的杂志《工学》的一个撰稿人，其得意忘形又超过了上面两个人，他称劳动与学习是“上天堂的一条铁路”的两条铁轨！^③

无政府主义思想意识和社会意识： 新文化思想中的文化和社会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不仅身份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者空前的多，他们的思想也成了中国青年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时期流传较广的杂志，如《新青年》、《进化》、《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甚至一些报纸，都经常讨论无政府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学说通过公有制生活的试验而深入到中国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新青年》在1919年底刊载的一个宣言中的一段话，表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程度，这段话完全可以在当时任何一篇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中看到：

① 《解放与改造》，1920年2月1日，第3页。

②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379页，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③ 《工学》，第1卷第1号，《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第297页。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①

这并不意味着，1919年时的新文化运动已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或动机，或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已大批地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这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词语理解为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具有排他性的社会与政治活动领域的概念的话，那么，把新文化运动仅看作某一种思想意识的运动就是错误的了。不能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是受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而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影响了一代人，似乎还决定了他们对其它思想意识的取舍。最好还是把新文化运动看作一个由多种思想流派组成的思想运动，一个具有自身的历史并在不断发展的意识。无政府主义便是这个思想运动中的一个流派，任何追求它的人都能很容易地掌握它。在那些年里，中国思想界当中追求无政府主义的人是空前之多。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数激增，无政府主义也在中国思想界广泛流传开来。

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所表现出的特有的姿态，对于成功地塑造中国青年的思想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读运动的实践表明，对许多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以及青年来说，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实用价值也许已经超过了它在哲学上的吸引力。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文章表明，他们无时不在回击

^①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74页（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译者）。

称他们的学说为乌托邦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空想的言论。^①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他们与别的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在奋斗目标上是背道而驰的。不管知识分子们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有多么不满，他们仍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忧虑，这便是他们中许多人拥护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显然与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主义倾向大相径庭，有时甚至还使他们对无政府主义者产生敌意。而且，大多数新文化运动参加者并不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主张废除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改造。他们对国家和政治的敌视，并非出自哲学上的认识，而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政治现状感到绝望。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感召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它要实现的一些并不属于其学说的目标。

但是，如果把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仅仅归结为其思想实用性的吸引力，那就会忽视无政府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以及新文化思想意识的辩证性。很显然，无政府主义者具有为实现其社会革命抱负而献身的精神，而且给新文化的未来观打上了他们的理想主义的烙印。新文化的民族主义受到了世界主义的鼓舞，从而使中国的解放事业成为全球性变革的开端。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政治现状的不满提出，现存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极为关注使个人从社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与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间的一致性造成的。夏洛特·福斯在其1972年的研究中注意到，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除了当时所提倡的科学以外，所有新文化思想流派都被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过。有人也许会提出，从1915年前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来看，新文化运动中包括科学在内的各种学说，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十年就已由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了，而且，他们对各派学说的传播比中国思想界的任何人都更为系统。所以，无政府主义自

^① 可参阅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浅说》，载《师复文存》。

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引人注目。无政府主义者显然不是新文化运动中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其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他们不仅“影响”了运动的思想倾向（好象他们是局外人），更确切地说，他们为运动提供了一种词汇，一种语言，新一代人得以用它来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忧思。随着中国的社会问题唤起青年一代对无政府主义早在十年前就已提出的问题的关注，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便更为人们所熟知。

我们习惯于根据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及他们在中国思想界所提出的理论来认识这个运动，然而这些理论对这个运动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它们的重要并不在于其自身的理论意义，而在于他们与整整一代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之间的关联。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既不在于其理论上的价值，也不在于其实用方面的吸引力，而在于它在整个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共鸣。

要正确评价无政府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或是对形成新文化运动任何一种思潮的影响，就不能仅仅把这个运动当作某一种思想运动，也不能当作一场具体的思想领域里的革命，而应该把它看作寻求现实社会问题的答案的活生生的人所进行的一场运动。他们所以把文化领域作为社会重大变革的活动舞台，这是由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国尝试的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政治上的腐败所促成的。正如陈独秀在1917年所说：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民主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完全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①

^①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陈独秀的结论是，中国需要的是共和制的道德和文化的再教育。即使是新文化的领袖们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文学革命，也与这个实际问题有关：改造旧文体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至少有人这样认为），它只是使广大人民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并接受新思想的一个手段。

那时，中国的腐败政治给思想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更重要的是使文化革命具有了社会意义。如果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现状的厌恶使他们转而从事文化革命，那么，他们所进行的这场文化革命就不再仅仅是一场思想革命，而是一场对于社会的道德基础的革命；它不仅改造国家，还要改造社会制度。文化革命对那些有可能改造的现存社会制度（主要是家庭）方面影响最大，因为它对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旧强权发动了进攻。中国青年无疑对统治中国的旧政权不满，但驱使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却是推翻日常生活中强权统治的强烈愿望，从而使新文化运动具有了社会意义，其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归根结底，是那些在1915—1920年间步入成年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动力，他们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加深了对一个他们已不再认为是天经地义（不象他们的前辈）的社会制度的反感。或许，对于发起这场运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使中国青年树立起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自主的新社会的信念，并为中国青年提供了一种能够明确表达他们对未来的心声的语言。正如一个《新青年》的读者给杂志的来信所说：

“今春我第一次读了你们的杂志，它好似春风唤醒了我，使我一下子认识到了青年的价值。我们应当仿效西方，去旧迎新。我好似一个病弱的人，必须吐故纳新。尽管我现在还不是你们所说的新青年，但是我一定能够扫除我心中昔日所有的旧思想。我感谢你们为拯救青年所做的一切工

作。”^①

与旧强权的斗争并非仅仅是抽象的思想领域中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而是社会内部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在这个社会里，知识分子所反抗的旧文化在这个旧权力和强权的社会结构里仍在肆虐。新文化的青年要打碎的是那些束缚他们一举一动的偶像。新文化领袖们的激进思想体现在一代人的社会激进主义之中，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旧世界实质上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一代青年很快就要接过新文化运动的舵轮了。这一天一旦到来，他们就要超出运动一些早期领导人的初衷，大力提倡激进主义，而那些领导人将不再能控制由他们倡导的这个运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新文化运动，那么，那些只把它看作单纯思想运动的运动的参加者们为保持它的这种性质日益所作的无效的努力，看来不再是这个运动的主流，而只是其中一种思想观点的反映吧了。他们提倡运动中的唯理智论，以抑制由他们的思想所激发的社会激进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革命的口号虽然明显地是提倡新事物、批判旧事物，但未必是否定一切旧事物，而主要是否定中国传统的合法制度中再生的“支配和服从的社会关系”，^②尤其是束缚青年和妇女的那些东西。吴虞是一个不妥协的儒学批判者，他批判儒学并不是因为它的“旧”（他并没有对道家 and 法家的学说进行同样的批判，而是利用它们来批判儒学），而是因为它维系着中国的家庭制度。他的关于“忠孝思想的作用在于把中国变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的论断，从社会的角度，因而也是从本质上揭示了当年这场文化革命的文化上的起因。^③当年使理论变为一场社会运动的，不是什么文化上或思想上的抽象问题，而是一种与老

① 引自马金柱：《1915—1926年的〈新青年〉研究》，第67页。

② 摘自雷蒙德·威廉斯：《文学与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

③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04页。

入对青年的统治，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一句话，是与强权进行斗争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社会运动。

因此，新文化的文化观正如其在五四时期所表现的那样，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思想，也就是说，文化革命就是要对社会的基本制度进行革命。

在这种文化革命思想的社会逻辑和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文化逻辑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革命思想中失去了意义。这两种革命思想都把社会看作是强权文化在制度上的体现，把文化看作是存在着统制和压迫的社会在制度上的体现。新文化的青年在寻求文化解放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能自由生活的社会空间。在新文化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比其它任何派别都更多地为青年人提供了这种空间。他们保证，他们的新文化观与其说是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不如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倡导的工读制度，甚至也许还包括工团组织，都可以看作是青年获得新生活的小天地。正如王光祈所说，工读团体并非仅仅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组织，而且还是青年脱离家庭、得到自由和平等的生活的天堂。^①

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扮演了一个促使社会激进主义在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崛起的助产婆的角色。如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劳动问题，而且把劳动和知识分子在他们所提供的空间里结合起来。那些在后来领导了20年代的社会运动的未来的中共领袖们，在五四时期几乎都经历过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阶段，这决非偶然。梁冰弦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瞿秋白和恽代英，都曾与《民声》社通过信。^②恽代英早在1917年就参与了互助社的创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70、413页。

② 恽代英：《回忆五四前后建立社团的活动》，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31页。

立工作；1919年后，他创办的利群书社和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都把工读互助团的宗旨作为自己的目的（至于对后来共产党人的影响，见王实汉：《五四运动简史》，第184—185页）。①彭湃甚至在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仍然赞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观点。②还有象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许多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毕业生，他们是在法国才第一次接触到工人的。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史学家都强调俄国革命在把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在1919年以后，俄国革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但我们却不能断定，人们在五四以前就是这样认识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俄国革命最先提供了媒介。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劳动》，是最早把俄国革命赞誉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革命的中国的激进杂志之一。③耐人寻味的是，李大钊在1918年底欢呼俄国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时，他竟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概念来理解俄国革命的。④ 傅斯年同样也曾把俄国革命看作是能够改造家庭等社会制度的一场社会革命。⑤李大钊甚至还称之为能解决“面包”问题的革命。1919年5月，《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曾刊登一篇黄凌霜以无政府主义观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篇论巴枯宁的文章。笔者认为，这表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起初都是用新文化观念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俄国革命的，而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观念的形成的影响又是如此之

① 梁冰弦：《解放备忘录》，第6页。

② 罗伯特·B·马克斯：《华南的农村革命》，马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65—168页。

③ 见《劳动》第2号（1918年4月20日）评论列宁和俄国革命的文章。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曾对俄国革命寄予厚望。

④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年，载《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23页。

⑤ 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载《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大。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思想界在1910—1920年间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存在着认识上的混淆现象，而这正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特征。

无政府主义也许完全象共产主义的史学家们常说的那样，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一个乌托邦运动。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对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无足轻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使一代中国青年倾心，并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过提高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觉悟而使改造中国的理论激进化。而且，当无政府主义在20年代中期走向衰落，并在20年代末期不复为中国激进思想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之时，其理想并未随之消失。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从工读主义的拥护者到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之间，似乎不过是咫尺之遥。

译自《近代中国》，1985年第7期，第251—300页。

刘勇 译 何祚康 韩红 校

民国时期上海杰出人物 生平学研究初探*

白吉尔 康诺蔼 安克强 何佩然

1949年以来，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速度很快，但相当不平衡。从事有关方面研究的人，往往着重探索帝制的衰败，不注意研究和分析民国时期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们把国际关系史、社会制度史及思想史视为重要研究课题，置经济发展研究于从属地位。至于对社会的分析，这方面的著述几乎寥寥无几。^①

由于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出现，史学研究的方向有了明显的改变，而且，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是个新开辟的领域，有关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部分中国的年轻社会学家曾经论述过个问题；^②战后，日本和法国^③发表过几部有关论著。不过，其中大部分

• 本文译完后，曾就篇名译法等问题征求作者白吉尔教授的意见。承蒙白吉尔教授及其他几位补署姓名的作者不惜宝贵时间通审译文，对篇名译法做了适当修改，并且还在中译文基础上对文章内容本身做了部分删节和补充。谨此并志谢忱。——译者

① 张仲礼的权威著作《19世纪中国绅士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西雅图—伦敦，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50页，1955年初版，1967年第3次印刷）；周德荣的开拓性著作《中国社会阶层的变易——中国士绅阶层的地位变化》（纽约，艾瑟顿出版社，1966年版，300页）；根岸信：《买办制度研究》（东京，日本东洋出版社，1948年）。

②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著作有：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和农民》（纽约，国际出版社，1936年版，144页）；费孝通的《中国的绅士》（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290页）。

③ 谢诺（Jean Chesneaux）：《1919—1927年间的中国工人运动》，巴黎，模顿出版社，1962年版，652页。

社会史研究著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视阶级为一个抽象概念，一种经济演变的产物及政治发展的因素。这些对阶级进行泛泛争论的著述不但没有揭露中国社会的实质，反而掩盖了社会现实。为了摆脱这种决定论框框的束缚，研究只有采取经验论和专题研究的方法。^①而采取这种方法，会使要描写的社会现象偏重质量分析而流于主观。这种直觉虽然是那样的靠不住，但在那些敢于探索的史学家看来，却要比马克思主义的泛泛之谈更有根据。但是，光靠探索是看不清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的，还必须进行调查。因此，这些探索并没有填补摆在决心开垦中国社会历史这块处女地的史学家面前的方法论这个空白。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生平学研究（也就是说，把几类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集中起来，进行综合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其实生平学研究一开始就从制度和司法方面入手，^②最后得出的结果，只能不断证实它作为分析社会的一种手段还是十分重要的。^③看来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情况。群体传记可揭示的，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依附关系、亲属关系、地方主义者的联合，等等——的作用。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历来占据优势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所以，这个社会主要是根据上述不同的

① 研究中国这方面问题的，还有毕昂科（Lucien Bianco）的许多著述，特别是他的《农民与革命》（载《国外政治》，1968年第1期，第117—141页），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的《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巴黎，模顿出版社，1968年版，154页）。

② 从人物传记研究角度论述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历史的文章有：克洛德·尼科莱的《生平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罗马与意大利》（载《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5期，第1209—1228页）；安德烈·夏斯塔纽尔的《生平学研究——研究后期罗马帝国的方法》（载《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5期，第1229—1235页）。

③ 将生平学研究应用于近代英国或法国社会分析的论著有：刘易斯·内迈耶的《乔治三世继位时的政治结构——美国革命时代的英国》，伦敦，麦美伦出版社，1930年初版，1961年再版，18+514页；劳伦斯·斯通的《上层社会的危机（1558—1641）》，牛津，卡拉雷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841页。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代与现代史研究中心近现代史研究所出版的《16—18世纪法国杰出人物生平学研究》（巴黎，1980年版）中找到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撰写的有关贵族，特别是商业界名流的大量论著的目录。

相互关系组成的。虽然有法律条文，但并未被应用于社会实践，忽视了这些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弄清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是如何展开的，更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其政治制度又是怎样起作用的。然而，这种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有人去提它，更少有人去描述它……

本文论述的是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界名流：知识分子、商人及市政府官员。简而言之，我们探讨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开放口岸中最大通商口岸那些西方化了的名人。我们的目的是力图阐明中国社会的某一部分向近代过渡的方式，以及这个动荡社会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

传统与转变。还有比它更经常被人重复的论题吗？其实，这不过是个刚刚提到的论题。我们不能仅限于把蕴藏在某一位开明的国务领导人身上、某一个改良党或革命党内部的进步力量，同因患传统习俗和意识疾病而瘫痪的社会中所存在的阻力对立起来。生平学研究在把我们带入这个社会的最深处和隐秘处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既是直接从这种传统中脱身出来的，又是与这种传统紧密相联的、致力于近代化的人——他们只希望用社会惯常的做法为见所未见的发展目标服务。我们在分析近代化的演变过程时，不能忽视技术、制度及其它方面变化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都是本能地和社会集团处在同一水平上，而且常常不是在当局的干预下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近代性就失去了课本中通常所讲的帝国主义、买办和官僚主义的特点了。中国的近代性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一种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势力的非对抗性的反击，而类似的实例在20世纪的亚洲并不罕见，它的历史一直等待一位象维贝尔那样的历史学家去撰述。^①

本文所探讨的每一个名人团体都以各自的不同特性在社会向近代化转变过程中起过作用，同时，每个团体——商贾、士大夫、

^① 维贝尔 (M·Weber, 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译者

官吏——本身也因此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并且为近代资产阶级、新知识分子和专家政治的胚胎创造了出生的机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各团体与其周围（地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客观条件的关系，也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意义。各种转移和变革正是在这种客观条件的要求和促动下进行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会明白上海之所以能扮演主要角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上海外国租界的出现，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上海人在智力发育方面出现的飞跃。一般说来，凡是在上海出生的，通常都可以被称为上海人。按照我们的理解，上海的杰出人物也包括那些在这座大都市里生活、学习、工作或曾经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生平学方法是有一定要求的，也就是说不能采取问卷调查的办法；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要力求全面；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所搜集的材料还要尽可能齐全。不过，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总会遇到资料方面的问题。因为很难接触到档案，所以，要想查阅其中的官方或私人的材料，一般是办不到的。由于不易得到原始资料，只好参考一些第二手资料，或是东寻点，西觅点。然而，在得不到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有时在寻觅和浏览过程中，往往碰巧也能得到一点线索。

我们搜集资料，通常是从查阅大量中、外（西方国家和日本）出版的人物志或人名辞典入手。中国出版的人物志，大都是介绍全国或某一地区范围内的重要人物，而且常以政界人士为主。^①这类人物传记在编撰上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资料选择标

① 《国民党领袖人物传》，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4册，378页。（这部书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1945年国民党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的组成的内部资料编译的。）

樊荫南：《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460页。

傅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上海，世界文化出版社，1948年版，310页。

《现代支那名人辞典》，东京，大陆文化研究所，1939年版。

广民：《当代中国人物志》，上海，中流书局，1938年版，360页。

准不够严格，其次便是各部人物传所列名单变化很大。由此可见，在介绍每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时，说法就更不一致了。可供参考的书籍，除了人物传记，还有部分社会特别机构（如军队、工商企业）的年鉴和地方志。^①此外，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史

胡自立、萧萧：《当代中国名人志》，上海，世界评论1910年版，394页。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北京（？）1940年版，两卷。

康国栋：《中国现代名人传》，东北力行出版社，1916年版。

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北，传记文化丛刊，1975年版，

陆丹林：《当代人物志》，上海，世界出版社，1947年版。

马克斯·珀伯格：《近代中国名人录》，香港，莱奥特出版社，1951年版。

4~8页。

任嘉尧：《当代中国名人辞典》，上海，东方出版社，1917年版，153页。

园田一龟著、黄惠泉译：《新中国分省人物志》，上海，良友出版社，1930年版，578页，

谭各：《当代中国民族英雄传》，国立人物年鉴社，1939年版，360页。

《中国名人录》，上海，中国周报杂志社，1920年版，1卷，314页；1925年版，2卷，972、26、11、168；1931年版，3卷，512、25、135、8页；1937年版，4卷，315、83页；1950年版，5卷，365、49、8页。尽管这部名人录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人物生平事迹是由有关人自己撰写的，《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部既没有对它作任何修改，也没有进行任何补充），它仍不失为民国时期的一部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资料集。

吴相湘：《中国现代人物》，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出版社，1965年版。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四卷。

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南京，辞典馆，1937年版，两卷。

张大军：《中共名人词典》，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年版，224页。

《中国历代名人词典》，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北，中华书局，1979年版，四卷，2,344页。

① 曹聚仁：《现代作家传略》，香港，一心出版社（？），190页。

陈澄之：《中国著作家词典续编》，纽约，东方社会出版社，1976年版，2卷。

《上海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版，100页。乔治·纽尔尼斯：《上海及华北要人录》，上海，东方出版社，1935年版，516页。

Pan Fu shuo等：《上海时人志》，上海，1948年版，291页。

《上海时人志》，上海，展望出版社，1947年，11、251页。

《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上海，上海史商会，（出版日期不详），27、116、289页。

王晓波：《现代中国思想家》，台北，聚仁出版社，1973年版，8卷。

《留美同学录》，北京，清华大学，1917年版。

徐益：《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202页。

袁清平：《当代党国名人传》，广州，古今图书公司，1936年版，548页。

学家还开列了部分参考书书目，可是，他们的选择也不能说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迄今为止，介绍1919年以前的各界名人的书籍，只有美国出版的两部辞典。^①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工作者正在编撰各类人物专集。我们从入选的人物数量也可以看出各专集的质量。^②日本经常编写和出版主要介绍当代负责人和领导人生平事迹的辞典，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有关革命前一段时间的可靠资料。^③

我们把传记看作是第二个资料来源。各种传记虽然很多，但是，其中大部分是介绍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和文化界名人的，^④经济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5卷。

《中国近代学人像传初辑》，台北，大陆杂志社，1971年版。

《中国现代作家传略》，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624页（第2卷即将出版）。

《中国艺术家辞典》，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50页。

周开庆：《民国四川人物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275页。

周开庆：《民国四川人物续传》，台北，四川文献杂志社，1976年版，334页。

《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目录》，北京，1920年版，288页。

① 有关清末人物传记，可参考恒慕义（A. W. Hummel）的《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1913年版，2卷）。这部书虽说收入的人物不够全面，但却是唯一的一部。有关民国时期的名人传记，可参考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所著《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1971年版，4卷）。除此之外，还可以参考人民中国名人传记，因为其中有些人在民国时期就很活跃，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在新制度下从事以前的职业。因为我们不能把有关书籍做一一介绍，所以，只能推荐安妮·B·克拉克和唐纳德·W·克莱恩合编的经典著作《中共人名词典》（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2卷），以及台湾新近出版的《中国人名录》（台湾，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84年版）。

② 《民国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4年版，3卷；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版，10卷。

③ 我们认为，对于研究民国人物来说，最有参考价值的书还是《当代中国人名词典》（东京，1966年版，1,209页）。这部词典出版后，日本又出版了续编，但与民国时期名人有关的资料很少。除此之外，日本出版的有关书籍还有《中国人名录》（东京，龙溪，1973年版，5卷）。

④ 民国时期及以后，中国和外国还出版了大量人物传记，其中包括自传。我们虽然不能在这里列出齐全的书目，但可以推荐几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自传部分有：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两卷，756、628页）；高达乐（Claude Gallet）和程映湘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腾飞——彭述之回忆录》（巴黎，1983年版，490页）；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北京，1983年

界名人几乎被遗弃了。传记中资料最为丰富的，应该说是自传，尽管作者往往有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思想。第三个资料来源便是新闻报道。^①1949年以前的新闻报道之所以珍贵，是因为那一时期发布任命时，报刊总要介绍被任命者的简历。1949年以后的新闻报道也不无可取之处，因为中国出现过各种政治运动，报刊上经常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1951—1952年间），以及为蒙冤受屈者平反昭雪的文章（70年代末）。这些文章虽然很少介绍个人的生平事迹，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近些年还有各种专刊、专集问世，专门发表回忆录及为纪念某人诞辰或某一历史事件而撰写的传记和文章。^②

最后一个资料来源就是对健在人物的访问记录。通过采访，我们可以搜集到一部分有关被采访者及与其来往过的同时代人的材料。至于搜集上个世纪历史人物的材料，有时只好参考其后代保存下来的手稿。这类资料很珍贵，同时也很难得到。^③

版，599页），萧公权的《问学录》（台北，1982年版，229页）；徐铸成的《报海旧闻》（上海，1981年版，318页）；蔡元培的《蔡元培自述》（台北，1967年版，138页）及胡适的《四十自述》（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132页）。中文书籍中部分介绍这一时期名人的有：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台北，自鸣出版社，1960年版，128页）；张君勱的《杜月笙传》（台北，1967—1969年版，4卷）；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北京，1980年版，374页）；孟祥才的《梁启超传》（北京，1980年版，423页）及毛注青的《黄兴年谱》（湖南，1980年版，302页）。其他传记著作正在撰写和出版中。

① 民国时期上海的重要报刊有：《申报》、《新闻报》和《上海文化》。这些都是撰写知识界名人传记所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撰写1949年以后的知识界名人传记，最好的参考资料便是《光明日报》。

② 有关方面的两大刊物是：大陆出版的《人物》；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两者均属月刊。

③ 面对这些困难，史学家不会束手无策，他们手中还有几张王牌。关于撰写中国口述史，曾经有两大方案：一个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于1958年提出并执行的；另一个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于1959年提出并于1975年进行的口头访问。史学家们通过访问，或者是从被访问者的回忆中，或者是从私人日记以及各种文字材料中，都取得了很大收获。那些接受采访的人，大部分是在1880—1890年间出生的，现在他们均已去世。通过这种途径搜集起来的资料，均已逐步公开发表。韦慕庭（Martin Wilbur）曾在中央研究院组织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史学口述史价值论》（载《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1，073—

一些次要人物的材料，要么很少，要么根本没有。一些国内知名人物的材料，不是零零散散，就是人们已反复使用的各种材料，一般说没有多大价值。1949年以前中国出版的人名辞典，主要介绍个人的社会生活，如学历、职业、官职和勋位等，很少介绍个人的私生活。有的人名辞典居然不介绍出生日期，即便是介绍，也很不准确，当你核实其生年时，竟会发现不同资料对同一人物的生年的介绍竟相差一、二十年！

中国的传统思想把历史演变作为一个循环概念来解释，并且很少注意有关个人履历的详细资料。近年中国出版的传记不存在这类缺点。但是，即使在今天，要想了解一些名人的社会出身，仍然是困难重重。即便得到一点材料，也不能说是十分可靠的。究其原因，就是写自传也好，为别人立传也好，作者总想以出身“好”（如国民党统治时期以“文人”出身、现行制度下则以工人或农民出身为出身“好”的标准）为基础。

在排除干扰和克服障碍方面，还会遇到一些令人头疼的难题。以名字为例：一个中国人在他一生中会使用许多名字，如名、字、号、谥……更不用说中国文人喜欢使用的大量笔名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便是其中一例，他的笔名不下15个。^①

搜集资料工作的条件和要求很严格，它可以决定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范围。在有限的条件范围内，确实

1,102页，台北，1981年版）的论文。与此同时，大陆也以不同方式作出相应的努力。如1950—1960年间，向在历次革命运动中起过作用的人系统地征集材料，并出版了几卷回忆录，如《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省政协编，武汉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两卷，第6、218、226页）。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项工作被迫中断，近几年才重新开始。人们感兴趣的已不仅是历次革命中的人物，采访对象已有步骤地扩大到了党外人士，如旧中国的银行家、警察、教授、买办及企业家。采访调查后整理的材料（并非完全属实），均在内容丰富、有趣的《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主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① 伊夫·纳莱：《陈独秀（1879—1915）——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文化教育》，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论文，1984年，第378—379页。有关笔名问题，请参考朱宝梁所著《20世纪的中国作家及其笔名》，华盛顿，国会图书馆，1977年版，366页。

很难得到齐全的资料。此外，在撰写集体传记时，需要严格的参数以限制一切个人好恶。我们正是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才试验性地把搜集到的一部分数据输入微电脑，用因式分解法进行处理。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工作往往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这些国家落后，不仅是历史发展落后，而且历史文献也很少。本文所介绍的有关方法论的尝试，不应从生平学研究这门学科的角度来看待，也不应将它的一些成果同西方在这方面的史学研究方法所取得的进步相比较。通过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缓慢发展，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项工作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介绍我们的初步工作计划的。

上海大纺织企业家

1921年4月，《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纱厂之调查》的报告。^①这个调查是前一年进行的，反映的是1920年9月，即纱业全面扩大时期中国纱厂的情况。

当时，中国仅上海一处就有纱厂19家。这篇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这19家（只有一家纱厂例外）纱厂的资金数额、设备情况及东主、厂长和营业主任的姓名。而得到查证的有18家。鉴于个别纱厂主在上海同时拥有许多家纱厂，故我们研究的人物总共只有14名，其中最大的老板要算聂云台（1880—1953）（他开办的纱厂有恒丰纺织新局和大中华纺织公司）、荣宗敬（1873—1938）

（申新纺织厂东主）、穆藕初（1876—1943）（德大纱厂和厚生纺织公司）、刘伯森（？—？），他开设了宝成纱厂）、朱志尧（1863—1955）

（同昌纱厂东主）、盛恩颐（1892—？）（经营三新纺织公司，该纺织公司实际是其父亲的产业）。^②因为棉纺织业投资的最低限额较高

① 《中国纱厂之调查》，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1号（1921年4月），《实业调查》部分，第1—9页。

② 其他纱厂东主还有：薛文泰（振华纺织公司）、郑培之（鸿裕纱厂）、徐静午（溥益纺织公司）、陈玉亭（纬通纺织公司）、许松春（永豫纱厂）、吴麟书（统益纱厂）及王启宇（振泰纺织公司）。

(平均1至300万元),^①所以,纺织业的名人在上海大企业家和绅士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既然纱厂设在上海,纱厂主理所当然是上海人了。与近代某些地方经济部门相比较,所不同的是:纺织业大体上为上海当地甚至上海附近地区的业主所垄断,而其他经济部门则由来自各省的商人控制。在我们这14个研究对象中,目前只有12人的材料较为完备。据有关材料证实,其中8人原籍上海或邻近上海的江苏省。当然,部分被当作上海人的纱厂主,他们的家往往是不久前才从外地迁入上海的,例如:朱志尧,他的家是19世纪由浙江省迁到上海的;聂云台,祖籍湖南省,20世纪初才定居上海。这些非上海出生长大的上海人,尽管同原籍、故乡还保持着宗教、经济,甚至政治上的联系,但他们仍被视为忠于其生活和活动的团体的领导,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4个非上海籍的纱厂主中,有两人来自浙江,另外两人则是从华南地区的江西和广东两省来上海开办企业的。^②

上海纱厂主原籍的地理分布并不十分典型,它不足以反映上海人在这里受到浙江金融集团和广东大批批发商的控制情况,以及他们在各地方企业集团中地位的高低和财产的多少。在上海,江苏籍的企业家居多(因为是当地招募的),但他们往往是一些小本经营的商人。当然,纱厂主并不包括在内。通过上述简单探索得出的结果可以证实,那种认为上海(就地理方面而言)大资本家具有振兴实业的特殊才能的普遍提法(至今香港和国外华侨团体仍持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相比之下,要想知道这些企业主的年龄,确实很困难。从我们掌握的8个人的材料来源看,当时他们的年龄都在37—47岁之间,其中只有两个企业主的年龄比较特殊,一个28岁,另一个57

① 这里的元,系指中国一种货币。1920年每元约合12个法国法郎。

② 理查德·布什:《国民党的棉纺织业政策(1927—1937年)》,纽约,1982版,第28—30页。

岁。他们就是盛恩颐（他刚刚接管其父的产业）、朱志尧（他开办的纱厂只能说是老企业的扩大，实际上应属机械工业范畴）。

从37岁到47岁这个平均年龄来看，这些纱厂主的年龄还是与他们的活动能力和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的。同传统的中国经济界名人（批发商、银行家和买办）相比，他们还很年轻。他们的经历实际上是开拓者的经历，因为从事这种职业既需要有革新的兴趣，又需要具备创造能力，而这两者通常又是与职业生活的最初阶段相互关联的。

这第一代工业巨头在成长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辈的熏陶。经过查证核实，13人当中，有8人出生于商人家庭。穆藕初和穆抒斋的父亲是大批发商，早在本世纪初就在上海从事棉花贸易。吴麟书自1915年开始创办工厂，其发迹史便是从在市场上推销工业用棉线开始的。王启宇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过近代教育，亦与棉花贸易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于1919年同别人合股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机器印染厂。^①

官吏家庭出身的纱厂主在我们研究的这一部分人中只占1/4（13人中占3人）。他们是：聂云台，他的外祖父是清末湘军首领曾国藩（19世纪下半叶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他的父亲是历任上海道台、江南制造局总办和巡抚的聂缉槩；盛恩颐，他的父亲便是清末官吏盛宣怀。从某种意义上讲，聂云台和盛恩颐都继承了父辈官办企业的传统。不过，因为这些名门后代的所做所为与其前辈完全不同，所以，与其说他们接近官商，不如说他们更接近普通商人。他们只从事经济活动，并不担任重要官职；尽管他们的活动很多，但几乎仅限于近代经济领域。这些官宦子

^① 这里提到的社会地位，是指父辈或祖父辈的社会地位。吴麟书（虽然他从前也曾从事过经商活动，但对于他的出身，我们却一无所知）、荣宗敬及朱志尧（鉴于他们是在其他工业基础上兴办纺织业的，应视为“近代工业家”），不在此列。为广泛搜集人物传记方面的材料，我们不但翻阅了前言中提到的人物传略，而且还参考了下列书籍：《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1958年版）；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上海，1926年版）；《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1896—1937）》（上海，1962年版）及《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1966年版）。

弟选择的是经商道路，而且，自从走上这条道路，他们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开放口岸的社会生活中去了。

这些上海纺织企业家中，还有两人：面粉大王荣宗敬和机器制造者朱志尧，是来自其他近代工业部门的业主。荣宗敬在扩大纱厂投资的同时，仍然不放松对增加他于世界大战前分别在无锡、上海两地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厂的巨额利润的追求。荣宗敬及其胞弟荣德生对经营纱业有一定经验，因为他们在1905—1907年间曾经同无锡的一个买办在无锡创办过振新纺织厂，荣德生还出任过几年振新纺织厂营业主任。1915年，荣家兄弟因与其他股东发生矛盾，遂退出振新纺织厂，并在上海自办纱厂——申新纺织厂。数年之后，申新纺织厂竟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大纺织厂之一。1920年，申新纺织厂投入资本达400万元，约占上海中国纱厂资本总额的1/6；纱锭8万枚，相当于上海中国纱厂生产能力的13%。申新纺织厂发展速度很快，1922年又增设了至少两个分厂，纱锭增至13万枚。纱厂在荣家企业王国里所起的作用，可以说与面粉厂不相上下。

朱志尧的目标则与众不同，他开办同昌纱厂的最初目的是想为其求新机器制造厂的产品打开一条稳定的销路。1918年，求新机器制造厂倒闭，朱志尧创办的其他工厂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

上海纱厂主的社会出身虽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为重要的一面，还应该说是他们对西方经济体系都有着一定（直接或间接）的认识。因为个人的家境、年龄不同，所以，每个人接受启蒙教育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新一代纺织企业家中的头号人物聂云台，他的各方面知识都是从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实践中学到的。聂云台同其他官宦子弟一样，童年时代延师就读。由于他的父亲对开放口岸情况十分了解，在聂云台年幼时，就请人教他学习英语。聂云台的科学知识（如机械、电气），全是自学得来的。聂云台就是在

受父亲委托于1904年经营华新纺织新局——一家规模较小的纱厂时，开始逐步掌握纺织工业方面的知识的。

数年之后，中国出现了留洋热，不少青年纷纷到国外学习深造。当时在外国留学，各方面开销相当大。不过，这对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来说，算不了什么。年轻的盛恩颐在结束了北京高等事业学堂（直译。——译者）的学习之后，又漂洋过海，到伦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穆藕初则与盛恩颐等人不同，他的外国技术知识是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大气力，并且是在成年以后才学到的。穆藕初15岁时就开始在一家棉花行里当学徒，直至1898年，也就是他22岁时，才进学校读书。他起初学了一个时期的英语，后来经过考核进入海关，充当办事员。他就是在海关工作时开始习惯西方企业管理的。33岁时辞去海关职务，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伊利诺斯和得克萨斯学院学习棉花种植和加工技术。穆藕初的情况相当特殊。黄金时代的大部分纺织企业家认为，即使是在中国，能受到一种“西方式”的教育（如振泰纺织公司创始人王启宇，他曾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过西洋教育）固然很好，不过，能从各种活动中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如以吴麟书和荣氏兄弟为代表的大部分商人阶层出身的企业家）也不错。

上海市政府官员

1927年到1937年间，上海隶属中国行政管辖的区域的政治生活一直是在两个不同集团的统治之下：一是市政府官僚；二是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我们掌握的有关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材料相当有限，但仅就这些现有材料，我们仍然能清楚地阐述对上海市政府名人的议论。在我们研究的这部分人当中，有40名市政府官员，10余名国民党地方势力的代表。我们选择的人数虽然不多，但通过采取生平学研究的办法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在了解上海市政府

所起的作用的同时，加深对一些重点问题的认识。

省籍是变数之一，它有助于说明各个不同时期市政府领导成员之间及国民党积极分子之间存在的十分明显的亲合关系。先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4位名人，他们每个人手下都有一班来历特殊的合作者。首任市长黄郛（1880—1936），原籍浙江省，他的部下中有6人和他一样，也是浙江人，其他5人是江苏人。首先应该说明的是，上海位于江苏省境内，同时也是浙江人传统迁移、定居的地方。因此，黄郛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手下人马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而且，就地方社会组织而言，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日战争爆发前上海市第4位（也是最后一位）市长吴铁城（1888—1953）任职期间，上海市政府领导成员的组成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市政府领导成员中，有7人同市长一样，原籍广东省；两人出生安徽省（虽然不是吴铁城的出生地，但他是在那里长大的），另外还有两名浙江人，他们是上届市政府的领导成员。至于国民党领导人物，他们当中一半是浙江人，一半是江苏人。据统计，四届市政府领导成员中，浙江人占32%，广东人占24%，江苏人占21%，剩下的则属其他省份。

市政府官员普遍年轻，并且年龄都很接近。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为40岁，国民党积极分子的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据统计，1927年，年龄在32—42岁之间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占经过查证的这部分人的58%；年龄在26—31岁之间的占1/5，也就是说，1927年年齡已到或刚到40岁的人占总数的80%。国民党地方负责人在年龄上比较接近，因为他们全是在1898—1900年间出生的，并且是同一年毕业的学生。

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不少问题。首先，上海的地理位置并不是以解释为什么市政府名人中原籍沿海省分的占据明显优势，因为江苏省所辖各地区出生的人仅居第三位。原籍内地省份（广西、四川）的市长也没能在地方上组织起一个如此清一色的

集团。其次，我们还应该强调一下市长的籍贯与其部下的籍贯之间的非常明显的关系。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数据，但它是一个重要，同时也是最常见的线索。是否同乡并不取决于是否同气，或者同样留恋故土，而是取决于是否存在能使相互接近的因素，如方言、风俗和饮食习惯。

市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仅仅依靠地区性的相互联系来维持。在同一所学校读过书，特别是同期毕业，这些都可以成为后来建立工作关系的基础，甚至可以成为政治划分的依据。国民党积极分子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如同笑话，然而却十分突出的先例：所有这些人都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当中有5人曾经在同一所大学——上海法政大学学习，很可能是同一年毕业的同學。有关市政府负责人的情况，我们从所掌握的更为全面的材料中，可以得到不少数据。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中国或外国受过高等文化教育）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这与当时中国行政和政治部门中某些高级人员不得不在明显无法胜任的工作中学点知识不同。^①他们大部分曾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学里深造1至10年。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无法明确肯定他们所学的专业和水平。此外，我们通过这些数据还可看出，普通教育（科学、文化）和军事教育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界线，这不仅反映在接受教育的地理分布上（如：学习文化科学，往往在欧洲或美国；学习军事，一般在日本），而且反映在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分工上（学文化和科学的人主要在科技部门任职；学军事的人大都担任政治职务）。

由于毕业于西方国家某一所大学与名望有关，因而又出现了“留美”派、“留欧”派，甚至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有一个“留美”派。那些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之间的联系则贯穿着

^① T'ien Hung mao: 《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斯坦福，斯坦福大学1972年版，第128、139—143页。

一种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通过两个阶段培养起来的：他们先是在中国的保定和黄埔两所名牌军校学习，毕业后，再到日本军校，特别是日本士官学校深造。不过，黄郛、张定璠（1891—？）、张群（1889—？）前三位市长及第四位市长以下的负责人，都是在相同几所军事学校毕业的。

市长聘任合作者时，也是从那些曾经与其共事的人中挑选。通过研究市长及其部下的经历，我们看到他们走过的路——无论是在军队里，还是在政府部门里，都是十分相似的（经查证，34人中有25人属于这类情况。）。从这个事实来看，他们有相互接触和建立关系网的可能。仅市政府内部就可以找出8例。除了这类关系，还有同乡、校友或其他关系。因此，市长聘请一个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然而，从前半个世纪出现的动荡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决定前途和促成各种同谋关系的不是职业经历，而是政治经历。市政府的40名负责人中，有13人曾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市长中有两位曾在上海，特别是在后来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蒋介石（1887—1975）身边起过重要作用，另外两位则在华南各省进行过活动。他们（一人例外）几乎都参加了1926—1927年国民党领导下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政治分歧和分裂（有的继续在中国南部从事革命活动；有的到北京政府供职；有的甚至干脆放弃公务，从事个人活动），可是，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联系依然存在，并为后来组建市政府各级组织创造了条件。

同样，上海的国民党积极分子中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不同的是，他们比较年轻，只参加过最后一次伟大的政治尝试——1926—1927年北伐。但是，通过这次尝试，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深厚友情。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他们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又加入了国民党内最激进的派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发起并组织的、反对在一切问题上同地方名人妥协的C.C.

系。从那些积极分子在国民党地方机构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C·C·系虽然是个亲蒋派系，但在控制上海这个问题上，与以市政府负责人为代表的更加温和和守旧的一派展开竞争时，还是寸步不让的。

通过对一个一开始就是由各类不同人组成的动摇的机构（这里指市政府先后由4人充当市长，而不像法官或高级公职那样相对稳定）的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出身各不相同，但市政府首脑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如籍贯、文化修养、职业和政治经历，特别是用人标准相仿。

我们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市长与其部下之间，各届市长之间，还是市长与最高领导人之间，都存在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它不但有着广泛的基础（最常见的是地区性联系），而且还得到了许多相互促进的关系的补充。除少数人需经1/3的人推荐，或经上级任命方能在市政府供职外，一般情况下，如果与市长没有私交，那是不可能被市长聘用的。总而言之，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指出的那样，因为原始资料存在质量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无法深入了解这一部分人的私生活，从而也不可能对市政府名人的社会出身及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姻娅关系作更多的描述。^①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研究知识分子方面，我们选择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员

① 如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与长期担任上海市政府工务局局长的沈怡（1901—1980）之间的姻亲关系是：黄郛的妻子是沈怡的一奶同胞。沈怡之所以能得到这么一个职位，并且任职时间又那么长（直至黄郛于1936年去世），毫无疑问，都是与上海市头号人物黄郛的关怀照顾有关。此外，公共安全局局长（广东人）温应星（1887—？）似乎曾将自己的一些亲属安插在该局。自从温某接受使命以来，在该局供职的人中就有10人与他同姓，其中6人又与他同属广东籍（其余4人的籍贯不详）。这实为一种令人困惑的巧合。当然，我们不能仅凭这两个例子断定当时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

为研究对象。^①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院长、总干事及各研究所所长，都是当然的评议会会员，无须提交评议会审议。此外，国立大学教授、研究所研究员或科研机关主任、科技发明者或优秀作家，都有资格被任命为评议会会员。^②自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1886—1950）提出建议后，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员才改称院士。^③

我们挑选出来作为研究对象的这部分人，通常都另有职务，如大学教授、作家或国家政府官员。大部分人都曾在著名学校或高等学府读过书，并且具有在外国长期生活的经历。通过对这部分人的分析，我们一方面可以研究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反应，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他们在民众和中央政权之间不断发挥的媒介作用——一种既符合儒家教育思想，又符合中国历史传统的作用。

这个研究专题的时间范围是从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开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止；研究对象是属于社会科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④并在其中供职至少两年的74名评议会会员。当然，其中也包括那些在这个时期内属于中央研究院，但在1937年以后被任命为研究院院士的人。

被我们列为研究对象的这74名院士，79%是在1886—1905年间出生的。1928年，他们的年龄在27至42岁之间，其中年龄超过47岁的占16%，年龄不满22岁的占4%，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7岁。

① 1935年，研究院院长蔡元培（1868—1940）及新任总干事丁文江（1887—1936）在确定研究计划和与其他研究机关建立联系的同时，使评议会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实，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早在1928年就已组成，并有67人被聘为评议会会员，只是到了1935年，评议会才成为一个正式机构。见《中央研究院第一年度总报告（1928—1929年）》，上海、北京、南京，1929年；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17日）。

② 绍良：《五十年来的中央研究院》，载《大陆杂志》，台北，第57卷第2期，第34页。

③ 朱国骅：《三十年来的中央研究院》，载《大陆杂志》（1959年10月），第19卷第8期，第22页。本文对院士和评议会会员不作区分，一律称院士。

④ 一些曾对组建这些机构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虽然不隶属这三大研究所，但亦被选作研究对象。

相比之下，这个年龄明显地低于传统的学术机构和司法机构成员的平均年龄。^①

从籍贯方面看，被聘为院士的人大都来自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等沿海省份，占总数58%，其中浙江人22%，江苏人18%。自南宋（1127—1279）时起，江、浙两省就出了许多大学士，直至民国年间，这两个省在出文人方面仍保持着这种传统的优势；^②自清朝（1644—1911）末年起，福建、广东两省的文人也逐渐多了起来；^③福建、广东两省的院士所占比例分别为8%和10%。剩下的人则是其他省分的，不过，任何一省的院士都没有超出5%。

早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沿海各省的优势及沿海各省出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显示出来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6名领导人中，^④就有3人是浙江籍和江苏籍。籍贯似乎也成了聘任院士的一个重要条件。1930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法制组主任王云五（1887—1979）曾说过：浙江和江苏人要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学问。^⑤

我们掌握的资料中，有关院士之间亲属关系的材料不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举出几个能够说明这类关系的重要性的具体实例：学者俞大维（1899—？）的妹夫便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他的表兄弟是历史组主任陈寅恪（1890—1969）。这

① 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的16名大学士中，其出生年月清楚的7名大学士均是在1785—1823年间出生的；1868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0岁。此外，1862—1865年间出任巡抚的31人中，出生年月较为清楚的15人都是在1804—1830年间出生的，1863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7岁。见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上海，1959年版，第18—24、188—190页。

② 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载《社会科学》，第1卷第1期（1935年），第34—35页；潘光旦：《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载《人文》，第3卷第1期（1930年12月），第20—22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风之地理分布》，载《清华大学报》，第1期，第34—35页。

④ 中央研究院6名筹备委员会领导人是：蔡元培（1868—1940，浙江人）、褚民谊（1884—1946，浙江人）、朱家骅（1893—1963，浙江人）、李石曾（1881—1873，河北人）、吴稚晖（1864—1953，江苏人）及杨铨（1893—1933，江苏人）。

⑤ 王云五：《谈往事》，台北，1970年版，第178页。

三位学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早在1920年前后留学柏林及后来被聘为中心大学教授期间就已建立和巩固起来了。因此，所长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各级代表都有着远近不同的亲属关系。又如：梁启超（1872—1929）的长子，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1966）也被聘请到他弟弟梁思永（1904—1954）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院士是否受过学院式教育，几乎成了这一部分人聚合的标准。被研究的对象中，所受教育的类型大致相同。就我们掌握的33位院士的详细材料来看，其中31人是在读私塾时开始接受传统教育的。大部分人（37人中有29人）在读完私塾之后，又进入近代公立中学读书。这是因为公立学校自19世纪起，越来越受到重视。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洋文凭便成了谋求高贵职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留学外国高等学府不仅是进入官方机构几乎不可缺少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且也是老同学在归国后相互建立各种牢固的特殊关系的基础。每个国家，每所大学，都使在它那里留过学的中国学生保留着它自己的精神及一种特殊的推理方法。^①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曾到外国留学的院士的文化水平普遍比只在中国受教育的要高。23位只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院士中，22人获学士学位，1人获硕士学位。他们当中，14人进过北京大学，两人在（北京）清华大学读过书，一人上过（上海）震旦大学，一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此外，北洋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和东南大学，各培养出一名院士。我们选择的这一部分院士，其中半数以上毕业于北京大学。可见这所高等学府在全国文化教育方面还是起了显著作用的。

54位曾经在国外深造过的院士中，31人取得了博士学位，7人取得了硕士学位，8人取得了学士学位。^②在外国高等学府毕业

^①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中央研究院年鉴》，台北，1956年第8期，第32页。

^② 54名院士中，8人只读了一到两年大学，有的是旁听生，最后终因失学而未取得毕业文凭。

的学生，半数以上（29人）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中12人就读于哈佛大学（1920—1923年间获博士学位的9人）；17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7—1919年取得硕士学位的9人）。留学其他国家的人数比例相当小，只有7人在日本读书，6人留学法国，5人在英国深造。从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留美（特别是在上述两所大学读书的）学生占据优势这一点，我们联想到老同学在国外逗留期间结下的友谊所起的作用，以及老同学之间的特殊关系。

通过职业分析，我们又发现74位院士中49人曾在著名大学任教：18人在北京大学，12人在中山大学，11人在清华大学，8人在南京中央大学。^①因职业联系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个研究所占据优势的是中山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实际上也是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傅斯年将文学院的历史系改为历史语言系；1928年，他又在这个基础上在广州筹建了隶属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年底，这个研究所迁至北京，后又转迁南京。因此，12名原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院士中，9人被聘请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大学同中央研究院之间的关系在院士聘任上，反映比较普遍。在1936年召开的一次中央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总干事朱家骅指出：……研究人员如不在大学教书，则不易明了大学情形，尤其不易物色后进……^②

参加政治活动或参与行政事务这类共同经历，不但密切了中央研究院一些院士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证明了这个优秀知识分子队伍是面向社会的。我们研究的这一部分人中，5人年纪最大，他们都是在1864—1884年间出生，并且在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初期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他们曾加入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支持者，并在1927年国民党清除共产党人运动中表现活跃。

^① 1928—1937年间，这些院士中有8人同时在两所大学授课。

^② 朱家骅：《三十年来的中央研究院》，第20页。

这些院士有的在国民政府内长期担任重要职务。30年代,他们曾做过监察院监察员,^①因而也成了国民党“大臣”。这些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在中央研究院掌握着制定计划和组织纲领的权力。

1928—1937年间,74位院士中,14人在中央研究院担负行政或次要职务,但在国家政府里却身负要职:10人在立法院任职;^②10人担任部长、政府委员或行政部门负责人。他们普遍兼任行政和管理职务。这些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院士,在中央研究院和政府之间起到了联络作用。

其他13位研究员除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活动,还在政府部门兼职,最常见的是在教育部负责研究院的管理工作。他们大都是著名学者,如蔡元培、傅斯年、胡适(1891—1962)、李济(1893—1979)。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任务与发表大学的研究成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有监督、改革政府^③和引导民众的责任。

随着院士越来越多地参加其他学会和各种组织的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日益密切和巩固。

20世纪30年代,诸如蔡元培、胡适、李石曾、任叔永(1886—1961)、翁文灏(1889—1972)及赵元任(1892—1982)等院士,都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董事。这个基金会是1925年用庚子赔款创立的,目的是促进科技和文化的研究。这些院士——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董事还利用他们在这个基金会内部的职权,维护他们在中央研究院的切身利益。1932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现资金短缺的困难时,同在两个机构任职的院士(如胡适、赵元任)为了解决他们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事李济的薪水来源,^④曾

① 监察院是传统的行政部门的最高监察机关。1930年,中央研究院有29—49位院士充任过监察员。见伍德海(H·G·W·Woodhead):《中华年鉴》1934年,华北每日新闻及赫雷特(Herald)有限公司出版,第61页。

②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

③ 《我们的政治主张》,载《努力周刊》第2期(1922年)。

④ 杨步伟:《元任和中央研究院》,载《传记文学》(1966年7月)第9卷,第1期,第61页。

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商谈。中央研究院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34年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在中央研究院的统一领导下，继续进行共同的研究事业。^①

一些对改革中国语言文字感兴趣的院士还分别组织了各种语音研究会，其中有顾颉刚（1893—1981）、胡适、刘半农（1889—1934）、吴稚晖和赵元任倡导创办的国语统一委员会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语音组几位研究员创立的数人会。这些小团体虽然人数不多、力量薄弱，但它们定期召集会议，这不但增进了各组织成员之间在学术上的联系，而且也密切了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

另外一种能增进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间关系的活动，就是创办一般性刊物，如丁文江、傅斯年、胡适、任叔永及陶孟和（1887—1960）等几位院士於1931年创办的《独立评论》。这个刊物是他们以个人名义集资创办的，带有自由主义政治倾向。鉴于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有50%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自己撰写的，因此不难看出它反映的实际上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对政府的看法。^②

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的各种连带关系最后发展成为密切的、和谐的、带有传统性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乡关系、亲属关系、同等学历及上下级关系和相同的政治选择，这一切又使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信赖的气氛，这些新知识分子不但受到了扎实的、牢固的近代教育，而且也具有在外国生活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把能反映传统社会准则的一些态度和习惯也带入了处在变革高潮中的社会。

新闻工作者

我们从1945—1949年间为属于无党派刊物的两种上海杂志撰

① 《中华年鉴》，第2卷，第1,762页（南京，1948年）。

② 胡适：《编辑后记》，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17日）。

稿的293人当中，选出75人作为研究对象。所谓无党派，就是指在国共斗争问题上，对任何一方都不表示拥护或反对。尽管这些刊物自我标榜中立(情况往往属实)，但是，有时还是倾向于反对国民党，且办刊时间也不太长。这类杂志究竟有多少种，确实难于调查清楚，估计50种左右。为这类杂志撰稿的人(他们往往不仅为一种杂志撰稿)也不过几百。

这两种在初期和试验性阶段被保留下来的杂志是《周报》和《观察》，但到后来，都被政府先后下令停刊。1945年9月8日创刊的《周报》，为了不致被立即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公开宣称无党无派，但实际上还暗中同情和亲共产党，因为给《周报》撰稿的人自1930年起就在左派组织中积极活动。由于当时国内政治气氛异常紧张，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日趋恶化，内战不断发生，《周报》终于在1946年8月28日被禁止刊行。

与此相反，1946年9月1日创刊的《观察》杂志却能在内战时期继续刊行。为《观察》撰稿的人大都是教育界人士，他们是以一种带有浓厚欧美文化色彩的自由主义来反对国民党的。国民党跨台前不久，即1948年12月，《观察》宣布停刊。它的停刊，标志着那些以笔杆子支持政府和与政府共存亡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转变。由此可见，这两种刊物正好反映了我们探讨的这个舆论阵地的两个极端。

在这75位人物的生平学研究中，我们将他们的地理出身和社会出身，他们所受的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他们的职业和他们在1921—1927、1927—1937、1937—1945和1945—1949年这几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选择，归纳为23个变数。这些变数的类型总共有216种。

我们在研究传记数据时，选择的是因式分解，^①我们采用这种方法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想绘制典型的兰图，而是想让人们看看那

^① 我们在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时，使用的是法国贝藏松M·I·S·-F·L·S·H. 试验室让-雅克·吉拉尔多编制的“数据会话分析”软件程序，并且参考了菲力普·西

些在描述、研究中还不能立刻显示出来的对数之间的关联。因此，虽然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有些人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我们仍决定不把他們排除在外。可是，由于某种吸力关系，这些非典型人物在保持原貌的同时，在细节方面使我们的图形有点走样了。即使是通过这些图形我们还不能明确指出变数之间的确切距离，但总还可以从中得到有关变数集中的可贵的基本指数。因此，就是在这个尝试阶段，传记数据因数分解也可以使一种我们对其怀疑的事实显象。这两种杂志在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社会出身（但不包括地理出身），特别是所受教育和职业及政治选择方面存在的差别有相联的关系。

我们是根据农村或城市出身、家境（三种类型）和父辈的职业（六种类型）这3个变数，计11种类型，来探讨出身问题的（见图表1）。如果以两个轴的同—端的因数为限，我们从图形上便可看出：富裕家庭和较低一等的城市家庭出身的作家与《周报》撰稿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出身富裕家庭的人，几乎都是《观察》的撰稿者。可是，其他变数之间的差距就不那么明显了。由此可见，无论是《周报》还是《观察》，都是同时处于“父辈是文人”、“贫困家庭”、“农村家庭”及“父辈是农民”这些变数的吸力和排斥力之间的，尽管《周报》比《观察》更接近这些变数（对比度是由量形成的角决定的）。此外，正如图形上所显示的那样，既然这些文人中40%的人曾做过私塾先生，诸如“父辈是文人”和“农村家庭”（或贫苦家庭），那么这些变数也就不是互不相容的了。

鉴于为《观察》撰稿的人有51%，而为《周报》撰稿的人有50%是市区出身，我们可以认定“城市家庭”这个变数更接近

布瓦有关方法论的解释（见《社会学数据分析》，巴黎，1984年版，218页）。此外，我们还得到了L·I·S·H的M·齐思贝尔的大力帮助。当然，舛误之处，概由我们负责。

《观察》。这种失真现象很可能是由于我们没有消掉一种非典型变数（父辈是商人）造成的，因为这个变数在我们可研究的人物中所占比例甚小，看来它把“城市家庭”出身的其他人也吸过去了。因此，我们必须（如后面的图形）做概略的观察，方法是使这些变数的范围扩大，以确定这两部分人之间的交点和疏远的限度。这两个并非完全互不相容的整体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显示出来的，即一方面，在《观察》这个整体——撰稿人中，出身富裕家庭和商人家庭的人居多，但也有如另一个整体那样，出身“文人家庭”、“城市家庭”和“官吏家庭”的人；^①另一方面，在《周报》这个整体中，大部分人出身农民家庭（其比例同商人家庭一样小）和一般中等家庭，而且，就社会出身而言，这部分人的社会出身范围要比《观察》撰稿人更广。

一开始，《观察》就是一种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刊物，而《周报》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或者说是纯上海地区的刊物，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在所研究的人物的地理出身（见图表2）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两部分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可从籍贯（江苏、浙江两省）方面看出，因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江苏和浙江人。可以说，浙江是《周报》撰稿人的原籍，江苏是《观察》撰稿人的故乡，因为34%的《周报》撰稿人和13%的《观察》撰稿人来自浙江；相反，28%的《周报》撰稿人和31%的《观察》撰稿人来自江苏。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相对的，因为这是图形给予差别（即与独立性的差距）的特殊待遇。其实，这两部分人的籍贯是比较集中的：68%的《周报》撰稿人和57%的《观察》撰稿人都是在4个沿海省分（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出生的。

至于这两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更确切地说，就是他们在中国和

① “父辈文人”和“父辈官吏”的变数是相互吻合的。所谓差别系指考中秀才和落榜文人之间的差别。

外国接受的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真正差距,我们一眼便可看出(见图表3、4)。^①这两张图表所反映的是:22%的《周报》撰稿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其原因往往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观察》撰稿人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总数的2%。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57%的《观察》撰稿人和22%的《周报》撰稿人都曾在北京的三所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读过书。

《观察》撰稿人中,绝大部分人学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②而《周报》撰稿人中的大部分只是在从事文学创作或政治活动之前进过师范学校或技校(学技术、医学)。《周报》撰稿人的前途要比《观察》撰稿人的前途渺茫,因为当时《观察》撰稿人的道路似乎较平稳,直接可以向高等教育或行政管理方向发展,不过,也有人认为最好能再到外国(英国、美国)的高等学府深造。

经过查证的《观察》撰稿人中,曾到国外留学的为83%,而《周报》撰稿人中只有38%。曾在外国留学的《观察》撰稿人中,80%是在美国和英国留学,《周报》撰稿人中仅有27%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相反,《周报》撰稿人中55%的人在外国留学之后,又到日本继续深造和学习,而《观察》撰稿人中这类人仅占9%。如果上述差别能进一步肯定我们关于社会出身方面的说明(总的看来,《周报》撰稿人的家庭出身不如《观察》撰稿人优越),那么,《观察》撰稿人中大部分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享受助学金的学生,而且能够进入英、美高等学府本身,就意味着能获得长期深造这点也是事实。这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观察》撰稿

① A、《周报》——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在上海上学——在昆明——杭州——没有到国外留学——在日本读书/《观察》——在北京上学——留学美国——留学英国——留学德国。

B、《周报》——技术——文学——美术——新闻/《观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

② 图形中的非典型因数,也就是那些(75人中有两人)曾经在德国留学的人的因数。这个非典型因数不但处在图形的一个角落,而且更把“哲学”这个应该说是更接近美国大学的学科拉过去了。

人中会有那么多的博士和教师，以及为什么《周报》撰稿人中曾到比较容易进入的邻国日本留学的学生中途辍学率竟会如此高。

通过这两张图表，我们还可以看出曾到外国留学的人在年龄上存在着的3个比较接近的级别：到日本留学的，一般都是在1881—1890年出生的；在美国学习的，是在1891—1900年出生的；留学英国的，大多是在1901—1920年出生的。

在下一项（就业阶段）分析中，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小团体关系），就更明显了。此外，一致的立场和相同的文化活动（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都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这些互助关系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及这两部分人的任何一部分究竟是在哪一个具体时期开始政治化的。

那些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周报》主要撰稿人在上海，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似乎在团结左派作家、艺术家的各种救亡组织的政治活动中结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团体。促成这种相互联系的另一个因素，便是日本占领上海时他们的共同生活遭遇，而战争时期，《周报》的领导核心就在上海。

图表5所反映的是这一最后阶段的转移和政治选择，它可以证实这个战斗核心的存在，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看出为《周报》撰稿的都是哪些人——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翼作家、亲共产党人士及上海的外国侨民。要想弄清他们聚合的起因，就必须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与此相反，为《观察》撰稿的大学教师（其中大多数撤退到昆明）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破裂，则是在中日战争期间开始的。究其原因，首先是昆明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致使《观察》撰稿人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独立，其次是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使《观察》撰稿人感到失望。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观察》撰稿人——大学教师才开始政治化的。

不过，通过这张图表，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是以一个政治上很不一致的团体出现的，而且，他们的政治选择——从“亲国民

党”到不问政治，是经历了一个自由主义和带有伦敦经济学派色彩的自由社会主义阶段的。从地理方面来看，这个团体也是分散的组织，《观察》的核心在昆明，而《周报》的核心则在上海。

通过以上简单的描述，我们不但可以看清每个团体的成员在地理和社会出身方面存在的某些特点，而且也可以看出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和他们的职业经历，以及他们的政治选择。然而，各不同专业的群体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例如：地区性的相互联系在那些企业名人或市政府官员身上显得十分突出，而在作家或新闻工作者身上就很不明显。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对这些团体的描述，给上海名人作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呢？

要进行这样一番尝试，必须作些补充性的研究。除此之外，还必须进一步阐明各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网。从这点来看，姻亲不能说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姻亲关系在向社会其他各界扩展利益和势力方面，是起主要作用的。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只有靠采访或查阅私人档案才能取得进展。这也是目前有关方面研究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开始阶段，我们只能对这些上海名人作最基本的大致的描述，因为这些人的籍贯大都是江苏、浙江、福建或广东，属沿海城市的中国，即属于一个面向辽阔海域、本能地热心贸易和外国思想观念、并与大陆后方那种根深蒂固的乡村和官僚正统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所以我们又称之为“另个中国”。^①虽然这些杰出人物的社会出身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过外国的影响——或是刻板地通过在西方或日本的大学里学习深造，或是在工作中通过与上海的外国管理人员和企业家的频繁接触，在实践中受过影响。这些新生贵族因为很年轻——其中大部分人在担负领导责任时几乎刚过40岁，因而对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接受得特别快。他们在从事各种活动，特别是组织活动——私营

^① 见白吉尔 (Marie-Claire Bergère): 《上海，或称“另个中国” (1919—1949年)》，载《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34卷第5期 (1979年9—10月)，第1,039—1,068页。

企业、地区行政机构、知识分子联谊会——中，都十分重视必要的转移（原文如此。应作借鉴理解。——译者）。虽然国家的能力有限，无法使他们共同致力于系统的近代化事业，但是，因为他们有着各种共同的需求和认识，所以，他们的行动在不同程度上还是一致的。这些革新者力求对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他们不但对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充满着同情，而且还通过各种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实践家、活动家及对现实问题表明态度和采取行动的人，他们似乎没有感受到如本世纪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或艺术家分割、绝裂的痛苦。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处在矛盾的价值观念之中，体会到了异化的痛苦。

上海经济界、政治界、科学界及新闻界的名人似乎成功地超越了他们面临的各種矛盾。他们不是用传统的中国，而且用具有近代特点的中国去同西方进行较量。他们追求的是近代化中国，一个他们在建设的初期阶段以外国近代特点为模式，然后再用中国方式演绎，使他们的聪明和才干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比起受孔夫子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国文人来，这些上海名人最重实效，而且较少受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这些上海名人以一种近代化的动力学代替了异化的辩证法——既不完全保留中国的，也不全面接受西方的，倒退亦不可能——，并且认为这种近代化能使他们的前途，也就是国家的前途得到保障。

译自《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4期，
1985年7—8月，第901—9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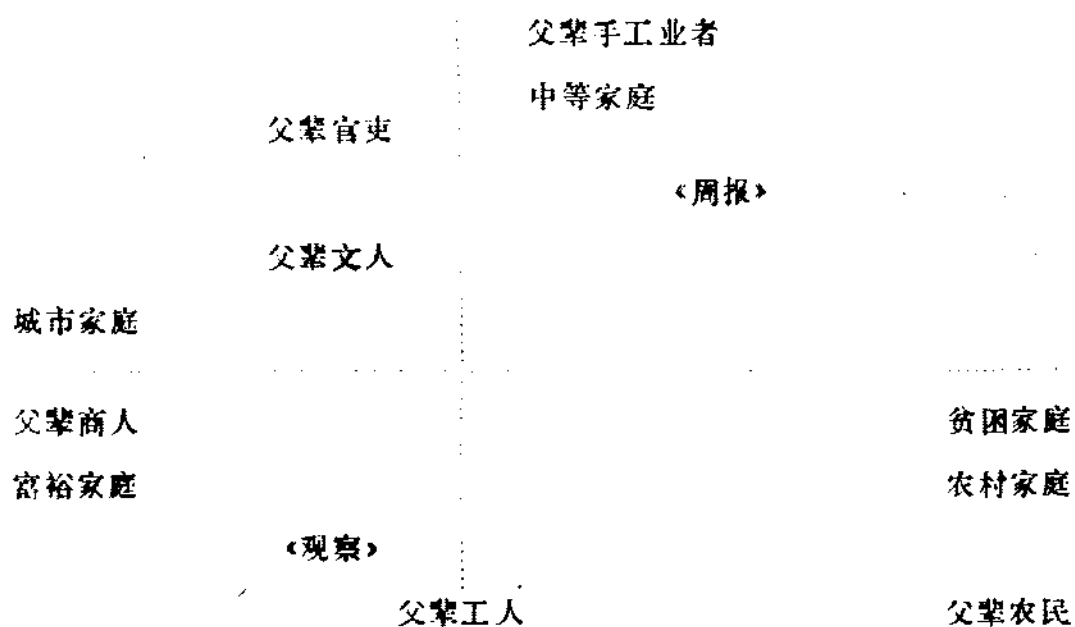
黄庆华 译

附录

图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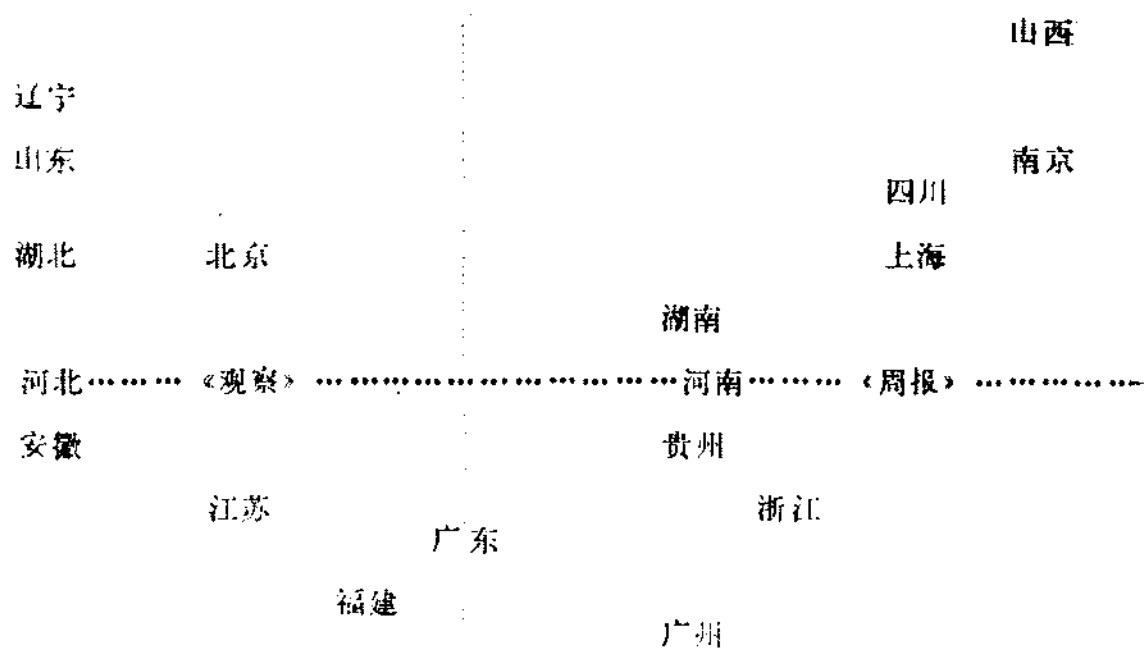
社会出身

上海新闻工作者——因式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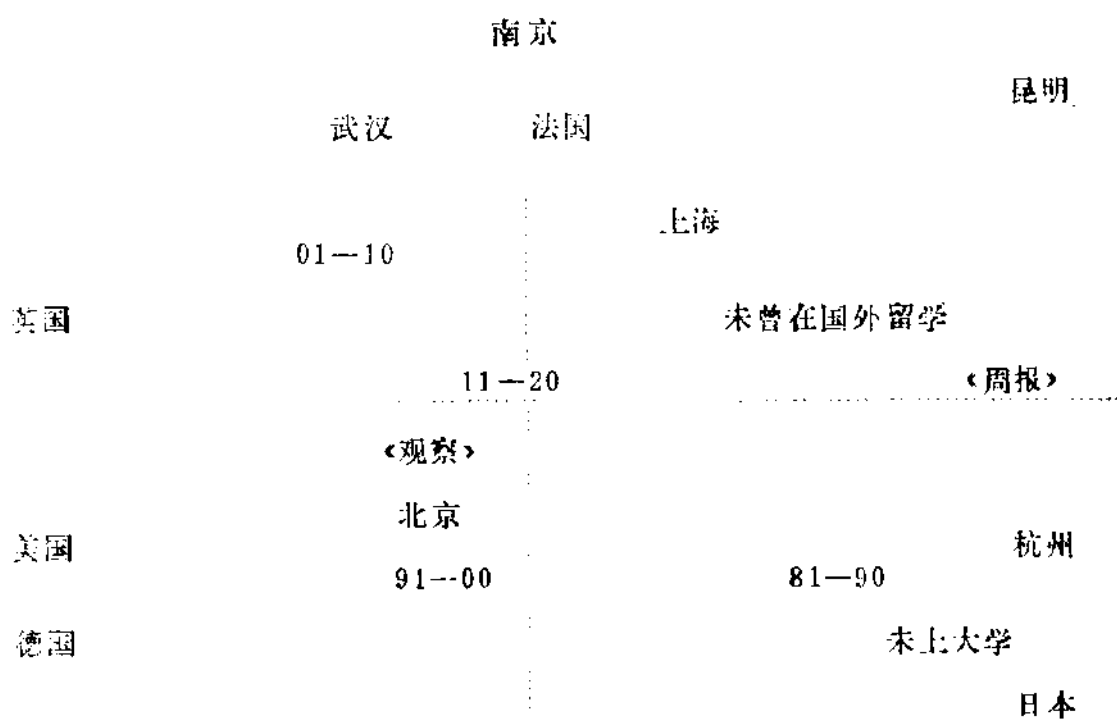
图表2

地理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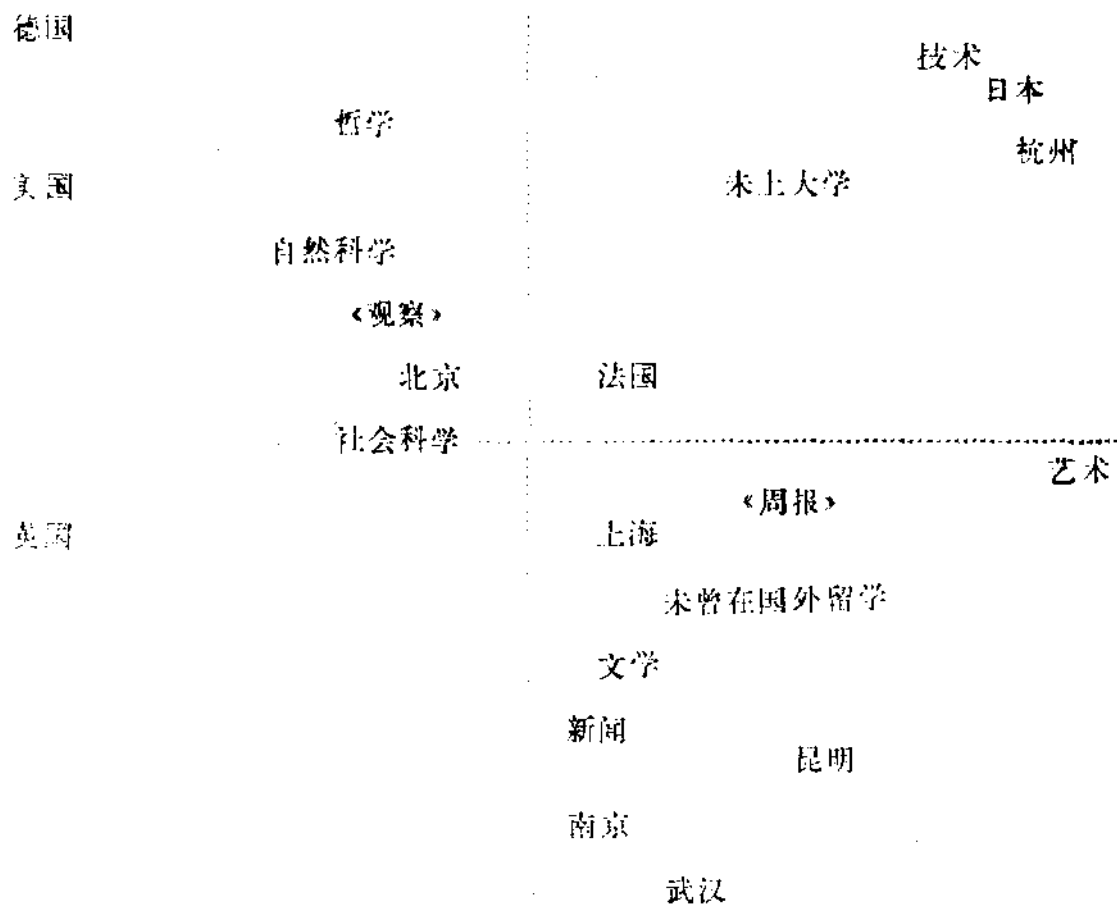
图表3

年龄、就学地



图表4

大学——地点及专业



图表5 政治选择与居住地（1939—1945年）

云南					
	共产党				
	《周报》				
	共产党地下组织				
		重庆	国民党		
		美国	民主同盟		
		《观察》	伦敦		
	国民党左派			昆明	
	亲共			北京	
上海		四川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形成

薛 衡 天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是旅俄华工的先进分子在俄共（布）的指导和组织下建立起来的。起初，华工以个人身分加入俄共；其后，在华工党员集中的地方形成党小组或党支部；至1920年6—7月共产华员局^①建立，始形成全俄统一的党组织。

大批华工进入俄国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中东铁路开工后，华工涌入俄国外贝加尔、阿穆尔和远东地区；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加强了对远东地区的开发，需要大批劳动力，华工遂第二次大批入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俄国到中国招募劳工，形成了华工第三次入俄高潮。十月革命前夕，旅俄华工约有四十万大，其中在欧俄地区有十万人，其余大部分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旅俄华工最初与俄国的政治生活毫无关系，但也有极少数人参加了俄国革命活动，例如共产华员局领导人之一安恩学（Ан Нен хак）就在彼尔姆积极地参加了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工农迅速革命化。华工受到了革命的薰陶，觉悟有很大提高，他们和俄国工人一起，参加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十月革命爆发时，华工的先进分子参加了赤卫队，有的还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甚至进入契卡工作。华工这些最初的革命实践，为华工党组织的出现准备了政治上和组织上

① 俄文名为：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в России，意为旅俄中国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局。

② 《苏中友好文件》，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39页。

的必要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协约国帝国主义开始了对苏俄的全面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机之中。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为粉碎内外敌人的进攻，紧紧依靠俄国工农大众的支持，并积极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援，将发展与巩固同外国劳动群众的联系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对在旅俄劳动人民中发展党组织予以特别注意。1918年5月，俄共（布）外国共产党组织中央联盟〔Центральн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упп РКП(б)〕成立。它直属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负使命是发展和建立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扩大同外国劳动人民的联系，推进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改变苏维埃俄国的孤立地位。该联盟主要由东欧、中欧国家战俘中的共产党人组成，联盟中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分部。但是，关于华人党组织的全部工作已同中央联盟的活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许多华人党员和中央联盟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一起学习党课，例如，到匈牙利人宣传员讲习所上党课的就有39名中国人。^① 1918年12月专门负责对东方人的工作的机构——俄共（布）穆斯林组织中央局成立后，在该局下属的10个支部中设立了中国支部，它负责对旅俄中国侨民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② 促进华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十月革命后，广大华工在苏维埃政府对华无产阶级政策的感召下，积极参加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生活，踊跃地参加红军。于是在旅俄华工组织和红军华工志愿部队里涌现了大批华人共产党员，他们参加所属的俄共（布）基层组织的活动，没有单独成立支部。但这些中国侨民的先进分子很快便同俄国共产党取得了组织联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叶卡捷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尔科夫、彼尔姆和苏俄的其他城市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单元179，第18张，引自《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41页。

^② 佩尔西茨：《旅俄东方国际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1918—1920.7）》；杰柳辛：《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莫斯科出版，第63—64页。

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团体”。^①在这些华侨社团中工人占绝对优势,其宗旨是“支持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的措施并帮助年轻的红军”,^②在苏俄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至1918年底,在这些新华工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在莫斯科等地华工集中的地方设立分会。联合会共有会员4—6万人,主要是华工;联合会内还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支部。^③据所见到的资料,这个支部是最早建立的华工共产党支部,其中的党员就是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地出现的华工团体的筹建人和负责人。因为“这些中国同志〔俄共(布)党员〕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从而使中国劳动者得以建立第一批革命组织”,^④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会的核心人物。由于这个党支部在联合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对联合会高度重视,将其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地位上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在发给莫斯科苏维埃的信中指出:

“旅俄华工联合会是无产阶级组织,……在该组织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它出版了中文机关报——共产主义的《华工报》,而且在俄国,以至在中国进行了宣传,与劳农政府携手合作。”

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之后,在华工中“进行了大量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工作:开办政治学校、互助会、生产合作社,举行群众大会和讲座等。这些工作促进了对华工的革命教育和华工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⑤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捷琳堡,上乌丁斯克、彼得格勒、乌克兰、中亚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华工联合会分会很快

① 《苏中友好文件》,《近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38页。

②④ 乌斯季诺夫:《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党组织》,载《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愿志者》,第41页。

③ 波波夫:《我们曾为苏维埃政权而并肩战斗》,第29页。

⑤ 《苏中友好文件》,《近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38页。

地建立起共产党支部。^①穆斯林组织中央局东方民族分部则集中力量在西伯利亚地区旅俄中、朝和穆斯林劳动者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尚未有党员的华工集居区，有时采取“群众建党”的方式，以适应形势发展的急需：首先召开华工大会，听取俄共（布）负责人关于建立党组织的报告，接着通过建立支部的决议，然后由与会者投票选举支部成员，通过当选者与俄共（布）地方委员会联系，正式建立支部。上乌丁斯克华工党支部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将该华工大会决议照录如下：

“听了亚历山大罗夫关于在中央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建设工农政权的报告后，我们在上乌丁斯克城集会的中国工人了解了俄共（布）的纲领和任务，非常欢迎工农政权和俄共（布）。我们认为，为俄国工农谋利益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俄国无产阶级取得的革命成果必须加以保卫，为此，我们将与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工农联合起来，为保卫全世界劳动者的权利而并肩战斗。为了使工作卓有成效，我们将建立共产党支部，它将和上乌丁斯克城俄共（布）委员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开展共同的党的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

中国工农和俄国工农的联盟必将粉碎谢苗诺夫匪帮的嚣张气焰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从北京宫院到中国农民屋舍上空飘扬解放红旗的时刻临近了。

.....

大会选出主席团：主席——М.И.秋同志，副主席——刘爱国同志，书记——秦国英同志。”^②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21/12，单元10，第2张和单元17，第7张，以及单元33，第1张，引自《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第42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372，目录1，卷宗319，第37张，见苏联《历史档案》，1957年，第4号。

无论是从俄共（布）基层组织分离出来的华工支部，还是从华工大会直接产生的支部，都加入了当地俄共（布）委员会，成为俄共（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受其领导。但这些支部较之华工以个人身份加入俄共（布）基层组织时已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因为支部成员一般都是华工团体的领导人和骨干，直接负责华工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们根据俄共（布）地方委员会的指示，可以独立开展对华工的组织教育和宣传鼓动等各项日常活动。这些党支部的建立为全俄统一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苏俄红军、红色游击队是造就大批华工基层组织的另一系统。在十月革命最初的年代里就有一些优秀的华工战士在赤卫队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开始后，大批华工响应列宁的号召参加红军，一些华工党员更是自动地组织华工志愿部队参加反对苏俄内外敌人的战斗行列，例如，共产党员沈清和早在1917年就指挥中国志愿部队同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匪帮作战；^①安恩学于1918年在秋明组建了一支华工部队，后来该部队加入了红军，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一直同武装干涉者进行战争；^②年轻的共产党员孙福元于1918年初罗马尼亚人在西线向苏俄发动进攻时，在普利德涅斯特罗维耶组建了第一个红军华人营，该营在敖德萨一带立下了赫赫战功。^③这些华工部队出现之后，相继加入红军的已不是“个别志愿者，而是一批批支队，甚至整团整团的部队完全由中国人来补充”。^④至1918年底，旅俄华工联合会，特别是华工党组织在各地建立之后，再次掀起了华工参军的高潮。1919年，又有包括中国模范团在内的八支华工部队分别被编入东方战线的第三、四、五军，南方战线的

① 苏联国立莫斯科地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全宗158，目录1，卷宗2163，第7张，引自《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第24—25页。

② 《苏中友好文件》，《近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39页。

③ 《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第12—13页及第26页。

④ 刘永安编：《鲜血凝成的友谊》，莫斯科1959年版，第6—7页。

第十、十一、十二军，北方战线的第六、七军。^①更有大批中国志愿者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组织起红色游击队，仅阿穆尔地区的华人游击队就有一万多人。^②据中俄档案资料估计，全俄共有华工志愿部队4万人以上。

在华工志愿部队大发展情况下，只有个别指战员参加党组织的状况就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为了提高华工部队的战斗素质、巩固队伍，苏军政治部门“在中国人组成的军队里均按照苏维埃武装力量党组织形式建立军队支部”。^③以第五军为例，凡是连级建制均要设立支部。西伯利亚步兵师第一兵团中国红军战士大会关于建立本团文化教育支部的决议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连队支部建立的经过：

“报告人亚历山大罗夫、伊万诺夫、梁福清、柴荣彦发了言。关于在中国部队所属各连建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外国处处长亚历山大罗夫、伊万诺夫及其他同志作了关于必须顽强地和创造性地做好教育和自修工作、建立学校和俱乐部以及中、俄语政治识字学校的报告后，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听了同志们的报告，这些同志为我们指出了个性自由发展的道路，我们希望成为为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自觉的、积极的工作者和战士，我们决定立即着手建立文化教育支部，为此选出我们自己的同志，由他们来领导第一兵团全体中国红军战士的教育组织工作。查德同志当选为主席 刘华清同志当选为书记”^④

这个团一级的文化教育支部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提高

① 《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第12—13页及第26页。

② 王永宏：《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工人》，1960年，第8期，第9页。

③ 《苏中友好文件》，《近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40页。

④ 苏共(布)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1，卷宗319，第16张，引自《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第168页。

中国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在各个连队建立基层支部。其他各军建立中国志愿部队支部的具体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它们都是按照苏军政治工作条例的规定相应地建立华工连队的党支部的。

华工团体和华工部队的基层党组织的大量涌现，要求建立统一的旅俄华人党组织来领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这是因为：

1. 华工党组织负有双重任务，作为俄共（布）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使命是保卫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还必须与中国国内的革命取得联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因此必须有自己统一的组织，才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2. 就俄共（布）来说，为摆脱被协约国封锁的孤立地位，急需同中国劳动人民建立革命联系，旅俄华工党组织恰恰可以成为进行这种联系的纽带。这一来，俄共（布）和华工党组织两方面的要求完全契合了。

1919年3月，在俄共（布）和列宁的倡导和主持下，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当时，无论就各国革命政党的实际状况，还是就苏俄所处的环境（由于内战和武装干涉，苏俄实际上处于与欧亚国家隔绝的状态）而言，都不具备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条件，但为了抵制第二国际伯尔尼会议，列宁还是决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多半是旧俄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的共产党代表、战俘中的共产党人和旅俄外籍共产党人。当时中国只有极少数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具备派代表的条件。于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刘泽荣）和莫斯科分会会长张永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俄文名为Китай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的代表出席了大会。^① 现有材料尚不能证明刘、张是否就是共产党员，但可以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核心就是前面提到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中的党支部。因支部的人数较少，在大会文件中常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9、11、14页。

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Группа Китай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刘绍周在致大会的祝词中说：“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笔者)，也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共产国际表示祝贺。^①这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仅是旅俄华工的革命组织，而且是作为中国国内的工人阶级政党出现在共产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之中。这就要求旅俄华工党组织必须尽快联合起来成为全俄统一的党组织，并和国内建立联系，这样才能承担共产国际赋予它的广泛的使命。

1920年6月18日至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提议建立中央机构以便集中领导旅俄华人共产党员，使分散在各地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这个机构即宣告成立，其中文名为“俄国共产华员局”，俄文名为“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通过决议，批准华员局为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同时准批了旅俄华人共产党员组织章程。章程规定，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为共产华员局，该局暂设于莫斯科；各旅俄华人共产党分部(Китайская сек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均为共产华员局的下级机关，各分部须由选举产生并经共产华员局批准；共产华员局的决议分发分部执行；共产华员局有权调配分部党员的工作；华工部队所有基层单位均须建立军队支部，这些支部要立即与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华员局接上组织关系，其工作按章程进行。〔见附录(一)〕

俄国共产华员局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已正式形成。从此，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国内，在中国革命和建党等问题上进行了巨大努力。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4页。

附录（一）

旅俄华人共产党员组织章程

（不早于1920年7月1日*）

一、总 则

1. 为组织旅居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党员起见，凡有华人共产党员的地方，均建立华人共产党分部，直属俄共（布）委员会。

2. 华人共产党分部的最高机关是全俄代表会议，在可能情况下，代表会议一年内至少召开一次。

3. 领导机关是华人共产党员中央局，它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

4. 中央局暂时设在莫斯科，附属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局所有关于原则问题的决议均提请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

二、中央组织局

1. 中央组织局由5名成员和2名候补成员组成。

2. 中央组织局将其决议以通信方式寄发下级党的机关。

3. 中央组织局核准由地方党组织建立的华人分部。

4. 在莫斯科建立中央组织局附属中央党校，所有华人党组织均派最优秀的同志进党校学习，以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

*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通过决议批准了旅居苏俄的华人共产党员的领导机关。

三、组织局主席团

1. 组织局主席团领导书记处的活动，进行一切日常工作。
2. 组织局主席团是本局的执行机关并贯彻本局的一切决议。
3. 主席团统计华党员的全体人数，并配置人员，因此事与俄国有关，故必须取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同意。
4. 主席团坚持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进行最密切的联系，向其通报自己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作，一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同意，便从事这些工作。
5. 组织局主席团拟制各种调查表和为报告准备问题等。

四、俄共（布）党委会直属 华人共产党员地方分部

1. 为扩大宣传工作和使中国劳动群众革命化，凡有华人共产党员的地方均建立直属俄共（布）党委会的华人共产党分部，并报请俄共（布）省委批准。
2. 为进行经常性的工作和实现分部对华人共产党员全体会议的领导，在三个月内选出地方组织局。
3. 组织局由三人组成，从这三人当中再选举一名主席，一名书记。
4. 组织局进行工作时，要和地方党委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取得其对全面的党务工作的指示。
5. 组织局要举办宣传周活动，以便将中国劳动群众吸引到党的方面来。
6. 地方组织局要通过中国会员*调查表，查明宣传员、组

* 中国会员，原文为“Члены—китайцы”，意为中国成员或中国委员。华工联合会的成员有时也写作“Члены—китайцы”，译文取联合会会员之意。——译者

织员和各部门工作人员的情况，并将数字资料报告中央局。

7. 地方组织局领导对中国群众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使他们具有革命思想，为此，应举行关于中国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群众集会、大会和讲演等。

附注：在华工部队中所有基层单位均建立军队支部。这些支部要马上与莫斯科中央组织局接上组织关系，并本着本指示精神进行工作。

五、在祖国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1. 华人共产党员认为，实现全中国社会革命——组织中国工人阶级，是自己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直接义务。

2. 在祖国凡有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地方均建立党支部。

3. 这些支部的工作，组织局大体上按上述条文进行。

4. 地方局应利用一切适当时机与华人共产党员中央局接上关系，本局暂时设在莫斯科。

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局（共产华员局）

书记

签字

签字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全宗17，目录2，案卷29，第19张。

根据原件印刷

• 签字难以辨认。

附录（二）

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局 （共产华员局）教育培训班条例

（不早于1920年7月1日）

1. 为提高教育水平，为了从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华工中训练共产主义工作人员，特建立短期教育培训班。

2. 培训班分为半年制和一年制。

3. 培训班开设下列课程：国语、尺牍、中国地理、算术、外语（选修）、共产主义史、苏俄宪法、宣传员训练实践课。

4. 学员入学须取得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局的允许。

5. 学员须准备住处、桌椅，并有社会保证。

6. 普通教育课的教员由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局邀请。社会主义课教员由当地的俄共（布）区委员会委派。

7. 教员均可领取一份口粮。培训班主任和副主任由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局委派。

为使培训班能按照实际要求适时开课，必须立即着手编写和出版石印或胶印课本。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全宗17，目录2，案卷29，第24张。

副本

附录（三）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局（共产华员局）会议记录节录——关于组织临时委员会同反革命、投机倒把、玩忽职守行为作斗争问题

1920年8月17日

听取：……

2. 安恩学同志报告。安恩学同志报告指出，我们——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当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投机倒把活动、反革命活动及其他滥用苏维埃政权的分子。……

一致决定在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局（共产华员局）下面成立临时委员会，以打击反革命、投机倒把和玩忽职守行为。

委员会要有定员，他们要到与各种犯罪行为展开最激烈的斗争的地方去。每一个共产党分部都应有一名委员会代表。该委员会应在当地同省肃反委员会共同行动。

主席 安恩学

成员 张德元

连 昆

赵永禄

书记 单伯铎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全宗17，目录2，案卷29，第6

张，原件

（译自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43页—146页。）

共产国际的活动经验

Φ·菲尔素夫 * K·希里尼亚 * *

译者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苏共中央理论与政治刊物《共产党人》1988年第10期发表的这篇文章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作出了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具有时代感与现实性，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击败这两个20世纪的重大事件期间发生过影响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的活动，构成了世界革命历史上一个重要阶级。

B·И·列宁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但是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仅记载了俄国人、俄罗斯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而且记载了德国、奥国、匈牙利、芬兰、瑞士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一句话，这记载了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53页）。共产国际在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该运动的战略与策略、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巩固它的队伍、使列宁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等方面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苏联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分析了共产国际在解决空前

* 弗里德里希·伊戈列维奇·菲尔素夫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部门负责人，史学博士。

* * 基里尔·基里洛维奇·希里尼亚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顾问，史学博士。

广泛的和复杂的问题时所取得的正面经验和所犯的错误。但是从今天来看，这些著作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研究人员和对共产主义运动史感兴趣的读者的要求。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对于共产国际发挥国际组织作用的方法，对于它的领导机关和所属分部〔尤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的相互关系机制，对于共产国际内部的政治斗争，对于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精神状态、理论观点、政治决策和实际行动的影响，几乎都没有进行过研究。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破除老框框，把大量档案文献，首先是那些难以理解或者根本理解不了的档案文献加以科学的运用。如何使用这些业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的文献，看来应当由各兄弟党通过协商解决。同时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原先有人试图对共产国际历史的某一方面提出批评，结果被认为是离开了党的立场。这种做法导致了片面的结论，致使文献中出现了“言犹未尽”的情况。

要深入分析共产国际的道路与经验，就必须从它所处的整个复杂的现实环境和总体情况来认识这个组织的活动，必须把阶级斗争进程同它在共产国际的政策（照样也对这些进程产生影响）中的反映加以对比。这样做有可能充分揭示共产国际正面的，以及反面的经验。研究共产国际的经验不仅从吸取教训的角度来说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确立对社会发展进程比较深刻的观点、揭示它的规律性和各种倾向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意味着要从真正科学的立场上来对待历史，认真分析那些不久前大家所不了解的或者被毫无根据地说成不大重要的事实。在提到这一点时，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国际的丰功伟绩，不要忘记曾经参与它的工作，把自己的知识、力量、精力，甚至往往连同生命贡献给共同事业的人们。

现在，苏联研究人员面临的任务是：恢复共产国际活动的本来面目，撰写共产国际真正的和完整的历史。关于共产国际的成就，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历史文献已有相当详尽的阐

述。笔者给自己提出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说明共产国际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各种消极的倾向对它的影响，并针对一些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认为，分析共产国际历史经验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恢复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以及马克思、列宁对工人阶级为实现主要战略目标而斗争的道路的观点。这个基本思想首先包含对社会发展趋势、具体的历史形势的深刻的、切合实际的^{〔1〕}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斗争的前景和任务。列宁曾努力使共产国际具备这个特点。当然，在列宁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各国共产党远不是所有干部都能理解列宁对革命运动问题的观点。为了确立列宁的观点，共产国际进行过斗争。抗拒列宁观点的不仅有机会主义者，而且还有信守教条的宗派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

最初，在1919—1920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提出了在一些国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苏维埃的任务。列宁及其追随者在这方面献出了大量的精力。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8月）的文献中记录下来的共产国际的基本思想政治观点，反映了这个方针。共产国际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能是刻不容缓地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许多共产党人仿佛觉得，运动发展得惊人之快，要不了多久，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彻底被消灭。那个时期的许多政治方针就曾受到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渴望尽快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思想的影响。

然而，对不久的将来无产阶级革命能在欧洲取胜的指望并没有实现。1920年末至1921年初，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衰退和资产阶级转入进攻的趋势已经显露出来。头脑清醒的和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列宁首先指出，必须认真改变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使之适应新的情况，把主要任务由原来的直接强攻资本主义调整为有计划地围攻资本主义堡垒。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7月）上，列宁严

厉地批评了那些认为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共产党都应当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进攻论”的拥护者。“进攻论”实际上是号召人们朝阶级敌人伸出的剑扑过去。列宁警告说，如果按照“‘左’倾盲动”方针和“进攻论”行事，那共产主义运动就注定要灭亡。在当时的情况下，关键不在于挥动红旗、发表特别革命的号召，而在于巩固工人阶级的阵地，以及为了捍卫它的根本利益进行确有成效的斗争。列宁突出强调，各国共产党要把注意力放在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即广大劳动群众上面。

在代表大会上，K·蔡特金、O·库西宁、B·科拉罗夫、B·什麦拉里等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列宁与“左”倾宗派主义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捍卫新的政治方针。1921年共产国际的转折正好在苏维埃俄国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发生，但是，不用说，它是由全世界形势的变化引起的。K·蔡特金后来说：“列宁从不会被自己说过的话束缚住手脚，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他原先亲口说过什么而约束、限制自己的行动。他在积极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结论，而且从不会使创造生活的力量屈从于一纸具文的威力。”因此，在列宁在世的时期里，共产国际活动的特点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这些领导机关力图在准确了解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客观形势和广大群众社会心理变化所揭示的各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来制定政策。列宁及其追随者大胆地作出新的决定，无所顾忌地否决过时的方针，揭示新的斗争道路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方法。

列宁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在共产国际于1921—1922年末制定的、并在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1922年11—12月）经过认真分析的工人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得到了体现。作为实现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及其组织行动统一的基础的路线，形成了使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进程向前发展的新思想，这就是：只有解决过渡时期的任务，展开反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的全民斗争，才能动员群众前进。在共产国际内部提出了取代资产阶级政

府的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口号，以便推动革命力量向前发展。

按照列宁的观点，以统一的思想理论观点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是丰富多彩的、始终向前发展的、具有自身特点和任何一国民族特征的运动。因此，从辩证的统一角度看，共产国际同时也被看作各个政党的联盟和统一的世界性政党。共产国际，它的执行委员会和机构的活动是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需要决定的。而且它的特点也是由这个组织的工作方法、它的外部与内部联系方式、集中领导制来决定的。

按照共产国际的公式，所有共产党都参与对形势，对未来和当前任务的集体讨论，共同对作出的决定负责。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这些讨论的特点是民主作风、维护自己观点的自由，以及在考虑具体历史条件、民族特点和传统的基础上共同寻找解决众所关注的迫切问题的愿望。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共产国际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即讨论结束以后表决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加以解决的。而且通常是力求达到相互谅解，寻求使争论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倘若策略上的分歧未能消除，那么就在大家表示同意的各点的基础上谋求折衷的解决办法。这种折衷办法的令人信服的例子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列宁的参与下，德国统一共产党多数派和少数派达成了协议。

当然，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方针中可以粗略地看到过分的“包罗万象”的现象，但是共产国际当时并非有意忽视各个国家工人阶级具体的和特殊的斗争环境。不过，由此仍然可以看出各国共产党不够成熟，当时还没有掌握独立寻求完全适合本国国情的决策的艺术。列宁非常重视共产国际制定决议时的民主程序，十分尊重每一个政党的意见及其对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这一切给共产国际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气氛，使得它的指示经常能包含兼顾各国的特殊性与特点的政治结论。这些情况同时要求对我们的历史科学进行补充研究，因为它们包含着列宁共产主义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的“秘诀”。

列宁善于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积极和最有才能的领袖团结和联合起来去解决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与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委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布）的活动家有关。Г·Е·季诺维也夫、И·И·布哈林、К·Б·拉狄克在制定和实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方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发生过分歧，但这在当时并不构成对制定共同的马列主义政治路线的工作难以逾越的障碍。作为共产国际内部一个最有经验和最成熟的政党的俄国共产党（布），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在其随后的历史时期里强调要忠于列宁的思想和传统。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逝世给共产国际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后来，据我们看，列宁学说的许多原则性论点被当成了教条和遭到了歪曲，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改造作用就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我们不妨把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引起的国际形势第一次急剧的转折，同共产国际在它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7月）上所作的形势分析作一比较，从中不难看出，就在那个时候，政治估计明显脱离实际的情况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代表大会根据表面现象得出世界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革命发动时期的结论，然而生活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从1925年起，共产国际在推断资本主义将出现相对稳定的同时，得出了资本主义矛盾加深和资本主义体系爆发总危机等一系列重要结论。不过，共产国际那个时候对政策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因此这些结论显然免不了有片面性和简单化。资本主义衰落时期被理解成这个制度（包括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的时期。比如，1926年秋以前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屡次强调，资本主义稳定是在腐朽的、不稳定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个进程每向前推进一步就意味着离革命更近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事实上成为公理性的论

断，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任何前进都意味着走向灭亡。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阶级搏斗都是用这个呆板的公式去衡量的。

托洛茨基站在极端的立场上说，资本主义不可能继续发展生产力，而所呈现的经济高涨，据他说，则意味着生产力停滞伴随着上下波动。在20年代后半期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当中，只有布哈林对形势和发展趋势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然而在他所作的分析中依然可以感到，他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及其对新情况的适应能力显然估计不足。

这样一来，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便估计过高了。当时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内部这样一种认识占了上风，即认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似乎已经彻底倒向帝国主义，在反帝斗争中不可能起积极的作用。斯大林更是积极地推行这种观点。他不是把列宁的反帝统一战线口号付诸实践，而是要集中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和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作为无产阶级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条件提了出来。这种观点后来写进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9月）的决议。它不仅严重地缩小了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行的政策的范围，而且对前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由于这个原故，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提出了过高的战略目标。

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纯属共产党的行动纲领看作群众立即可以接受的他们自己的行动方针，企图以彻底转到革命立场上来并与原来组织脱离关系，作为同具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情绪的工人合作的条件。这种企图照例以失败告终。认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错误往往是“上层”，即共产国际领导强加给各国共产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在“下层”，即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和革命工人运动队伍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宗派主义思想情绪。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影响，革命浪漫主义思想情绪，对阶级斗争道路的简单化认识等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处在来自“下层”的宗派主义思想情绪压力之下和对它作出让步，那是常有的事。甚至在作出批判“左”倾的政治决定的同时，它自己也常常“向‘左’转”。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斯大林和一些“左”倾的共产党所具有的同一种思想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前景作出了以下的估计：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渐渐临近了。据我们看，这种看法反映了期待新的革命浪潮到来的急躁情绪。历史学家当前有必要研究那个时期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党内生活和精神状态，特别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国际巩固共产主义先锋队、消除小资产阶级和宗派盲动主义思想观点影响的顽强斗争，不仅使共产党的干部受到思想政治锻炼，同时也使理论与政策变成僵死的教条。需要解答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试图比较清醒地和比较现实地对待事件发展的做法，却遭到反对，甚至被斥为机会主义倾向与背离革命前途。

这个时期宗派主义一教条主义观点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在工人统一战线问题和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上。众所周知，列宁非常突出地肯定了社会民主党在1919—1920年革命高潮时期的作用。再说共产国际本身也是在无产阶级运动中革命派同社会改良主义划清界限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时，右派和中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在“纯粹民主主义”口号下实际上同资产阶级一道建立防范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壁垒。在共产国际转而采取工人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下，共产党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由许多新的因素决定的。共产党人在不停止反对社会改良主义思想斗争的同时，应当遵照列宁的遗训，找到对待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情绪的工人的方法，以便组织共同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

关于这一点，季诺维也夫于1921年12月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引用了列宁在制定统一战线策略时发表的极有意义和极其重要的论断，列宁说：“工人阶级有的阶层也许如今才第一次参与政治生活，——这样的阶层总是有的。它们由于普遍的

情况到现在才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它们应当抛弃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它们自己应当根据自身的经验去试验改良主义者向它们提供的、它们感到新鲜的途径。”可见，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当前应当或多或少地根据自身的经验去试验社会改良主义者提供的途径。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这种可能性？对这个问题，列宁作了解答。1922年，他论述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不那么相信，但同意帮助试验的资本主义向新制度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407页）。列宁这个观点批驳了在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人为地加剧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对立的作法。此外，从列宁的话语中可以断定，他认为在群众中进行共同行动精神的教育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实行统一战线问题变得更加重要。遗憾的是，列宁提出的发展统一战线的思想由于以下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更谈不上进一步深化）：推行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政策的右翼社会民主领袖起来反抗，共产党人在实行这个策略时犯了宗派主义错误。1923年末至1924年初，赞同共产党队伍里的“左”倾宗派主义情绪的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下了一个定义，实际上是把统一战线的全部内容仅仅归结为旨在揭露据说应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的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手段。这种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发展，社会民主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法西斯的孪生派别和羽翼。“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严重阻碍了争取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斗争，并给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暗中破坏统一战线提供了方便。

由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想出来的、作为联合所有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的“以阶级消灭阶级”的口号，实际上具有宗派主义的内容，它只不过是要猛烈地打击社会民主党，组织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排斥在外的工人行动。统一战线仅仅被理解成统一矛头对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下层工人的行动。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小组被说成是工人运动中共产党人最危险的敌人。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这个时期的政策还存在着其他不足之处和错误。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的革命发展道路被套上同一个模式。而且否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存在过渡时期。对泛民主主义任务、当前的局部要求，以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估计不足。担心这些要求和任务会使无产阶级不再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这些错误观点自然不可能不影响到共产主义政策的效果。

笔者本想将注意力移向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在共产国际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所谓“清除”共产国际内部的、那个时期被称作“右派”和“调和派”的人和派别的问题。对这段历史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我们想，目前需要在仔细研究文献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对这次“清洗”的对象和后果作出评价。从中也可对斯大林发动的反对那些可能拥护布哈林的人的运动有所认识。

我们在思考共产国际活动中消极现象产生的根源时，应当注意到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苏联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对抗和共产党队伍里相当普遍存在的渴望用直接的、急进的和那时认为是最迅速的方法达到目的的意向。在1920—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左”倾宗派主义在认识上的冲动还有另外的原因，但共产党人那时就认为，资本主义未必能摆脱这个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把共产国际变为具有高度集中的组织，变为能够干练地领导处在各种环境中的所有分部的趋势大大加强。比如，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中，集中制和民主原则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变成过度的集中，以致限制了各国共产党政治上的灵活性，阻碍它们对迅速变化的形势及时地作出反应，而且往往使它们消极地等待中央的指示。

事物的发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增强了，团结精神、同志关系、互助精神，尤其是对从事地下活动的和受到阶级敌人打击的党的干部的援助得到了加强。各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苏联在世界各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

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内部，列宁奠定的讨论思想政治问题的方法遭到了破坏。在1928—1929年期间，尤其布哈林被解除共产国际的职务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有争议的问题逐渐地、越来越多地是用把不同意斯大林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的人排除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办法来解决。正如文献所证实的，只有经过他批准，共产国际领导才能采取某个政治行动。过去讨论是广泛进行的，后来讨论范围变得相当狭小，人数也有限，而且常常要服从事先定好的调子，结果，一般政治性方针公式化了。资产阶级营垒和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中的几乎所有复杂的发展过程，都一律被说成是法西斯化，这对确定具体的反法西斯斗争目标是有影响的。此外还把反法西斯斗争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等同起来，以致妨碍集中力量去反对向苏维埃政权扑来的法西斯。把阶级斗争中每一个稍为重大的事件都看作革命危机成熟的征兆，而对于共产党的挫折，则照例竭力用一个原因去解释，就是它们落后于似乎是蓬勃增长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斯大林于1931年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起了消极的作用，他在信中把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实际上把它与其他革命政党的经验对立起来。这一切都严重地背离了列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许多原则性问题的基本观点。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以期从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自己的队伍。大家共同努力粉碎了将把共产主义运动推上冒险主义道路的托洛茨基主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保卫中国革命、拯救萨柯与樊塞蒂等人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运动。共产国际发动群众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战争危险，声援苏联。

共产党人在阶级战斗中，在群众运动中积累了战斗经验，并把它同解决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的广泛的国际主义方法结合起来。一大批具有高深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逐渐成长起来。在共产国际的活动的推动下全世界工人

阶级的先进分子保持了崇高的战斗精神，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并在许多重大的战斗中夺取了新的阵地。但是从整体上看，由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错误而未能完全认清和利用这个时期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有利条件。

30年代前半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由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法西斯的进攻，由于战争危险的增长，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出现了新的质的变化。反法西斯的泛民主主义的任务被提到了首位。然而在那个时期，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民主力量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挡住法西斯的前进道路。共产国际不是制定一个为了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而为大家所能接受共同纲领，而是采取赶在法西斯发动进攻之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很晚才意识到必须改变政策。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精神的既有下层的共产党（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也有上层的以莱比锡诉讼案中众所瞩目的人物Г·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

生活要求确定新的策略—战略目标、改变共产国际的活动方法。Г·季米特洛夫在仔细拟定新的方法时，得到了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М·多列士、П·托里亚蒂、В·皮克、Г·哥特瓦尔德、О·库西宁、Л·З·曼努伊尔斯基的支持。他的建议也得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赞同，它委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联共（布）代表团推动方针的贯彻，使共产党能按照共产国际的总方针独立地解决自己的政治的与策略的问题，使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不断地下放给地方。

对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在制定统一战线和广泛的人民阵线政策、为推翻法西斯专制和建立人民阵线制度或者与此类似的反法西斯—民主制度而斗争的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苏联文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个政策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为一切革命力量与民主力量的合作与共同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代表大会向共产党人的政治中心提出了维护和平、

反击法西斯、争取社会进步的泛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目标。

尽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通过的，但它实际上抛弃了（虽然没有进行公开的批判）他的许多宗派主义教条，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原则。这些决议表明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并为政治实践开辟了新的更加广阔的天地。这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着巨大的思想理论潜力，它变得更加成熟。

实行完全适合具体历史情况的统一反法西斯力量和团结反战力量的政策这本身表明，从总体上说，共产党已完成了形成新型政党的过程。尽管教条主义公式为害不浅，但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范围内，并在其帮助下仍然在思想政治上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

在战争危险日益威胁着人们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把援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作特别重要的任务。它懂得，唯有这个国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整个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命运、和平与进步事业都与苏联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苏联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苏维埃国家的阶级利益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根本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上的。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新战略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彻底地实现。对它产生很大影响的有以下种种情况：阶级敌人的反抗；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右翼社会党领袖的阻挠；群众本身缺乏政治经验；由于未能完全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影响而犯下的错误；斯大林的方法对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生活的消极影响。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给各国共产党以更多的政治自主权的决议，在个人迷信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更何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机关的民主继续受到限制，斯大林的主张不容反驳，要当作决定性的意见来接受。而且在战争危险有增无减的复杂情况下还形成了相互猜疑的气氛。尔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

命运以至生命，都取决于斯大林的看法和个人的好恶。30年代末期，在苏联对列宁的党的干部采取的恐怖手段，直接波及共产国际，其中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许多以政治侨民身份在苏联避难的共产党人也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成为斯大林一叶若夫—贝利亚独断专横的牺牲品。

大家知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Γ·季米特洛夫在很多场合下曾为那些他确信无辜的同志辩护过。这种干预有时取得成效，但共产国际往往不能保护他们免遭斯大林的毒手。这一切都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及它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态度产生影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奸细提供的关于波兰共产党队伍“不纯”的错误情报，逮捕了它的领导人，紧接着又解散了波兰共产党——这种做法不仅粗暴地违反了共产国际的章程，而且表明主席团事实上在政治上赞同这种犯罪行为。这个决定给当时处在希特勒侵略威胁着国家安全情况下的波兰工人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共产国际历史上这些惨痛的事件，我们无权回避，它们同发展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趋势——在一切革命民主力量当中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其中包括在与西班牙共和国团结一致运动中和反对法西斯与战争危险斗争中的革命民主力量当中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趋势是截然对立的。

我们想象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为受到斯大林独断专横后果的严重影响而不能在1939年苏联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独立的思想政治见解。众所周知，苏联这个迫不得已的外交行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严重的混乱。这个行动本身绝对不是要求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放松反法西斯斗争。我们的策略意图是不给希特勒以任何籍口来破坏1939年条约，然而在共产国际紧紧追随苏联的外交行动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意图给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政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针对希特

勒德国而言的“法西斯主义”这一术语，从那个时期发表的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消失了；在宣传工作中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但总的来说是强调英、法帝国主义特别危险。待法国沦陷和希特勒德国进攻南斯拉夫以后，共产国际才从这个错误中清醒过来。

尽管共产国际从两方面把业已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帝国主义战争，但它对于法西斯联盟的特殊危险性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并且不关心在这个战争中出现的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趋势。而正是这种趋势在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以后，共产国际竭尽全力动员共产党人、一切反法西斯分子为粉碎法西斯奴役者、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共产党走在解放斗争的前列，树立了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榜样。它们发挥了团结和指引抵抗运动力量的作用。共产国际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成了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统一的世界中心感到愈来愈难以给各国共产党确定基本的政治方针了。而早在这以前，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前进过程中就已逐渐停止了共产国际范围内的组织活动。30年代末期，这种组织形式愈来愈妨碍共产党发挥政治机动性和积极性；而现在，从各国共产党需要更多的独立自主性这一点可以判断，这种组织形式已完全过时了。1943年夏，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第三国际所特有的组织形式是历史造成的。然而，共产国际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它的基本特征引起当代共产党人的关注，需要人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解这些经验，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从而能够为充实和增进这些经验而效力。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中出现了共产党人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这是一个由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斗

争，到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争取民主、反对战争、实现普遍人道主义的理想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趋势。今天，当拯救人类免遭热核武器毁灭成为头等重要的、优先考虑的任务，当善于制定联合反战力量的政策和善于为此目的团结广大群众、人民和国家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的时候，这个经验对我们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译自《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11期

丁如筠 译

1986年日本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久 保 亨

以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和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探索多种方法论这两方面为中心，出现了一种形成新的历史意识的局面。可以说，1986年是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我国史学界正在迎来一个大的转折时期而给人以强烈印象的一年。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同中国本身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无关系。自1986年底以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为开端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迟早会给整个政治、社会带来巨大的结构上的变化，并将给人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尽管日、中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会有各种齟齬，但仍将以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而这一时代的到来，势必要求并促使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形成。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取得新进展方面的情况。近年来，对1912—1949年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完全可以说一改过去那种偏重于革命运动史或中共党史的陈旧局面，特别是最近一年内，相继出版了孙文研究会编的《孙中山研究（日中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集）》、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五四运动历史的再探讨》（中央大学出版部，以下简称《五四运动》），以及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国民政府史的研究》（汲古书院，以下简称《国民政府史》）3册学术论文集。

《孙中山研究》是1985年底在神户举行的日中国际学术讨论

会的论文报告集，收录了日方10篇、中方8篇学术报告或讲演稿，并附有详细的讨论记录。围绕孙文和辛亥革命诸问题的考察，是民国史研究中积蓄最厚的研究领域。有此雄厚的基础，加之不断提出崭新的观点，这一领域的研究，毋庸说肯定成为讨论会最感兴趣的论题。例如，中村哲夫的《试论孙文的经济思想》一文，依据经济学原理来理解，进行了重新研究孙文经济思想的尝试，因而被认为是“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孙文研究（竹内实）。同样，在讨论横山英的《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报告与他的《辛亥革命绝对主义论》一文时，指出了二者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野泽丰），久保田文次、中村义等人提出了应根据现在欧洲史中市民革命史研究的水准，来建立新的辛亥革命理论。这一观点，值得引起注意。又比如，谷口宽的《孙文和大亚洲主义》一文，论述了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和平野义太郎的“大东亚共荣圈”两者之间的差异，含有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目前日本的孙文研究的意义的内容。会上，岛田虔次在综合报告《围绕孙文研究之我见》中，论述了将孙文的民族主义置于儒教文明这一传统脉络中加以研究的现实意义。对此，山田辰雄提出如何“同现实的运动相联系”的问题，狭间直树作了“同前近代相决裂”这一对以往近代史研究反省的发言。笔者认为这些相互有联系的发言都值得一提。作为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研究成果，去年还出版了《辛亥革命研究》杂志（第6号），登载了许多有关发掘、整理史料方面的报道，并正在连续刊登小島淑男的《关于中国国民会》一文，而久保田文次的《辛亥革命是绝对主义变革吗？》（《东亚世界史探求》）一文，则是对会上提出的建议所作的综述。

其次是《五四运动》论文集。它的许多文章围绕五四时期的中国历史过程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把五四运动置于历史总体中加以考察，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能达到打破狭义的运动史研究的框框，获得开阔视野的目的。所收论文集的头两篇，即齐藤道彦的《五四运动历史再研究的观点》和笠原十九

司的《五四运动史的历史性探讨》，都提出了应该把五四运动看作“全民族收回山东主权运动的壮举”的观点。笠原的文章还以此为基础，批判了以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描述五四运动历史”的观点。接着，笠原在《巴黎和会和收回山东主权运动》一文中探讨了五四运动以前的北京政府的动向。齐藤的《五四北京学生运动断面》一文，再现了学生运动的详细实况。这两篇论文都论证了五四运动是全民族收回山东主权运动的观点。古厩忠夫的《五四时期上海的社会状况和民众》一文，将视线转向上海，非常具体地论述了上海工人及其同一层次的下层市民的生活和意识，并对动辄就是“先进的工人阶级”这种纯粹观念化的“上海工人阶级”概念强烈地提出疑问。末次玲子的《五四运动和国民党势力》一文，同样是以上海为中心来阐述国民党势力与民众运动兴起之间的关系，她的研究填补了研究史上的空白。味冈初的《南北对立和联省自治运动》一文，指出了在政治统治的理想状态与民众运动的相互交错中曾出现过“第三政府”设想派。高田博文的《第一次大战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文，是在以往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用统计法论证对外贸易的结构变化和工业化的进展。此外，姬田光义的《“挥代英日记”读书札记》一文，生动地展现了生活在激烈动盪的五四时期的一个青年活动家的形象。上述这些成果，都大大开阔了我们对这一时期历史认识的眼界。

最后举出的《国民政府史》论文集，是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二十多年间作为基本上统治中国本土的全国性政权的国民政府进行的第一部正式的研究著作。实际上，正如早就指出的那样，我国学术界“不以国民政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实在是太长了，这是日中战争期间，向国内外宣传无视重庆国民政府，欲使战争长期化的著名的“近卫声明”中的一节所规定的。即使是概论一类的著述，也都仅限于有关国民政府统治的论述，从政治立场上加以毁誉褒贬的不胜枚举，而真正作为历史研究对

象的，实属凤毛麟角。直至近年，这种状况才终于开始有所扭转，该书的出版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成果。但是，由于评论者本人与该书的编纂关系密切，因此，这里避开引起争议的内容，仅摘录一些所收录的论文的概要。由姬田光义、久保亨撰写的总论，总结了研究状况，并说明研究国民政府史的重要性。其后，在第一编“广东、武汉政府”中，收录了①坂野良吉的《武汉国民政府论序说》；②枌木利夫的《国民革命时期的地方政府》；③笠原十九司的《建立上海市政府的基础》等3篇论文。第一篇论文对在国民革命最后的高涨时期中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权设想及其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作了分析。第二篇论文对支持该政府的地方政府之一的湖南省政府进行了研究。第三篇论文则着眼于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的活动，阐明了国民革命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权力基础的继承性。第二编“南京政府”，由①土田哲夫的《南京政府时期的国家统一》；②姬田光义的《抗日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政策》；③久保亨的《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④上野章的《经济建设和技术引进》；⑤高田幸南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等5篇论文组成，从多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进行了剖析。第一篇论文以东北张学良政权同南京政府的关系为例，描述了处于成立时期的国民政府统一国家的真相。第二篇论文以蒋介石的军事思想为中心，对作为统一国家要素的军队统一化的进展过程作了概述，从该文中，甚至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队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第三篇论文以关税政策为例，从确保中央政府的财源和促进发展独立性的经济这两个要求的相互关系中，找出南京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特征。第四篇论文，通过分析改良蚕种政策的实施过程，指出当时存在着一条极其重视技术革新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建设路线。第三、四篇论文都运用了接近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第五篇论文，则是一方面论述了称为大学研究院—大学区制的这一政府成立初期的教育行政设施，另一方面承认它继承了国民革命的某一侧面，因而产生矛

盾。第三编“重庆南京政府”收录了①井上久士的《国民政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国民政府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加深理解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②今井骏的《对日抗战与蒋介石》，分析作为“持久战论者”的蒋介石的战略理论，清楚地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所发挥的作用；③菊池一隆的《重庆政府的战时金融》，阐明了支撑战时金融的四联总处的积极意义。以上三篇都是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文。此外，以战后最大的劳资纠纷“申九惨案”为例进行研究的齐藤哲郎的《战后中国的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一文，菊池先生作为相关研究论及云南军阀龙云抵制蒋介石中央集权化政策的意义的《云南省的战时经济建设》（《中央政治和地方社会》）一文，均被收入本编之中。

除了以上列举的3册论文集之外，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如笹川裕史的《1920年代湖南省的政治改革和地方议会》（《史学研究》第171期）一文，作者在深入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如何控制地方政权问题时，考察了湖南省的政治发展过程，从中成功地分析出：那些主张依靠省议会以振兴实业、振兴教育，并开展反“军阀”等的政治运动的“开明乡绅”阶层，才是促使“湖南社会资产阶级化”的主要力量。他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同前面的《国民政府史》中枌木一文观点相呼应。俞辛焯在其《满洲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东方书店）一文中，指出了依赖于列强调停的国民政府，实际上也已经冷静地察知了它同日方的界限。作者论述的依据是打破传统的通史框框的新史料，因此十分可贵。此外，渐渐进入从新的角度对人物进行研究的阶段。正象望月敏弘在《关于五四时期戴季陶政治主张的一点考察》（嘉悦女短大编辑出版的《研究论文集》第29辑，第2册）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容易首先从政治立场去评价”。而望月本人在上述论文中，则是全面地、具体地“以当时的政治状况为背景”，对五四时期戴季陶的思想进行了

研究，弄清了现代民族主义的真相。石川照子的《宋庆龄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津田塾大编辑出版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第12分册）一文，重视“从民国史，即国民党史着手研究的观点”，并为今后对宋庆龄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再有小林善文的《中国现代教员史研究序论》（《东洋史研究》，第44辑，第4册）一文，以五四到国民革命这一时期为中心，对初等学校的教员阶层的实际情况，诸如培养制度、薪金、工作条件等方面作了仔细的整理，是考察教员工会组织和运动的佳作。就象《国民政府史》论文集中高田的论文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对政府的教育政策本身重新估价，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

还有，介绍日本以外的国家研究民国史动向的文章有菱向哲的《中国北洋军阀研究的动向和今后的课题》（《立命馆法学》，第186辑）、冈斗基的《关于南朝鲜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现代，近きに在りこ》，第10辑），特别是后者，给人留下鲜明、强烈的历史意识跃动的印象。

为了支持、配合民国史研究的繁荣，工具书之类的书籍也日益得到充实。正在连载中的《近现代中国人物合传类索引》（《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8辑）、藤田正典编的《现代中国人物别号总览》（汲古书院）、亚洲经济研究所编的《中文报刊综合目录》（该所）及久保亨的《中华民国时期文书史料的介绍与研究》（《中国朝鲜文书史料研究》）等等均已出版。

同以上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相并列，应该指出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多种方法论的探索。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好几次讨论会都在这方面发生过争论。该讨论会筹备委员会编的报告集《中国蚕丝业在历史上的发展》也已出版。其中的报告者之一曾田三郎，在《中国蚕丝业的发展和日本》（下关市立大编辑出版的《论集》，第30辑，第2册）的报告中，超越了单纯比较史的框架，引入了可以称作日中经济关系史的观点，从而开辟了新的视野。川井悟的《日中战争前中国安徽省的茶叶统制政

策》（京大编辑出版的《经济论丛》，第13辑，第4册）报告，尝试探讨了技术专家主导的茶叶振兴政策的历史特点。久保亨的《近代中国棉纺业的地域结构和经营类型》（《土地制度史学》，第113辑）一文指出，从中国人的企业经营本身可以发现棉纺织业“发展的理论”，并采用经营史上的研究方法，对大量经营关系新史料作了深刻的分析。另外，在1986年度经济史讨论会上报告的工作中，黑田明伸的《20世纪初期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货币流通》（《日本领事报告的研究》）一文，通过分析货币流通的复杂结构，阐明了随着袁世凯银元、中国银行券的流通，形成了币制统一的趋势，并指出商品流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则是促进币制统一的主要原因。还有滨下武志的《英帝国经济和中国·香港》（山田秀雄编《英帝国经济的构造》新评论）一文指出，香港是中国对外经济集中活动的地方，而中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与香港又有很大差异。滨下武志的文章则扩大视野，把香港作为考查对象，就香港与中国国民经济的关系广泛地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又一次表明这种研究方法是可行的。而久保亨的《围绕1935年币制改革的研究动向》（《现代·近きに在りて》第10辑）一文，则是对近年来的众多研究进行的探讨。

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在农村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小林弘二所编《对旧中国农村的再思考及对改革起点的质问》（亚洲经济研究所）一书中指出：“解放以来直到最近为止，我们总是将眼光停留在改革的一面，今后对连续性的一面也应该引起注意，必须长期地把握变动情况”，这一点，值得重视。该书还收录了以下论文：三谷孝阐明1930年代中国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实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其调查》、井上久士的《农村复兴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农村调查》、小竹一彰分析当时农村社会时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封建成规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片桐裕子对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史进行汇集的《战后日本对旧中国农村调查的研究成果》、旗田巍分析农村社会现状的

《以庙祭为中心的华北村落之会》，以及内山雅生的《近代中国华北农村中的“讨租人”》等论文。再有，该书的执笔者之一内山所著的《民国初期华北农村契约的实施和民众运动》（《骏台史学》，第66辑）一文，依靠采用“惯例调查”等静态的把握和采用报纸、地方志等动态的把握相结合的方法，加深对农村社会的认识。此外，石田浩将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汇成《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研究》（晃洋书房）一书，把中国村落中能够见到的“没有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依地域、血缘结合”的现象作为焦点进行研究，提倡采用“生活共同体”的概念。如果将这一观点和上田信在其《关于对乡村起作用的吸引力（上）（下）》（《中国研究月报》，第455、456期）一文中根据他亲身进行的农村调查，着眼于乡村中存在的犹如张开的网似的同族关系、行政关系等“线路”的观点相比较，想必引人入胜。关于1982年以来的三年间所开展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的始末，在林达·古洛甫的《对上海市松江县华阳桥乡的美中合作调查》（《现代·近きに在りこ》，第10辑）报告中，也已作了明确的报道，至于它的全部内容，尚有待于公布。和上面那样的“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的方法”相对照的是“经济分析方法”。吉田宏一的《20世纪前半叶华北谷类作物地带的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向》一文，就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者根据4个农村调查报告中的土地生产和劳动生产这两个指标加以整理，清楚地分析出从大规模经营向小经营过渡的趋势。这种分析很有启发性。

作为社会经济史领域中其它令人感兴趣的成绩，还有仓桥正运用历史学方法分析去海外卖淫的日本妇女问题的《娘子军考》（《中国季刊》，第5期）和充满复杂感情的毛里和子的《上海史杂感》（《现代·近きに在りこ》，第10辑）两篇文章。

第三方面，介绍一下围绕日中战争的研究动向。“七七”五十周年即将来临，由于近几年的政治气候，这方面的研究正渐渐活跃起来，并且发生了虽然是小规模，但却是重要的争论，因

此想触及一下。争论之一，可以从西村成雄的《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转变和历史学》（《现代中国》，第60辑）一文和菊池一隆与其商榷的《对西村报告的质问》（同上）一文中，窥见双方环绕抗日战争时期或抗日时期的阶段划分而展开的争论。针对西村将1931—1945年作为抗日时期和将“九一八”至“七七”这个时期作为抗日时期前阶段的说法，菊池从应当重视“中国内部质的转变、结构的发展”的观点出发，坚持1937—1945年为抗日时期的主张。而日本史学界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显然主张“日中十五年战争论”，正因为这样，所以希望进一步对日中战争的分期问题展开讨论。争论之二，是以今井骏对石岛纪之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一书所写的书评（《历史学研究》，第553辑）和石岛对书评的反驳——《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同上，第562辑）一文为开端。“今天，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应该如何来研究？”——今井先生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对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史总体来说，同样具有意义。对今井提出的问题，石岛也同意相互就下面这一点达成谅解，即必须努力从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进行抗战这一历史经验中冷静地进行判别，对今天仍有意义的东西，应当继承、发展，而对今天已经失去意义的东西，必须予以克服……这一点，恐怕对其它领域也同样适用。

此外，有关日中战争的研究成果，还有池田诚的《“国民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立命馆法学》，第183、184辑）一文，它和前面提到的西村一文，都从相同的角度出发，对如何划分国家主义类型进行了尝试。但是，如同上面今井认为的中国的国家主义有其界限性一样，池田的类型划分论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石岛纪之的《围绕南京事件的新的争论点》（《日本史研究》，第28辑）、井上久士的《南京大屠杀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6期）等文，都是采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说明事件真相所取得的成果。恐怕原有的“南京事件=虚构”论以及企图过低估

让南京事件的论调，会因此而难以完全成立了吧。

以上所指的三个方面，显示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进展。此外，去年还相继出版了新的通史，有①小島晋治、丸山松幸的《中国近现代史》（《岩波新书》岩波书店）；②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矢吹晋的《中国现代史（1949—1985）》（《有斐阁选书》有斐阁）；③安藤正士、太田胜洪、辻康吾的《文化大革命和现代中国》（《岩波新书》岩波书店）等。必须把以“立足于今天的观点重写近现代史”（见①）作为编纂《中国近现代史》的宗旨，审视以前的研究情况。但是，确实随着“中国的大转变”，日本许多中国专家多次“不得不重新评价对中国的认识”（见②，第435页）。在以往的研究中若有违心地歪曲事实的话，那就要加强“对自身的严厉的剖析”（见①）。总而言之，在“主体上”要努力把握历史过程的内核”（见②），重写通史的这一写作方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使这一方针成为可能呢？这一点也是必须考虑的。因此，在撰写通史时，必然要认真思考和研究如何有效地吸收上述民间史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问题。倘若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那么，不仅民国时期的历史，就连1949年以后的历史叙述也将进一步得到充实。“封建遗制”显而易见是个历史概念，但极易被作为非历史概念加以使用（见③，第196—198页），这种现象也将不再频繁地出现。如此看来，石島一今井的争论是极有启发性的。当然，重新全面地探讨包括战前时期在内的日本以往研究中国的应有的方法，这在培养正确地认识主体性历史的问题上，还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石堂清伦、野间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等人的《十五年战争和满铁调查部》（原书房）著作，通过几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前辈对自己的经历谈笑风生的回忆，再现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这是一部具有相当份量的读物。

最后，介绍一些应该涉及而尚未触及的研究成果。平野正的《1947年的对日媾和争论中的中国的琉球归属论》（西南学院大

编辑出版的《国际文化论集》，第1辑第1册）和西里喜行的《琉球殉难事件考》（《球阳论丛》，白昼社）两篇文章，都是从琉球问题这一角度出发，对国民政府的（平野）或清朝政府的（西里）国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石井明的论文《中国和对日和谈》

（渡边昭夫、宫里政玄编《旧金山和谈》，东大出版会），对逃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和日本直到缔结双边条约为止的外交努力作了追踪，这也是以往历史研究中较薄弱的部分。上野章的《上海缫丝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第4辑）一文，通过分析确凿的实例，清楚地阐明了劳资关系的变化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关系。富永孝子的《大连·空白的六百年》（新评论）是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连的优秀纪实作品。它经过战后40年的岁月，当然也可以说是必要的40年，才终于问世，不过，要将该书的内容写进中国现代史的通史中去，尚需做更多的工作。

郭新鹏 译 孙国群 校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一)

黄光域 辑

编者按：在史学以及其他学术研究过程中不时会遇到一些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称，而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本比较全面地介绍这方面资料的书籍。黄光域同志在积年悉心搜集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将向读者提供比较准确可靠的在华的外国教会、洋行、厂矿、银行、医院、学校、报刊、公用事业、慈善机关及社会团体等等的约定俗成的中外文名称。括号内的注文系辑录者所加，使用时请注意。本刊将陆续刊登，供读者参考。

A

AAM

Aachen & Munich Fire Insurance Co.

Abalmasoff, Peter

Abbass, S. H.

Abbott, Thomas R.

Abbott Laboratories

ABC Clean'g Contractor

A. B. C. Express & Storage

ABCFM

来复会

欧春保火险公司，（1930年代后）

华懋保险公司

璧得洋行

利泰（洋行）

艾百泰（洋行）

雅培药厂

爱丽清洁行

新华航务局

美国公理会

A.B.C.Press, Societe Anonyme	商业印字房；商业印字馆
A.B.C. Publishing Co.	爱卑斯印刷公司
Abdoola & Co., C.	施鸭都刺（洋行）
Abdoolally, Ebrahim & Co.	祥记洋行，（香港）鸭都刺利洋行
Abdoolrahim & Co.	何道谦公司
Abdulljalil, H.A.G.	源大洋行
Abdulla & Co., W.	义信（洋行）
Abe & Co.	安部洋行
Abe Kobei	安部洋行
Abe Kobei & Co., Ltd.	安部洋行
Abeichi & Co.	阿部市洋行
Abeichi Kabushiki Kaisha	阿部市洋行
Abeichi Yoko, Ltd.	阿部市洋行；株式会社阿部市洋行
Abekobe & Co., Ltd.	安部幸兵卫商店
Aberdeen Industrial School (Salesian Institute)	香港仔儿童工艺院
ABFMS	大美国漫礼会差会
ABMU	大美国漫礼差会
Aboitiz, F.S.	爱胞狄士；爱胞狄士洋行
Abousoff, Ltd., A. & M.	宝丰洋行
Abouzoff, A.	宝丰洋行
Abraham, D.E.J.	益丰洋行
Abraham, E.	益丰洋行
Abraham Brothers	鼎兴洋行
Abraham, Katz & Co.	凯时洋行
Abramoff, R.	隆丽（珠宝首饰行）
Abramoff, R. & Linsky, G.	隆丽洋行
Abramovitch, L.M.	阿卜拉莫维赤（印刷所）
Abramovitch & Heatman, M.	中美洋行
ABS	美华圣经会
Accumulatoren-Fabrick, A.-G.	蓄电池制造有限公司
A.C.E.C.	比国沙城电器制造工厂

ACEC	美 华教育部
A.C. K. Co., Federal Inc., U.S.A.	三德洋行, 爱世开洋行; 美商爱世 开
ACM	美国圣公会
Acme Advertising Agency	爱克美广告公司
Acme Chemical & Surgical Co.	亚美洋行
Acme Code Co.	祥美洋行; 爱美电码 (编印所)
Acme Engineering Works	爱克门机器工厂
Acme Foundry, Ltd	达利铁厂有限公司
Acme Manufacturing Co.	爱美制造公司
Acme Oil Mill	义生制油厂
Acme Painting & Decorating Co.	爱克美油漆 装璜公司
Acme Photo	爱美电机复影公司
Acme Traders	大通贸易 公司
Acme Trading Co., Ltd.	爱克美贸易公司
Acme Union Co.	握美洋行
Adachi & Co., K.	须田老药房
Adair, Graham & Co.	津京机器厂
Adams, William A.	大美保险公司
Adams & Co.	亚通美行
Adams & Co., T.	美商亚当母斯公 司
Adams & Co., William A.	龙和洋行
Adams & Knowles	永固工程公司
Adams & Sons, T.	亚当母 (洋行)
Adamson & Co., (Shanghai) Ltd., James	大同洋行
Ades Brothers, Inc., U.S.A.	爱台司洋行
Adjmi & Btsh	百达洋行
Adjmi Importing Co., Inc.	爱基美洋行
Adler, A. H.	合成绘图公司; 艾德兰
Adler, D.	亚洛叫卖行
Adler, Nikolai	德安洋 行

Adler-Drogerie	凌基药房
Adler Transportation Co.	安达勒运输公司
Administration Francaise des Postes et des Telegraphes	大法国电报总局
Admiral Line, The	提督轮船公司
Admiral Orient Line, The	提督东方轮船公司
Admiral Steamship Line	提督轮船公司
Adorer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The	加拿大宝血会
Advent Christian Girls Middle School	来复会女学校
Advent Christian Girls School	来复会女学校
Advertising Agent	哈维告白经理 (行)
Advertising & Publicity Bureau, The	泵臣告白行; 汤臣告白行; 泵臣广 告传布所; 泵臣经纪广告传布 所
Advertising Art Studio	正道广告美术社
Advertising Bureau, Fed. Inc., U. S. A., The	大中国广告部
Advertising Club of China	中国广告公会
AEG China Electric Co.	蔼益吉电机制造厂
AEPMV	同善会
Aero Trading Co.	飞航公司
AFO	贵格会
Afra Co	安利洋行 (东方面粉公司)
Afshar & Co., A. R.	协兴洋行; (1920年代) 复昌洋行; (1930年代中) 福兴公司
Afshar & Co., Mirza Mohamed Bowker	进益洋行
AG	神召会
Agatstein & Co., P.	德盛洋行
Agence Francaise Independan- te	自由法人通信社

Agence France-Presse	法国新闻社
Agence Generale d'Importation & de Representations en chine	雷旭洋行
Agence Havas	哈瓦斯通信社
Agence Na-che-pao	那世宝通信社
Agence Roliz	路利公司; 万国旅行社
Agencia Comercia de Macao	澳门代理商货公司
Agenzia Italiana di Vendita per l'Estremo-Oriente, S.A.	安和洋行
Agenzia Manifatture Italiane	意商安茂洋行
Agfa China Co.	矮克发洋行
Agfol China Co.	爱福行
"Agile-Actarc" Welding Elec- trodes Factory	"阿吉利—阿克他" 电气焊药棍厂
A.G.I.R.	雷旭洋行
Agranovsky, J.	德亚洋行
Agricultural & Commercial Bank	农立银行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 of Watertoon, N. Y.	美商农业保险公司
Ahwerst, C.	阿卫斯特公司
Ai Lien Hospital	爱怜医院
Aikawa Photographers	相川照相馆
Aikosha Dairy	爱光社牛奶公司
Aircraft (China) , Ltd.	环球飞机有限公司
Airland, Ltd.	安轮有限公司
Aishi Dental Hospital	爱齿齿科医院
A. I. V. F. O.	安和洋行
Ajax Blue Print Co.	葡商韵秋晒图纸行
Ajax Blue-print Paper Factory	韵秋蓝白晒图纸厂
Akita & Co.	秋田洋行
Akita Lumber Co., Ltd.	秋田商会木材株式会社

Akita Mokuzai Shokai Kabu- shiki Kaisha	秋田商会木材株式会社
Akopian, Kamsar	阿阔平克进出口商行
Akron Mercantile & Transporta- tion Co., Fed. Inc., U.S.A.	安慎洋行; 美商安慎
Akron Syndicate, Ltd., The	安慎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慎洋行
Aktiengesellschaft Lothar, Mar- cks & Busch Saegewerk	宝利公司; 宝利有限公司
Aktieselskabet det Ostasiatiske Kompagni	宝隆洋行
Aktieselskabet Union Bryggeri	上海啤酒公司
A.K.U. China Agency	雅固 (洋行)
Ala Parisienne	柏立生 (时装店)
Albergo Commercial Transpor- tation Service	福生洋转运行栈
Albergo Roma	义国饭店
Albers, Carl	爱尔白 (经理行)
Albert, S.	爱利勃; 爱利勃 (洋行)
Albert & Co., Ben	爱尔白 (洋行)
Albert French Bakery	鸦路毕法国食品 (店)
Albert J. Pitkin Memorial School	匹瑾女学校; 私立匹瑾初级中学
Albert Motors	亚尔培汽车公司
Albert & Wullschlege	宝纶 (洋行)
ALBM	遵道会
Albright Boys School	遵道中学校; 私立遵道初级中学
Albright Preparatory School in China	遵道中等预备学校
Aldag, H.	德商阿尔达 (洋行)
Aldag Transport & Trading Co.	通茂 (洋行)
Alden Speare Memorial Hospi- tal	吐毗哩医院

Alexander Clark Co., (Shanghai), Ltd.	安康洋行
Alexander Shoe Co.	华革和服鞋行; 华革和服公司
Alexandra Cafe Co.	亚力山打咖啡馆
Alexandria Mercantile Co., The	亚力山大洋行
Aaff & Co.	多福洋行
Algar, A. E.	爱尔德 (建筑师事务所)
Algar & Beesley	爱尔德 (建筑师事务所)
Algar & Co., Ltd.	英商爱尔德有限公司
Alhambra Cigar &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Co.	亚路亨白公司; 麦尔克洋行
Alhambra Theatre	平安戏院
Ali Baba	阿拉伯夜总会
Alice Memorial & Affiliated Hospitals	雅丽氏合济医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雅丽氏医院
Alimentation Generale	大丰洋行
A Liu Koshi	永隆公司
All Asia	亚细亚月刊
All Russian Central Union of Consumers' Societies, The	中央联合商会
All Russian Central Union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The	中央联合商会
All Saints' Church	① (上海) 诸圣堂; ② (天津) 安立甘教堂; 安立甘教会圣堂
All Saint's Divinity School	圣堂学堂
All Union Textile Syndicate of the U.S.S.R., The	新源布庄; 苏联纺织新源布庄
Allan, Arthur S.	大美国爱论大律师 (事务所)
Allan, E. C.	爱纶洋行; 爱纶汇票经纪人
Allan & Co., V.	义益 (印刷所)
Allan & Buchan	盘根爱纶洋行; 爱纶及盘根洋行

Allanson, William	立信洋行
Allanson Brothers	立信洋行
Allen, Edgar Pierce	林文德大律师 (事务所)
Allen & Co., Ltd., Edgar	爱伦炼钢厂; 爱炼纯钢厂
Allen & Hanburys, Ltd.	爱兰汉百利有限公司; 爱兰汉百利
	西药行
Allen & Lucker	林文德 (律师事务所)
Allen, Sons & Co, Ltd., W. H.	爱伦厂
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	同善会
testantischer Missions Verein	
Alliance China Mission	德华盟会; 传福音会
Alliance Francaise	上海法文协会
Alliance Francaise Comite de	中法协会
Pekin	
Alliance Insurance Co. of Phi-	爱伦斯保险公司
ladelphia	
Alliance Mission	宣道会
Alliance Press	宣道书局
Alliance Tobacco Co. of China,	英商驻华联合烟草有限公司
Ltd.	
Alliance Trade Bureau	联合贸易洋行
Allianz China Mission in Bar-	德华盟会
men	
Allianz und Stuttgarter Verein	华尔德 (保险公司)
Versicherungs Aktien-Gesell-	
schaft, Berlin	
Allied Automotive Association of	中国汽车业联合总会
China	
Allied Commercial Co.	一匡洋行; 安康 (洋行)
Allied Machinery Co. of Ameri-	美昌洋行
ca	
Allied Products Corporation	美斯洋行

Alliston, S.	礼敦 (洋行)
Allman & Co.	阿乐满律师事务所
Allman, Davies & Kops	阿乐满、台维斯、克保罗律 师事务所
Allan, Chow & Co., Eric	远兴洋行
ALM	豫南信义会; 中华信义会
Almeida & Co.	美大 (洋行)
Alpha Code Condenser	蔡高福 (电码登录行)
Alt, Harold L.	华尔德 (工程咨询事务所)
Altamira & Co., M. P.	美亚洋行
Altberg, F.	老山洋行
Altounian, H. H.	美康 (出口行)
Altshuler (S. J.) & Friedman (U. M.)	远东股份水酒公司
Aluminium (V), Ltd.	美国铝业公司; 铝业有限公司
Aluminium Union, Ltd.	铝业有限公司
Aluminium Co. of America	美国铝业公司
Alves & Co., A. L.	顺昌洋行; 嘉乐地
Alves & Co., J. M.	顺兴洋行
Alves & Co., Ltd., J. M.	顺兴洋行
Amasia Importing Corp.	美亚 (进出口行)
Amasia Sales Co.	美亚公司; 美亚洋行; 美亚售品 公司
A. M. I	安茂洋行
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	大英戏院
Amberg & Co., George	亨柏洋行; (1940年代) 安培洋行
Amchina Fur Corporation	美商郝利洋行
America-China Export-Import Co.	美利洋行
America-China Trading Co	中美贸易行
America & Far East Trading Co	远东公司

American Academy	美国学校
American Advent Christian Mission	来复会
American Agents	美信洋行
American Art Store, The	美国照相馆
American Asiatic Commercial Co., Ltd, The	美亚贸易有限公司
American Asiatic Import Export	美亚进出口行
American-Asiatic Silk Mill	美商美亚织绸厂
American Asiatic Trading Co.	① (1910年代) 汇华 (洋行); ② (1928年开办) 美亚贸易洋行; 美亚贸易公司
American Asiatic Trading Co., Ltd.	中美贸易有限公司
American Asiatic Trading Corporation	美亚洋行
American Asiatic Trading Corporation, Inc.	美亚贸易公司
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 Federal Inc., U.S.A.	美亚保险总公司
American Assemblies of God Mission	神召会
American Auction & Sales Co.	美商利安洋行; 美国拍卖售品公司
American Auctioneering Co.	通孚拍卖行
American-Australia Orient Line	美澳东方轮船公司
American Auto Parts Co.	美国汽车零件公司
American Bakery	美国面包公司
American Bank Note Co.	美国钞票公司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Hospital	明德医院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大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大美国浸礼会差会；美国浸礼会
American Baptist Gospel Mission	美国浸礼福音会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大美浸礼公会
American Bar Restaurant	美华香饭店
American Beauty Institute	美国美容修饰所
American Beauty Shop	美国电发厅
American Benedictine Sisters	美国本笃女修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大美国圣经会；美华圣经会
American Board Mission	公理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公理会；公理会；（福建等地）美部会；美部传道公会
American Book Co., Ltd.	欧美图书有限公司
American Book & Supply Co.	美国书业公司
American Book Shop, The	中美图书公司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美国商船测勘公司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 The	驻华花旗商会；上海美国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Hankow	驻华花旗商会；汉口美国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Peking	北京美国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ientsin	天津美商会；天津美国商会
American-China Commercial Co.	立丰洋行
American-China Export & Import Co.	美利洋行
American-China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中美国际贸易公司
American-China Trading Co.	中美贸易行

American-Chinese Co.	美华公司
American-Chinese Co., Federal Inc., U.S.A.	美丰洋行
American-Chinese Drug Co.	美华药房
American Chinese Fire & Marine Insurance Association	美安水火保险总公司
American, Chinese, Korean Co.	三德洋行
American-Chines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美华教育部
American-Chinese Products Co.	美商汇茂隆 (洋行)
American-Chinese School	美华初级中学
American Chinese Steamship Co. Ltd.	中美轮船公司
American Chinese Trading Co.	美华洋行
American Chinese Trading Co., The	中美贸易公司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圣公会; 大美圣公会; 美国圣公会
American Cleaners	美国机器熨衣公司
American Club	① (上海) 美国总会; ② (天津) 美国公会
American Construction Co., Fed. Inc., U.S.A.	美国建筑公司
American Dairy	(上海) 美商资利牛奶棚
American Delicatessen	滋美食品公司
Americ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ederal Inc., U.S.A.	大美企业公司
American Dispensary (Federal Inc., U.S.A.)	华东药房
American Dominican Mission	圣多明我会
American Drug Co.	科发药房
America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ina)	北极公司; 北极电气冰箱公司; 美商北极股份有限公司

America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Federal Inc., U.S.A.	北极公司
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	美国圣公会
American Export & Import Co.	美国进出口行
American Exporters Corp.	美成洋行; 美成公司
American Express Co., Inc., The	美国运通银行; 美国运通银行有限公司
American Far East Trading Co.	美中公司; 美中商行
American-Far Eastern Match Co. Federal Inc., U.S.A.	美光公司; 美光火柴公司
American-Far Eastern Products Co. (Fed. Inc., U.S.A.)	永和(洋行)
American Far Eastern Syndicate, Inc.	美国远东企业公司; 美国远东洋行; (天津) 美亚洋行
American & Far Eastern Trading Co.	美国远东洋行
American Flour Co.	美国面粉公司
American Food Agencies, Inc., U.S.A.	美品洋行; 美国食品公司
American Food Co. (Federal Inc., U.S.A.)	美国食品公司
American Food Manufacturing Co., Ltd.	美商罐头食品公司; 美商食品公司; 美商食物公司
American Food Products Co.	美国食品公司
American Foreign Insurance Association	美国保险公会; 美国水火保险会; 美国海外联合保险公司
American Forwarding Co.	美国转运公司
American Franciscans	方济会
American Free Methodist Mission	循理会
American Friends Mission	贵格会
American General Electric Ed-	美商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 美商安

ison Corporation of China	迪生中国电料厂
American Ginseng Co.	美国花旗参行
American Health Service Co.	美国康健保护会
American Import-Export Corp.	大雅(洋行)
American Industrial Corpora- tion, Federal Inc., U.S.A.	美华实业公司
American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Co., Ltd.	亚美兴业洋行
American Industrial Supply Co., Inc.	富来洋行
American Industries, Fed. Inc., U.S.A.	永胜公司
American Insurance Co., of New Jersey	细(纽?)其西保险公司
American Japanese Commercial Co., Ltd.	日米洋行; 日米商事株式会社
American Leather Import Co.	利福洋行
American Leather Import Co. (Ifland, S.)	美国皮件进口公司
American Lloyd	欧美旅行社
American Lloyds	美国商船测勘公司
American Locomotive Co.	美国机车公司
American Locomotive Sales Corporation	美国机车公司
American Lutheran Brethern Mission	遵道会
American Lutheran Misiosn	豫南信义会; 美路得会
American Lutheran Mission of Shantung	中华信义会
American Machine & Foundry Co.	美国机器铸造公司; 美国纽约机器 铸造公司
American Machinery & Export	美清公司; 美清洋行

Co.	
American Mai-Mai Fur Corporation	郝利洋行
American Mail Line, The	美国邮船公司; 花旗轮船公司
American Manchurian Corporation	美满贸易公司
American Manufacturers	亨大洋行
American Marine Paint Co.	美丽洋漆行
American Maritime Co., Ltd.	花旗航业有限公司
American Mercantile Co., Federal Inc., U.S.A.	美泰贸易公司
American Merchandise Co. of New York, Inc.	美国贸易公司
American Metal Co., Ltd.	美国五金公司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美以美教会
American Milk Products Corporation	(初称) 三源牛乳制品公司; 美商荣发牛奶公司
American Millinery Manufacturing Co.	美国女帽公司
American Milling & Industrial Corporation	美国实业公司
American Motors, Inc.	美国汽车行
American Motors (Federal Inc., U.S.A.)	美国汽车公司
American Newspaper Co. (Federal Inc., U.S.A.)	大美晚报 (公司)
American 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	美瑞路德会
American-Orient Co.	大美洋行
American-Oriental Bank of Fokien, The	福建美丰银行

American-Oriental Bank of Szechuen	美丰银行（渝行）
American-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 The	美丰银行
American-Oriental Finance Corporation (Fed. Inc., U.S. A.), The	美东银公司
American Oriental Fur Agency	（初称）东方洋行；美商东方皮毛 （洋行）
American Oriental Leaf To- bacco Co., Inc.	东美烟叶公司
American Oriental Mail Line	提督轮 船公司
American Oriental Motors, Fed. Inc., U.S.A.	美达洋行
American Oriental Sales Co.	美东洋行
American Oriental School of Acting	美亚电影传习所
Americau Oriental Trading Ex- change	永泰（洋行）
American Overseas Warehouse Co., Inc., The	瑞通洋行
American Pacific Enterprise, Inc.	美国太平洋企业公司
American Painless Dentists	美国不痛牙科（诊所）
American Paper Exports, Inc.	美国造纸出口联合公司
American Pharmacy	普利大药房
American Plumbing & Heating Co.	汽喉公司
American Presbyterian Hospi- tal	海口福音医院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	长老会；大美国长老公会；美国长 老总差会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South	美国南长老会；南 长老会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Hospital	华美医院；华美男医院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	美华书馆；花华圣经书房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美国总统 船务 公司
American Press, The	爱美印刷所
American Printing Co.	美国印书馆
American Products Co.	美国物产公司
American Radio & Refrigeration Co., Federal Inc., U.S.A.	飞歌公司
American Radio Equipment Co.	美国无线电公司
American Radio Repair Service	美国无线电修理社
American Real Estate, Construc- tion & Loan Co., Ltd.	基立行
American Red Cross, The	美国红十字会
American Reformed Presbyte- rian Mission	美国约老 会
American Russian Trading co.	美俄洋行
American Sales Co.	美国百货公司
American Sales Corporation, The	华美公司；华美洋行
American School	美国学堂
American School of Correspon- dence	美国函授学堂；美国函授学校
American Securities Corpora- tion, Federal Inc., U.S.A.	美安公司
American Securities Corpora- tion (China)	美安公司
American Shoe Co.	汇泰（鞋行）

American South Baptist Mission of Shantung	浸信会
American South Baptist Mission of Tengchow	浸信会
American Stevedoring Co.	美国工运公司
American Swedish Mission	美瑞丹会
American Textile Co.	美亚贸易公司
American Tobacco Leaf Company	美华烟叶公司
American Traders	福美洋行
American Traders, Ltd.	美商洋行有限公司
American Trading Association, Inc.	美国商会
American Trading Co., The	茂生洋行
American Trading Co., Inc	茂生洋行
American Trading Co. of The Far East, Inc.	茂生洋行
American Transportation Co.	美国运输公司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美国同学会；美国同学会事务所
American Violet Ray Machine Co.	美国紫光电疗器公司
American Warehouse, The	益生（批发庄）
American Water Well Co. (China), Inc., U.S.A.	美国自流井（工程公司）
American Welsh Co.	美商惟利士公司；惟利士转运公司
American West China Navigation Co.	（重庆）美顺轮船公司；美华轮船公司
American Women's Club of Shanghai	花旗妇女总会；美国妇女公会；美国妇人俱乐部
American Women's Club of Shanghai, Inc.	美国妇女公会
American Woolens & Textile Co.	天安洋行

American X-Ray & Medio-Scientific Supplies Corporation	美国爱克司光科学医疗用具公司
American "Zakoopshit", Inc., New York, U.S.A.	美国柴可士必托联合会社; 美国柴可士必托纽约联合会社
AMI	意商安茂洋行
Amin & Son, M.	安敏洋行
Amos Bird Co., Inc.	班达公司; 班达公司蛋厂
Amoy Club	厦门总会
Amoy Dispensary	夏礼公司
Amoy Engineering & Electrical Agency	机器并电器代理行
Amoy Hospital	厦门博爱医院
Amoy Trading Co., The	协利(洋行)
Amschel, Julius A.	安涉迹(代理行)
Amsterdam-London Insurance Co., Ltd.	望赉水火保险公司
AMT	教会司库协会
An Chien (Safety) Match Co.	法商安全公司
An Pu Oil Mill	安普油厂
Anastassieff & Co., G.V.	聚丰(洋行)
Anchia Brothers	嘉丰营造厂; 嘉丰艺术公司
Anchia Brothers & Co.	嘉丰公司
Ancienne Etude A. du pac de Marsoulies	前邀百克大律师事务所
Ancienne Etude Nouveau	农复律师公司
Anciens Etablissements	元利洋行
Ancient Capital Fur Co., The	华茂女子服装商行
Andersen & Co., A.O.	德生洋行
Andersen, Meyer & Co.	慎昌洋行
Andersen, Meyer & Co., Ltd.	慎昌洋行
Anderson, D.J.N.	安德臣大律师(事务所)
Anderson, H. McClure	安德森工程司(事务所)

Anderson, J. O.	安德臣大律师 (事务所)
Anderson, L. A.	安达生 (洋行)
Anderson & Anderson	安德臣大律师 (事务所)
Anderson & Ashe	晏打臣及雅士 验 船 机 器 师 (事务 所)
Anderson & Co.	安记洋行
Anderson & Co., A. L.	安大生洋行
Anderson & Co., Ltd., Robert	协和洋行
Anderson Brothers	安德兄弟广告印刷公司
Anderson, Clayton & Co.	美安棉业洋行
Anderson, Clayton & Co.'s Agen- cy	美安洋行
Anderson & Ferroggiaro (Fed. Inc., U. S. A.)	美国别克汽车公司
Anderson Music Co., Ltd., The	晏打臣琴行; 晏打臣洋琴有限 公司
Ando Shoten	安藤商店
Andreeff, D.	爱达里也夫 (印刷所)
Andreeff & Son, D.	爱达里也夫父子 (装订厂)
Andreev's Successors, S. A.	安德列耶夫 (酒厂)
Andresen, Inc., C. A.	安定洋行
Andresen, Stern, Inc.	安定 (洋行)
Andresen & Co., Inc., J. C.	美商安定洋行
Andresen & Son, Inc., C. A.	安定洋行
Andrews & Brooks	博文律师 (事务所)
Andrews & George	美丰洋行
Andrews & George (China)	美丰洋行
Andrews & George, Inc.	美丰洋行
Andrews & George, Ltd.	美丰洋行
Andrews & George Co.	合名会社大连支店; 安德 (洋行)
Andrews & George Co., Inc.	安德 (洋行)
Andrews, von Fischerz & George	美丰洋行

Ltd.	
Andrews & Wentworth	立华（牙行）
Angarrack Christian Mission	神爱馆
Angarrack Japanese Christian Mission	神爱馆
Angelo & Co., M.d'	邓者罗（营造厂）
Angelou & Co., A.A.	正昌烟公司
Anglican Church in China	中华圣公会
Anglican Mission	中华圣公会
Anglican Mission School	安立甘堂；（1912年后）萃英学堂； （1930年后）育华学校；私立育华 初级中学
Anglo-American-Chinese Commercial Club	中英美商业联合会
Anglo-American Coal Co.	英美矿务洋行
Anglo-American Export Co.	益昌（洋行）
Anglo-American Import & Export Co.	惠新洋行
Anglo-American Metallurgical Laboratory	英美冶金公司
Anglo-American Shoe Co.	英美皮鞋公司
Anglo-Asiatic Co., Ltd., The	英亚洋行
Anglo-China Finance, Ltd.	英商中英信托有限公司
Anglo-China Trading Co., Ltd.	英商敦和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Anglo-Chinese Agencies	中英营业公司
Anglo-Chinese Building Co.	和记建筑公司；和记建造公司； （1920年代后）利泰建筑公司
Anglo-Chine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Co.	和记建筑公司
Anglo-Chinese College	①（厦门）英华书院；私立厦门英 华中学；私立英华中学；②（福 州）鹤龄英华书院；私立鹤龄英华

	中学；③(上海)中西书院；④(天津)新学大书院；私立新学书院；新学中学；伦敦新学书院
Anglo-Chinese Cotton Manufacturing Co.	振华纺织厂；上海振华纺织公司
Anglo-Chinese Eastern Trading Co., Ltd., The	华英东方贸易公司；英商油房机器公司；英支东洋贸易株式会社
Anglo-Chinese Engineers' Association, Ltd.	保丰洋行
Anglo-Chinese Fibre Co., Ltd.	纶新轧花公司
Anglo-Chinese Finance & Trade Corp., Ltd.	华英商业银公司
Anglo-Chinese Girls' School	中西女学校；私立中西女子中学
Anglo-Chinese Import & Export Co., Ltd.	中英有限公司；美丰洋行；英商美丰有限公司
Anglo-Chinese Methodist School	中西学校
Anglo-Chinese School	①(上海)英华书院；英华书馆 私立英华书馆；②(苏州)英华男学堂
Anglo-Chinese Trading Co.	永和公司
Anglo-Chinese Trading Co., The	中英洋行；中英公司
Anglo-Chinese Trading Co. (Hongkong), Ltd.	公源洋行
Anglo-Danish Shipping Co.	大丰洋行
Anglo-Dutch (Java) Plantations, Ltd., The	英嘴爪哇橡树咖啡地产有限公司
Anglo-French China Corporation, Ltd., The	联华银公司
Anglo-French Ice Co., Ltd.	大茂(冰厂)
Anglo-French Land Invest-	英商英法产业有限公司

ment Co., Ltd.	
Anglo-French Trading Co., The	英法贸易公司
Anglo-German Brewery Co., Ltd., The	青岛皮酒公司
Anglo Philippine Trading Co.	惠利洋行
Anglo-Siberian Co., Ltd.	吉利洋行
Anglo-Swiss Confectionery Co., Ltd.	丰茂糖果有限公司
Angus & Co.	恩克师洋行; (1930年代后) 海明 (洋行)
Anking Cross Stitch Co-operative Society	针黹协济会
Ann Summers Dance School	桑梅史跳舞学校
Ann Summers Studio	桑梅史跳舞学校
Annet Mme.	安娜 (衣帽店)
Annett, Ltd., M.A.	时昌洋行
Ann's Medical Cosmetic Institute & Laboratory	安氏化学美容制药社
Anselm & Co., Inc.	安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Anshoh & Co.	安昌洋行
Anthorose Co.	仁德乐士洋行
Anti-Cigarette Society of China, The	中华民国戒香烟会
Anti-Narcotic Society	天津拒毒会
Anting Hospital	安定医院
Anto Banzai Kabushiki Kaisha	安东锯木厂
Antoine	安汤妮美容室
Antoine Beauty Parlour	杏朵汶美容室
Antoine Chiris Navigation Dept.	吉利行轮 船部
An-Tou Shin Po	安东新报
Antung Daily News	安东新报
Antung Electric Light & Power	安东电灯电力厂

Plants

Antung Gas Co., Ltd	安东煤气公司
Antung Hospital	丹国病院
Antung Japanese Concession Telephone Co.	安东日商电话公司
Antung Sawmill Co., Ltd.	安东锯木厂
Antung Water Works	安东自来水厂
Antwerp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 Ltd., The	恒昌(洋行)
Anz & Co., D.H.	盎斯洋行
Aoki & Co.	青木洋行
Aoki Shoji Kaisha, Ltd.	青木商事株事会社上海支店
Aoyagi Law Office	青柳法律事务所
Aoyama Printing Co.	青山印刷所
Apcar & Co., A.V.	万记(洋行)
Apcar & Co., Ltd., Arratoon V.	万记(洋行)
Apcar Line	鸭家轮船公司; 阿家轮船公司
Apollo Cinema	爱普庐(电影院)
Apollo Theatre	爱普庐影戏院
Apollon	福明理发店
Apostolic Delegation in China	宗座驻华代表公署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使徒信道会; 使徒信心会
Apostolic Faith Missionaries	使徒信心会; 使徒信道会
Apostolic Vicariate of Ichowfu	沂州府天主堂教区
Apostolic Vicariate of Tsing-tao	青岛天主堂教区
Aquarius Co.	泌乐水厂; 正广和有限公司泌乐水厂
Arai & Co., T.	新井洋行
Arbuthnot & Co.	大和洋行
Arc & Co., G.L.d'	搭克叫卖行
Arc Welding & Die Casting	爱电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

Works, Ltd.	
Arcade Amusement Co., Tientsin	平安电影公司
Arcadia Tobacco Co., Ltd.	英商克敌烟草公司
Arcadia Tobacco Store	上海安乐烟公司
Archer & Co.	安吉 (工程事务所)
Architects Bureau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美国长老会测绘建筑事务所; 美国长老会绘图事务部
Arculli, A. el	夏高理律师 (事务所)
Arculli Brothers	合德洋行
Arcus, S. G.	亚柯司洋行
Arcwelding & Diecasting Works, Ltd.	爱电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 爱电制造厂
Arcwelding Works, Ltd.	爱电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
Ardalmetals, Ltd. (China)	英商亚达金属有限公司
Ardath Tobacco Co., Ltd.	雅达烟公司
Ardjoeno Insurance Co., Ltd	望赉 (保险公司)
Arendorff, Anker	爱达富洋行
Argentina Nite Club	阿根廷夜总会
Argento-Sino Co.	中国阿根廷贸易公司
Argo Co., The	安固洋行
Argus Weekly Pictorial	万宝周报
Arita Drug Store	有田药店
Arkell & Douglas, Inc.	美康洋行
Arkin (W.) & S. Wainberg	阿立金那万般比尔格 (洋行)
Arlington Technical Co.	雅灵顿科学用品公司
Armbruster, Alb. C.	德商狄星洋行
Armco China Agency	美国金山铁厂驻华总经理处
Armstrong, Whitworth & Co., Ltd., Sir W. G.	来丰 (洋行); (香港) 启东建造公司
Arnaud-Coste, A.	益隆 (洋行)
Arnaud-Coste & Dent	彙昌洋行

Arnhold, H. E.	安利洋行; 安利英行
Arnhold & Co., Ltd.	安利英行; 英商安利洋行; 安利有限公司
Arnhold Brothers & Co., Ltd.	安利洋行; 安利英行
Arnhold, Karberg & Co.	瑞记洋行
Arnhold Trading Co., Ltd.	瑞记有限公司; 瑞记洋行
Arnold, E. A.	克隆洋行
Arnold & Co., Ltd., Henry	爱富有限烟公司
Arnold, Inc., Hollis H.	亚诺尔工程事务所
Arnoult, Societe Anonyme des Anciens Etablissements	昇昌忠记行
Arnoult et Amoureux	大法国面包房
Aronovsky, D. G. M.	罗泰洋行
Arrow Advertising Agency	爱罗广告公司
Arrow Plywood	箭三夹版(木行)
"Art" & "Dolls Clinic"	格立玩具店
Art Picture Advertising Co.	星发(广告行)
Art Picture Co.	美术图书馆
Artesian Wells, Ltd.	源源凿井有限公司
Arthington Memorial Women's Hospital	亚斯顿福音医院
Arthington Mission Hospital	亚斯顿福音医院
Arthur & Co., Ltd. (Glasgow)	公义洋行
Arthur & Co. (Export), Ltd.	公义洋行
Arthur Peill Memorial Hospi- tal	道生施医院
Artistic Bronze & Iron Works	伊思尔钢铁工厂
Artistic Corset Co.	集美公司
Arts & Crafts, Ltd.	美艺有限公司; 美艺公司
Arts & Crafts Furnishing Co., The	美艺(公司)
Asa Lees & Co., Ltd.	爱雪利司纺织机器制造厂

Asahi-Gumi Contractor	朝日工程局
Asahi-Ken Restaurant	朝日轩
Asahi Marine&Fire Insurance Co.,Ltd.,The	朝日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Asahi Shinbun Sha	朝日新闻社
Asahi Shoji Kabushiki Kaisha	旭商事株式会社
Asano Bussan Co.,Ltd.	浅野物产公司; 浅野物产株式会社
Asano Trading Co.	荣兴公司; 浅野洋行
Asanuma Shoten	浅沼钟表批发行; 浅沼商店
Asbury Academy	吉士学堂
Ascot Riding School	爱驰骑马学校
Aseptic Dressings Manufacturing Co.	有宁外科包扎材料制造厂
Ash, Arthur	集盛 (牙行)
Ashida Engineering Co.,Ltd.	芦田电气有限公司
Ashizawa Printing Co.	芦泽印刷所
Ashkenazi,D.	安瑞洋行
Ashkinazi,D.J.	阿式西那在叫卖行
Ashley,C.J.	新永发 (篷帆索具行)
Ashmorth,A.	汇昌 (洋行)
A-Shu&Co.	亚洲公司; 合名会社亚洲公司
Asia Agencies	亚洲 (代理行)
Asia American Egg Drying Co.	华友蛋厂
Asia Banking Corporation	友华银行; 美国友华银行
Asia Boyeki Kabushiki Kaisha	亚细亚贸易株式会社
Asia Coal&Briquetting Co., Ltd.	亚洲煤砖有限公司
Asia Commercial Trading Co.	亚洲洋行
Asia Company,Ltd.	瑞商亚细亚股份有限公司
Asia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Co.	亚洲建筑公司
Asia Decorating & Advertising	亚洲图画广告公司

Co.	
Asia Development Co., Ltd	亚洲建业有限公司
Asia Distillery Co.	亚细亚水酒洋行
Asia Electric Co. (Federal Inc., U.S.A.)	亚洲电器公司
Asia Engineering & Contracting Co., Inc.	亚洲机器建筑公司
Asia Engineering & Iron Works	亚洲机器铁厂
Asia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亚洲机器公司
Asia Export Co.	① (天津) 华亨洋行; ② (上海) 亚洲出口公司
Asia Factors Co., The	发德洋行
Asia Film Exchange Co., Ltd.	亚洲影片公司; 亚洲影片交换公司
Asia Film Service	亚洲影片事务所; 亚洲影片交换公 司
Asia Films of China	亚洲影片公司
Asia Finance Corp., Ltd.	新亚银公司
Asia Finance Syndicate	亚洲银团
Asia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友邦水火保险公司
Asia Fire & Marine Underwrit- ers (Fed. Inc., U.S.A.)	友邦水火保险总行; 友邦保险总行
Asia Fire Insurance Underwrit- ers	友邦水火保险公司
Asia Glass Co.	亚细亚玻璃公司
Asia Hotel	① (天津) 亚细亚饭店; ② (上海) 亚洲蕊香院
Asia Import Co.	亚盛洋行
Asia Import & Export Co.	天昌洋行
Asia Industrial Corp., Ltd.	亚洲实业有限公司
Asia Koun Koshi	亚细亚航运公司; 亚细亚航运股 份 有限公司

Asia Lands, Ltd.	普益置业有限公司
Asia Life Insurance Co., Inc.	友邦人寿保险公司
Asia Machine Co., Ltd.	亚细亚机械株式会社
Asia Mohi Kabushiki Kaisha	亚细亚毛皮会社
Asia News Agency	亚细亚通信社
Asia Press	亚细亚印字馆
Asia Radio Co.	宝兴无线电公司; 亚细亚无线电公司
Asia Realty Co. (Federal Inc., U.S.A.)	普益地产公司
Asia Saving & Financial Corp., Ltd.	亚细亚有限银公司
Asia Steel Works	亚细亚钢业厂; 亚细亚钢业株式会社
Asia Theatres, Inc.	亚洲影院公司
Asia Trade Development Co., Ltd.	志成有限公司; 志成洋行
Asia Traders	通华(洋行)
Asia Trading Co.	①(上海俄商) 新泰洋行; ②(上海日商) 亚细亚洋行; ③(上海滇池路) 大亚贸易公司; ④(香港) 德泰洋行
Asia Trading Co., Ltd.	亚细亚贸易株式会社
Asia Trading Corp.	振华贸易公司
Asia Trading Exchange Co.	华通(洋行)
Asia Transportation Co.	亚细亚商运公司
Asiatic Commercial Co.	亚洲贸易公司
Asiatic Commercial Co., The	纶美(洋行)
Asiatic Craftmen	永平洋行
Asiatic Engineering Co., The	亚大(商社)
Asiatic Film Co., The	亚西亚制造影片公司
Asiatic Fleet Review	亚细亚舰队评论

Asiatic Fur Co.	亚细亚皮毛公司
Asiatic Fur Trading Co.	亚细亚皮业出入口洋行
Asiatic Godown & Trading Co., The	亚洲营业公司栈房
Asiatic Mercantile Co.	①（上海西班牙商）兴隆洋行；亚 细亚洋行；②（上海俄商）亚洲贸 易公司
Asiatic Motor	东亚汽车月刊社
Asiatic Motors, Inc.	亚细亚汽车公司
Asiatic Motors Company of Harbin	亚细亚汽车行
Asiatic Perfumery & Drug Co., Ltd.	普利大药房
Asiatic Petroleum Co., Ltd., the	亚细亚火油公司
Asiatic Petroleum Co., Ltd. The (London)	亚细亚火油公司
Asiatic Petroleum Co. (North China), Ltd., The	亚细亚火油公司；亚细亚火油有限 公司
Asiatic Petroleum Co. (South China), Ltd., The	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商亚细亚火油 公司
Asiatic Produce & Coal Co.	大亚公司
"Asiatic Republican"	英文白话报
Asiatic Retreading Co.	亚细亚橡皮胎整新公司
Asiatic Trading & Finance Corp. of Chicago	亚济公司
Asiatic Trading & Industrial Co.	亚细亚商务工业公司
Asiatic Trading Co.	①（上海四川路拉脱维亚商）恒昌 洋行；②（上海南京路日商）亚细 亚洋行
Asiatic Trading Co. (T. L.), Ltd.	亚细亚商业洋行

Asiatic Trading Corp., Ltd.	新泰洋行
Asiatic Transport Co., Inc., U. S. A.	福东公司
Asiatic Yeast Works	大华利卫生食料厂
Asiatic Yeast Works, Ltd.	大华利卫生食料厂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French Convent)	下环婴堂
Asmus & Schenitzki	新亚 (服装店)
Aso Hospital	麻生医院
Asp Dairy Farm	亚士浦 (牛奶场)
Asphalt Engineers	安孚行
Asquith & Co. (Hongkong & Shanghai)	玉山洋行
Assemblies of God	神召会; 上帝教会
Assemblies of God Mission	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in Shacheng	挪威福音会
"Assicurazioni Generali—1831"	意泰保险公司
Assin & Co., I. S.	爱新洋行
Associacao Das Senhoras Por- tuguezas	葡萄妇女总会
Associated Advertisers (Fed. Inc., U. S. A.)	普益广告公司
Associated Agencies (Far East), Ltd.	联锡机业五金有限公司
Associated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	驻华美国联合商会; 驻华花旗商会
Associated American Industri- es, Inc.	美国企业公司
Associated Architects (Shang- hai), The	联益建筑公司
Associated Canadian Manufac- turers	坎拿大商品陈列所

Associated China Traders, Ltd.	友联贸易行; 友联行
Associated Drug Co. (Fed. Inc., U.S.A.)	美商华友大药房
Associated Importers, Inc., U.S.A.	恒丰公司
Associated Life Underwriters	联合人寿保险公司
Associated Manufacturers, Ltd.	宝康洋行; 宝康有限公司
Associated Manufacturers Export Co.	钺康洋行
Associated Merchandising Corporation	诚信洋行
Associated Mission Treasurers	教会司库协会; 教会联合会计处
Associated Neonlite & Advertising Co.	华美霓虹灯告白公司
Associated Oil Co.	大光火油公司
Associated Oil Co. of China	大光火油公司
Associated Petroleum Co., Ltd.	联记煤油有限公司
Associated Press of America	美国联合通信社; 美国联合报
Associated Press of Japan	日本新闻联合社
Associated Produce Co.	厚和洋行
Associated Products Co., Ltd.	亚士德有限公司
Associated Publicity Bureau, The	联合广告事务所
Associated Refrigerator Services	康泰电气冰箱公司
Associated Seal Brand Shippers & Distillery Co.	联印洋酒公司
Associated Storage & Transport Co.	联利运输公司
Associated Trading Co.	联合贸易行
Association Amicale Sino-Belge	中比友谊会

Association of British Traders.Ltd.	英商华盛贸易有限公司
Association of Chinese & American Engineers	中美工程师协会
Association of Exporters & Dealers of Hongkong	香港出入口洋庄商会
Association of Lancastrians in China,The	英国兰格霞旅华同乡会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青年协会书局
Assomull & Co., Wassiamull	森茂洋行
Assurance Franco-Asiatique	保太保险公司; 中法保太水火保险公司
Astor Bar, The	小礼查 (酒吧)
Astor Drapery Store, The	麟大洋行
Astor Grill & Restaurant	新礼查 (餐馆)
Astor Grill Rooms, The	新礼查 (餐馆); 虹口新礼查 (餐馆)
Astor House	① (烟台) 法国饭店; ② (香港) 法冷西酒店; 丫士打酒店
Astor House Hotel	① (烟台) 法国饭店; ② (奉天) 华富饭店; ③ (汕头) 适宜楼; ④ (牛庄) 泰来饭店; ⑤ (上海) 礼查饭店
Astor House Hotel, The	(汉口) 礼查 (饭店)
Astor House Hotel, Ltd.	利顺德饭店
Astor House Hotel Co., Ltd.	礼查 (饭店公司)
Astoria Cafe	瑞丰糖果公司
Astoria Chocolate Factory, Confectionery, Cafe-Restaurant	瑞丰公司
Astoria Confectionery and Cafe Restaurant	瑞丰公司
Astoria Confectionery and Tea	瑞丰公司

Rooms

Astoria Hotel	哈尔滨旅馆
Astoria Tea House	瑞丰公司
Astoria Theatre	光明大戏院
Astra	爱达里也夫父子（装钉厂）
Astra China Co.	恩斯达华行
Astrid Auto Supply Co.	亚斯得利（汽车材料行）
Astrid Modes	爱司曲立特时装公司
Ataka & Co.	安宅商会
Ataka & Co., Ltd.	安宅商会；株式会社安宅商会；安宅洋行
Ataka Co., Ltd.	安宅洋行；株式会社安宅商会
Ataka Sangyo Kabushiki Kaisha	安宅产业株式会社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比国沙城电器制造工厂；比国沙城电机制造工厂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Mecaniques	簿利机器铁厂；（1920年前后更名）华利铁厂
Athens Cigarette Co.	雅典洋行；雅典烟商行
Atienza, Vicente	美先地亚甸沙（洋行）
Atienza & Co., Vicente	美先地亚甸沙（洋行）
Atiyeh, E. N.	天益洋行
Atkinson Academy	私立振声初级中学
Atkinson & Dallas	通和（工程局）
Atiknson & Dallas, Ltd.	通和工程局；通和有限公司
Atlantic Co.	红扇（洋行）；大西洋公司
Atlas, Ltd, Engineering Works (Copenhagen)	亚特拉公司
Atlas Assurance Co., Ltd.	地球火险公司
Atlas Trading Co., Ltd, The	地球（洋行）
Ato Photographic Association	亚东印画协会
Au Bon Marche	福食公司

Au Chic Parisien	① (香港) 芙莲洋行; ② (上海) 美极 (时装店)
Au Louvre Parisien	久未悉 (时装店)
Au Paradis des Dames, Ltda	洞天公司
Au Petit Louvre	胜法 (服装店)
Au Petit Paris	达龙洋行
Auction Salesroom, The	英界沙面夜冷馆
Auctioneer & Brokering Co., Ltd.	英商武治洋行; 武治维洽行
Auctioneering & Brokering Co., Ltd.	英商武治洋行
Audinet & Co., J.	百司 (洋行)
Audinet, Lacroix & Co.	百司 (洋行)
Auditorium Club	中央运动场
Auditorium Store, The	中央运动场商店
Aufwerber & Co., H.	晋德 华行
Aug	信义会
Augan	恩昌 (服装店)
Augan Co.	恩昌 (服装店)
Augusta Trading Co.	奥客斯塔贸易公司
Augustana Synod Mission	信义会
Augustesen, H. C.	雅利洋行; (重庆) 协昌公司
Augustesen China Co., H. C.	雅利洋行
Augustinian Corporation	望德堂
Augustinian Procuration	望德堂
Augustinians	奥斯定会
Augusitniens	圣奥斯定会; 奥斯定会
Augustiniens Recollects	重整奥斯 定会; 奥斯定重整会
Ault & Wiborg China Co., The	利达洋行
Ault & Wiborg Co., The	利达洋行
Ault & Wiborg Co. (Far East), The	利达洋行; 利达股份有限公司

Aurora College for Women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Aurora University	震旦学院；震旦大学院；震旦大学
Auslander's Finance Import Office	上海奥兰大银款办事处；奥兰大银款办事处
Auslander's Finance Office	上海奥兰大银款办事处
Austral-China Import Co.	澳华洋行
Austral-China Trading Co.	澳华洋行
Austral-China Trading Co., Ltd.	中澳贸易公司
Australasia Co-operative Trading Co.	中澳商业洋行
Australia China Trading Co.	中澳贸易公司；中澳洋行；中澳贸易有限公司
Australia China Trading Co., Ltd.	中澳贸易有限公司
Australian Churches of Christ, Foreign Mission Board	基督徒会；澳洲基督会
Australian Dairy Farm Co., The	金山牛奶棚公司
Australian Export Association, The	固安进口公司
Australian Manufacturers, Ltd.	《初称》克罗洋行；（嗣后改名）明昌洋行；澳洲名厂有限公司
Australian National Travel Association	澳洲旅行社；澳大利亚旅行社
Australian Produce Co., The	美荣洋行
Australian Trading Co.	①（1910年代）厚利洋行；②（1940年代）澳大利亚贸易公司
Austrian Export & Import Co., Ltd., The	兴利（洋行）
Austrian Lloyd	奥国轮船公司
Austrian Lloyd Steam Navigation Co.	奥国轮船公司

Austro-Asiatic Trading Co., Ltd.	兴利 (洋行)
Austro-Belgian Trading Co.	良济公司; 上海良济公司
Austro Philippine Trading Co.	大奥洋行
Auswaks, S.	爱礼洋行; 华北皮毛洋行
Auto Castle	大利汽车行; 大利汽车公司
Auto Clinic Service	卫生汽车公司
Auto Doctor Service	汽车医生公司
Auto Exchange	汽车取引所
Auto Hall	亚托好乐 (汽车服务行)
Auto Invicta, The People for Cars	胜利修理汽车公司
Auto Palace	炽信 (汽车行); 利喊机汽车行
Auto Palace Co., The	利喊机汽车行
Auto Palace Co., Ltd., The	利喊机汽车行; 利喊汽车公司; 利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Auto Parts Co.	汽车零件公司
Auto Petrol Union	汽油合作社
Auto Trading Co.	奥多汽车公司
Auto Tyre & Rubber Equipment	米雪仑车胎行
Automatic Electric, Inc. (China Branch)	美国自动电器公司
Automatic Electric Co., Ltd.	美国自动电器公司
Automatic Electric Sales Co., Ltd	美国自动电器公司
Automatic Telephone Manufacturing Co., Ltd. (of Liverpool)	英国自动电话制造公司
Automatic Telephones of China (Federal Inc., U.S.A.)	中国自动电话公司
Automobile Cleaning Service	汽车清洁所
Automobile Club of China	中国汽车偕行社; 上海汽车公会; 中国汽车偕行会

Automobile Insurance Co. of Hartford, Connecticut, The	安泰保险公司
Automobile Service Co.	汽车修理公司；汽车服务公司
Aux Nouveautes	佛来地（时装杂货店），（嗣后更名）新华洋行
Avanozian & Sons, M.	利美洋行
Avdoyan & Co., Inc.	舍坚洋行
Avenue Joffre Flower Shop, The	霞飞花店
Avenue Nurseries, The	爱文义花园
Aviation Engineering Corp.	美国航空工程公司
Awa Kyodo-Kisen Kaisha	阿波国共同汽船会社
Awad & Son, Nicola	中美洋行
Awad & Sons, Nicola	中美洋行；中美花边洋行
Awoki Hospital	青木医院
Ayer Tawah Rubber Plantation Co., Ltd., The	爱耶太华橡皮公司
Ayukawa & Co.	①（上海）鲇川（珠宝首饰店）； ①（大连）鲇川洋行本店
Azadian, Jacques	祥利洋行
Azadian, Jacques (Societe Anonyme)	祥利洋行
Azadian, Leon	礼荣洋行
Azadian Fils, Jacques	祥利洋行
Azadian Freres	礼荣生记洋行
Aziatische Handelmaatschappij voor Mestsoffen N.V., Amsterdam (China Branch)	钾质肥料公司；驻华钾质肥料公司
Azumi Chemical Factory	安住化学工业厂；株式会社安住化学工业厂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一、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目的在于介绍国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二、本刊欢迎有关中国近代（1840——1949年）历史的下列稿件：

1. 专论译文；
2. 专著摘译或节译；
3. 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回忆录译稿；
4.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或述评；
5. 国外有关著作的书评或介绍；
6. 其他。

三、本刊欢迎推荐值得译介的有关文字，建议一经采纳，当赠本刊为谢。

四、译稿要求译文准确，人名、地名、官职、机构名称等，务请查核清楚，引用中文资料应使用资料原文；数字，年、月、日等标写方法，以《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注释一律采用同页脚注。

五、译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即发函通知；一经发表，即按规定致酬；如不采用，妥为退稿。

六、无论译稿或撰写稿，均请使用有格稿纸，书写工整，译文中所附原文请用印刷体书写。

七、来稿请写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

八、来稿来信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勿寄个人。

第14卷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委会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会主办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如筠
责任校对：丁如筠
封面设计：王 鹿
版式设计：李玲玲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四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各 书 店 经 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321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册

ISBN 7-5004-0578-2/K·68 定价：5.25元